

华夏

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2022年2月

双月刊 | 总 224 期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广东省优秀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ISSN 1003-7373



9 771003 737224 02
定价: ¥30 HK\$40 NT\$128 \$20

独家

侨见惠州

西湖若晓月，常与朝云伴；东江似彩练，总系旅人魂。

侨见惠州，惠州惠侨：惠州华侨的一帧帧历史册页，

南海风帆的一阕阕壮丽诗篇。



會員委動運國救空航僑華部外海

據

004 海韵 / 吾心安处是吾乡

077 侨政 / 颜珂：以侨为“桥”打造聚才引才强磁场

104 撇英 / 海归韦艳敏：“侨”见数字时尚创投

110 拾贝 / 鲁迅与史沫特莱

167 湾区 / 广州文化的精神特质

222 海风 / 锡兰过大年

我爱你 中国

程学源

每一次离开
都盘算着回来
每一次不舍
都满含着挚爱

每一次回眸
都闪烁着泪花
每一次挥手
都情深似海

春雨绵绵的时候
你是鲜红的牡丹
每一滴水浇过
都是最美的盛开

夏风徐徐的夜空
你是满天的星斗
温暖动人的曲子
闪烁在我的心海

秋季月圆的时分
你是飘香的桂花
多少深沉的思念
难于表白的挚爱

冬日不冷的异国
你是怒放的三角梅
那些围炉说过的情话

鲜活地一次次彩排

我行走在异国他乡
你总是在梦里梦外
印度洋的海风悠悠
是你在为我喝采

多少忠诚的坚持
多少担当的豪迈
多少坎坷的努力
多少孤独的告白

多少委屈的泪水
多少辛酸的无奈
多少个无眠的夜晚
我想你会明白

每一次爬坡过坎
每一次攻坚克难
每一次执着坚持
每一次温暖花开

你是我心头
不落的旭日
彤红的五星红旗
飘扬着豪迈
你是我耳边
日夜萦绕的雄壮国歌

踏平 千难万险
始终 初心不改

无论是万丈霞光
还是乌云徘徊
无论是狂风骤雨
还是烈日曝晒
我都将你深情遥望
不负你千山万水
千叮万嘱的期待

我是你
襁褓中呦呦待哺的婴儿啊
是炎黄子孙蓬勃的血脉
我是你情切切意拳拳的游子啊
想起你光辉的名字
心儿都会为您 澎湃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请您倾听
儿女们遥远而
深情的诉说
祖国啊
我伟大的祖国
我们会牢记使命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原载《读者》文摘，写于2019年9月3日，作者时任中国驻斯里兰卡特命全权大使，现任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我们，一起向未来

《华夏》编辑部

来，我们手牵手
一起向未来
我们是幸运的虎妹虎仔
华夏已经崛起
我们拥有共同的精彩
爱人类，爱地球，爱生活
深深地爱

亲爱的读者，您好吗？又是一年迎春来，《华夏》杂志全体同仁向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致以春天的祝福，祝愿大家虎年大吉、虎气冲天。

虎，中国十二生肖之一，以其百兽之王的威猛形象，被制作虎符、虎环、虎雕等除灾免祸的镇邪物，趋吉避邪，守护人们吉祥平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两年来的全球抗疫，海内外华夏儿女共进退，互支援，一次次迎来曙光，又一次次陷入困境，再一次次勇敢担当战疫魔。2022年，依然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新冠病毒的持续变异使疫情仍处于全球大流行状态。然而不管形势如何艰难，始终如一支持我们走过风雨、走过坎坷的，是华夏儿女的坚韧、顽强、团结、友爱。

因为疫情，我们原本的生活节奏被扰乱，海内外交流更是受限，相隔千山万水的亲友们不能常常见面、尽情相拥。彼此想念的日子，更多时候只能通过“云端”串起。每一处疫情发现的实锤，每一次确诊病例数字的上升，都让我们诚惶诚恐，担心生离死别的悲剧发生在身边。突然之间，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成为我们每个普通人都需要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您是否感觉到生存的沉重、生命的脆弱？是的，我们每个人都都很渺小，然而心连心、手牵手，让我们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于是，我们多么需要猛虎的神勇和震撼天地的虎啸之声。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虎年，欣逢虎年：大贤虎变愚不测，今年花胜去年红！新的一年，疫情的阴霾虽未散去，但美好从未远离。南海之畔，改革开放的步伐永不停歇。广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建设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以及RCEP的实施，奋战正酣，必将为侨界亲人们发挥投资兴业、双向开放的作用，参与广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重要的历史机遇和发展舞台。

亲爱的读者，您的家人、爱人都在您的身边吗？如果在，请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爱的力量可以驱散前路的阴霾。

一起向未来，希望满怀。🌐

华夏

2022年2月

双月刊 总第224期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华夏杂志社编辑出版

《华夏》编委会

主任 颜珂

副主任 杨春华 刘迪生

编委 柯广宁 钟敏仪

总编辑 刘迪生

副总编辑 钟敏仪

总编辑助理 赵阳欢

视觉设计 广东阅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术编辑 张柳燕

社址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
广东侨联大厦6楼

邮编 510620

电话 020-38879808

邮箱 gdqlhx@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 440000100021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刊

承印单位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 ¥30 HK\$40 NT\$128 \$20



■ 海潮

001 我们，一起向未来/《华夏》编辑部

■ 海韵

004 吾心安处是吾乡/巫国明

■ 侨政

077 颜珂：以侨为“桥”打造聚才引才强磁场/龚春辉

079 新征程承载新使命

——广东省侨联十一届三次全委会议侧记/乔莹

081 广东侨联纪事/林辅毫

085 侨胞盛赞2022侨联春晚/于超等

087 在推进新时代自我革命实践中展现新作为/李家瑞

■ 撷英

090 追忆祖父的挚友梁灵光/曹卫东

095 余思伟：记录者，更是见证者/赵阳欢

098 “健康女神”的善美之行/何尚

102 失聪天使的灵魂工程师/邓仕勇

104 海归韦艳敏：“侨”见数字时尚

创投/莫斯其格 曾德雄 刘志超

■ 拾贝

110 鲁迅与史沫特莱/嘉禾

120 杨克：“永远在路上”的诗人/苟文彬

126 那些“无足轻重”里正蕴含着铮铮质地/李一鸣

128 贺龙敲石鼓红旗漫天舞

——在长江第一湾追忆红军/白浩

132 词有别裁天地宽

——卢家明《词林别裁》的艺术世界/郭守运

136 大家小文亦精彩

——读朱小平散文集《像蜀锦一样绚烂》/张陵

140 灵魂超度的时间想象

——谈张况的《史诗三部曲》/郭小东

144 印说岭南/黎向群

146 比较文学变异学视域下的《雷克斯罗斯诗歌与

《道德经》》/魏君珊

CONTENTS 目录



- 014 惠州简史/惠然
- 018 惠州侨文化展览馆探寻/邓丽琼
- 024 叶亚来：乱世中展身手，吉隆坡埠敢称王/邓见柏
- 027 林海山：追随国父，矢志革命/吴泽思
- 030 廖仲恺：革命终生，百折不回/邹雄彬
- 034 曾生：忠肝义胆书赤诚/朱敏菊
- 037 廖承志：丹心一片承先志，鞠躬尽瘁为家国/吴尚云
- 040 袁学才：尽责履职，点燃人生/张雪婷
- 043 陈锋：三尺讲台，廿年岁月/子衿
- 045 黄延辉：用人生写下爱国誓言/静姝
- 047 曹丽云：回“唐山”去/张雪婷
- 050 潼侨的呼唤/肖建国
- 052 一甲子的流光溢彩/客都
- 062 为惠州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凝聚侨界
新力量/惠州市侨联
- 067 叶挺红军小学讲学记/孙福盛
- 070 博罗侨胞的家国情怀/舒伟平
- 072 我的新生/姚应崇
- 074 万里归舟 大美潼侨/罗春彦
-
- 149 质朴而鲜活的乡村水彩画
——评秦锦屏散文集《万木生芽》/安裴智
- 152 杨清茨：自然天成 内美静悟/周由强
- 155 彩笔追风
——动态人物画家徐治庆画奥运/丰雪心
- 159 虎至福臻
——左昌亚生肖作品赏析/高达之
- 湾区
- 162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畅想/钟晓毅
- 167 广州文化的精神特质/王焱
- 169 欧阳山《三家巷》：青春叙事，以及现代广州的
童年/于爱成
- 181 《赛龙夺锦》描绘的近代音乐人群像/许泽红
- 186 歌从山中来
——客家山歌的大山情怀/陈菊芬
- 193 《雄狮少年》：非遗国漫助推岭南文化
传播/童雯霞 王玉洁
- 196 客家酿豆腐/彭伟栋
- 197 中国海龟湾/刘明霞
- 海风
- 206 让卢永根故事代代相传/姚燕飞
- 207 侨乡沙堆的浓浓乡梓情/黄柏军
- 213 陈炯明与《南侨月报》/王毓伟 彭露
- 216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写在广东省侨刊乡讯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周年
之际/肖韵贤
- 222 锡兰过大年/杨海蒂
- 228 我留学时的室友/冯萍
- 230 巴拿马华裔作家陈玛琳的传奇一生/苑雨舒
- 234 《鸿雁飞越加勒比》西文版序言/徐世澄

吾心安处是吾乡

文/摄 巫国明



作者简介

巫国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摄影家协会摄影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现供职于广州市增城区政协。



摄影于我，不只是光影、角度、画面、景物的谋略，更是时空定格，情感传递，审美指向，思想结晶。我深爱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深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文景象与自然景物。许多影友不惜万金千里迢迢去追拍名山大川，我却在家乡增城的山山水水、田野村庄寻寻觅觅，淘我心目中的黄金。

乡村是我们城市的摇篮。那里不



⑦ 敬祖

但有着我们先祖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有着他们的艰辛与奋斗、光荣与梦想，还蕴含着无比鲜明的乡土风俗、无比纯朴的俚言人情，代代相传的神奇传说、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自然，也承载着他们的诸多无奈、挫败、难以改变的命运和挥之不去的忧伤……所有这些，正是我们的传统、现实与根之所在。对乡村的无视、遗忘，就意味着忘本、背叛。著名诗人艾青曾以诗的形式发出肺腑之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总是怀着感恩之心走向乡村。我不奢望能拍出多漂亮的作品，只期望于别人熟视无睹之处，有我自己的发现，为父老乡亲，为家乡，留一份值得珍存的记忆，留一份美丽的乡愁。这个系列的习作，正是我基于上述认识与行动的结果。我想通过镜头，用我的摄影，去记录、拥抱、温暖、安抚一条条垂垂老去，或面临拆迁，或行将消失的村庄，为它们唱出我深情的挽歌。





结婚习俗之一——咬苹果，寓意平平安安、幸福美满
孩子们喜迎新春
传统民俗舞蹈——貔貅舞









丰收
童趣



独家 | 侨见惠州

泛黄的老照片上或是忧愁或是欢喜的脸庞，讲述着波澜壮阔却鲜为人知的故事；玻璃罩里刻满岁月痕迹的物件，低语着思念、盼望和归来。文字里满溢深情，薄薄的纸中寄托着最沉重的牵挂。在这座承载着时代记忆的展览馆里，惠州华侨历史文化资源被注入了新鲜血液，获得了新生，以展览的形式讲好华侨故事，赓续家国情怀，吸引更多的人了解惠州华侨历史。这期独家策划，我们一起探寻惠州的侨文化。





卷第224期

惠州简史

文 惠然

惠州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惠州境内不断被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展示了惠州从史前到先秦的社会文化发展链条，为惠州自秦汉开始的郡县制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今惠州地域置博罗县，县治位于梁化屯（今惠东县梁化镇）；三国东吴甘露元年（266年），博罗改名“博罗”，博罗一名沿用至今。

东晋咸和六年（331年），今惠州地域属东官郡管辖范围。南朝齐时期，东官郡治从今深圳市的南头古城迁往怀安县（怀安县由当时的博罗县东部析出，今惠东与惠阳一带），这是惠州历史上的第一个郡治。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

析南海、东官两郡地置梁化郡，辖欣乐、博罗、河源、龙川、雷乡五县。

隋开皇九年（589年），全国撤郡设州，始兴郡、梁化郡、东官郡、义安郡合并为循州，博罗县徙治至浮碇冈（今博罗县城）；开皇十年（590年，一说开皇十一年），循州总管府迁至归善县棕山（今惠城区中山公园），辖循、潮两州，开启了惠州作为府（州）治的历史，也成就了惠州成为总管府级（省级，军政兼治）政区的始端，使其成为岭东重要的军事要塞和战略重镇。循州、祜州、惠州府均设治于归善县内，故归善县有“东江首邑”之称。

五代南汉乾亨元年（917年），循州分置为



⑦ 惠州西湖

循州、雉州。原循州改为雉州，州治仍在原循州州治所在地（今惠城区桥西街道），辖归善、海丰、博罗、河源四县，雉州成为惠州历史上的第二个名称。同年，循州州治迁至龙川县（今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辖雷乡、齐昌，这是历史上循州（龙川）、雉州分治的开始。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一说北宋天禧五年），因避太子赵祯讳，雉州改名为惠州，辖县和州治未变，惠州之名自此而始。

明代，地方政区重新划分，惠州与循州（龙川）分治的局面结束。明洪武元年（1368年，一说明洪武二年），改元代设置的惠州路为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四县，惠州“府

城”的称谓自此而始。至崇祯六年（1633年），惠州府辖归善、博罗、长宁、永安、海丰、龙川、长乐、兴宁、河源、和平十县，并设连平州（领河源、和平两县）。

清代，惠州府所辖从明朝的一州十县到一州十一县，再到一州九县，这就是“惠州十属”的开始，并一直延续至清末。整个清代，惠州府治都在惠州城。1912年，惠州府与归善县合并，改名为惠阳县，直辖于广东都督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区划调整，惠州辖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设有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



01/秦

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秦置博罗县，县治位于梁化屯（今惠东县梁化镇）



03/东晋

咸和六年（三三二年），今惠州地域属辖郡管辖范围



04/南朝

◎ 齐时期，东官郡治从今深圳市的南头古城迁往怀安县（今惠东县梁化镇），这是惠州历史上的第一个郡治
◎ 梁天监二年（五〇三年），博罗县治从梁化屯迁于浮碇冈（今博罗县城）



02/三国

东吴甘露元年（二六六年），博罗改名「博罗」，博罗一名沿用至今



葛洪像



05/隋

开皇九年（五八九年），置循州，开皇十年（五九〇年），循州治所设归善县（今惠城区）



06/五代

南汉乾亨元年（九一七年），循州、循州（治龙川）分治



⑦ 惠州历史沿革图

惠州侨文化展览馆探寻

文 邓丽琼

走进位于惠州市潼侨镇的潼侨公园，一组白色的人物雕像格外瞩目：五座象牙白的男女雕像依次排列，排头的男子颌首微笑，头戴富有越南特色的帽子，拖着行李箱；后面跟着的几个人物有的戴着斗笠，有的头顶包裹，归来的喜悦荡漾在他们的脸上。沿着公园往里走，一块巨大的石碑上刻着鲜红的“侨”字，石碑后就是惠州侨文化展览馆。恍惚之间，仿佛看见了归侨们当年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建设家乡的身影。

惠州侨文化展览馆于2021年正式开放，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250平方米，是一座全面系统收集、研究、展示惠州华侨华人历史和业绩的展览馆。

展览馆设有三个固定展厅：第一展区“侨乡”，由“华侨溯源”“粤侨分布”“侨乡惠州”组成，对惠州华侨华人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探索和梳理；第二展区“侨心”，由“精忠报国”“中华文脉”“情系乡梓”组成，揭示了惠州华侨华人与祖国同气连枝的紧密联系；第三展区“侨情”，由“爱侨护侨”“侨乡兴旺”等组成，展示了华侨华人对祖国的依存，对家乡的情感，以及归侨在新时代侨乡的生活工作。

展览馆目前收藏有数百件侨史物件和大量侨史资料，包括上千张侨史照片和部分音像资料等，通过实物还原、图片文字记载、多媒体影像展示、侨文化主题书吧等形式，再现惠州华侨华人的辛酸史、奋斗史和成就史。



⑦ 惠州侨文化展览馆展厅

根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唐代之后就具有相当规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移民潮。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对移居国外的华人没有固定的称谓，多称他们为“唐人”“北人”“中国贾人”等。清光绪九年（1883）郑观应首次使用了“华侨”一词。此后，“华侨”逐渐成为移居海外中国人的专称。

惠州是广东著名侨乡，惠州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末或宋初，据《南洋华侨通史》记载，唐代初年有惠州人居住在东南亚，由于海上贸易发展迅速，出海商人“十倍于昔”。至18世纪末，仅马六甲海峡的惠州人就有3000人之多。他们扬帆远航，在海外开荒垦殖、经商贸易、开枝散叶，逐步形成华侨社会。惠州人移居海外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避战乱到海外谋生。宋末，元兵大举南下，惠州城破后，避难者与“诸文武臣流离海外”，漂流到南洋各地定居。而惠州人大批移居海外，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当时朝廷腐败、连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许多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破产，被迫背井离乡到南洋谋求生路。1922年至1925年，由于东江地区战乱，众多惠州人又逃荒到泰国做苦工。

二是被招募或掳掠为劳工（华工）。西方殖民者占据东南亚各地之后需要大批劳动力开发资源，遂在中国招募和掳掠大量劳工。明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政权，两次赴粤招工，惠州被招至菲律宾的工匠达数百人。清道光三年（1823），南洋英属各地都能看到契约华工的身影。清咸丰四年（1854）惠州又有数千人被招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开采金矿。清同治二年（1863）美国修建太平洋铁路，招募华工数以十万计，其中惠州籍华工就有数千人。

三是逃荒。天灾也是导致惠州人逃到海外的

原因之一。如清乾隆七年（1742）惠州大旱，近万人逃荒到菲律宾谋生。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惠州又大旱，斗米百钱，数千惠州人逃到泰国谋生。清乾隆六十年（1795），惠州发生大饥荒，沿海农民、渔民逃荒到南洋各地谋生。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夏，惠州遭受大水灾以及秋冬大饥荒，沿海居民远渡南洋谋生者数以万计。

四是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历史上数次起义失败后，都有不少起义者流亡海外。包括清咸丰四年（1854）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由翟火姑领导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时期由孙中山发动的惠州三洲田起义及七女湖起义，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失败后，东江革命根据地沦陷，革命志士逃亡海外或港澳谋生，从事海外革命活动。

五是海洋贸易。唐代“循州是临海而居的，造船业尤为发达。造的大船长二十丈，容四百多人”。惠州人乘坐大海船扬帆远航，到南洋各地进行海口贸易或“住蕃”。早期惠州移民多因通商贸易滞留当地，主要聚集在交通、贸易较发达的东南亚各地港口。囿于当时交通不便和历代王朝的禁令，他们大都与当地民族通婚、融合，同祖籍故土甚少联系。明隆庆、崇祯年间，海禁放宽，海上贸易大为发展，出海商人大规模增加。明郑和下西洋时期将马来半岛马六甲作为中途站，海禁放宽后，马六甲已发展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东西贸易中心。惠州人到马六甲最初进行贸易，有部分人做苦工，开采锡矿；也有部分人开荒垦殖，从事农业。

在华侨移居海外的过程中，虽然生活状况恶劣，但是中国人凭借勤劳智慧，通过经商贸易、亲属牵引、家庭团聚等形式创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成为新兴民族国家，让华侨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为了适应侨居地的新局势，华侨绝大多数加入居留地国籍，或根据当地法律自动成为当地公民。这样，华侨就变为华人，在当地繁衍生息。

魂

虽然身在海外，但华侨时刻心系祖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对祖国和家乡作出贡献。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2月，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入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早期的126位会员中，华侨就有80余名。在惠州地区，1900年10月8日，由孙中山组织策划，惠阳人郑士良领导指挥，东江华侨子弟参加的三洲田起义爆发；1907年6月，由孙中山组织策划，惠州人邓子瑜、陈纯领导的七女湖武装起义，在汝湖下庙爆发。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义，惠阳籍罗仲霍等31名华侨参加起义。最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共有86名革命志士牺牲。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险将72名烈士的遗骸收殓，安葬于红花岗。因黄色菊花代表烈士英魂，后将红花岗称为“黄花岗”。

东江陷敌，故国烽火。1938年10月，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旅居海外的宝安、惠阳、东莞华侨义愤满腔，纷纷捐集粮款物资，以解倒悬。南洋惠属侨胞得知日军侵



郑士良（1863—1901），原名振华，字安臣，号弼臣，惠阳淡水人，出生于华侨家庭，是孙中山早期革命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惠州三洲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邓子瑜（1878—1925），博罗县麻陂乡丰门村人，早年为归善（今惠州）、博罗等县三合会首领，因参加反清活动遭通缉，避居香港、新加坡。1900年发动惠州三洲田起义，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3月赴香港并被推举为革命军首领，1907年6月领导七女湖武装起义。



罗仲霍（1882—1911），字则君，惠阳人，中国同盟会会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906年毕业于马来亚槟榔屿师范学堂，曾受聘筹办吉隆坡尊孔学堂和荷属水火山中华学堂，并担任两校校长和檳城华文报《新报》主笔。1911年3月，由南洋返香港从事秘密活动；4月参与广州起义。

略华南地区后，立即行动起来，救国救乡。10月30日，南洋英荷两属惠州侨胞在马来亚雪兰莪州首府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南洋各埠惠州华侨代表大会，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推举爱国侨领黄伯才（吉隆坡惠州会馆总理）为主席，总部设在吉隆坡惠州会馆，各州设分会。随后，南洋惠侨救乡会组织回乡服务团，各地华侨先后组织队伍回国。1939年1月中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在惠阳县淡水成立，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

1939年2月25日，南洋各埠惠州同胞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兼参谋长郑晋（郑天保）应邀出席大会。为了进一步支援祖国抗战，大会决定发动第二期募捐，把募捐所得款项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20%作为惠州难民救济费。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侨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祖国早日和平安定，并为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如淡水有华侨家属1000多人抢修淡水至龙岗等地的公路，为解放军物资运输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在民族危难之际，惠州籍华侨华人纷纷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



② 南洋吉隆坡华侨数千人组织“东团”回国投军

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部分国家形势动荡，不同程度上危及华侨在当地国的生存与发展。不少华侨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归祖国，建设新家园。根据当时的国情和侨情，华侨农场应运而生。广东省有23个华侨农场，分布在全省14个地级以上市，其中惠州市有2个，分别是潼湖华侨农场和杨村华侨柑桔场。追寻侨乡的发展史，一代代归侨以敢为人先的气魄，在荒丘起伏、杂草丛生、房屋破旧、百废待兴的侨场挥洒汗水、开荒拓土、发展生产、建设家乡。惠州侨文化展览馆如今所处的地方，正是当年的潼湖华侨农场。

这片土地经历了数次流变和更名：惠阳县国营潼湖畜牧场、广东省国营潼湖华侨农场、潼湖华侨农场、潼湖经济管理区、潼侨镇。

惠阳县国营潼湖畜牧场于1959年11月8日筹建，12月31日正式成立，位于潼湖地区一座叫菠萝山的地方。该地原是个杂草丛生的小山坡，古名鹞婆石，因山坡顶有块石头形似鹞婆鹰鸟而得名。后因当地居民在此垦荒种植菠萝，故名菠萝山。

惠阳县国营潼湖畜牧场的人员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金星、宏村、光明三个大队的社员，



③ “东团”成员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另一部分是于1964年至1965年先后接待安置的402名汕头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了接待安置这批知青，畜牧场开辟了狮头岭和菠萝山青年新村。

1966年9月，惠阳县国营潼湖畜牧场正式改为潼湖华侨农场，从1966年至1991年的25年里，接收安置归难侨共3批。第一批于1966年至1969年，主要来自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少数来自印度、日本和法国；第二批于1978年至1979年，主要来自越南，近5000人，规模为3批中最大；第三批于1991年接纳从陆丰、揭阳等地市华侨农场迁移的归侨。

潼湖华侨农场建立初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只有荒山、滩头、洼地，缺乏水利设施、通信设备，防灾害能力差，每年5月至9月，潼湖地区被淹没在洪水之中，方圆十几里白茫茫一片，有

“一日大雨水汪汪，三日无雨田龟裂”之说。

被安置于此的归侨抵达不久后被分为几个生产队，每人发了一把锄头、两个畚箕、一根扁担，生产队队长教他们如何使用这些农具。对于他们很多人而言，这是第一次见到农村的模样，更是第一次干农活，但是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边建房，边开荒，边生产。部分住房建好后，紧接着就开展了围堤、挖渠、开荒、造田、兴修水利的工作。他们还种植水稻，同时发展茶叶、水果和淡水养殖。随着开垦面积不断增大，为增加农业生产收入，又增加种植甘蔗、香蕉、柑橘、花生和油菜等农作物。各生产队开办小猪场，侨场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1978年，国营潼湖华侨农场更名为广东省潼湖华侨农场，划归省华侨农场管理局管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潼湖华侨农场摸索蹒跚了10余年后，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探索并



⑦ 侨场织造厂成立

初步进行经营管理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管理机构、体制的改革；农业方面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基础上，以茶为主，多种经营；工业方面引进外资，兴办外资企业。

1979年，潼湖华侨农场设立5个管理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自负盈亏，调动广大归侨的积极性。农业水稻生产总产量增加，实现了稳产、高产，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与此同时，茶叶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农场的支柱产业之一。由于归侨把国外茶叶种植的经验融合运用于潼湖地域的水土优势中，潼侨生产的茶叶质优味美，驰名遐迩，形成特色鲜明



⑦ 青年新村



⑧ 侨场医院

的茶文化。潼湖茶厂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拥有茶园面积2000亩，职工400人，产品曾一度大量出口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创汇丰厚。

1981年起，潼湖华侨农场陆续成立建筑工程、供销商业服务、畜产品养殖农业发展服务企业，还办起独立中小学、医院、敬老院等。侨场工业原是一张白纸，建场前仅有金星、光明两个大队有土糖榨、土油榨的小作坊。自建农场后，相继建起锯木厂、砖厂、粮食加工厂等，特别是建了一间比较有规模的农机修配厂。20世纪80年代，侨场引入外商、外资，“三资”企业迅速发展，农场集资大力兴建厂房。1984年，引进了两个来料加工毛织厂。到1995年，有日本等地的外商承租来料加工的厂商如制衣厂、灯饰、电子、毛织手袋、丝花、工艺等25家，农场私营企业也发展到25家。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潼湖华侨农场大胆改革创新，斥资大力兴建厂房，积极引进外资企业进驻，经济总量不断壮大，职工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潼湖华侨农场的交通运输、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和社会治理都获得长足发展。

过去50多年，惠州的华侨农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一片片沼泽草地，今日变成一片片良田；昔日晴天尘土飞扬的坎坷路，今日变成一条条宽敞的康庄大道；昔日低矮破旧的泥土坯房，今日变成成片聚居的高楼洋房；昔日过着“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如今高新技术产业和中高端制造产业加速崛起，广大归侨侨眷住上了归侨侨眷聚居小区，逐步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在祖国生根散叶的同时，归侨不仅保留了侨居海外时的习俗，而且传承着异域风俗，形成了东南亚国家特色鲜明的侨文化，并渗透到衣食住行等方面。文娱生活、文体活动、特色产品、异域美食无不散发着浓浓的华侨文化和特色，构成了独属于惠州侨乡的异彩缤纷的画卷。🌍

叶亚来：乱世丛中展身手，吉隆坡埠敢称王

文 邓见柏

19世纪中叶以前，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下同）吉隆坡还只是一片莽莽苍苍的热带丛林，而如今，这个地方已游人如织、高楼林立。吉隆坡的变迁史中，留下了华侨华人先辈们的深深印痕，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叶亚来的惠州惠阳人。他是吉隆坡第三任甲必丹，将自己的一生融入吉隆坡的开埠历史之中，被华人社群公认为吉隆坡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生于乱世 白手起家

“乱世出英雄”，1837年，叶亚来出生于今惠州惠阳秋长周田，他出生后不久，中国就卷进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漩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大肆侵华。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两千八百万银元的战争赔款和赎城费，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加紧横征暴敛，将税收增加一至三倍以上。兼之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民族矛盾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广大农民揭竿而起，反清起义达到高潮。

年幼的叶亚来就生活在这样兵荒马乱的社会环境之中，他只读了两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大部分时间帮助父母务农或当牧童放牛。十三四岁时，为了维持生活，叶亚来离家替人种田或打短工。1854年，年仅十七岁的叶亚来为求生计，辞别父母，背井离乡，跟随同乡人一起乘船南渡，前往马来亚。

当时的马来半岛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在欧洲殖民势力还未到来及建立有效的统治之前，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十分恶劣，蛮烟瘴气，凶兽四出。随着马来半岛等地大量锡矿被发现，以及各种农业作物被开发，不同族群的移民纷纷到马来亚谋生。叶亚来从马六甲上岸，他的双脚踏上了这片土地，成了典型的早期移



叶亚来

民中的一员。

刚开始，叶亚来由族亲叶国驹安排在榴莲洞加的一处锡矿工作，四个月後，由於该锡矿生意欠佳，他又被安排到附近吉山镇的一家杂货店当助手，店主叶五是叶亚来的族叔。一年后，叶亚来与一位叫叶福的同伴，从马六甲步行至附近的芦骨谋生。1856年，叶亚来到达芦骨后，先在惠州籍客家人张昌的矿场当厨师，三年后又改行做猪只买卖，并因此认识了芙蓉华人甲必丹盛明利的随身护卫刘壬光，受邀加入了盛明利所领导的海山派帮会，成为刘壬光的助手。

1860年，双溪、乌绒两个马来集团因争夺华人锡矿税收等利益而发生冲突。当地两个华人帮派，即海山派和义兴派，也因本身利益而分别支持其中一方。这次武装斗争历时半年，双方均死伤惨重。最终海山派战败，盛明利也遭敌人所杀。为了善后和预防类似冲突重演，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叶亚来被推举为甲必丹的继任人。就这样，年仅二十三岁的叶亚来成了权重一方的双溪乌绒华人甲必丹。

迎难而上 权重一方

1862年，叶亚来受到当时已为吉隆坡甲必丹的刘壬光之邀，卸任双溪乌绒华人甲必丹一职，到吉隆坡辅佐刘壬光。叶亚来除了替刘壬光管理锡矿和一般行政工作外，也负责经营巴生港的商务，还开设了一家店号叫“德生”的药材店。到了1868年，刘壬光病重，不得不考虑吉隆坡甲必丹的继任人选。次年，三十二岁的叶亚来继任为吉隆坡的第三任甲必丹。

然而等着叶亚来的是一盘混乱的棋局。因吉隆坡的华人以同姓宗亲为轴，各自抱团，势力根深蒂固，而叶亚来资历不足，在吉隆坡还未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他一上任就遭到以刘、关、张姓宗亲为主的一批华人的反对。面对

这一困境，叶亚来邀请了马来土酋素单甫亚沙出面告诉反对他的人：苏丹和地方领袖已经同意叶亚来担任甲必丹，而且这个安排也尊重了前任甲必丹刘壬光的遗嘱。

这次危机的化解并没有使叶亚来就此高枕无忧，因为他知道，阻碍他在吉隆坡站稳脚跟的远不只刘、关、张姓宗亲的反对，另外一个严峻的外在问题就来自叶亚来的原雇主张昌。1856年，叶亚来初到芦骨的时候，曾在张昌的矿场当厨师。昔日手下的厨子爬上头来当领袖，张昌哪能服气！于是，在叶亚来担任甲必丹之后的半年，张昌从间征（张昌的势力地盘，位于吉隆坡以北）率领二十余人到吉隆坡闹事。他们表面上是到吉隆坡拜访叶亚来，却拒绝在他家留宿，反而在镇上大吃大喝，制造麻烦。类似这样的戏码重复上演，叶亚来与张昌的斗争越发激烈。

另一个外在问题来自马来族群间的权力斗争，即长达八年的雪兰莪内战（1866—1873），其复杂性比华族间的权力斗争更甚。这场马来皇族中的两个集团间的内战是由于锡米征税权的利益问题引发的，初阶段的内战双方是拉惹玛蒂和拉惹阿杜拉，最后以拉惹玛蒂胜利，成为雪兰莪最有实力的人物而告终。1869年，他以苏丹代表的身份正式册封叶亚来为甲必丹。

但马来皇族间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不到一年，拉惹玛蒂被苏丹的女婿东姑古丁击败，还被赶出巴生，拉惹玛蒂的势力就此消失。叶亚来迫于形势及自身利益，转而与东姑古丁结盟，直接卷入第二阶段的雪兰莪内战。拉惹玛蒂被赶出巴生后心有不甘，除了重新组织马来军队外，也拉拢叶亚来的仇家张昌集团，试图重振声势，伺机反攻。1870年至1872年间，两股敌对势力先后在瓜拉雪兰莪、安邦、万挠、古毛和吉隆坡等地展开争夺战。最后吉隆坡失守，叶亚来只好撤退到巴生。

经过几个月的重整军队，叶亚来于1873年



② 叶亚来故居碧滢楼

3月收复吉隆坡。而拉惹玛蒂集团的势力终于被肃清，雪兰莪内战宣告结束。同年五六月间，东姑古丁特地从巴生前来吉隆坡，基于正统的观念重新委任叶亚来为吉隆坡华人甲必丹，授予其合法管辖吉隆坡的权力。

开埠功臣 华人领袖

战乱期间，吉隆坡两度易手，三度被焚，战争后满目疮痍，民生凋敝，锡矿场也化为水潭。面对这一“烂摊子”，叶亚来的许多同僚都希望他迁，但叶亚来一个个地说服了他们，让他们留下来一起重建吉隆坡。1873年至1880年，叶亚来全力投入建设吉隆坡，使之从一个战乱废墟发展成为雪兰莪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叶亚来首先做的是振兴当地经济，他认为重中之重是发展当时最有经济价值的锡矿业。他向政府和英商借了开矿资金，并从马来亚各地，甚至中国引进劳工，使吉隆坡地区成为马来亚的锡矿中心之一；其次，他鼓励不善于开矿的马来居民在吉隆坡近郊种稻，并给予各方面的协助；再次，他极力推动建筑业和公共建设，并开设砖窑，鼓励居民以砖瓦兴建房屋；此外，他多元化

经营业务，除了锡矿场和粮食生产以外，还开拓了牧牛场、养猪场、屠宰场、采石场、码头、仓库等业务。

叶亚来也很注重社会公益。一方面，针对当时吉隆坡医疗服务匮乏的问题，叶亚来设立医院医治和照顾病人，并开办养老院收容贫苦无依的老人；另一方面，为了让居民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叶亚来捐出市中心地段，作为仙四师爷的庙址，将其奉祀为吉隆坡的保护神。同时，他还捐拨土地兴建拿督庙和惠州会馆。在文教方面，叶亚来在重建吉隆坡时创建了当地第一所华文学塾，礼聘前清举人叶树纲为授课老师。后将学塾改为唐文义学，并增聘徐绍荪为教师，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而在交通建设方面，叶亚来耗巨资在吉隆坡建筑道路，如巴刹街、安邦街、罗耶街等。就这样，在叶亚来的管理下，吉隆坡渐渐恢复生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885年，叶亚来因劳累过度病逝，年仅四十八岁。“叶亚来是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华人社会的一面旗帜”，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盛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雪兰莪内战时表现英勇、善于领导，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建吉隆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担当和毅力。🌐

林海山：追随国父，矢志革命

文 吴泽思

位于惠州惠东北部的安墩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地处山区，环境秀丽，树木常年青葱，空气清新怡人。惠州著名华侨林海山就出生在这里。

林海山出生于 1871 年。生活在苦难的年代，且家境贫寒，林海山从小就饱尝人间的苦辣辛酸。八岁那年，他进入私塾读书。虽然年纪尚小，但他很是珍惜求学的机会，勤奋好学，于 1883 年 8 月考入惠州府归善县观澜书院（惠州市第二中学前身）。在观澜书院里，林海山与同窗互相勉励，勤奋攻读五个春秋。时逢清末，清政府腐败无能，社会动荡不堪，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百业萧条。在这样的时局下，林海山毕业就等于失业，生活无着。于是，1888 年，他与一批学友便前往香港谋生。不料，抵港后却被诱骗至美国旧金山，与殖民主义者签订了卖身五年的契约，成为一名卖苦力的契约华工。其间，林海山在矿上工作，十分辛苦，饱受不公平待遇。

三洲田起义展雄志

1894 年 11 月，由于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林海山在檀香山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是最早参加兴中会的惠州华侨之一。不久，他跟随孙中山到香港组织“兴中会总会”，并与郑士良、胡汉民等人在日本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1900 年 10 月初，林海山受孙中山委派从日本横滨回到归善，协助郑士良发动三洲田起义。同年 10 月 6 日，起义爆发，起义军分两路进攻，一路由林海山、杨发率领一千多人从金龟洞出新圩攻占镇隆，击败了镇隆的清军后，向惠州城挺进，围攻惠州城。部队行至佛子坳时，与清军相遇。起义军勇往无畏，手执戈矛者在前，持枪者分列左右两翼，匍匐上山，与清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经此一役，活捉归善县县丞兼清军管带杜凤梧，俘虏清军数十人，获得一大批枪支弹药。旋即，林海山与杨发又率领起义军折向攻打永湖。永湖之战中，清军不敌起义军之攻势，被杀得丢盔弃甲、人仰马翻，狼狈逃窜。起义军又夺得大批枪支弹药，军心大振，遂乘胜前进，经平潭、平山、梁化、白芒花（今白花）进入三多祝（今多祝），捷战连连。



十几天内，起义队伍从六百余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声势浩大。但因多次战斗，枪支弹药耗损巨大，且又无外援，最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遭受失败。

三洲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成为孙中山及其政党领导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首次战争的重要实践。孙中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经此一役，“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林海山等革命党人出走香港、南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01年至1903年，林海山到新加坡、越南、日本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为了灌输新知，让自己的思想更先进，以便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林海山于1904年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在日本学习期间，林海山与廖仲恺结识。异国他乡遇同乡，两人一见面便十分亲切。廖仲恺称林海山为“大哥”，说他“是惠州三洲田起义的虎将”。面对夸奖，林海山十分谦虚，说“海外赤子同心同德，为推翻清廷，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而奋斗”。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林海山积极入会，被任命为中国同盟会越南分会会长。林海山到达越南后，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他指出，“因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我们必要倾覆清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实行共和，使祖国富强独立，不受外国帝国主义欺凌”。

1907年12月，孙中山发动镇南关起义。林海山、黄明堂率领起义军突袭镇南关，占领了多个要塞，取得战役的胜利。起义队伍中，有不少是越南华侨战士，可见林海山在越南宣传革命思想取得了良好效果。经镇南关战役，林海山的事迹在越南华侨中广泛流传，有“破敌最，素为孙中山所器重”的赞誉。

1911年农历三月，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震动全国。同年农历九月，林海山受孙中山任命，与邓仲元等共同策划惠州武装起义。接受任命后，林海山在安墩、平山发动一千余人，与其他部队共赴马安圩集结。战斗打响后，起义军奋战一夜，直扑县城，包围府城，迫使清军投降。惠州光复后，林海山、邓仲元等率军由县城出发，经水东街过浮桥直进府城，受到百姓的欢迎。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林海山被



任命为东江水陆军务督办和行营绥靖公署主任（驻惠州提督衙署内）。任职期间，他实行保护华侨政策，禁止买卖人口，革除种植和吸食鸦片、赌博、缠足、嫖娼等恶习，改革官制。同时，他还倡办实业，提倡普及教育，鼓励人们兴办工商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这些制度政策，革故鼎新，具有民主革命的新精神。

1913年，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随后，林海山为躲避袁世凯的通缉，弃官出走南洋。1914年7月，孙中山为了讨伐袁世凯，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林海山再次前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中华革命党马来亚



⑦ 惠州中山公园三洲田起义浮雕

吉隆坡支部主委，在马来亚筹措讨袁款项。次年12月底，林海山受孙中山命令从海外回到惠州，再次组织武装起义。此次攻占惠州城之役历时三月之久，因粮尽援绝未能胜利，林海山还在战斗中受了枪伤。尽管结果不尽人意，但这并未打击林海山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决心。他又再次到南洋为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

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叶挺、林海山等的掩护下冲出敌人的包围，辗转登上永丰舰，到达上海。叛军作乱时，林海山不顾个人安危，率队迎击，激烈作战，不幸右肋中枪，血染军衣。英勇杀出重围后，他乔装成“商人”，乘船到香港疗伤。此后，林海山始终忠于孙中山，拒绝陈炯明的拉拢，并策划讨伐叛军的武装暴动。然而，讨伐陈逆的行动遭到泄密，林海山被捕入狱。在狱中，他遭到严刑拷打，险些丧命，后在惠阳父老乡亲的联名保释下得以释放。

革命的道路凶险多多，但这些都未能击垮林海山，历尽苦难，他仍坚定地追随孙中山，将革命进行到底。

弃无权之职而办实事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举国哀悼。林海山闻讯，悲恸欲绝。同年8月，廖仲恺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暗杀，这一噩耗又深深地打击着林海山的身心，令他极度伤心。悲痛至极的他号召“黄埔健儿起来报仇”，因此遭到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忌恨、排斥。这年冬天，受到排挤的林海山改任有职无权的粤军大本营总参谋部中将参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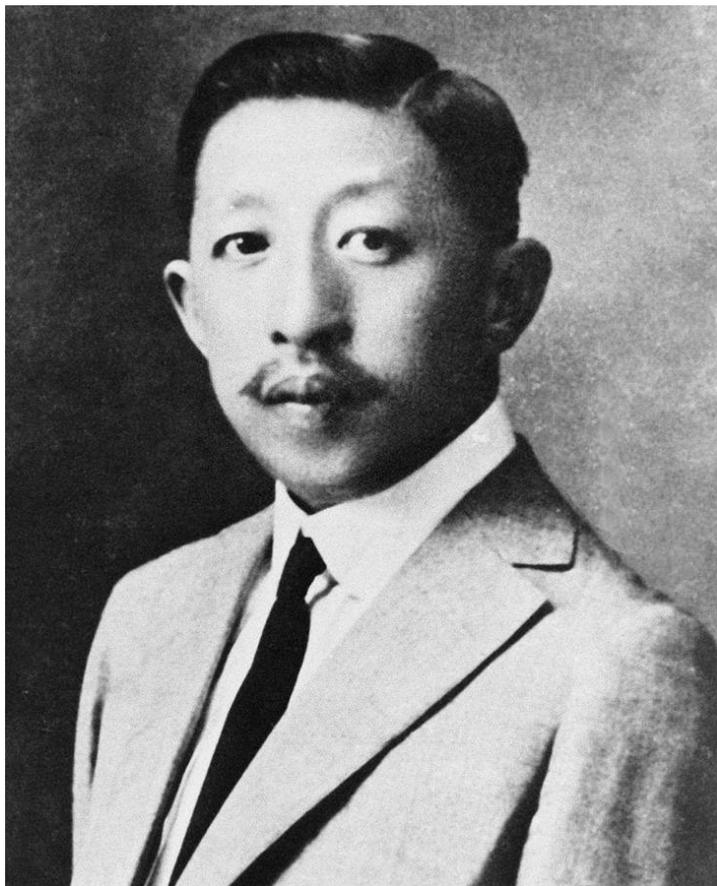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林海山对此举甚为不满，愤而辞职，退出政治舞台。1927年8月，他与赖廷周等在虎门开办“达民生石矿公司”，热心兴办实业，为发展祖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1936年，林海山闻得日本侵略军的可恶行径，欲“弃伤再着戎装”驱赶日军，但得不到重用。年逾花甲的他在忧国忧民中战伤复发，溘然长逝。

林海山追随孙中山革命数十载，屡立功勋，战功卓著，其坚持革命的决心和爱国忧民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廖仲恺：革命终生，百折不回

文 邹雄彬



① 廖仲恺

“廖仲恺、何香凝先生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建树了光辉的业绩。他们坚持原则，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廉洁奉公，不断进步，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邓颖超这段话是廖仲恺、何香凝一生的真实写照。廖仲恺夫妇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值得后人铭记，他们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值得发扬传承。

不怕牺牲 投身革命

廖仲恺于1877年4月23日出生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从小他便从父母亲朋口中得知许多华工遭到洋人歧视、虐待和凌辱的惨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华人不被公平对待的海外环境中长大，廖仲恺开始思考华人饱受欺凌的原因，并在父母长辈的启发下，意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国之不国，软弱可

欺”，进而萌生出报国之志。

1893年，廖仲恺的父亲在旧金山病故，家庭经济困难，得旧金山惠州会馆慈善赞助盘缠费，廖仲恺随母亲将父亲灵柩运回惠阳，一家人结束了侨居美国的生活。在家乡的私塾馆，廖仲恺拜梁缉鞅为师，攻读“四书”“五经”，时常“鸡鸣而起，孳孳研究经史策略之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大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失败的消息传来，廖仲恺深感震惊。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很快省悟到从“四书”“五经”中找不到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遂更倾心于西学。

在叔父廖志岗的支持下，廖仲恺于1896年考入香港皇仁书院就读。毕业后，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赴日本留学，于1903年9月在日本结识孙中山，从此踏上民主革命的征途。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并任总理。作为孙中山革命的坚定拥护者，廖仲恺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为了更好地传播革命思想，熟悉英语的廖仲恺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他还以“屠富”“渊实”为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指派廖仲恺到天津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天津当时是清政府的京畿地区，堪称“虎穴”。但廖仲恺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于1905年冬到

天津从事革命运动，发动仁人志士进行反清活动。后又前往东北吉林、营口等地从事革命联络工作。1910年又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去日本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工作。

1911年7月，廖仲恺随孙中山到美国旧金山成立“美洲筹饷局”，号召广大侨胞为革命捐款，得到广大侨胞的支持。辛亥革命胜利后，廖仲恺担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后追随孙中山从事“反袁护法”斗争，为讨袁筹措军费。1921年4月，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新的革命局面。同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代理总长，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为支持北伐运动，解决财政窘困问题，廖仲恺动员海内外华侨为革命政府踊跃捐输，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粮款是军事活动的重要基础保障，作为负责财政工作的领导人，廖仲恺在任职期间，用人唯贤，做到“部中无一私人”，并且秉公执法，依法治理国家财政，严禁贪赃受贿，“无一私财”，清廉节俭。当时他家乡的祖屋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他也没钱修葺。

1922年，陈炯明叛变，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派前往惠州做说服工作，不料刚至石龙便被扣留，谓“锁住了孙大炮的荷包”。在狱中，廖仲恺受尽折磨仍不改其志，写下了十几首诗赋以明志。“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珠江日夕起风雷，已倒狂澜孰挽回？征羽不调弦亦

怨，死生能一我何哀！”这些诗句充分表现了他的革命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廖仲恺作为主席团成员，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后又协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

革命伴侣 伉俪佳话

双清楼仍在，当时人不归。

在广州市同福西路龙溪新街，坐落着一栋坐北朝南的青砖石脚两层小楼，它就是廖仲恺与何香凝曾经的居所——“双清楼”。这座简陋的小楼记叙着廖仲恺夫妇相守相望、相濡以沫的伉俪佳话。

1897年，廖仲恺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儿、同为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在广州结婚。由于当时经济上尚未独立，廖仲恺与何香凝结婚后，

便与哥哥廖恩焘一家合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的廖公馆。廖仲恺夫妻俩在二楼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作为居所。在简陋的新居里，廖仲恺和何香凝相知相爱，感情日渐深厚。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希望学成归国后能改变中国危亡局势，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结交革命贤豪，共图大业，唯学费无着，奈何？”廖仲恺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但苦于没有经费，“常常哀声长叹”。看到丈夫苦不得志，何香凝一面给予廖仲恺安慰，一面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

1902年1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东渡日本留学。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也抵达日本东京，开始了夫妇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廖仲恺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后考入日本中央大学读政治经济系，专攻政治经济



⑦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学。何香凝考入日本目白女子大学、东京女子师范大学，后考入日本东京东乡美术学校高等科学绘画。

在日本留学期间，廖仲恺与何香凝结识了孙中山。异国他乡遇良师，廖仲恺夫妇都被孙中山伟大的气魄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时常拜访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此后，廖仲恺夫妇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先后入会。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成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他们俩还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了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互相激励。

海外留学的生活并不容易，廖仲恺和何香凝既要勤于学业，又要忙于革命工作，但两人都无怨无悔，坚守初心。其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相继出生，给夫妇俩紧张的生活带来温馨的家庭乐趣。在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到天津等地进行秘密活动时，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了何香凝的身上，她以柔弱之肩承担着照顾幼儿、参加革命活动等事务，是廖仲恺的坚强后盾。

辛亥革命胜利后，廖仲恺和何香凝追随孙中山回到祖国继续革命事业，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遇刺身亡 千古流芳

“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不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反革命的行为，便立

刻变成反革命派。”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这样慷慨犀利的语言招致国民党右派老党员的嫉恨。他们散布种种谣言，甚至故意将暗杀廖仲恺的计划张扬出去，企图恐吓。然而，面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来势汹汹，廖仲恺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参加领导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

“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1925年8月，暗杀廖仲恺的消息处处流传，一时间满城风雨。在严峻的形势下，廖仲恺仍坦然面对。

1925年8月18日，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以递纸条的形式告诉廖仲恺有人将对他不和，廖仲恺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他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8月20日上午，廖仲恺与何香凝驱车前往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广东惠州会馆旧址）开会，在门前惨遭暴徒射击，身中四弹，不幸离世。

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后世建有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仲恺中学、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以作纪念。🌐

曾生：忠肝义胆书赤诚

文 朱敏菊



① 曾生

曾生，原名曾振生，广东惠阳（今深圳坪山）人，出生于1910年，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狱中获知共产党

1923年，十三岁的曾生离开家乡，跟随父亲到悉尼，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海外生活。曾生的父亲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工人。在海外学习、生活的经历增加了曾生的见识，使他认识到华工在异国他乡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心中埋下了奋发图强的种子。

在悉尼的商业学院毕业后，考虑到商业不能救中国，加上父亲的思乡之情日益浓烈，于是曾生放弃商业学习与父亲一起回国。回到祖国后，曾生并未放松学习，于1929年9月考入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在黄明堂办的学旅寄宿。时逢局势动荡，同年秋天，两广军阀混战，张发奎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攻军阀陈济棠控制的广东。曾生的房东黄明堂是张发

奎的部属，他与人密谋推翻陈济棠的统治，为陈济棠所不容。于是，陈济棠亲自带人去抄了黄明堂的家，把曾生等一批寄宿于黄明堂学旅的学生抓走投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万岁！”在监狱的墙上，曾生看到了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这些激动人心的标语给予了曾生力量，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和信仰，并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未来只能寄望于中国共产党。出狱后，曾生便留心打听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注意阅读进步书刊，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坚定不移勇革命

“你们打了不准抗日的教育厅，打得好！”1948年，曾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了这句话。“打了不准抗日的教育厅”的事情还得从“一二·九”运动说起。

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当时，曾生在中山大学读书，并担任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主席。北京学生的抗日游行活动传至广东后，中山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发起组织抗日示威大游行。曾生带领爱国学生、市民两万多人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至广东省教育厅请愿时，发现教育厅内不见人影，于是群情愤慨，一怒之下就捣毁了压制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厅。此次抗日示威游行影响很大，当局震怒至极，下令通缉相关人士。曾生也

因此遭到通缉，且被中山大学停止了学籍。为了避风头，曾生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宿舍睡觉，后幸得中山大学中青支部的帮助，得以前往香港。在“日本皇后号”邮轮上，他当听电铃的“走钟仔”，照顾旅客洗澡。尽管生活艰难，但他仍不忘初心使命，筹办“余闲乐社”，组织爱国海员为抗日募捐财物，宣传抗日思想。

1936年9月，广东的时局发生变化，曾生得知对他的通缉令解除了，便回到广东，并于193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

1938年10月，曾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香港回到惠阳，任中共惠（阳）宝（安）工委书记，领导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指示，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组织抗日革命队伍，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英勇抗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为尽快把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抢救出来，按照中央指示，曾生负责组织展开了一场秘密大营救。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共营救出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在内的八百多名文化名人。为此，著名文化人士邹韬奋亲笔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字赠予曾生，盛赞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抗日所做的重要贡献。

为适应斗争需要，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担任司令员，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接收复失地，威震南粤。因为功劳显赫，1945年8月，曾生被朱德总司令指定为华南抗日纵队代表，接受在广东的日军投降。

曾生为东江纵队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发展华南敌后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建设广东勤出力

“你这回又增加了部队，要为解放华南再立新功！”毛泽东曾这样鼓励曾生。曾生也的确不负众望，在解放广东全境的战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9月，曾生和雷经天、尹林平一起，指挥由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和粤中纵队组成的解放广东战役的南路军，胜利完成了解放广东战役一翼的任务。同年11月，广东军区成立，叶剑英任司令员，曾生任副司令员，次年2月，兼任珠江军分区司令员，同时兼任政治委员和珠江地委书记。

1952年上半年，广东军区改组为华南军区，曾生调任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到广州参加华南军区的筹建工作。同年，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副军长，指挥该军参与了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结束后，曾生回国，在叶剑英的介绍下，转入海军，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

1956年7月，曾生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委员、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广州军分区第一政委、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等职务，为南海国防建设和广东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曾生迎难而上，主管广东省国防、外事和统战工作及广州市政府的全面工作和市政建设，其坚定魄力令人敬佩。

1979年2月，曾生接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根据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和香港招商局的经济方针，曾生产生了筹建工业区的想法。有了想法就大胆干，随后，曾生代表招商局和广东省革委会多次实地考察，最后确定工业区选址在蛇口，并由交通部和广东省革委会联合向国务院报告。得到批准后，蛇口工业区计划开始实施。该项目的建设是建立深圳特区的前奏，也是曾生为广东、为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

1981年，已是古稀之年的曾生退居二线，调任国务院顾问。他晚年虽然体弱多病，但仍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5年11月20日，曾生在广州病逝，生前著有《曾生回忆录》。🌐

廖承志：丹心一片承先志，鞠躬尽瘁为家国

文 吴尚云

廖承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他曾在工运、军事、统战、外事、中日友好等多个领域工作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人类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可谓是：丹心一片承先志，鞠躬尽瘁为家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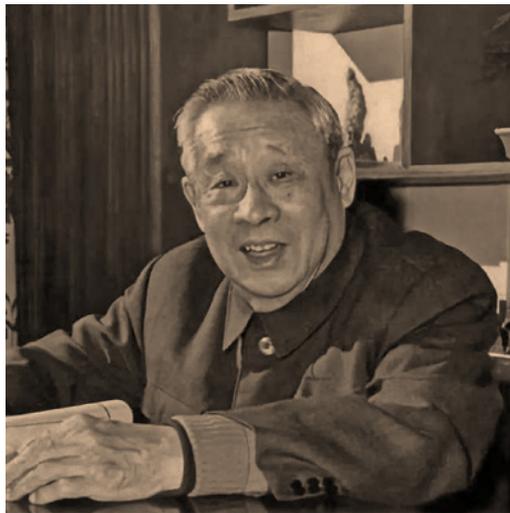
乐观豁达 “戴枷” 长征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万里行，天涯海角任消磨。

“戴枷”万里走长征，是廖承志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真实写照。1933年，廖承志经营救获释后，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担任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其间，由于其批评了张国焘，而被怀恨在心的张国焘污蔑为“蒋介石特务”，遭撤职囚禁，并开除党籍，后被押解参加长征。

长征途中，战士们过雪山、草地，一路历尽艰辛。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前行的廖承志的处境更是艰苦，但他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乐观向上，积极工作。当时军中能写会画的人才极少，每次军中需要宣传革命思想的标语、图画，便会让廖承志绘画书写，待任务完成后又把他关起来。即使这样，廖承志也没有任何怨言，时常深夜刻图作画，积极投入宣传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在周恩来的营救下，得到释放。

“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廖



廖承志

承志这种遭受冤屈仍豁达乐观的精神与其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及其早年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廖承志于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的著名元老和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1914年至1918年，廖承志在日本东京华侨小学念书，学习成绩居全班前茅。他小小年纪便能流利地说日语，并且不忘“祖宗声”，与父亲用客家话交流，与母亲用广州话交流。聪明伶俐的他，很受孙中山的宠爱，孙中山曾夸赞他“长大以后，必成国家栋梁也”。1919年，廖承志回国，先后就读于广州岭南附中和岭南大学。其间，他加入了国民党，并与周恩来相识，受到启发，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孙中山和周恩来的教育、启迪下，廖承志的眼界愈加开阔，不断进步，树立了救国救民的爱国

思想。

廖仲恺被刺杀后，廖承志也陷入了不法分子“欲斩草除根”的危险中。为保护他，周恩来和何香凝将廖承志送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

“四一二”政变后，廖承志脱离国民党，积极参加在日本的中共东京特支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革命活动。1927年至1928年间，他因在日本从事爱国活动，多次遭日本政府拘捕，并被驱逐出境。

1928年夏，廖承志被日本警方强行驱逐出境后回到上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在党的指派下，赴海外组织领导中国海员运动。在此期间，他曾先后被荷兰、德国当局拘捕驱逐出境。1932年，廖承志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33年8月，廖承志投笔从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于1934年任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长征。

在革命道路上的种种磨难，如多次被拘捕驱逐、长征途中蒙受冤屈等，都不能将廖承志击倒，反而磨砺了他的意志，培养了他积极乐观的心态。因而在长征途中，即便苦难重重，差点儿被处决，他也能悲愤地哼出“戴枷万里行”，体现出“百岁人生一瞬过”“百年自有人照料”的豁达。

坚守初心 共同抗战

……可是这些血与泪砌成了中国一座新的血肉长城，显示了中华民族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曙光，这是用血写成的收获。

1938年年初，廖承志发表《收获和教训》一文，鼓舞中华儿女壮大志气，奋起抗争，大大削弱了日军和降日派的嚣张气焰。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廖承志为驻港办事处主任。按照周恩来的指

示，廖承志除了为新四军、八路军筹集资金和物资奔走，还在香港创办了抗日宣传刊物《华侨通讯》，并亲自为该刊撰写文章，为贯彻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费尽心力。《华侨通讯》发行范围广、发行量大，除了在中国香港、菲律宾销售外，还邮寄给世界各地的华侨团体、侨领、华侨学校等。其中所刊文章还被纽约的《华侨日报》、秘鲁的《华商日报》、古巴的《前进月刊》等侨刊转载，影响力不断扩大。

“廖承志抗战有功，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妇孺皆知。”廖承志担任驻港办事处主任期间，为抗战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饱受赞誉。

1938年10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东江日占区开拓游击区的指示，廖承志在香港与吴有恒和曾生商量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后，决定派曾生回东江。同年10月24日，曾生回到惠阳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委，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任总队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劳，威震南粤，名扬海外。

1939年1月，廖承志在香港召集南洋惠侨救乡会的代表和香港爱国团体，协商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总团办事处。1月中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组织华侨青年回国抗日。据统计，经廖承志在香港动员，先后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港澳同胞和华侨子弟共一千人以上。这些华侨子弟回国后，大多在曾生的率领下，转战东江两岸，挺进粤北山区，深入港九敌后，出生入死，积极抗战。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后，封锁了港九交通，大肆搜捕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日分子。在这危急关头，廖承志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开会，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抢救工作。次年1月，在廖承志、曾生的领导下，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派出港九大队突破日军海陆道路的层层严密封锁线，将在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文化名人抢救出来，并护送到安全地区，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待的任务。

1942年，廖承志到粤北参加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委”）的领导工作，担任海外部部长一职。然而，就在这时，第三次反共高潮掀起，廖承志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身戴脚镣手铐的廖承志在狱中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时常以小纸条和小漫画的形式秘密与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董必武取得联系。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时，他还在狱中。1946年1月，在党的营救下，廖承志重获自由。又一次从鬼门关生还，他满面春风，笑容爽朗，似乎全然忘记了所经受的苦难。

“破堞楼头来复去，留丹停畔恣徘徊。悠悠夜月东江水，忍望天南剩劫灰。”在日军的侵略下，祖国大地满目疮痍，一片惨状。廖承志见到家乡惠州西湖点翠洲在战火中被烧毁，不禁感慨留诗，以抒悲痛之情。心系祖国的他，在抗日战争中，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呼号，做出了重大贡献。

血浓于水 心系侨胞

“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最感痛心的是，不尊重、不信任他们，没有用武之地。可是，现在我们埋没人才的现象，到处都有。有的人在国内长期不能有所作为，出国后就成为有成就的人才。这是我们工作的失策所造成的状况，是很不应该的。”

廖承志在著作《给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更多的尊重和照顾》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华侨大学校长等职，为团结海外侨胞、开拓新中国的侨务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侨务工作中，廖承志广泛接触各阶层华侨、归侨、侨眷，向中央提出了许多完善侨务工作的重要政策建议，积极推动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和侨区土改中的遗留问题，推动制定保护侨汇、保护侨户房屋等生活资料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海外华侨对祖国建设事业十分关心，有与祖国开展经济合作、捐资办学等报国之愿。为此，廖承志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中央很快就研究落实了具体措施，颁布了《华侨申请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华侨捐资办学的办法》等。这些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有远见的创举。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一些国家出现排华事件，中国专门成立了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廖承志担任主任委员，负责统筹几十万名归国华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

廖承志还十分关心华侨教育。1960年初，国务院批准创办华侨大学，周恩来总理任命廖承志兼任校长。当时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经济困难，但为了让华侨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廖承志全力奔走，呼吁海外华侨捐款建校。海外华侨被他的精神感动，于是慷慨捐输，终于在侨乡泉州办起了华侨大学。尽管廖承志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他始终心系华侨大学的各项事务，聘请老师、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等，都一一给予规划指导。同时，他坚持在华侨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专家教授参与治校，实属可贵。

“世代忠良表，英华一旦凋。痛心问可了，矢志报天骄。”廖承志逝世后，澳门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和澳门企业家何贤合写的挽联写出了廖承志的人品，表达了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对廖承志的深厚感情。🌐

袁学才：尽责履职，点燃人生

文 张雪婷

袁家祖辈漂洋过海，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经过六七代人的努力终于在越南姑苏岛站稳了脚跟。然而，一场排华浪潮却改变了袁家后人的命运。海外华侨华人遇到危险时，祖国母亲是他们最坚强的依靠。袁学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携带家眷回到中国，在潼湖华侨农场的土地上挥洒汗水，为建设侨场贡献力量。

侨居海外 艰难归国

1938年6月6日，袁学才在越南出生。虽生于越南，长于越南，但袁学才知道，他的家乡在中国，在那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广东湛江遂溪。年少的袁学才也曾幻想过家乡的样子——那里是不是也和越南姑苏岛一样，有美丽的海边、自由的海鸟，以及勤劳朴实的人民？

当年的姑苏岛远不如现在这般繁华、游人如织，而是十分荒寂。袁学才在学习越文的同时，还要学习中文。如果说学习越文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那么学习中文则是以语言传承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眷恋。姑苏岛上聚居的华侨华人来自祖国五湖四海，因此袁学才的普通话和粤语都讲得很好。

袁家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尽管生活条件不宽裕，但还是支持孩子上学，学习文化知识。袁学才顺利从越南姑苏中学毕业。那个年代，能够完成初中学业的人并不多。1962年，袁学才被聘请到当地农业局工作。在工作岗位上，袁学才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做好每一件分内之事。

1978年，风云突变，越南大规模排华事件发生。因受到越南当局的不公平对待，袁学才所在乡村的华侨华人陆续回国。同年7月



5日，袁学才一家决定举家迁返中国。归国途中，袁学才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离开袁家几代人耕耘开拓的土地的难舍，又有期盼回到祖国怀抱的喜悦，以及回国后如何生活的忧虑。历经艰辛，辗转多地，袁学才一家终于在7月15日回到中国。这一年，袁学才已经40岁。

勤恳耕耘 建设红岗

袁学才一家被安置到潼湖



◎ 20世纪60年代的菠萝山

华侨农场。这时期与袁学才一同被安置到潼湖华侨农场的越南归难侨有 900 多户 3000 多人。

在侨场，袁学才初时被安排到菠萝山工作。菠萝山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建设，荒凉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很落后，荒草丛生，道路泥泞。1978 年，袁学才积极地参加建设菠萝山的工作，因表现优良，几个月后被调至农业一队，担任副队长一职。

1979 年，负责农业一队生产工作的原队长迁往香港定居，袁学才接任队长一职。他刚上任，没有过来人指点且人生地不熟，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一队大部分人都是归侨，从缅甸、越南、泰国等归来，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各异，管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尽管如此，袁学才还是不厌

其烦地做好上级分配的任务，抓生产、重检查，协调好各项工作。

当时，因气候多雨、排灌设施不完善等，侨场时常发生洪涝灾害。洪灾发生时，到处白茫茫的一片。上百亩的庄稼都浸泡在水里，极大地影响了收成。袁学才等农业队班子成员群策群力，想尽办法改进排灌设施，还尝试带领村民到山坡上种植香蕉、柑橘等，以减轻洪涝灾害带来的不良影响。

除了洪涝灾害外，劳动力不足问题也比较突出。其时生产队有 400 多亩田地，但是包括后勤人员在内才 40 多名队员，典型的地多人少，常常忙不过来。到了水稻插秧季节，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耕作，一个劳动力一天只能插三至五分地，插完一亩地要两天的时间。这样一来，这



头秧苗插完了，那头稗草又长起来了，不仅误了农时，还导致稗草来不及除去，影响水稻生长，从而导致收成下降。耕田种地最讲究农时，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传统的耕作方法显然不适用。为此，袁学才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劳动力的工作效率。经过摸索对比，袁学才他们发现采用将发芽的谷种直接放在犁好的地里的方式播种，即直播，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按照新的育秧、插秧方式，队里的田地能够按时耕种完毕。

解决了插秧时效问题，就要解决除稗草的问题了。之前生产队曾尝试过一般的锄草方法，但是效果都不理想。袁学才与班子成员想出将杀草丹、敌稗两种除草剂混合使用的化学除草方法。按照一定的比例，将杀草丹、敌稗和水调配后用来除稗草，能取得很好的除草效果。当年，袁学才所在的生产队亩产达到四百多斤，这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产量了，不仅圆满地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还得到了嘉奖。由此，该经验方法得以向全场推广。

1981年冬，袁学才被调至侨场场部工作，1982年又调任红岗管理区区长。红岗是潼湖华侨农场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域，这里聚集了许多越南归侨。部分越南归侨散漫懒惰惯了，对与侨场有关的政策不是十分理解，因此常有政策得不到有效实施的状况。袁学才到任后，积极与这部分越南归侨沟通，消除他们心中的顾虑。

尽责履职 贡献力量

默默耕耘，砥砺前行。1983年，袁学才凭

借优秀的工作成绩被选为潼湖华侨农场副场长、华侨农场侨联主席。同年四五月间，因工作需要，其仍兼任红岗管理区区长，负责红岗的各项事务。

袁学才明显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以前只要管好红岗的事务就可以了，现在面对的是整个华侨农场，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及时处理，工作异常忙碌。袁学才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时刻紧绷着工作之弦。他明白，侨场要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向好向快发展，领导班子的带头作用很重要。在这一时期，潼湖华侨农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进外商办厂投资。毛织厂、电子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在政府的鼓励下，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归难侨进入工厂工作，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经济收入有了提高，农场经济呈现欣欣向荣之势。

1986年，为了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充实自身的知识结构，袁学才在组织的安排下公派到广州农垦学院学习一年。在农垦学院学习期间，年近五旬的袁学才为了不落后于人，加倍努力地学习钻研。对老师讲授的重难点，他常常在课后仔细琢磨，反复记忆。学习期满，袁学才顺利考取了相关资格证书。

1998年，袁学才从潼湖华侨农场（潼湖经济管理区）副场长（副区长）、工会主席任上退休。从1978年归国至退休，他始终兢兢业业，有一分光发一分热。作为一名1988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他立足平凡岗位，践行了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广东省劳动模范”“归国华侨先进份子”等荣誉，就是对他的努力最好肯定。🌐

陈锋：三尺讲台，廿年岁月

子衿

回国之前，对陈锋而言，祖国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这个印象来自学校教室里挂着的毛泽东像，国庆时家家户户门前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电影和书刊上的天安门，以及父母口中回忆一件又一件的往事。1964年，陈锋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参与祖国的建设，将青春贡献给了潼湖华侨农场。

生于印尼 毅然归国

赤道上的骄阳是那么灿烂，太平洋海面是那么平静。光华轮发出长长的笛声后，所有回国的华侨学生都站到船舷旁。码头上站满了送行的亲友，他们高声叫喊着对方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叮嘱对方注意安全。随着光华轮徐徐驶出码头，亲友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渐渐地就看不见了。华侨学生站在甲板上，望向无边无际的大海，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一个伟大的终点——祖国。陈锋就在其中。

陈锋1944年2月1日在印尼出生，祖籍为福建福清。为谋生，他的父母年轻时就到印尼闯荡。陈锋是家里的老幺，上有七个哥哥和姐姐，备受家人宠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父母将他送到印尼锡江市中文学校读书，接受华文教育，一直念到高中，与其他华侨子弟一同成长。在华侨中学读书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年少时的陈锋对祖国的概念是模糊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尼华侨对祖国十分热爱，中文

学校的课室悬挂有毛泽东像，陈锋对祖国的认识就是从这幅画像开始。他问家人，画像里的爷爷是谁？家人回答他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袖。后来，陈锋接触到不少关于祖国的电影和书刊，加上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心中逐渐对祖国产生了热爱和向往。每年国庆节，印尼华侨家家户户都挂起五星红旗，红色的旗帜黄色的星星，汇聚成一片令人心潮澎湃的海洋。虽然他从来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但他身躯里流淌着中华儿女的血液，对祖国的热爱和向往是与生俱来的。

1964年7月，300多名华侨学生从印尼各地集中到雅加达，准备搭乘光华轮回国。当时航空运输不发达，跨洲越洋只能依靠搭船这一途径。21岁的陈锋与其他华侨学生一样，对回归祖国的生活满怀憧憬。他的母亲是反对他回国的，担心他只身回去如果遇上困难没有家人陪伴。但陈锋还是希望为祖国的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沸腾的热血不因离开亲朋好友而冷却，不因离开舒适区而冷却，不因不再得到父母庇护而冷却，尽管未来的路陈锋还看不清，但他决不放弃心中的理想。

投身建设 无怨无悔

回到祖国不久，陈锋因患上肺病滞留在广州三元里华侨接待站疗养。经过细心的诊疗，1967年1月他的身体状况有了好转。之后他便随着中华儿女战斗队从广州三元里华侨接待站出发，徒

步到潼湖华侨农场。中华儿女战斗队由17名印尼、柬埔寨的归侨组成，旨在团结一致到潼湖华侨农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时队员们热情高涨，还专门制作了一面写着“中华儿女战斗队”的红旗。扛起红旗，大家一路唱着革命歌曲，也不觉得苦和累。同年2月初，中华儿女战斗队抵达潼湖华侨农场，成为农场第一批建设者。

陈锋家在印尼算是小康之家，他的父亲主要做修理钟表等小生意，三餐富足，他自然没机会接触农活。到农场后，等待陈锋的却是一片沼泽地和艰苦劳累的生活。当时，农场劳动强度最大的任务是种田和开沟挖渠，一天下来，大家都精疲力竭，腿脚更是生疼。农场的生活条件也极其艰苦，物资极其匮乏，所有人凭票购买生活必需品，包括白糖、猪肉、布料、肥皂、油、香烟等。日子过得再艰苦，陈锋和其他华侨都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后悔回国。

1967年年底，陈锋被安排到农场的学校教书。在三元里华侨接待站时，陈锋打算病愈后就去学习，为升学做准备。当时同在接待站疗养的十多名华侨病愈后也都到华侨学校学习，陈锋是最后一批病愈离开的，结果遇上“文化大革命”，读书梦便成了泡影。虽然不能继续深造，但有机会以老师的身份回到课堂，陈锋自是高兴的。他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一边实践，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努力，对“如何教好学生”也积累了经验。由于教学工作出色，陈锋又先后到另外两所小学任教，在教坛上一待就是二十年，直到1988年被调到农场场部宣教科工作。

在潼湖华侨农场，陈锋不仅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就，还收获了美满的爱情。1974年，陈锋与一名缅甸归侨女孩相爱并结婚，生下一男一女。

回忆往昔 感恩祖国

2004年，陈锋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

的两个子女已成家立业，大女儿跟他一样教书育人，小儿子大专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谈起归国后的经历，陈锋说自己从不后悔，为祖国建设吃再多的苦都无怨无悔。

1964年8月至1967年1月，陈锋在广州三元里华侨接待站疗养的伙食费由国家补贴，接待站的干部职工对他们十多名疗养的归侨也是关怀备至，让他们深感温暖。干部职工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还带他们去看电影，而他们也帮接待站做些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来到潼湖华侨农场后，虽然生活很艰苦，但陈锋却觉得跟大家一起工作劳动也很愉快，农场领导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也让他们很快适应了农场的生活，生出了“家”的感觉。要知道，20世纪60年代是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但是为了安置归侨，国家还是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在全国建立了几十个安置归侨的华侨农场，潼湖华侨农场便是其中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全国各地，此时国家政策允许归侨申请到香港和澳门生活定居。很多归侨都提交了申请，他们说到了香港和澳门，生活会好很多，也劝陈锋一起申请。当时，陈锋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境地，一方面，他知道其他归侨申请到香港和澳门生活定居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另一方面，他想自己好不容易回到祖国，难道又要申请到香港或澳门定居吗？经过了一番精神挣扎，陈锋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农场。

1994年，陈锋等华侨分配到三层楼的单元房，房款由国家出大头华侨出小头，房产所有权归华侨所有。2003年潼湖华侨农场撤场设镇，归惠州市管辖。自此以后，潼湖华侨农场变成潼侨镇，面貌也逐年改变，所有归难侨住房问题得到解决，市场经济也开始得到发展繁荣，开店铺、做生意、到工厂工作的归难侨越来越多，就业环境得到改善，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也不复存在。如今的侨乡发展越来越好，人民安居乐业，归侨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

黄延辉：用人生写下爱国誓言

文 静姝

从华侨开办的中华学校正式开始学中文、写汉字和说华语；从人生第一本语文课本里学习到“牛、羊、花、草、鸟、树、门……”；从课堂上看着老师深情地指向地图上形似雄鸡的那片土地——“这是中国，这是大家的祖国”……漂泊海外的华侨从一点一滴里感受着“祖国”这个词流露出的深切情意，并对这个遥远的故乡有着绵绵向往。

饮水思源

当年生活在印尼的老一辈华侨对祖国有着浓烈且真挚的眷恋，希望这份赤子之情世代相传。于是，他们将子女送到华侨开办的华文学校学习，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中文学习环境，能够接受更多的中国文化教育。然而，由于历史、师资等诸多原因，当时的华侨子女高中毕业后，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到印尼的大学去继续求学。所以，回国深造成了那些从小就向往祖国的华侨学生的理想和目标。

黄延辉，正是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华侨子女之一。她1945年2月16日出生于印尼三马林达市，祖籍福建省金门县水头村。1953年至1966年，她先后在三马林达市中华小学、中学就读，再到三马林达市印尼基督教中学读高中。热爱祖国的华侨家里大多都有订阅华文报刊、书籍，这些书刊令黄延辉对亲爱的祖国产生了无限向往。

20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事件不断升级，

这更加激发了华侨的爱国情怀，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回国热潮。黄延辉高中毕业后，带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毅然决然地选择回祖国继续学业。1966年12月，她自费坐飞机回国。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人，让她有点伤感，但她的内心也隐隐有些激动，她离魂牵梦萦的祖国越发近了。她的内心当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对她呼唤——归来吧归来吧，祖国是你永远的靠山。

那年，广州三元里华侨接待站接待了从印尼和缅甸回来的数百名归侨，他们在此处等待安置。黄延辉回到广州，准备在广州华侨补校学习后参加高考，但当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她的完成学业以效忠祖国之愿便被打断了。可对于有心人来说，报效祖国的方式远远不止一种。当时，有17位志同道合的归侨青年不愿继续留在广州华侨补校，为了报效祖国，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发组织了一个下乡战斗队——“中华儿女战斗队”。他们自愿到刚建场的华侨农场——潼湖华侨农场，黄延辉是其中一员。

赤子之心

在潼湖华侨农场的头一个月里，他们与汕头知青混编在一块儿，每天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那是一段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岁月，也是一段归侨们激情燃烧、难以忘却的岁月。当时农场人烟稀少，是一块未开发的大荒原，荆棘纵横，荒草遍地，经常内涝水浸，归侨居民点就建在地势较高的荒丘之上。资源匮乏、

凭票购物、厕所共用、睡板凳床……职工从事农业生产，开荒造田，种水稻、筑堤坝、挖水沟等，每人每月基本工资24元，实行“评工记分”，日薪月计发给。这些对“书生样儿”的归侨青年来说着实艰苦，但他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意志坚定。

时间久了，他们干农活儿越来越拿手，后来又陆续来了大批归侨，农场愈发生机勃勃。国家对华侨农场很重视，为农场职工建了椿墙（黄泥、砂石、石灰粉等混匀椿实成墙）瓦房。归侨们过着集体生活，虽然劳作的日子很艰苦，但能为祖国建设做贡献，内心仍感到幸福。逢节假日，归侨带来的东南亚风情歌舞，让农场枯燥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黄延辉落户潼湖华侨农场以后，与农场的职工同甘共苦共患难。她始终秉持着热情工作、积极肯干、与职工打成一片的精神品质，一步一步成长，从1967年1月参加中华儿女战斗队下乡，到1967年4月在潼湖华侨农场红卫队当副队长，到1972年4月在潼湖华侨农场铁姑娘队当茶椒专业队队长，再到1976年2月由茶椒专业队调入新组建的茶厂当厂长，1979年11月当选为惠阳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惠阳县第七届人民



⑦ 归侨在侨场里劳作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党务委员会委员。1982年，她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在农场的岁月，黄延辉正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踏实工作，才获得了领导的好评和群众的喜爱。

和许多归侨一样，她跨过千山万水，回到生活条件尚还艰苦的祖国，愿意并且做到了与祖国同甘共苦。半个世纪过去了，她对祖国还是一往情深。因为对她而言，从踏入潼湖华侨农场那一刻起，她就扎根在农场，扎根在祖国的大地上。

1983年，黄延辉被调入惠阳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以下简称“惠阳侨办”）工作。在新的岗位上，她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业务水平，协助政府解决归侨遇到的实际问题，向华侨宣传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惠阳侨办工作期间，她还担任任惠阳县台胞台属联谊会会长、惠阳地区台胞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惠州市台胞台属副会长等职务，与台胞台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黄延辉曾当选为惠阳县第七、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同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惠州市第六、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为服务中心大局，更好地服务侨胞，积极参与议政。

时光荏苒，黄延辉等归侨在祖国大地的根儿越扎越深。他们始终不忘初心，数十载如一日，以自己的一身本领报效祖国，将自己的青春热血奉献给这一片深爱的土地。2000年1月，黄延辉正式退休。🌐

曹丽云：回“唐山”去

文 张雪婷

懵懵懂懂回“唐山”

等待着回“唐山”的曹丽云一家终于拿到签证，可以回国了。对于年仅九岁的曹丽云来说，“唐山”是一个陌生且熟悉的概念。她只是从长辈的口中得知，那里是中国，是祖辈们的故土，是他们的“根”。

曹家在缅甸落地生根已经有些年头了，和大多数华侨一样，他们习惯称中国为“唐山”。曹丽云是侨四代，自小受祖辈熏陶，又在父母的有意安排下到当地华文学学校读书，自然对故土充满向往。缅甸发生排华后，曹丽云父亲便决定回“唐山”。1968年9月24日，曹家“组团”回国，曹丽云的祖母、父母、叔叔、姑姑和她的兄弟姐妹共九人登上了回“唐山”的飞机。相比于许多只身回国的华侨，曹丽云的父亲认为，一家人同甘共苦、互相照顾最为重要。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第一站到了云南昆明，在昆明华侨接待站住了几天后，又辗转到了广州三元里华侨接待站。当时归国华侨可以选择回祖籍地或听从组织分配安置地。对于祖籍地，曹丽云一家都比较陌生，他们从来没有回去过。幸而，曹家奶奶携带的一个精致木盒里有一张存封多年的纸条，上面清楚地写着祖籍所在地——广东台山曹凹村。

然而，曹丽云一家并没有回到台山，而是去了潼湖华侨农场，因为曹丽云父亲在回国飞机上的一段奇缘。曹父在飞机上与邻座的一家人相谈甚欢，结下友谊。那家人被分配到惠州，于是两家人便说好一同到惠州，互相照应。就这样，两家人在广东省侨办的安排下，被安置在潼湖华侨农场，却在不同的生产队。

勤勤恳恳做工作

曹丽云一家被分配到潼湖华侨农场八队安家落户。回国前，曹父在缅甸经商，曹家在都市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没有农作的经历，与农场的生活截然不同。当时的华侨农场，住的是简陋的瓦房，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从热带回来的归侨总觉得冬天特别寒冷。尽管农场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正值壮年的父母非常乐观地为孩子撑起一片明亮的蓝天，他们辛勤劳动，耕耘农田，修沟建渠，开荒辟地，为建设侨场流下了辛勤的汗水。父辈勤劳坚毅、爱国忠诚、拼搏奉献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曹丽云。

1968年10月曹丽云进入潼湖华侨农场五七小学读书，1976年7月从潼湖华侨农

场中学高中毕业。求学期间，她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多次获得“五好学生”“三好学生”等荣誉，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曹丽云性格开朗，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较强，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信任，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班干部。无论做什么事，她都始终牢记父母的教导：做事要认真有原则，为人要诚实守信，要助人为乐做善事。父母的教育和熏陶，使得她养成了坚毅果敢、有担当的性格。

高中毕业以后，曹丽云被选入农田水利专业队中的青年突击队。这支队伍有朝气，有活力，有拼劲，承担“急难险重”的任务，是农场抢险突击队。在这个集体里，曹丽云乐在其中，自豪感倍增。然而，半年后，即1977年年初，八队队长以队里需要年轻骨干为由，将曹丽云调回了生产队。年轻气盛的曹丽云对调回八队一事，略感委屈，但她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在八队饭堂班长的职位上认真踏实地工作起来。

曹丽云坚持原则，在打饭时，无论是职工还是场部驻队干部，都一视同仁，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她的这一品质，受到驻队领导的赏识。因为工作能力强，为人真诚肯干，1978年12月，曹丽云被调入潼湖华侨农场团委工作，历任惠阳县团委委员、常务委员。最让曹丽云印象深刻的是，1982年12月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她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倍感光荣。作为归侨代表，1983年4月她出席了广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1985年6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心心念念编侨志

1985年12月，曹丽云调入惠阳地区行政公署办接待处工作。1988年，国务院发文同意撤销惠阳地区，设立了地级惠州市。随着行政区划的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侨场场部



改变，曹丽云成为惠州市人民政府接待处科员。此后五年间，她历任接待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等职。

1995年11月，曹丽云被调往惠州市侨联，出任主席。因自身归侨身份，曹丽云对华侨和归侨侨眷有着特殊的感情。尤其是看到年岁渐长的老华侨、老归侨相继离世，她的内心更加着急，希望能编撰一本关于惠州华侨的志书，抢救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惠州是广东省重点侨乡，在中国近代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惠州籍华侨华人都作出了贡献，曹丽云认为，让后人了解惠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和侨务工作的历史事实，把惠州籍华侨华人爱国爱乡的精神传承下去，是侨务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20世纪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物质生活还较困难，要出一本地方性方志并不是容易的事。虽然知道这实践起来难度很大，但是曹丽云还是下定决心要做。她的这份侨心，是深受父亲的影响。自曹丽云记事起，她常在家中看到《人民画报》等爱国刊物，还常跟父亲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观看《东方红》等电影。那个时代，对于绝大多数侨居缅甸的华侨家庭来说，能够看到中国刊物和电影是多么不容易。曹丽云兄妹也是得益于父亲是缅甸爱国社团骨干，才早早接触到中国文化。曹父虽然接受的是英文教育，不懂中文，只会用中文写自己的名字，但他非常崇敬毛主席，床头放着缅文版《毛泽东选集》，时常阅读并做了大量笔记。

在曹丽云的推动下，编委会克服经费不足和

硬件设备缺乏的困难，积极收集史料，展开调查。没有经费，他们就积极筹款；没有电脑，他们亲笔手书。1998年12月，《惠州华侨志》终于面世。

实实在在办侨事

曹丽云是政协惠州市第七届委员，政协惠州市第八、九、十届常务委员，积极参与议政，撰写了关爱老归侨以及提升当地教育水平等方面的提案。2011年2月，她在惠州市政协第十届五次会议上所作《关于对年满60周岁以上归侨发放生活补贴的建议》的提案得到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因为关注民生，积极建言献策，曹丽云被惠州市政协评为“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分子”。

20世纪90年代，惠州市经济欠发达，当地人收入不高，特别是侨场的归侨和散居在各县区、乡镇的归侨侨眷困难家庭比较多，惠州市侨联协助市政府开展扶贫济困工作。1997年1月，

在惠州市第六次归侨侨眷代表会上，曹丽云倡议捐款成立“惠州市归侨侨眷福利会”以帮助有困难的归侨侨眷，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响应，大家慷慨解囊，筹集到了第一批善款30万元。同年4月，惠州市归侨侨眷福利会经惠州市民政局批准成立，1998年开始每年春节给困难归侨侨眷家庭发放慰问物资，还对遭遇家庭变故的归侨侨眷给予救济。

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她，退而不休，每日依然为各种侨务忙碌着，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惠州华侨志》

编者：《惠州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潼侨的呼唤

文 肖建国

冥冥中，似乎有驳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向我耳边袭来。

起初是海浪交织着铁器在与岩石碰撞，紧接着摩肩击毂，人声嘈杂。喘息声、吭哧声、骨裂声、打骂声、呼唤声、枪炮声……响成一片。我瞬间如晕车般地旋转，忙离开众人，躲到角落，闭住双眼。那驳杂的声音见我如此不堪一击，如蟾蜍吐舌般收回到画卷里。

我没有听错，确实有声音袭来。也没有看错，那些声音是从每一幅画的后面发出来的，并汇集到一起，无所顾忌地对我伤伤。

这是2021年1月10日，踏着新年的阳光，我来到惠州的潼侨镇，参观惠州侨文化展览馆。

虚也，实也？我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凭人生阅历，我知道这展馆有故事，这潼侨有话说。那些驳杂的声音是在提醒我，慢些、慢些，再慢些。

展馆共分三层，一层一主题，分别为侨乡、侨心、侨情三大展区。我随众人看完三层，然后就滞留在第一层不再走动。我想再听听那些呼唤，于是从第一幅画的内容里走进，走到历史深处，尽力抵达侨民内心，把不好表述的细节，努力补充完整。这也许就是冥冥中那驳杂声音中的一种诉求吧。

潼侨，先有侨而后得名。最开始，这里叫惠阳县国营潼湖畜牧场。原本是一片广阔的滩涂地，水草丰盛，灌木丛生，适合放牧牛羊。据史料记载，建设畜牧场是在1959年。那时，中华

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多年的兵连祸结，使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岭南也不例外，人们迫切地需要吃饱、穿暖，睡个安稳觉，干个踏实活。惠阳县的决策者们洞悉民心，因地制宜，办起畜牧场。这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来说，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物质上，都带来莫大的安慰和振奋。

然而，风雨骤起，国家欲稳可海外不太平，远在他乡的游子惨遭蹂躏。1966年3月，为了接待安置饱受欺凌的华侨，惠阳县国营潼湖畜牧场改为广东省国营潼湖华侨农场（到2003年，潼湖华侨农场改制为潼侨镇）。第一展厅的内容也就由此开始，那些背井离乡的同胞们回来了，虽然拖儿带女，满脸悲戚，但他们可以在祖宗留下下来的这块土地上放心痛哭。他们的哭声不再惊恐，不再藏着掖着。他们哭那怀中捧着的陶罐，里面盛有亲人的骸骨，他们终于可以叶落归根，与列祖列宗共处一方乐土。他们哭那数月前还在异国一起劳作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以及兄弟姐妹，转瞬间，鲜活的生命就做了他乡的冤魂。

活着的人，路在脚下，还要继续前进。他们只能擦干眼泪，把愤懑化为力量，在自家的土地上重建家园。潼侨华侨农场先后安置了来自越南、印尼、缅甸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归难侨民。如今在潼侨镇内居住生活的归侨侨眷达4000多人。这些，都不是让我天旋地转的原因，也不是那驳杂声响的呼唤，我要看的是历史深处那苦难的印痕。而墙上的挂图太过于光鲜，无论

是劳动还是返乡，放上去的都是一张张笑脸。

顺着历史的墨痕，我从资料上找到了两双眼睛。这是两位客死他乡的老人的眼睛。第一张是人工画的，第二张是相机照的。两位老人面相不同，但瞪圆的双眼里呈现的都是绝望、疑问。请允许我用化名，据说这两位老人的后人都在潼侨生活，并且过得很幸福。我不想用那段震惊人类的悲惨时光，惊扰他们的清梦。但我真诚地希望，他们应刻在心里，不应忘记祖上的苦难。

冯三，归善县人，清雍正十一年（1733），跟随亲人们漂洋过海，几经辗转来到巴城（今雅加达）。他们虽然是来做苦工的，但在当时的“土著”眼里，他们就是被贩卖的“猪仔”，没有自由，没有尊严。踏上他乡的土地，他们干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吃的是粗粮糙米，住的是漏风窝棚。为了保住一份糊口的低薪工作，往往要忍受各种屈辱。在他们心中，以不争不抗为行为准则，总希望通过忍耐与忍让，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

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过到1740年，手里稍稍有些余钱的冯三刚把妻儿接到巴城，不承想巴城当局对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妻儿在乡间橡胶林暂住，躲过一劫，而冯三被活活打死。这次屠杀，据有关书籍记载，共持续七天，杀死华侨数万人。华人城区的一条河道被尸体堵塞，河水被鲜血染红。这次大屠杀，历史上称为“红溪惨案”。

冯三的尸体被偷偷抬回橡胶林内，双眼圆睁，直视苍穹，死不瞑目。这样惨无人道的屠杀传到了清廷，没想到乾隆却表示：“天朝之弃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虽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取。”

另一位是陈二，博罗县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到南洋谋生，最开始在橡胶园里务工。每天早起晚归，挖地、除草、施肥、割胶。割胶必须在太阳出来前完成，然后将一碗碗的胶汁从树上收集下来，挑到集中地加工。等这些活儿都

做完，陈二的腰已累得无法直起。就这样，回到家里，还要去稻田里干自家的活。这是他一家人的口粮，稻田是租来的，只有拼了老命，才能保证一家人不挨饿。每逢节假日，陈二凭借着在家乡学到的手艺，磨些豆腐挑到市场去卖。在当地“土著”眼里，华侨都不是人，是干活的机器。他们鄙视又惊叹，论吃苦耐劳，不服华人行。

陈二以最辛苦的劳动得到最微薄的报酬。日久天长，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他才彻底舒出一口气。

然而没过几年好日子，当地再次爆发迫害华人惨案。这也是有记载以来，海外移民史上受害人数最多的一场惨案。陈二的后人逃了回来，陈二却客死他乡。陈二临死前曾问自己的儿子：“侨民好斗吗？侨民逞强吗？侨民在外敢违法行凶吗？可为什么灾难都会落在我们的头上？”儿子说：“爸爸，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在异国‘土著’眼里，我们都是无根的浮萍。你常教诲我们要宽容大量、以和为贵，然而这都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啊。爸爸，如今国家强大了，才给我们安排回去住的地方，我们今后再也不出来了。”陈二瞪大双眼而去。

望着手中的资料，我阵阵心悸。昔日我们是半封建半殖民国家，远走异国谋生也许是条出路。可非他族类，生命随时都有危险，日子能好过吗？我们与其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外族身上，不如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反正有一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死得其所，倒也是一种慰藉。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我想，这就是我进入展厅后，那些驳杂声向我袭来的原因。

那声音是潼侨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告诫，越是和平幸福的年代，越是不能忘记先辈们在灾难中留下的道道伤疤。要常来这里走走、看看、想想，只有自己的国家强大鼎盛了，民众走出去才有自尊和自信。🌐

一甲子的流光溢彩

文 客都

侨乡潼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经历了数次流变，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各个历史阶段，这片土地接待了不同的群体。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潼侨从“一日大雨水汪汪，三日无雨田龟裂”蝶变为归侨安居乐业的鱼米之乡，谱写了澎湃激荡的历史卷轴。

1964年至1965年，汕头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后分为4批共402人来到这里，洒下了他们的泪水和汗水，他们开荒辟地，挖河筑堤，兴修水利，书写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精彩传奇。更有一批知青参加由东江向香港引水的东深供水

工程（1965年竣工），被誉为“东深勇士”。

1966年至1991年，潼侨迎来了新的“客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归侨。这里从1966年开始，先后安置了来自越南、印尼、缅甸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归侨，因此被赋予“小联合国”之称。祖国对归侨给予了庇护，归侨则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倾注于侨场。

近一甲子的沧海桑田，潼侨的归侨文化已经成为了惠州的一张名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归侨文化与本地文化不断融合新生，成为这座惠民之州的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发展的源源不绝的动力。



① 汕头知青抵达潼湖畜牧场



② 飞机降落，三名归难侨终于踏上故土，高兴地向祖国挥手



⑦ 1966年，归来的华侨青年组成的新村菜组



⑦ 知青在潼侨畜牧场劳动



⑦ 排华事件后，华侨携家带口逃难回国



⑦ 一个归侨家庭在回到祖国怀抱的第三天迎来新生儿



⑧ 1967年1月29日，由17名归侨组成的“中华儿女战斗队”从广州三元里出发，步行19天后到达潼湖华侨农场





⑦ 当地政府派出医护人员为农场上的归侨子女检查身体



⑦ 侨场第四队“赤脚”医生杨开镜



⑦ 归侨在织造厂里工作



⑦ 侨场劳模、二队长陈子毅



归侨在潼侨华侨农场改造荒山、开辟良田、建设家园，从此在这里扎下根来，筑梦侨乡，在祖国大地上写下归侨拼搏奉献的绚丽一。

归侨在侨场里劳作
农科所技术人员指导归侨种田

一天下来收获颇丰，归侨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20世纪70年代，归侨管理的侨场畜牧队猪舍

茶厂的归侨职工在闲暇时品尝自家生产的茶叶









归侨子女在侨场中学读书，图为学生和老师合影留念
侨场中学第五届高二（2）班毕业生合影
知青黄坚和归侨温秋霞表演特色舞蹈
归侨子女在农场业余体校练球

虽然当时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艰苦，但归侨将生活过得多姿多彩





⑦ 如今在潼侨，每逢节日或大型活动，都有东南亚异域风情舞蹈压轴登场



⑧ 潼侨镇党委、政府先后分期分批建设了新侨花园、侨安花园等归侨侨眷聚居小区

为惠州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 凝聚侨界新力量

惠州市侨联



② 惠州市侨联举办“传承侨精神 弘扬侨文化”主题沙龙

走进惠阳秋长气势恢宏的叶亚来故居，感受“吉隆坡王”勇闯南洋、心系桑梓的传奇人生；漫步潼侨公园内惠州首座侨文化展示馆，重温归国华侨挥洒汗水、建设家乡的燃情岁月。惠州作为广东省重点侨乡，素有“客家侨都”之称，侨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目前惠州常住人口中有归侨1.2万人，侨眷约80万人。惠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关爱侨胞，归侨侨眷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惠州市侨联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深入践行“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积极打造“侨心向党 与惠同行”党建品牌，以“党建带侨建”为引领，努力加强基层侨联组织建设，创新做好基层侨联组织和“侨胞之家”建设工作，进一步夯实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的基础阵地，走出了一条凝聚侨界创新之路，为惠州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贡献侨界力量。

一、以“侨心向党”为主题，画好侨界同心圆

政治性是侨联的灵魂，为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是侨联的核心任务。在惠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广东省侨联的大力指导下，惠州市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对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实现“换届强队伍，创新强基础”，全面开启新征程，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惠州建设更加幸福一流城市贡献力量。

惠州市侨联以“凝聚侨心向党力量”为首要立足点，始终把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弘扬华侨精神结合起来，与侨联主责主业结合起来，与历练侨联干部队伍结合起来。组织侨联委员开展“聚侨心 启新程”专题培训班，组织惠港澳侨界青年开展“侨心向党 青年向上”专题学习班，组织惠州市侨联第一期侨商研习班侨商代表赴惠州市结对帮扶黔东南州助力乡村振兴，将侨界力量充分凝聚起来、调动起来。

扎实开展“侨心向党+N”系列主题活动，不断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切实深化侨界群众对党的历史的系统认识，引导侨界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2021年全年开展“侨心向党+N”群众活动14场，线上线下覆盖侨界群众3500余人次，完成“我为群众办实事”8件。通过口述历史沙龙、云宣讲、“回望百年风雨路 侨与惠州共前行”主题征文活动、唱红歌、情景剧表演、配乐诗朗诵、诵读红色经典等学习活动，进一步提升侨联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引导侨界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营造全市侨界“侨心向党 同心筑梦”的浓厚氛围。

二、以“为侨服务”为宗旨，破解难题强基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侨服务，加强广大归侨侨眷的联谊服务工作，是侨务工作的基础”。侨联组织的活力在基层、生命力在基层、创新力在基层，加强基层侨联组织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中国侨联十代会重要部署的重大任务，是侨联强“三性”、去“四化”的具体举措，有助于扩大侨联组织覆盖面，服务基层侨界群众，最大程度团结归侨侨眷、海外侨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侨的独特优势。

近年来，惠州市侨联深入践行“以人为本，为侨服务”宗旨，努力增强基层侨联组织阵地建设、队伍建设、能力建设，进一步夯实侨联基础，创新开展“五好侨胞之家”创建工作，全市目前共有基层侨联组织276个，“侨胞之家”30个，其中“五好侨胞之家”5个；在全省地市级侨联率先建立“地方侨联+高校侨联+校友会”工作新机制，与广州中医药大学侨联缔结友好侨联并常态化开展侨生研习交流活动；成立首个高校侨联——惠州学院侨联，以及惠州华侨大学侨友会；探索实施“侨联组织+侨联党支部+侨胞之家”新模式，进一步夯实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的基础阵地，切实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联系起来、组织起来、活跃起来”，实现基层侨联组织建设上下联动、蓬勃发展的良好工作局面，走出了一条凝侨聚侨的创新之路。

三、以“服务大局”为根本，凝聚侨力谋发展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市考察时说：“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

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海外惠州籍侨胞就达300万人，其中多数分布在东南亚地区。海外惠州人继承了客家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同舟共济的性格特点，经过一代代的努力，许多人已经成为侨居国的政要、精英和商业巨贾，是惠州在海外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惠州市侨联围绕惠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凝聚侨心侨力侨智。

搭建侨界创新创业新平台，做推动双区建设的“助推器”。与广东省侨联在仲恺高新区惠南高科技产业园共建“南粤侨创基地”，与仲恺高新区合作建立“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驿站”及“惠州侨界青年创客空间”，为惠州抢抓“双区”建设重大机遇，深度“融深融湾”搭建平台；开展“惠侨暖企”行动，联合市侨务局等单位，举办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解析及进出口货物海运服务宣讲、招工用工专场座谈活动；密切联系我市侨商侨企，发动侨商参与广东国际商会等侨商平台；走访问需侨资企业，开展调研座谈；先后引进来自加拿大、瑞士、美国、英国、日本、马来西亚等45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学者、经贸团组到惠考察对接项目共计35批400多人次，协办“海外华商南粤行”等活动。

动员侨界力量投入乡村振兴，做社会发展的“力行者”。几年来，累计动员侨界力量投入资金（含物资折款）640余万元，实施侨界帮扶项目6个，参与乡村振兴项目6个，为侨镇修建“侨心路”、改造中学运动跑道等多项民心工程。组织第一期惠州市侨联侨商研习班20多名侨商赴贵州省黔西南州考察对接项目，同时与黔西南州侨联签定友好合作协议，助力惠州与黔西南州结对帮扶工作，促成侨商采购黔西南州产品220多万元。此外，我市知名侨资企业香港旭日集团获得“全国侨联系统助力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积极参政议政，做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代言人”。2021年我市两会期间，市侨联提案《实施健康惠州行动加快推进“治未病”中心建设》在市政协第十二届五次全会上做大会发言，为市中医医院争取150万经费建设治未病中心；2022年换届后，全市共有市级侨界人大代表10名、政协委员23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围绕惠州经济发展和民生参政议政，展现侨界代表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充分调动侨界青年力量，做惠州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自2013年成立以来，市侨青会已发展会员300多人。市侨青会坚持以慈善回馈社会，“圆梦助学”品牌项目累计筹资856万元，资助贫困

大学生1370人次圆大学梦想，全市归侨侨眷家庭贫困大学生受助率为100%；“微慈善”项目长期资助自闭症康复机构，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市侨青会致力于海内外侨界青年和惠港澳青年交流，主办多次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同伴计划”主题活动，促成20多个会员合作创业项目，已发展成为凝聚惠州侨界青年的活力组织、粤港澳青年交流的活跃平台。



四、以“疫情防控”为号角，践行侨联使命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侨联号召侨资企业、侨青企业以及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累计捐款3000多万元，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144万余元，上演了“万里送口罩”“跨海声援”等感人的抗疫故事。海外疫情蔓延后，积极回应海外侨团侨领的关切和需求，筹措抗疫物资援助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协助组织惠州侨企在越南分支机构工作人员打疫苗，切实为海外侨胞“办实事”，影响远播海外。其中，发动企业向柬埔寨捐赠的30万个医用口罩和3万个N95

口罩，得到柬埔寨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诚挚感谢，柬埔寨总理洪森的夫人亲自向惠州市侨联签署感谢信，体现了全球抗疫合作中的惠州贡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积极发挥党员干部先锋带头作用，选派干部参加疫情防控专班参与转运入境人员，组建党员干部先锋队下沉基层社区协助开展核酸检测和疫情防控，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侨联力量。

五、以“依法护侨”为载体，健全维护侨益机制

2021年，惠州市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⑦ “侨心向党 青年向上”惠港澳侨界青年党史学习专题培训班

正式建立，为广大涉侨纠纷当事人提供更简便快捷的纠纷解决渠道，降低侨界群众诉讼成本，切实维护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与广东省侨联法顾委联合举办“侨爱南粤·法治沙龙”（第三期）暨民法典宣讲活动，为企业依法经营、规范管理、解决困难指明方向；完成市侨联法顾委换届，构筑更高效的维护侨益平台；编印《涉侨法律法规指南》；开展“学党史 知侨法”在线有奖知识竞答活动；联合致公党惠州市委在杨桥镇开展“法治护航 情暖侨乡”12.4国家宪法日普法宣传活动。严格做好华侨事业费发放工作，抓实监管责任确保资金使用规范有效。走访慰问困难归侨侨眷家庭和有突出贡献的归侨代表、开展归侨重阳敬老座谈等活动，传达党和政府对侨界群众的关怀。

六、以“文化交流”为主线，弘扬惠州华侨文化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华侨文化是海内外惠州儿女共同的“魂”。惠州市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增强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为主线，进一步激发海外侨胞的爱国爱乡情怀，充分发挥“侨”文化的纽带作用，为惠州与沿线国家搭建一条合作共赢、交流发展的桥梁。联系央视、北京电视台到惠拍摄《魅力侨乡行 惠州篇》纪录片，充分展现“客家侨都”惠州的旖旎风光和城市魅力；协助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在惠州举办“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专题研讨会；举办“传承侨精神·弘扬侨文化”主题沙龙；开展“回望百年风雨路 侨与惠州共前行”主题征文活动；组织侨界艺术家开展书画雅集等；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展现惠州侨乡风采，弘扬惠州华侨文化，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发展。

七、以“社会建设”为抓手，增强侨界群众幸福感

通过开展“点亮微心愿 服务暖群众”活动，联合驻点村和共建单位走访困难群众收集他们改善生活的微心愿，发动侨联委员、干部认领微心愿，采购物资送到困难群众手中，为他们送去侨联的关心和关爱；与共建单位祝屋巷社区联合开展“整治旧区扰民树”、“粽香传情 感念党恩”向基层困难群众送粽子活动，帮助群众解决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定期走访困难归侨侨眷家庭和老归侨，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传达党和政府对侨界群众的关怀。

八、以“基础建设”为突破，提升侨联服务水平

惠州市侨联贯彻落实中国侨联关于推动“两个建设”的部署，不断夯实“基础建设”，推进“数字侨联”建设工作，打造侨联数据库，发挥数据库对侨联各项工作的支持和促进作用；提升官网、微信等网络平台矩阵建设水平，提升侨联工作信息化网络化水平，通过“网上侨联”加强与海外侨团和乡亲的联络，传递家乡声音，更好地服务广大侨界群众和海外侨胞。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惠州市侨联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惠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在广东省侨联的指导下，团结带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更好地发挥侨界独特优势，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侨为“桥”，讲好中国故事，砥砺奋进、勇毅前行，擦亮侨联品牌，充分彰显惠州“客家侨都”风采。🌐

叶挺红军小学讲学记

文 孙福盛（马来西亚）

一个世纪的牵挂

2014年3月26日，一个我生命中永恒而荣耀的日子。

这一天，作为一位海外学人，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回到祖籍地，为老家的孩子们上一堂课。

美好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将以一位海外客家人和老乡的身份，开始我在中国的第一场生命教育演讲，与我老家的孩子们，进行一次贴心的交流，一次跨世纪的对话。

初春三月，神州大地的原野一片青绿，我应约来到广东省惠阳区秋长镇叶挺红军小学（前身为腾云学堂），为该校师生呈献一场名为《让梦想动起来——爱我中华共圆中国梦》的演讲活动。

抵达校门口，一条红底黄字的欢迎横幅映入眼帘，令我倍感亲切和感动，却又心潮翻滚。

这次演讲活动，缘于我的第一次回祖籍地探亲之旅。

我的祖籍地惠阳淡水大埔孙屋，是我爷爷和奶奶出生的地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地仍是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农村生活更是穷困凋敝，看不到希望，许多年轻人都含泪离别家乡，在“下南洋”的大潮中远走他乡，寻找更好的出路。

我那位勇敢的爷爷，就是在这一波“下南洋”的大潮中，勇闯七洲洋，来到蕉风椰雨的马来亚，和奶奶一起成了海外客家人。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海外惠阳后裔了。

爷爷和奶奶终究没能回到自己的老家，他们的遗愿在经历一个世纪后，由我为他们完成。

2012年杪，在惠州市侨联和惠阳区侨联负责人的协助下，我成功进行了第一次祖籍地探亲之旅，为祖籍地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兴奋无比。返马之前，我立下一个心愿：身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有生之年，我一定要为家乡的孩子们上上课。

在惠阳区侨联和教育局的组织协调下，这件美事终于实现了。我的生命和

教育生涯，因为这一次在叶挺红军小学的演讲经历，增添了无限的荣耀和光彩。

这是牵挂了一个世纪的心事，延续了一个世纪的缘分！

是缘分，也是荣耀

真没想到，我在中国的第一场演讲，是从叶挺红军小学开始的。这是一次极其难得的缘分，也是我这位海外学人的荣耀。

叶挺红军小学，地处惠阳区秋长镇山区，属于农村小学，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的母校，前身为腾云学堂，创立于1903年。

我是一个喜欢“望文生义”的人。第一次站

在腾学校的校门口，联想此次到访的目的，一句短诗立刻飘过我的脑际：腾云腾云，腾飞中国梦，云集栋梁材。

啊，多好的校名，多好的内涵，多好的期盼！

我不得不为此行添上如此美丽的臆想。

走进校园，满眼的晨光熹微，春风向我送暖，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欢快啼唱。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同学手持清洁工具，正在进行清洁卫生工作，这就是传言中的中国学校：自己动手，建设整洁校园。

教育的潜移默化，就从这里开始了。我的心里好生感动。

我的演讲在宽敞明亮的多功能礼堂进行。从



⑦ 惠阳叶挺红军小学

校门口到礼堂的布置，显现了该校师生对这次演讲培训活动的重视。该校吴志文校长吐露，教育局为了让这一次演讲活动更为顺畅，特别拨款为该校添置了全套新的投影设备，让该校的硬件设备更上一层楼。

在马来西亚，我们把这样的演讲培训活动归类为青少年生命教育，目的在引导青少年学生从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到创造生命的价值，演讲会全程用孩子们喜欢的文字和影像进行。

我说过，也做出承诺：“我的讲授，必须充满歌声、笑声和掌声。”

今天，我做到了。

歌声不断，梦想无限

我的演讲会包括了两场专题分享：“天生我材必有用”“立大志做大事”；教唱了两首手语律动歌曲：《蜗牛与黄鹂鸟》《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

“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唐代诗人李白《将进酒》里的名句，我们的演讲会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我让自己更有用”。

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要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是啊！要做大事，就要立大志，而成大事者，就是从小怀抱远大的志向，并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最好。

《蜗牛与黄鹂鸟》是一首源自台湾的校园歌曲，旋律轻快、寓意深刻，通过蜗牛与黄鹂鸟之间调皮和生动的对话，带出“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怕慢，只怕站”的道理。

《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则是新加坡艺人梁智强创作的歌曲，歌词简单易上口，其中的经典歌词“每个人的贡献都不同，也许你就是最好的那种”，勉励每个人珍惜生命，发挥所长。

经过两次示范和教唱后，我发现同学们很快

就掌握了，而且歌声嘹亮，动作整齐，士气高昂，让旁听的校长、老师和嘉宾们称赞不已，承认这样的培训活动没有教条，充满乐趣，符合孩子们的学习心理，应该大力推广。

是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多年来的青少年生命教育实践，让我对这句古话深信不疑。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同学们参与度很高，在问答和分享环节，总是抢着举手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在“梦想树”的堂上互动环节，孩子们把自己心中的梦想，一一写在缤纷的卡片上，兴奋和恭敬地挂在梦想树上，四位可爱的同学站到讲堂前方，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那一刻，我在孩子们兴奋的脸上，看到了认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生命的跃动。

时任惠阳区教育局副局长吴远优在总结致辞中，用了八个精简的大字勉励在场师生：“从今天起，让我们叶挺红军小学，歌声不断，梦想无限。”

吴副局长的总结道出了我的心里话：是的，中国梦不仅是十四亿中国人的振兴富强之梦，也是身在海外的几千万华侨华人的共识。作为一名中华儿女，能够把自己的所学和生命实践，与中国梦联系起来，在追求生命价值的过程中，为中国梦添砖加瓦，将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无限延伸。因此，我极愿为之。

演讲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孩子们把我团团围在了校园的一棵大树下，向我提出许许多多可爱的问题。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后，我把双手搭在孩子们的身上，望着他们充满渴望的眼睛，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都是我的中国亲人，我爱你们，愿你们永远健康，努力，有朝一日，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我会在未来的街头等你，给你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博罗侨胞的家国情怀

文 舒伟平（台属）

博罗是岭南四大古县之一，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北部。历代的博罗侨胞勤劳勇敢，爱国爱家，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清王朝软弱无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个时期，不少博罗人被迫去香港和南洋地区谋生。当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革命党人提出要推翻清王朝、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三民主义”之时，广大侨胞即从道义上、经济上、行动上予以大力支持。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华侨众多，进出方便，是孙中山等同盟会革命党人宣传发动、组织联络、筹备经费的重要基地。当时在这些地区的博罗侨胞已有不少，他们都积极地参加了同盟会的活动，投身革命，涌现许多著名人物。如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新加坡华侨邓子瑜，博罗县麻陂镇人，1900年从海外归来，联系发动归善（今惠阳）、博罗、新安（今宝安）、河源等地爱国人士，响应郑士良领导和发动的惠州三洲田武装起义。1906年，邓子瑜加入了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的同盟会。1907年6月2日，他率领会党领袖陈纯和爱国志士两百多人，在博罗七女湖（现属惠城区汝湖）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七女湖起义。不到半月的时间，连续攻克了泰美、杨村、公庄、石坝等地，后因弹尽援绝失败。这两次起义，被称为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又如园洲镇李屋村人李文甫，少年时代在博罗就受革命思想影响，十七岁时（1908年）便弃学辞家前往香港

寻求革命道路，不久加入同盟会。他在1909年任香港《中国日报》协理，后升任经理兼主持《时政画报》笔政；1910年2月参加同盟会发动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又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任先锋第七路领导人，在掩护黄兴撤退后中弹被捕，慷慨就义，其英名镌刻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终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广大侨胞对此十分欢迎。博罗侨胞在这个时期，革命功绩也熠熠生辉。出生于博罗园洲镇贫寒家庭的李源，1919年，15岁的他就到香港谋生，在昌兴公司的海轮上当侍应生，1921年加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先后参加了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队员，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1925年，李源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支部书记。1927年，他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5月，开始先后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书记，领导全省的革命斗争。他于同年秋在梅州大埔三河坝渡口不幸被捕，惨遭杀害，年仅二十四岁。

文化救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另一种救国形式。这个时期，博罗在文化教育史上出现的

第一例教育革命，是公庄的港胞刘培记推行的。1919年，他在家乡獭子墟和出生地出头沥村兴建了两所新学制的小学，于1920年春招生。乡人给前者定名为“培风小学”，后者为“培智小学”。教学课程告别了蒙学、四书五经之类的读物，改换为国文、算术、图画、音乐、体育等新的课程。培智小学一切经费全由刘培记负责，学生免交学费和书本费，每学期还给每个学生发一套文具和三元钱奖学金，使该村学龄儿童百分之百入学，提高了当地人的文化素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中国。1938年10月11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因为国民党军消极抵抗，节节败退，惠州、博罗、增城、广州相继沦陷。这些消息牵动着广大华侨、港澳同胞的心，他们纷纷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内地人民进行抗日。博罗县城10月16日沦陷后，香港慰问团、香港记者访问团、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等几个团体来到博罗，博罗战时工作团协助他们对灾区群众进行慰问、宣传、送发药物、衣服等工作。侨居海外的博罗人李江、庄紫君等人，满腔热血参加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战斗在抗日前线。博罗石坝冷水坑人邓志满，14岁时因生活贫苦被迫卖身到马来西亚北婆罗洲从事苦力，由于吃苦耐劳，果敢有谋，德高望重，而被侨众推为侨领。1941年，当日军侵略北婆罗洲时，他不顾年迈，带领其子邓威廉及当地人民奋起抗战，坚持多年。1945年2月，尽忠沙场，牺牲前，还教育儿子邓威廉要抗战到底。虎父无犬子，其子邓威廉带领队伍继续抗战，直到抗日胜利。邓氏父子的光辉事迹为马来西人历代崇敬，他们是中国海外侨民的典范，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永留青史。

1945年，饱受战乱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战胜利。然而，1946年1月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不久，蒋介石便阳奉阴违，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撕毁停战协定，反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广大侨胞深知民族不独立，

人民不解放，个人也遭殃，于是纷纷起来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这个时期，身居海外的博罗侨胞积极支持内地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的将老家设为东江纵队的地下联络站；有的从香港购进物资支援东江游击队；有的青年则离开父母回到内地投身战斗行列。泰美井水窝村（现为楼角村）的港胞钟月初，从1938年开始，就利用在港经商和老家开矿的来往活动，经常为东江游击队购买弹药、武器，支持抗日。1942年，博罗知名进步人士张友仁先生（1949年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史馆馆长）遭国民党迫害时，钟月初积极解救并保护张友仁的家属安全。钟月初还鼓动其弟子协助东江纵队做好已沦为草寇的邓子廷等人的思想工作，并于1944年冬将其收编成一支革命队伍。钟月初一家在邓子廷队改编期间一个多月内承担了供给，为此押过二十亩祖田和卖掉一担生油，买回十五担米供给伙食。1946年8月，国民党匪部梁桂平准备袭击“东纵”三支队一团的民运队，钟月初之子钟纪彪得悉后即告知部队，使部队得以安全转移。钟纪彪后来参加了民运队，投身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行列。从此，钟月初的家成了革命的堡垒。泰美镇永良围侨胞徐佛森，为了家乡人民早日得解放，利用在泰美开设的小店，积极为东江纵队的地下联络工作服务，并经常馈送一些游击队紧缺急需的日常用品及药品等，支持中国的解放斗争。在港出生的朱安和祁婉等进步青年，想到日军践踏香港时的惨状，以及国民党发动内战给群众带来的苦难，1949年愤然回内地参加革命。他们通过读夜校时认识的同学关系回内地加入“东纵”一支队，投身于人民的解放斗争。博罗侨胞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乡情连海外，月是故乡明。”在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慈善事业等各个方面，博罗侨胞和社会进步力量始终是一支有力的后勤部队，对推动博罗经济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的新生

文 姚应崇（越南归侨）

1978年，越南政治风云突变，开始大规模排华活动，并且骚扰中国边界。他们把枪口对准勒紧裤带支援他们的中国人民，不断制造事端，不断挑起边境冲突，同时彻底驱赶在越华人。一只面目狰狞的白眼狼活生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同年7月的一天，在越南当教师的我们与其他华人遭到越方驱赶，被逼净身离开越南。妻子背着简单的行李，双手牵着年幼的儿女；我搀扶着年老的父母，一家人夹在逃难回国的人流中。成群结队的人流，有抬着走的、有背着走的、有呻吟的、有哭泣的、有骂人的。天上阴云密布，地上怨声载道，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家破”，第一次当上“难民”，第一次尝到“游离失所”的滋味，我咬牙切齿地记住了。

历尽艰辛，我们一家踏上渡船。祖国东兴口岸，沿着河岸插满五星红旗，岸上站满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拉着巨幅标语：“祖国欢迎你们回来！”

当我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悲喜交杂。我跪在地上双手捧起一把祖国的泥土，把它轻轻地放到我的唇边，然后又把它紧紧地贴到我的心窝上。啊！祖国母亲，你流落天涯、受尽欺凌的儿子回来了，回到你的怀抱里！从此他不再孤独，他不再有忧伤，他不再担惊受怕……

走在边城东兴的大街上，红旗飘扬，阳光明媚，《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大街小巷。到处都可看到各式标语口号“坚决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祖国是广大华侨的靠山。”“对归侨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关心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看到这些，我的心暖暖的，甜甜的，美美的，一股被呵护被关心的暖流在心头回旋。从此我获得了新生！

回到祖国后，我和家人获中国政府安置在广东博罗杨村华侨柑桔场。这是东南亚最大的柑桔场，山清水秀，花果飘香。农场领导和职工敲锣打鼓，列队欢迎我们。接待员给我们安排了住房和膳食，还发放了家具、厨具、餐具、衣服和被褥。这些足以让我们衣食无忧，让我们重新有一个完整温暖的



◎ 归侨回国后等待安置

家。祖国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动落泪，祖国给了我一切，祖国是我的一切！

经过简单的考核后，我和妻子获得对口安排工作。妻子到小学任教，我到中学任教并担任教导主任。后来妻子还被选派到北京参加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这令归侨同胞非常羡慕。为报效祖国，奉献社会，我以满腔热情兢兢业业地投入工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多次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多次荣获优秀教学论文奖，1999年还被评为惠州市优秀教师。我取得的点滴成绩无不与祖国的关怀和帮助息息相关。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不知不觉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为了更好安度晚年，我们举家迁往惠州城区。这是个半城山色半城湖的城市，我们选择在惠城区下角落户。这里开窗便见到西湖，出门便见到东江，到处绿树

成荫，公园遍布四周，风景迷人，空气清新。这里走出去几分钟就有最好的健身场地，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晚年能在这优美的环境中度过，真是快活胜过神仙！夕阳无限好，晚年更幸福，这也是祖国给我的。

这辈子我有幸获得新生，生活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这辈子我有幸见证祖国社会主义制度无以伦比的优越性；这辈子我有幸见证祖国的强大，见证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巨变，见证基建的辉煌成果，见证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今天现代化的生活已超越了历代帝王的待遇，我们今天使用的新科技已达到几千年来的巅峰，连神话中的神通法术也逊色，这辈子值了，太值了！我坚信祖国的崛起没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挡，我坚信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中国梦必定早日实现！

此生有幸入华夏，来世再做中国人！🌍

万里归舟 大美潼侨

文 罗春彦

20世纪60年代末，带着离别的悲痛和满腔热情的印尼、缅甸等国的第一批归侨，先后来到位于潼湖的华侨农场。

许多归侨刚来到华侨农场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应。

六十多年前，建场之前的华侨农场还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山坡，只有一片未被开垦的土地和几座光秃秃的小山坡，牛棚羊舍傍山而建。地势较低，经常水涝，一下大雨就“水漫金山”，只露出几个近似光秃的山头，潼湖也因此得名。

196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惠阳国营畜牧场及周边三个村，转为广东省国营潼湖华侨农场。当地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在侨场建起一千多座房屋免费安排给归侨居住，划地给归侨耕种。生活清苦，收入也不多，但归侨依然感受到了党的亲切关怀。

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归侨们怀着“敢叫潼湖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投身到华侨农场建设中去。

归侨们修堤垒坝，围湖造田，开河挖沟，修筑渡槽和水闸，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他们用锄头和拖拉机开荒造田，翻开了沉睡多年的大地。

归侨们在东江岸边延绵起伏的丘陵地带上开创茶园四百亩，种植水仙、黄旦、梅占、茗花、云南大叶等十多种优质茶种。

茶是故乡浓。潼侨绿茶后来蜚声海外，成为创汇产品，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十分受欢迎。每年立春过后，许多旅居海外的侨胞都会委托亲朋好友购买潼侨的绿茶，寄往美国、加拿大等地。2007年5月，“潼侨”牌绿茶入选中国名优产品行列，是惠州茶叶类唯一入选的品牌。

华侨农场先办起红卫小学等几所学校，解决了华侨子女读书的问题，随后建立医院，职工们看病实现“公费医疗”。

经过几年的建设，整个农场由荒山野岭变成青山绿水、物产丰富、牛壮鱼肥、瓜果飘香的“鱼米之乡”。

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老挝等国第二批归侨历经千辛万苦，万里归舟，来到华侨农场。有了老归侨们的开荒拓土，后来的新侨民有了相对富足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有党和国家侨务政策的扶持，潼侨发展得更好更快了，镇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吸引了来自韩国、意大利、中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投资创业，初步形成了以电子、化工、纺织、玩具、五金配件、灯饰、食品加工为主的工业格局。



⑦ 潼湖茶厂的归侨职工

2003年12月，华侨农场综合改制，设立潼侨镇。至此，华侨农场一共安置了来自菲律宾、印尼、缅甸、柬埔寨、新加坡、越南、日本、印度、法国、马来西亚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八千多名归侨。潼侨也因此成为广东著名侨乡，成为惠州两大侨镇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归侨们在潼侨生根，融入当地生活。走进归侨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习惯还保留了不少异国风情。

若要体验异国风情，“无需离疆去寻梦，只须咫尺游潼侨”。十四个国家的归侨聚居一起，他们带来了各个侨居国的语言、饮食和习俗，使得潼侨的异国风情多姿多彩，五花八门。椰子树、棕榈树、菠萝蜜树、杧果树……热带植物掩映幢幢东南亚情调的房屋。他们还保留了一些侨居国的饮食习惯，如印尼归侨喜欢酸辣食物；马来西亚归侨喜咖喱味道，煮鸡肉也要拌上咖喱粉、马铃薯、黄姜、香茅根、辣椒、椰粉、葱等特有的配料；越南归侨的煮扎蹄，先将猪蹄去骨取肉斩碎，拌胡椒、木耳，煮熟后用蕉叶或竹芋叶包好，急冻后才吃。在着装方面，不少归侨还穿着侨居国的服装。遇上重大庆典，归侨们还会使用专门

从印尼、越南等购置的充满浓郁异域风情的安格隆和哥巴伦等音器和服装道具，兴致勃勃地表演印尼苏拉威西岛民族舞、印尼欢乐舞、印尼苏门答腊亚齐舞和马来舞。

为了保护传承侨乡传统文化，丰富归侨的文化生活，全面开启新时代产、城、人融合发展样板区，潼侨众多公共设施也融入了诸多华侨文化元素。潼侨公园大门侧设立了一面反映归侨在农场热火朝天地劳动建设的雕塑墙，形象地再现了归侨勤勉劳动创造美好家园的画面。

“正月腊梅开，潼侨雁归来。茶园绽新绿，原是故人栽。”一批移居周边城市的归侨，带着半个世纪的乡恋，常常相约潼侨，畅谈过去的岁月，体验潼侨的变化。

一位归侨品完潼侨绿茶后写下《西江月·咏茶》：“扎根不拘贫贱，披霜染绿山丘。任凭采摘掐烘揉，片片尽献春秋。形容干枯莫愁，杯中舒展广袖。浮沉一生嗜香游，苦中甘甜醇厚。”

词赞的虽是茶，但也是对历尽艰辛、浮沉一生，万里归舟，不拘贫贱，开荒拓土，勤进取劳，开放包容，建设大美潼侨、苦尽甘来的归侨最好的赞颂！🌐



广东侨联工作

文化 交流 品牌

风韵
南粤

弘扬中华文化，支持海外传承，以文化人，以韵感人，
讲好美丽中国故事，助推人类共同发展。



颜珂：以侨为“桥”打造聚才引才强磁场

文 龚春辉（《南方日报》记者）



② 颜珂

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双休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广东省台联会长、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颜珂是在办公室度过的。整理资料、线上交流……随着全国“两会”临近，她在日常繁忙工作之余认真修改提案。从2018年以来，她参与提交的提案累计超30份，其中《关于取消台港澳同胞就业许可制度的提案》曾被列入全国政协成立七十年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

2021年，颜珂来到广东省侨联工作，新环境给她带来了新的履职启发。“近期，我们对侨界高层次人才进行多次专题调研，希望把他们最关切、最真实的声音带到北京去。”她呼吁，以侨为“桥”打造聚才引才强磁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推动台胞台企深度参与乡村振兴

颜珂是在大陆出生长大的台胞二代。20世纪90年代，她首次因工作关系踏上宝岛，“终于有机会去家乡看看”。此后，她持续为深化海峡两岸融合发展鼓与呼。

尤其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颜珂经常在各种场合为便利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建言献策，助力台胞台企更好融入进来。“这既是工作责任使然，也有理想信念的驱使。”

随着两岸开放人员往来，颜珂敏锐地注意到：两岸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加快互融互通，一批批台胞相继来大陆发展，“以前台湾朋友们说‘去大陆’，现在习惯说‘回大陆’”。

在一线走访时颜珂发现，台胞台企在参与推进乡村振

兴方面潜力巨大。一方面，大陆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和一系列利好政策。另一方面，台湾具有农业技术及新品引入的优势。“比如，韶关翁源的气候和台湾接近。这些年，台商带来新兰花品种与先进培育技术，引导翁源农户种植。当地政府积极搭建平台，提供友好、便利的投资环境，推动翁源兰花享誉全国、远销海外。”

颜珂通过调研发现，台胞台企深度参与乡村振兴事业还面临政策支持相对零散、融资较难、产业支撑和智力支持不足等一系列现实挑战。去年，她从加强政策措施扶持力度、鼓励台湾青年到乡村就业创业、增强园区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引起有关部委高度重视，并得到相关答复：将支持鼓励广东等地打造海峡两岸乡村发展融合试验区等平台。

“粤台两地农业互补性强，广东已打造出一批粤台农业交流合作载体，呈现出合作共赢的发展态势。”颜珂表示，在鼓励台胞台企参与乡村振兴、推动两岸乡村融合发展方面，广东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有不少创新之举。“今年，我既要把此前调研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带到全国两会上，也要把广东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到北京，与全国各地的委员们交



② 颜珂率广东省侨联调研组一行考察南粤侨创基地

流。”她说。

以侨聚才助建高水平人才高地

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作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战略布局，颜珂高度关注。在她看来，侨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理应在服务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发挥重要作用。她准备向全国政协提交一份团结和引导海外侨界高层次人才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的提案。

为此，在今年春节前后，颜珂结合日常工作，赴全省多地的“南粤侨创基地”实地考察，并以“线上+线下”方式多次围绕侨界高层次人才专题调研，特别是对他们回国创业的意愿和政策诉求进行精准调研与分析，同时借鉴世界其他知名湾区的经验，以期形成一份针对性和可行性强的提案。

在提案中，颜珂建议从强化平台载体建设、完善人才政策体系等方面着手，注重以侨引才聚才，汇聚更多侨界高层次人才，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贡献更多侨界智慧。

脚步不停，履职不止。“四年多来一直尽职尽责，但仍有很大努力空间。”回顾自己在全国政协的履职经历，颜珂颇有感触地表示，将继续守好初心、担好使命，尽心尽力为人民发声、为发展献计。🌐

新征程承载新使命

——广东省侨联十一届三次全委会议侧记

 乔莹

春回大地的南粤，处处涌动着咬定目标、砥砺前行、一起向未来的干劲。站在新的征程上，广东省侨联正以昂扬的精神、奋进的姿态，团结凝聚侨界力量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22年2月28日，广东省侨联十一届三次全委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和中国侨联十届五次全委会议精神，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发挥优势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团结凝聚侨界力量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再建新功。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隋军，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宁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黄宁生强调，全省各级侨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迎接党的二十大、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贯穿全年的重要政治任务，夯实侨界群众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深刻把握省委“1+1+9”工作部署要求，聚焦“双区”和两个合作区建设，鼓励引导侨界在粤投资兴业、创新创业，助力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抓好《中国侨联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及我省实施方案的贯彻落实，统筹好海内与海外、线上与线上、联内与联外、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不断

开创全省侨联工作新局面，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做出侨界新的更大贡献。

隋军代表中国侨联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充分肯定广东省侨联取得的显著成绩，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侨联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广东省委工作要求。要凝心聚力谋发展，做强做实“创业中华”“侨创南粤”等品牌，为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要持之以恒强基础，织好“两张网”、用好“两项机制”，做好爱侨护侨工作，增强侨界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勇立潮头抓改革，提高侨联工作科学化水平，胸怀“两个大局”，推进“网上侨联”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持续引领侨界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会议选举颜珂为广东省侨联主席，增补了一批委员、常委。

击鼓催征再出发，奋楫扬帆新征程。

“我省是全国最大侨乡，担任广东省侨联主席，令我深深地感受到身上担负着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颜珂表示，要接好这个接力棒，把党的侨联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台阶，广东省侨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中国侨联的有力指导下，团结班子带领队伍，紧紧依靠各位委员和各级侨联组织、侨联干部的努力，紧紧依靠广



⑦ 广东省侨联召开十一届三次全委会议

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鼎力支持，在历届侨联领导班子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走好新时代广东侨联赶考路，继续当好全国侨联工作排头兵，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侨界的期望。

时殊世易，唯初心不变。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广东省侨联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省委“1+1+9”工作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中国侨联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团结带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侨联组织的新作为新形象，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侨界智慧力量。

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益、拓展海外联谊、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会建设”六大工作职能，广东省侨联开展了2022年工作部署：一是着力思想政治建设、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高潮；二是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三是着力文化强省建设，在广东实施对外传播工作中展现新担当；四是着力拓展海外联谊，壮大爱国爱乡力量涵养侨务新资源；五是着力参与社会建设，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氛围；六是着力侨联组织党建，深入推进自身建设展现侨联新形象。

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侨联关于贯彻落实〈中国侨联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分解工作任务和举措，制定落实阶段性工作目标和任务，确保“凝侨心、聚侨力、弘侨爱、扬侨韵、发侨声、强侨建”六大行动和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把规划转化为推动侨联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引领侨联工作开创新局面，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广东侨联事业新气象。

蓝图已绘，未来可期。🌐

广东侨联纪事

《华夏》记者 林辅毫

1月
January

1月1日，颜珂书记赴江门出席“展望区域未来·谋求开放新发展”——RCEP 启航合作发展系列活动并开展调研。

1月5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宁生到机关调研座谈。颜珂书记汇报了工作，黎静主席，戴文威、谢惠蓉、邵瑾副主席，庄有林、曹堪宏、林克风二级巡视员，以及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月5日，谢惠蓉副主席带队到省司法厅座谈交流。

1月6日，颜珂书记赴惠州出席惠州市侨联十届二次全委会议并开展调研。

1月7日，黎静主席出席广州市“1+11”为侨服务数字化综合服务系统全线开通仪式。

1月8日，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出席《南国高原》出版八周年座谈会。

1月11日，颜珂书记、邵瑾副主席在机关会见省侨联兼职副主席、省商务厅副厅长陈越华，商议筹办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有关事宜。

1月13日，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2021年度省直单位中直驻粤单位机关党委（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1月13日，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宣传部长会议。

1月13日，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广东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年会。

1月14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宁生到广州市荔湾区开展工作调研。颜珂书记陪同参加调研活动。

1月14日，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外宣工作会议。

1月15日，颜珂书记在广州参加广东省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



January

1月17日，省侨联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颜珂书记出席并讲话，戴文威副主席主持会议，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三巡回指导组组长孙小华，副组长曾小龙、黄光华等到会指导。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全体党员干部，直属社团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会议。

1月17日，颜珂书记在广州参加全国统战部长会议。

1月18日至21日，颜珂书记、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1月21日，邵瑾副主席赴清远出席大湾区生命科学园动工仪式暨招商推介会。

1月21日，颜珂书记、黎静主席出席“美丽资深·乡村振兴公益基金”签约暨启动仪式。省侨联海外委员、美国潮商总会主席、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执行会长林辉勇出席启动仪式。

1月25日，戴文威副主席出席肇庆市第九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1月26日，颜珂书记、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十二届省纪委七次全会。

1月27日，省侨联领导班子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三巡回指导组副组长曾小龙到会指导并作点评，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三巡回指导组成员黄金华、郭宾，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李连坚到会指导。颜珂书记主持会议，黎静主席，戴文威、谢惠蓉、邵瑾副主席参加会议。

1月27日，庄有林二级巡视员在广州参加全省统战部长会议。

1月上中旬，由省侨联领导分别带队，组成七个慰问组深入全省各地开展“侨爱南粤·新春送暖”活动。此次活动共发放慰问金一百多万元，慰问全省二十一个华侨农场、省侨联直属企业的困难归侨侨眷及部分城乡散居归难侨家庭。

1月中下旬，省侨联领导分别带队上门走访慰问省侨联离退休老干部。

2月 February

2月10日，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

2月11日，中国侨联十届五次全委会议以电视电话形式举行。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副主席李卓彬主持会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和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书记处重要指示要求，总结2021年工作，研究部署2022年工作，团结引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颜珂书记，黎静主席，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庄有林、曹堪宏、林克风二级巡视员，以及在粤中国侨联委员在广东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2月11日，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组织部长会议。

2月11日，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分管领导分管单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分析研判会。

2月15日，颜珂书记、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走访法国番禺富善社广东代表处。

2月16日，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2022年全省贸促工作会议暨广东国际商会七届二次理事会会议。

2月17日，颜珂书记在广州参加住粤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

2月17日至18日，颜珂书记、谢惠蓉副主席到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广东省侨界仁爱基金会、广东省客联公益基金会、广东国际商会、广府人海外联谊会走访调研。

2月22日，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出席法国番禺富善社与中国国际商会广州市番禺区商会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2月23日，颜珂书记在广州参加2021年度省委选人用人工作“一报告两评议”会议。

February

2月24日，颜珂书记、谢惠蓉副主席到省贸促会沟通协商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相关工作。

2月24日，省委第五巡视组向省侨联党组反馈巡视情况。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陈然传达了省委书记李希在听取十二届省委第九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并对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省委第五巡视组组长范先军分别向省侨联党组书记颜珂和党组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颜珂主持向领导班子反馈会议并作表态发言。省委巡视办、省委第五巡视组、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省侨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侨联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副处以上干部，机关纪委委员，组织人事干部列席会议。

2月25日，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2022年省直机关党的工作会议。

2月28日，省侨联十一届三次全委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和中国侨联十届五次全委会议精神，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发挥优势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团结凝聚侨界力量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再建新功。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隋军，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宁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选举颜珂为广东省侨联主席，接受黎静辞去省侨联主席、常委、委员职务的请求，接受邵瑾、梁瑞冰辞去省侨联副主席、常委、委员职务的请求，卸免和增补了一批委员、常委；审议通过《广东省侨联十一届三次全委会议工作报告》《广东省侨联关于贯彻落实〈中国侨联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实施方案》等事项。

在德国疫情第五波的阴霾下，侨联春晚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侨联是我们海外中华儿女最知心的娘家，特别是万主席热情洋溢的致辞，让我们感受到祖（籍）国的温暖和关怀。请祖（籍）国放心，我们海外中华儿女一定会心手相连、共克时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才智和力量！

——国际德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于超

万立骏主席送来的新春祝福让我们海外侨胞在疫情仍然严重的情况下感到无比亲切，深深感动。我们在海外将继续为促进祖（籍）国与住在国的经贸文化交流多做贡献。

——欧洲荷兰侨界妇女联盟会长熊国秀

非常感谢万立骏主席在春节来临之际与全球的中华儿女相聚云端，送来温暖祝福，感谢中国侨联精心制作的高水准视听盛宴。听着熟悉的旋律，看着优美的画面，无比思念父母兄妹和亲朋好友，无比眷恋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乡音乡情。

——美中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沈宓



隔山隔水隔不断血脉亲情，中国侨联已连续两年举办“亲情中华·同心与共”云上春晚，让广大侨胞相聚云端、体验中华文化、感受浓浓亲情，把我们的情感在“云端”之上拉得更近、更紧。

——香港侨界社团联合会会长黄楚基

晚会采用“云”视频技术，“云传播”“云互动”，融通大屏小屏，为“就地过年”的海外华侨华人送上情意浓浓、祝福满满的文化盛宴。在不能与家人团圆时，感受来自祖籍国的温暖，让身在异乡的我不再孤单。

——德国香草山中文学校校长涂丽萍

因为疫情我和我的同学们不能回家过年，远离祖国、远离父母，中国侨联这台有年味、有国韵的晚会让我们十分激动。晚会中的说唱节目《我眼中的中国》更是让我们无比想念祖国的美食美景。出门在外才发现，无论在哪里，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实最温暖的后盾。想念家乡，想念家人，希望早日学成归来，为祖国繁荣昌盛盛尽一份绵薄之力。

——英国女王大学留学生刁昱琳

老艺术家杨洪基《多情的土地》、军旅歌唱家吕继宏《再见了，大别山》、女高音歌唱家郑咏《九州尽芳菲》唱出了华夏儿女对土地的深情、对故土的眷恋、对乡亲厚土的感恩、对祖国的热爱，令我们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侨胞深深感动。

——老挝中国总商会会长姚勇

晚会中印象最深的是《唐宫夜宴》这一节目，舞蹈演员诙谐可爱又婀娜多姿，运用现代科技将大唐盛世美妙地呈现出来，展现了大国文化的传承和自信。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海外侨胞也要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校长陈晓红



这是一场特别的、难得的文化盛宴，尤其第二篇章“情系桑梓”中，方锦龙、陈军两位大师表演的器乐联奏《故乡情思》，余音绕梁，震撼人心，传递的浓浓思念之情仿佛跨越了山海，直抵游子内心，一解乡情与相思。

——韩国（株）新华国际董事长王俊霖

感谢中国侨联为海外华侨华人献上这台云端春晚，晚会年味、侨味十足，让人看后意犹未尽。万主席的新春祝福贴心又暖心，透露着浓浓的亲情乡情友情，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中国侨联是海外侨胞的娘家”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无论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会感受到祖（籍）国的温暖，繁荣昌盛的祖（籍）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西班牙南部华侨华人协会会长傅正洪

云上春晚构思独特、编排出色、制作精良，充满年味侨味，是一场名副其实华侨华人自己的春晚。四个篇章层层推进、高潮迭起，用一场充满民族风情的盛宴，加深了海外侨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抒发了海外侨胞对祖（籍）国的思恋。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昊

晚会是中国侨联为广大侨胞奉献的一场饱含浓浓年味的视觉盛宴，让全球华侨华人相聚云端，共叙亲情乡情友情。因疫情不能回家的游子通过观看晚会，体会着亲人的温暖和故乡的味道，感受到到祖（籍）国和侨联组织的殷殷关切和拳拳爱护之心。

——赞比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李铁

在推进新时代自我革命实践中展现新作为

李家瑞（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组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个方面历史经验，把“坚持自我革命”列为党百年奋斗的十个历史经验之一，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信心决心和使命担当。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的重要政治机关，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要贯通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宝贵经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好全会关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部署要求，努力在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新实践中展现新风貌新作为。

一、以学习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刻体悟新时代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深刻揭示了我们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党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全面、深刻、系统地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自我革命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我们要联系实际、紧扣职责，准确把握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主要任务，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

坚持自我革命、建设廉洁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苦难辉煌依然保持常青之道的秘诀，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反对腐败。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坚持自我革命和严明党的纪律放在重要位置，就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为己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从严管党治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以改进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打虎、拍蝇、猎狐”都取得了历史性成果，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能解决的顽瘴痼疾，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大党的能量和气魄，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信赖和支持。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是管党治党的重要政治力量，在党的自我革命中担负着重要使命。作为派驻省统战系统的纪检监察组，在推动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我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决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着力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我们要发挥好“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突出政治监督，做细做实日常监督，发挥好派驻监督近距离、全天候、常态化的监督优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好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全省统战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二、以旗帜鲜明讲政治为责任，不断增强新时代自我革命的使命担当

坚持党的领导，是《决议》总结出的党百年奋斗的第一条宝贵经验。赵乐际同志指出，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派驻监督的首要任务。作为派驻省统战系统的纪检监察组，我们要立足职能职责，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突出“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责任，切实加强对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紧围绕“纪检监察”和“统一战线”两个大局，准确把握好“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凝聚思想共识，强化政治引领，督促被监督单位扛起统战大省的责任担当，以履职尽责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在省直统战系统不

断走向深入。要结合全省统战系统实际，紧盯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开展监督工作，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战略部署，巩固和发展壮大新时代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加强对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监督检查，督促各被监督单位落实落细中央和省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等重大事项的决策部署，并跟进检查落实，做到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到哪里。抓住“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督促省统战系统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选择性执行，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问题严肃查处。2022年上半年，省工商联、省知联会等团体将进行换届，对提名、推荐人选要做好监督的再监督工作，严肃换届纪律，把好政治关、廉洁关，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三、以“三不”一体推进为引领，自觉坚守新时代自我革命的初心使命

《决议》强调，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这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的重要方略，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的自我革命是为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作为党的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握好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新任务新要求，发扬斗争精神，为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履好职、尽好责。

作为省纪委监委派驻的纪检监察组，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三不”一体理念推进正风反腐。精准把握好监督的职责定位，压实被监

督单位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通过督促制定主体责任清单，与被监督单位（党组）党委定期会商全面从严治党、共同研判政治生态等方式，建立完善“两个责任”贯通联动机制。督促被监督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督促被监督单位开展好提醒谈话、廉政谈话、警诫谈话工作。在“强高压、重遏制”打造“不能腐”权力制约的基础上，突出监督责任与主体责任的统筹联动，强化融合协同，增强总体效能，以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日常管理监督制度机制打造不能腐的制度笼子，以加强教育引导构筑“不想腐”的思想堤坝，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

四、以围绕统战工作为大局，躬身笃行新时代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坚持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之一，强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的充分肯定，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更好服务中心大局，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增添了强大动力。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就是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纪检监察机关在长期奋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是经济大省，也是统战资源大省、统战工作大省，统战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切实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统一战线各领域各方面，深入推进广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繁重前所未见，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香港迎来国安法颁布之后的第一个特首选举之年；外部势力干扰台海局势、不明因素增多，对台工作开展困难重重、责任重大；敌对势力对宗教的渗透、对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拉拢腐蚀时刻存在。但是机遇与风险同时存在，更要发挥好统战工作凝心聚力的作用。作为派驻省统战系统的纪检监察组，我们要运用好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宝贵经验，在推进自我革命新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要时刻把握好政治监督定位，围绕统战工作大局，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化运用“四种形态”，躬身笃行做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战士，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发挥好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我省统战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伟力提供坚强的纪法保障。🌐

追忆祖父的挚友梁灵光

文 曹卫东（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青年文学家》杂志签约作家）

1993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半，时值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陪同祖父曹松康前往江苏南通县北山宾馆，看望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南通县抗日民族政府第一任县长兼保安旅旅长、新四军苏中军区九分区司令员梁灵光。

梁灵光正在与几位老同志叙话，我的祖父健步如飞向前：“梁司令，您好！”梁灵光站起来与我们亲切地握手，并与祖父相拥，彼此关切问候。两位老战友多年未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的祖父曹颂康1917年3月生于南通一个书香世家。早先在中学任教，1940年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新四军。1941年初春，苏中四分区税务局局长陈国栋分派祖父前往海门担任苏中四分区税务六分处稽核兼海门大豫镇征收所所长。同年深秋，祖父奉命协同姜卓筹办新四军苏中军区干部培训学校（为作掩护后把学校更名为“私立弘毅职中”），姜卓任校长，祖父任校务主任。经过半年的筹办，干部学校正式开学，开学典礼上祖父与前来作报告的梁灵光相识，并由此和梁灵光结下了长达55年的深厚友谊。

我年少时一直听祖父说起梁司令在通如海启地区的战斗经历，久闻大名却是素未谋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老。梁老给我第一印象是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一头银发，两道白眉，精神矍铄。

我根据祖父生前的口述和遗稿，特写此文纪念梁灵光金戈铁马、从军从政为国为民的一生。

独闯虎穴，接管南通县城

梁灵光1916年出生于福建永春一个比较富裕的儒商家庭，年轻时即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35年曾参加上海的爱国学生运动，后辗转到南洋在马来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继续从事革命运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在马来亚的梁灵光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共赴国难。1938年夏天，他几经辗转至江苏淮阴县，联络当地抗日人士，组建了“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

随着日军铁蹄的蹂躏，1938年3月南通城镇相继沦陷。日军攻占南通后，以何润章为首的国民党南通县政府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蚕食，一味退缩，县政府驻地一再撤至金沙、北兴桥。由于县长何润章的消极避战，不断地助长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南通地区的对敌形势急转直下，抗战局面岌岌可危。

1940年10月，在此严峻形势下新四军军长陈毅建议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季方在掘港召开苏四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宣布并成立了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季方和当地爱国人士同时致电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请求新四军派兵进驻通如海启地区，领导当地的民众开展抗日斗争，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梁灵光闻讯后即向指挥部主动请缨去南通县开展工作，得到上级同意并被任命为南通县县长。当新四军委派梁灵光担任南通县县长的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何润章等国民党军政头目和地方土豪劣绅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武力对抗，并宣布县城北兴桥镇实行戒严，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企图与新四军决一死战，抵制接管。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原计划派侦察连护送梁灵光上任，时年24岁的梁灵光展现了果敢、睿智的一面，为避免摩擦，坚持不用部队护送。梁灵光仅带着秘书和警卫员一行3人于11月24日下午从掘港出发，前往南通县北兴桥。面对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梁灵光镇定自若。他提前派人深入南通县城进行侦查，掌握到保安旅内部派系林立，保安旅地方派和泗阳派矛盾重重。而保安旅一团中校团副季莘是地方实力派，梁灵光充分利用季莘想当保安一团团长的野心，加强对季莘的策反，许诺只要他与新四军合作，事成以后，一定满足其愿望。在季莘的接应下，梁灵光顺利地通过层层设防进入南通县政府。当梁灵光带着专署的委任状突然出现时，往日盛气凌人的何润章

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季莘迅速解除了县政府警卫排武装，切断了县政府同外界的联系，并扣押了何润章和保安旅副旅长以及一团团长等少数反动军官。为了团结稳定保安旅，梁灵光于次日上午宣布保留大多团以下军官的原有职务，并由自己亲任保安旅旅长，正式接管南通县政权。

12月1日，梁灵光在县政府驻地北兴桥召开了首次行政会议，宣布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建立。为使各界人士统一思想团结抗日，梁灵光向与会人员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并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阐明了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立场，以“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政治民主，澄清吏治”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抗日方针和施政纲领。会上梁灵光热忱欢迎通如海启的广大军民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一起开创抗日新局面。就这样，梁灵光孤胆闯虎穴、兵不血刃，顺利地接管了南通县



⑦ 1943年梁灵光在南通抗日根据地

政权。

在建立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过程中，梁灵光注意对保安旅这支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整训、改造，并发展壮大以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同时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这一系列积极的举措得到了南通地区广大军民的拥护，在党和新四军的领导下，南通海启地区的抗战局面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解放战争期间，梁灵光历任新四军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三十三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军党委常委，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

百废待兴，任轻工业部长

1977年12月梁灵光调任轻工业部部长，那是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许多商品都需要凭票按计划供应，即便如此商品也时常短缺。轻工业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长期处于被“挤”被“让”的地步，轻、重工业比例长期失调，重“重”轻“轻”也成为那个年代的常态。上任伊始，梁灵光首先是改变这种常态，加大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抓好糖、食品饮料、盐、洗涤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造纸此类民生最需要的商品，以保证市场供应的平衡。当时有许多省份轻工业一直上不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轻工业投资被挤。为此，梁灵光多次奔赴各地、深入基层调研，提拔并重用各类专业人才，对轻工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整顿，逐步地使轻工业的发展走上一个新台阶，真正做到敞开市场供应，繁荣城乡市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扩大外贸出口，使轻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担负起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全国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梁灵光召集轻工业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在会上作了题



① 1984年，梁灵光陪同邓小平在深圳国商大厦楼顶观看市景

为《轻工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今后轻工业发展指导方针》的长篇报告。会议要求企业的领导班子务必把主要精力用于抓生产、抓科技，努力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变此前的抓产值、抓产量为抓质量、抓品种；并就如何扩大出口、多创外汇、搞好企业的挖潜、革新、新技术和外资引进等多个问题进行阐述；明确各级领导和企业须按照轻工业自身的特点搞好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真正做到以轻养重，使轻工业得到有序、有质的发展。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和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掀开了中国轻工业快速发展的序幕，并为此后轻工业的繁荣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1979年4月，应日方邀请，梁灵光率领中国轻工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访问，在日本各主要城市考察了各行业的57个单位。考察期间丰田、松下、三洋、资生堂、王子造纸等企业均表达了强烈的合作和投资意愿。梁灵光还重点会见了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此次会见为促成松下公司其后在上海、北京、广东、辽宁投资办厂打下良好的铺垫。这次考察，拓视野、找差距、谈项目，为中国轻工业目标的确定和其后的赶超汲取了先进的丰富的经验。

从1977年12月履新到1980年10月，梁灵光主持轻工业部在调整产品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基本改变了以前轻工业被挤被让的现象，使重视轻工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卷烟、糖、酒、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皮革及制品、家具、服装、工业艺术品等品类经过不断调整和充实，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家电行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三年时间里，梁灵光殚精竭虑带领轻工业部一举扭转了中国轻工业长期徘徊、停滞不前的局面，使中国的轻工业获得了较快较好的发展，为其后轻工业的迅猛发展和腾飞夯实了基础。

主政广东，推进改革开放

1980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梁灵光谈话，为广东和经济特区的起飞进行先行探索，经中央考虑决定调梁灵光和任仲夷去负责广东的工作。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接见了梁灵光和任仲夷，并要求他们到任后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东的优势，努力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梁灵光带着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嘱托于11月8日南下广东。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据资料显示，1978年以前，广东连续14年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时适逢经济调整之际，梁灵光和任仲夷到任后再三斟酌，决定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另一方面根据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坚持发展生产和对外搞活，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结合起来，积极举措、多管齐下：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大抓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对全省企业进行整顿并实施初步改革；以调整工业结构，创名优部和名优产品为企业的工作重点；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出口；减少流通环节，促进农业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建设；开放广州和湛江两个港口城市；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价格体制的改革；推进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同时注重加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科教和文化卫生事业，并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以上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制定、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推进，从1981年到1985年，广东全省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5年广东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在5



◎ 1993年10月梁灵光在南通北兴桥探望老区群众

年内均实现了年均 13% 以上的增速。

梁灵光主政广东的 5 年间，打开了对外经济的新局面，引进了大批外资和先进设备，在全省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沿海开放地带，基本建成了一个适应扩大对外改革开放和技术交流的网络，与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广东的改革开放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先行示范和排头兵的作用，并由此带动和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其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数访故地，情系通如启海

1985 年 9 月，年届 70 的梁灵光在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任上离休，此后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旅集团第一任董事长，并兼任暨南大学校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1988 年 5 月，梁灵光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6 年 10 月，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落成，在海安举行苏中七战七捷 40 周年纪念会；1990 年，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50 周年，为纪念抗日民主政府的历史功绩，中共南通县委、南通县人民政府在原北兴桥乡政府院内树立了由梁灵光题写碑名的“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碑”；1993 年 10 月，南通市委、市政府组织举行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 50 周年纪念活动；1996 年 11 月，梁老撰写的《梁灵光回忆录》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5 年 4 月，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老战士座谈会。这些纪念活动，梁灵光应邀出席并作讲话。数次重回故地，梁老均高度关注南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并为地方的发展献计献策。

每次回南通，梁老总不忘邀请我祖父相聚，畅聊南通的发展和离休岁月里的诗文创作。在《梁灵光回忆录》付梓成书的次年，梁老趁回南通之际向我祖父赠书，亲笔题赠“曹颂康同志留念”。这次见面，两位老人把酒言欢，回忆当年的革命岁月。酒过三巡，梁老对我祖父说：“颂康兄，如果我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战争年代后的 40 多年里我们第一次一起喝酒。”二人相谈甚欢，动情处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客厅，虽已耄耋之年，但豪气不减当年。

此后多年我祖父一直和梁老保持书信往来，他和我多次讲起梁老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他说梁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儒将，光明磊落、廉洁奉公。无论从军还是从政，梁灵光都把为国为民谋福祉放在首位，为中国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从儒将到人民的公仆，梁灵光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更是为国为民耕耘的一生。🌐

余思伟：记录者，更是见证者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余思伟

历史的见证者

余思伟与广东省侨联的结缘始于广东华侨历史学会。

1977年，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余思伟在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从事东南亚史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教学。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内经济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这当中，侨胞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从而引起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研究的关注。1981年，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在暨南大学成立，各项学术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批批海外华人学者应邀到广东访问讲学，一篇又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接连诞生，余思伟作为历史研究学者，也加入其中，并凭借出色的学科专业素养和人际传播能力，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985年2月，由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的《华夏》杂志应运而生。原广东省民委副主任陈夏苏出任总编，余思伟和蒋明元担任副总编，还聘请了霍英东、王宽诚、庄世平、马万祺等著名侨领和商界人士担任名誉社长，并建立了全省通信员站。

开办初期，《华夏》在香港印刷出版，为了适应当时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使用了竖排繁体字的排版，每一期突出一个中心人物。如今，翻阅这些稍显老旧的杂志，我们依然能发现像

霍英东、许晴、董倩等知名人物的特稿。

回忆起往事，余思伟思绪纷飞。《华夏》杂志创办之初，著名侨领、时任广东省侨联主席蚁美厚常在单位会见侨胞，其中不乏著名企业家。蚁美厚是广东澄海人，口音稍重，而余思伟既会说客家话，又会说潮汕话，可以担当翻译，因此时常陪同蚁美厚与侨胞会谈。因此便利，余思伟获得了不少独家讯息，采访了不少侨胞和国内商界人士，并跟踪报道了海外侨胞投资建厂的过程。例如，1983年，由香港知名实业家霍英东与广东省人民政府投资合作兴建而成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时任广东省旅游局副局长朱一明兼任首任总经理。广州白天鹅宾馆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合作酒店，因此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而朱一明这位从政府官员转型为企业高管的首任总经理更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大家对他充满了好奇，但朱一明却非常低调，拒绝了很多大媒体的采访邀约。余思伟则另辟蹊径，他通过《华夏》杂志名誉社长霍英东的关系，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朱一明的同意，但朱一明事务繁忙，只答应给予十五分钟的采访时间。余思伟事先做了大量准备，凭借着过硬的业务素养，提的问题恰好“挠”到了朱一明的“痒处”，因此朱一明不由自主地敞开心扉，与余思伟畅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不久之后，《华夏》刊登了关于朱一明的独家深度报道，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

此外，当时海外侨胞回乡探亲或考察经商环境，往往会选择位于广州海珠桥畔的华侨大厦入住。余思伟常常去华侨大厦与海外侨胞接触，获得许多其他报刊无法获取的关于海外动态的一手

资料。因此，许多想要了解海外消息，或者想要出国留学、移民海外的读者对《华夏》格外感兴趣，纷纷订阅。

2015年，余思伟退休了。赋闲在家的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并未减退。他时常记挂着对他影响深远却素未谋面的祖父——革命烈士余登仁。余思伟和家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了祖父的英雄事迹。这是余思伟宝贵的家史，更是一段可歌可泣，不应被遗忘的惨痛历史。

青山有幸埋忠骨

翻开余思伟与余崇伟、余志伟编著的《中华英烈余登仁》一书，感人至深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名青年人的追求和信仰。

1903年6月，余思伟的祖父余登仁出生于广东饶平九村陂墩。饶平是广东省四大瓷业产区之一，瓷器生产历史悠久，瓷土资源丰富，迄今已有七百余年的生产历史。明清时期，中国的青花瓷器风行世界，饶平九村一带便是粤东出口青花瓷器的主产地，余家世代也以生产陶瓷为生。余登仁七岁丧父，由于他天资聪颖，且酷爱读书，叔父格外疼惜他，将他送进乡间私塾，后又转入饶城琴峰书院读书。1919年，余登仁考入汕头华英中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余登仁随即在汕头参加了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和示威游行。1922年，余登仁考入上海国民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和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广泛接触，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25年，余登仁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秋，余登仁大学毕业后回到饶平二中任教，秘密参加中共饶平县支部工作，负责领导黄冈镇的工农运动。他通过教书育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学生中发展组织。1927年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当局继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在全省范围内缉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余登仁由黄冈转移至饶平北部上饶山区，参与领导饶平县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攻打饶平县城，开创上饶红色乡村武装割据局面。

为了救国救民，余登仁可谓毁家纾难。1927年6月，国民党饶平县长蔡奋初“进剿”饶城新丰、九村，放火焚烧上饶区农民协会会址及余登仁的祖屋。余登仁的家产被洗劫一空，家里的瓷窑被烧毁殆尽，一家老幼由叔父余浩扶携逃往他乡避难。1929年9月，余登仁奉调东江特委工作。次年11月调任中共潮澄澳县工作委员会委员，领导南澳岛、饶平、澄海沿海一带的渔民革命。1931年4月12日，因交通员被捕叛变，余登仁等六人于澄海鸿沟被捕，囚禁潮安县监狱。5月下旬，在潮澄澳樟东区委的策划下，准备越狱工具，买通看守人员，余登仁等成功越狱，搭乘党组织准备好的木船，驶向饶平西澳岛，辗转来到饶和埔诏县委所在地——招安县秀篆乡石下村，任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从此，他在饶和埔诏边区度过长达五年的血与火的艰苦岁月。在此期间，国民党对他的家人进行了疯狂报复。1926年，余登仁的弟弟余登烈在梅县白土张家园内被国民党人杀害，余登仁的叔叔在汕头、高陂、黄冈的碗铺也被敌人扫荡一空，只能倒闭。1934年8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正式成立，余登仁当选为特委委员。是年冬，余登仁的妻子

刘鲫鱼被国民党保长凌辱，万分痛苦之下悬梁自尽。余登仁的母亲孤苦伶仃，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只好与余登仁的族弟余龙章步行百余里崎岖山路，来找数年未见的余登仁。余登仁尽管心里万分悲痛，却对母亲避而不见。他翻出身上仅剩的几毫钱交给余龙章，说：“遭难的何止我一家呢？现在是革命最为紧要的关头，我母亲绝不能留在这里，我也不能放弃革命而回家侍奉母亲。现在部队给养困难，我身上只有这点钱，拜托你陪她回去吧。”余登仁的母亲无可奈何，只能含泪回家。此后，每年除夕，她都会在饭桌上多放一副碗筷，希望革命早日成功，儿子平安归来。

可惜，中央红军长征后，闽粤边区一年多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党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存在。特委主要领导人不顾客观事实，把苏区失利的责任推在县委身上，给余登仁扣上了“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并以“托派和社会民主党的首魁”等罪名，将他开除出党。1935年12月，闽粤边区特委决定解散饶和埔诏县委，还给了县委书记许其伟处分。

1936年春，闽粤边区搞内部“肃反”，大搞逼供信，余登仁受到株连。为弄清问题，闽粤边区特委宣布扣押余登仁，由政府保卫队从饶和埔诏苏区押往特委机关审查，途经水晶坪附近时，发现前方有敌情，慌乱之中，余登仁被误杀，时年三十三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余登仁的冤案得以昭雪，余登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青山有幸埋忠骨，烈士英名永世存。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梦想的力量，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

“健康女神”的善美之行

文 《华夏》记者 何尚



⑦ 李红在“医药港健康方舟杯2021世界健康女神大赛”总决赛中摘取了桂冠

2021年12月19日，本土性国际化女性选美活动“医药港健康方舟杯2021世界健康女神大赛”总决赛在广州医药港隆重开幕，网络直播百万人共睹“健康女神”的风采。总决赛中，李红脱颖而出，一路晋级并一举夺下首届总冠军，同时，她还荣获了“最受媒体关注女神奖”。

尽管每个人对美有不同的理解和审美，但提及女神，大概是明星最耀眼的样子，人群中光彩熠熠，引人侧目。

见到李红之前，我的内心充盈着期待与好奇：高冷御姐？甜美萝莉？精致优雅？时尚达人？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她归到任何一种标签之下。毕竟，快消时代，互联网引导大众对于女神的认知，无外乎此。

见到李红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对于美的认知流于刻板印象。拿既有的标签去归类人群，如井底之蛙般狭隘。

李红的美不仅体现在她谈吐间的优雅与从容、衣着妆容的得体大方，更体现在她诚挚的双眼中流露出的柔软的爱与善。“美只能愉悦眼睛，而气质的优雅才使人着迷。”在我看来，气质是一个人的修养，是人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

施比受有福

李红出生于广东大埔，这里素来被誉为是“客家香格里拉”，山川秀丽、风景如画，同时又遍布古村落古建筑，深蕴人文气息，极具客家文化特色。李红出身于革命世家，爷爷奶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奶奶更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双枪老太婆”；外公早年于海外经商，有所成就后归国投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李红与兄弟姐妹们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20世

纪60年代，国家百业待兴，李家生活也并不宽裕，时常有无米下锅的拮据窘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清楚地记得姐姐拿着一个小布袋去邻家讨米的情景。

兄弟姐妹五人，李红排行老四，小时候身体瘦弱，全家人都对她格外照顾，童年生活虽然贫困，但她却从不感到苦，家庭的温暖、邻里的帮助滋养着她幼小的心灵。

家风是一个人气质的底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后来，父亲下海做起了餐饮生意，家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他们都不忘教导几个子女要记得当年邻里对自己的帮助。每次返乡探亲，父母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敦促他们去看望乡亲，有困难的，一定要帮！父母的话语质朴却分量十足：“得人恩情记百年，滴水恩当涌泉报。”这也是家庭给她上的人生第一课。李红说，能够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她很幸运，街坊邻里的善意、兄弟姐妹的包容关爱，还有父母在苦日子中从未放弃的信念，都让她感到无比的踏实。

“施比受有福。”这是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用此勉励督促孩子的话。在李红看来，多年过去，父母与街坊四邻依然维持着和睦互助的关系，他们脸上的满足确实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施比受有福，淳朴如客家人拥抱世界的态度。父母的言传身教让她对这句话有着更深切的认知与理解，也成为她与姐姐走上乐于付出、甘于奉献的公益之路的动力。

“女神”之美

在谈及“健康女神”这个称号时，李红笑了。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喜欢虚名的人，虽然自己一直在爱与赞美中成长。李红报名参加这次大赛，是被“健康、美丽、智慧、大爱”的大赛主题所吸引。在她看来，美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美是各具形态的。柏拉图曾说过：“至善方能至美。”

李红希望通过参加这次选美比赛，让更多人关注公益，参加公益，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的偶像是德兰修女和奥黛丽·赫本，这是两种不同的至美至善的人格魅力。”李红心目中的女神是内外兼修，才德兼备的，而她也一直在追求爱与美的人生之路上不断努力。看着面前文静，甚至有些羞赧的李红，很难想象她已经在央企服务二十多年，由于工作出色，多次被单位授予“先进工作者”“卓越贡献奖”等荣誉。不争不抢的她在工作岗位上却十分进取，她将公益慈善当做自己的事业，将其与央企的社会责任相连接，不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奉献自己的热忱与能力，也赢得了回馈。创建“希望之光”公益品牌时，她主动担任单位义工队的负责人，连续多年不辍地为当地残联提供义工服务，赢得社会广泛好评，更将此品牌打造成“深圳市年度十佳志愿服务项目”。除此之外，她多年间共发动建成一百多个乡村小学图书角，这些深入人心的公益行动让她对父母的那句“施比受有福”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修女德兰与好莱坞女星奥黛丽·赫本，两位听上去完全不沾边的女性，在李红心中合二为一地成为美的模样。她也用自己的行动回应自己对两位至善至美的女性的尊敬，那就是不断追求成熟、知性、美丽、自如的女性该有的样子。在大谈女性、女权主义的当下，她认为活出自己就是对女性最大的尊重。生活中，她恬静温婉；工作上，她积极热诚，接人待物、为人处世中落落大方。我对这位“健康女神”有了新的认知与认同。

爱的芬芳

在李红的视界中，她总能看到那些弱小的群体，听到他们无助的声音。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2018年，广东省民政厅决定开展“牵手行动”，组织百家社会组织对留守和困

境儿童开展关爱保护活动。社会组织报名后，经省民政厅筛选，组建十五个关爱小组，每个小组组织力量深入每一个监护困境儿童家庭，开展监护指导和家庭教育指导，提升家庭监护能力，督促家庭履行监护主体职责，最大限度减少留守和困境儿童遭受侵害的危险，防止发生性侵、溺水、欺凌、流浪、辍学等问题。

兼任广东人家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的李红也参与了该行动，担任广东省百家社会组织走进留守儿童梅州组副组长单位负责人一职。她多次往返所在组别地区，为梅州市丰顺县十七个乡镇三百多名留守儿童和生活困难儿童提供针对性帮扶。“每到一户儿童家里，我们会和孩子们及家里的大人聊天，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身体心理状况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等，将每一户的具体情况登记入档，并将走访中发现困难家庭的问题如实上报民政部门，为困难家庭争取更多权益。同时我们还会对孩子们的自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进行提升培训，对照顾者进行心理压力疏导。”

提及该行动，谈及那些孩子们，李红显得非常感性，她说，留守儿童由于在情感上缺少健全的关爱和沟通，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性格大多比较内向、孤僻，但孩子哪有什么防范与芥蒂，只要有人愿意给予他们关心，他们就会再次积极快乐地拥抱生活。“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女孩家里，她妈妈生下她后就不知所踪，爸爸在外地打工，只有爷爷照顾她的生活。一开始她见到我们很怕生、很害羞，但我发现她很爱跳舞，就跟她说，请她教我们跳舞，小女孩一听就很高兴，带着我们又唱又跳，不停地笑，那笑声带动所有人都不自觉地随着她的节奏起舞，赶走了所有的疲惫。”

“牵手行动”让李红走近了这些缺乏爱、需要关怀的孩子们，也让她成为很多孩子心中的依靠，备受信任的同时也让她更加意识到责任的重

大。2022年2月14日，广东省百家社会组织走近留守和困境儿童“牵手行动”梅州组接到一封来自五华县龙村镇睦贤小学龙宝同学的求助信。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家中的困难：奶奶和爸爸患重病住在不同的医院，爷爷和妈妈要去不同的医院照顾他们，家里失去经济来源，弟弟妹妹也无人照顾，家中还有八十多岁的婆太（奶奶的婆婆），生活举步维艰。知道这件事情时，李红还在休假，但她非常担心小龙宝，第一时间与梅州组组长开会商议救助方案，做出了再次捐赠的决定，并建议大家梅州组微信群里发起爱心倡议，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经组长单位商量决定后，她牵头拟写了一份倡议书，在梅州组组长单位和全体公益伙伴的共同努力下，救助活动得到了组员和爱心企业人士的热切响应，短短三天内就为小龙宝募捐到善款四万余元，解决了小龙宝家中的燃眉之急。而善意并没有停止，随着信息的扩散和倡议书影响力的传播，小龙宝还陆续收到更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和关怀。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袭来，抗击疫情成为每个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早在疫情初发时，李红就筹集多方力量，在口罩最紧缺的时候，她自己出资购买一千多个口罩送给抗疫人员。在了解到梅州乡下小学缺少消毒抗疫物资时，她不顾工作繁忙，多方联系各界爱心人士，为师生们购买了一大批消毒药品和防疫物品，紧急发回大埔双溪学校。她还常常主动投入社区抗疫工作。有一次，她晚上10点多做完核酸检测，看到现场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她主动参与帮忙，与现场工作人员忙碌到深夜。第二天，李红所在的社区义工队招集义工服务核酸检测，她又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从早上一忙到夜幕降临。

这是李红公益行动的日常。在她看来，只要有需要，能力允许，就责无旁贷，她也从不觉得累。“施比受有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是莫大的幸福。



⑦ 李红参加2017年第十六届“北塘计划”中英夏令营，与外国学生志愿者一起赴梅州支教

李红提倡做“快乐公益”，“首先你要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李红深有体会地解释说，公益人往往会在公益活动中见到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因此部分特别感性的公益人往往容易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刹不住车”，过度消耗自己的体力和精力，她觉得公益人应该在照顾好自己的前提下去做公益。“公益讲究长效性，可能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能长期坚持下去，并影响身边的人，就可以汇流成海，就会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这是自己作为公益人的精神追求，也是社会责任感的知行合一的体现。”李红说。

正如大家所想，做公益当然要付出，但我在李红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得到”，是她对公益

慈善有一种超脱了得失的理解。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与这股回馈的香气相比，她早已不计付出的辛苦。受助者的一句谢谢，被帮扶对象的笑脸，受助孩子的录取通知书，都让她的内心十分安慰和满足。

这样的李红，是一个感性、爱美、热爱生活的女性，内心充满了悲悯，如一颗夜空中的星星，闪烁着自己的光与热。“施比受有福”像是土壤里开出的花，在公益慈善之中散发着香气、绽放着美丽。在李红心中，公益本就是让世界变好，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发力。而她只是这其中的个体，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能够用自己的初心、行动影响带动更多的美好能量，人与人己都是一份福气。🌐

失聪天使的灵魂工程师

文 邓仕勇（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惠州市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在惠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的一个教室，一位脸上挂着和蔼笑容的女老师正在训练着一个小男孩说话。女老师伸出一只手指指向天空，小男孩便跟着伸出一双小手臂，作飞翔状，用断断续续、不怎么清晰的声音说道：“一……只……小……鸟……叫……喳喳。”女老师又伸出两只手指指向地下，小男孩接着说道：“两……只……青蛙……叫呱呱。”女老师伸出三只手指，“一……只，”小男孩看到老师微微摇头，忙自纠道：“三……只……小猪……哼哼哼。”如此类推，小男孩在老师的引导下练习发声。而这位老师就是听障儿童康复教师高丹。

高丹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听障儿童早期康复教育专业。2002年3月，她入职惠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听障儿童康复训练部。

高丹一边工作一边摸索，最终总结出一套科学且卓有成效的训练方法。“孩子只要没有完全丧失听力，且干预得早，父母又配合，通过我们的听力训练，基本上都能康复。”

来听障儿童康复训练部的孩子，都是上幼儿园的年龄。由于孩子们情况特殊，教学的难度很大，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爱心和耐心。在高丹的印象里，有好些家长是含着泪带孩子来康复中心的，他们的泪眼中夹杂着无助，甚至绝望。高丹看着心里真不是滋味。从她接过孩子的那一天起，她就用爱的声音呼唤着孩子，以顽强的毅力和耐心对孩子进行听觉语言康复训练。听障儿童康复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为了教孩子们发

声、发音，高丹每天教他们做唇操、舌操、呼吸操，反复对他们进行发音、听训等锻炼。在语言训练中，每个音、每个词，健康的孩子都很容易说出来，但要让听障儿童说出来，则需要教几十遍甚至几百遍。高丹无数次地对着孩子们比比画画，用手势、口型和表情帮孩子们定口型、摆舌位、正音调，直到孩子们看懂为止，然后再引导他们去理解运用。

高丹的每一堂课都要花心思根据每个孩子的听力、年龄及兴趣设计情境教学，让孩子更容易看懂和理解。此外，她每月还会专门安排户外课程和亲子活动，让孩子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加速康复步伐。

“听障儿童有个‘关键期教育’。”高丹解释，六岁以前是儿童获得有声语言的关键期，这



⑦ 高丹给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

个时间段孩子接受外界的信息最多，模仿力也较强，如果这个时期的听障儿童因听不到声音，缺乏语言刺激，则将会对其有声语言能力的获得造成致命影响，使之错过语言能力发展的最佳时机，出现“因聋致哑”的后果，这时再对听障儿童实施听觉语言康复会难之又难。在关键期阶段，听障儿童接触最多的是父母，最熟悉的环境是家庭。多年来，高丹在听障儿童康复训练中发现一个现象：但凡康复效果好的孩子，都拥有良好的家庭康复环境，这样家庭的孩子是乐观的，好学会学的，是善于与人交流的。拥有明智的父母，再加上科学的教育，就是听障儿童康复的最大保障。

有位刘杰（化名）小朋友在两岁时便被诊断为重度失聪。刘杰的父母并没有被痛苦击倒，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下定决心要让孩子恢复健康。当刘杰的父母将孩子送到高丹那里，高丹告诉他们，听障儿童的康复训练不但要靠老师，更要靠家长的深度参与。刘杰妈妈听了，辞掉工作全心全意到康复中心陪读。

高丹给刘杰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后，抓住康复的最佳时机，专门每周给孩子设计一节亲子同训课程，在训练刘杰的同时，还手把手地把自己所有的技能教给刘杰妈妈。从此刘杰妈妈便跟孩子一起学习，听力训练、舌体操、发音训练等成了母子俩每天的必修课。

高丹常常对陪读家长说：“今天，我们走在了一起，那我们就是无惧于困难的‘勇士’，只要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孩子就有希望！不要因为他们的缺陷而嫌弃他，那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也不要因为他们的缺陷而感到自卑，要勇敢起来，做孩子们心灵的支柱，支撑他们弹奏出人生的新乐章；更不要因为孩子的缺陷而一味迁就，对孩子要有合理的期望值，要相信每个孩子的潜能都是无穷的，用心去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并以此为契机，从兴趣入手，耐

心地培养他们听觉语言习惯的养成。”

刘杰在高丹和其母亲高度配合的训练下，从刚开始时什么都不会说，到慢慢会说“杯机杯来杯去”，到后来会说“飞机飞来飞去”。经过一年多的悉心训练，刘杰康复了，回归正常生活，长大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市里的一所重点高中。

惠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在训听障儿童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比较贫困。虽然在康复中心伙食费、训练费全免，但是在训儿童家长必须有一人全职陪伴，这让本就经济困难的家庭负担更重。

一天早上，高丹刚上班，便有一个矮个儿、皮肤幽黑、瘦骨伶仃的老婆婆牵着一个小男孩在等着她。小男孩叫胡彬（化名），惠城区横沥镇人，他的父母都是因聋致哑的残疾人。胡彬由于先天遗传，出生时也是一个听障儿童。胡彬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植入了人工电子耳蜗，恢复了部分听力功能，他外婆为了让他能成为一个正常儿童，便带着他来进行康复训练。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外婆没有在康复中心附近租房子，而是每天带着胡彬坐公交车往返。外婆有“老人卡”，胡彬身高不到一米二，都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但横沥镇距市中心二十多公里，公交车单程要一个多小时。高丹了解后，急在心里。她发现胡彬外婆为人热情，手脚也勤快，经常帮着训练部扫地、拖地、收拾桌椅，于是她帮胡彬外婆介绍了一份钟点工。没想到，胡彬外婆因工作认真负责，得到了主人家的肯定，经介绍，又得到另外两户人家的雇佣。有了一些收入，外婆在附近租了房子，一边兼职一边照顾外孙。

工作之余，高丹还利用休息时间汇总制作了惠州第一本社区康复员培训教材，并长期加班加点地培训乡镇的康复员。由于她工作成绩突出，并愿意无私分享，曾获评惠州市残联系统优秀教师、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

海归韦艳敏：“侨”见数字时尚创投

文 莫斯其格（《广州日报》记者） 曾德雄（广州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 刘志超（广州城市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



① 韦艳敏

2021年10月，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争夺赛暨颁奖典礼在南昌大学举行。这是一场“双创”领域的盛宴，优秀的年轻人在全球最大的创新创业舞台竞技，充分展现当代中国青年的锐气与勇气、智慧与担当。

而这一切离不开幕后“深藏身与名”的创业导师和评审专家的付出。近年来专注于科技文创领域天使投资工作的海创会资本创始人韦艳敏就是其中一人。

回望“归巢”那时候

2021“美@中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春节篇”中，一条名为《归巢》的短视频吸引了评委的关注。短视频镜头对准因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众多鸟禽觅食栖息、建巢繁衍的海珠湿地，而画面表达的还有另一番含义：同样在海珠，一群从海外归来的海归高层次人才也在海珠、在大湾区、在祖国大地大展拳脚，创造价值。

在《归巢》的游子中，有韦艳敏的身影。她这样介绍自己：“我从英国回来，从事天使投资和非遗时尚工作。”

“归巢”对韦艳敏来说，是必然的选择。

研究生一毕业，韦艳敏就一心想回国，迫不及待地这颗赤子之心献给祖国。刚回国的

韦艳敏没有好高骛远，选择在一家民营企业里做秘书工作，“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虽然我留过学，但是对于国内的市场、基层工作经验并不是很了解，从秘书做起就是从头学起，再微小的事情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韦艳敏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在她看来，职场如爬山，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求索，三年后就要迈向更大的平台，才能看更高望更远。在三年的秘书岗位上，她参悟了企业运作流程规范化和资本运作。一家民营企业如何进入资本市场，从借壳、VIE架构的反向并购到美交所挂牌、转板纳斯达克，完成了对同行业第四公司的并购和内部风控梳理和员工期权计划的执行，参与其中的韦艳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步，也是她走向投资圈的重要跳板。

经过五年的磨砺，韦艳敏发现自己依然怀揣着一颗创业的心，于是她选择回到广州，专注于科技文创领域的天使投资工作。

有趣的是，“海归”成为韦艳敏创立的海创会资本的一个关键词。海创会核心创始人全都是海归，投资的项目也都是海归。韦艳敏笑称：“我们和海归没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是海归，我们懂海归，我们就投海归。”

正是七年英国留学深造，五年资本市场经验积累，以及五年国内创业投资的经历，韦艳敏很能理解如何解决海归创业者的困难。海创会资本从创业培训、精准链接开始，通过协同相关企

业、高校、政府及投资合作伙伴等方面，让海归创业者实现创业本土化的精确落地。

韦艳敏这样分析道：“因为我本身是海归群体的一员，海归学成回国创业，他们首先是有先进技术的一群人，选择这样一群人，投资的风险会降低很多；其次，异国求学的经历，炼造了海归们的独立性和吃苦精神，这类人选择创业至少不会太容易半途而废；最后，海归所拥有的背景、资源相较于一般创业者更有优势。三者层层叠加，助力海归创业的成功率更高，投资人的风险也会相应降至最低。”

对韦艳敏来说，创业梦是彩色的。从小生活在广西桂林的韦艳敏，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岭南文化情有独钟，即使在远赴英国留学和生活期间，她也始终难以忘却中国传统非遗文化带给她的惊艳。2020年疫情期间，结合海归的时尚视野融合非遗文化，她投资创办了Yes&True珠宝（简称：Y&T珠宝）。这也许是场冒险，所幸的是她赶上了新消费品牌最好的时代。

在创立之初，Y&T珠宝便坚持“将非遗传统工艺融入珠宝设计，以讲好中国非遗故事，传播民族文化，打造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中国时尚IP”的理念，击中了当下新生代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也使Y&T珠宝成立5个月就成功登上“小蛮腰”，代表时尚广州的名片宣传岭南文化时尚，成为在广州塔举办的2020年广州国际时尚产业颁奖晚会的主角之一。



© Y&T珠宝的代表产品之一，将瑶族文化融入珠宝设计中

专注“投资”那些年

把历史传承和现代创新结合、让非遗时尚融入生活，这不仅是 Y&T 珠宝设计创作的理念，也是韦艳敏投资的重点。

韦艳敏不做盲目撒网式投资，她将投资的领域缩小到时尚文创和科技创新。“最近很多合作都是国外知名品牌和本土传统的结合，不局限于时尚产品，而是通过表象的产品辐射到产业升级、产品创新、品牌 IP 打造、产业资本架构服务和投资等。我们用好海归自身的科技创新、全球视野，引领结合本土宝贵文化和技艺，把非遗文化融合创新，应用到消费者中，这才是非遗产业一直说的非遗活化和融入生活。”

当非遗文化本身作为传统工艺，自身的创新发展需求也不容小觑。通过与新品牌的创新设计进行跨界合作，依托于新品牌的创造力和爆发力，来激发传统非遗工艺的生命力，奠定产品

独特性优势，这才是非遗工艺得以长青的基石所在。“传统非遗工艺流传至今，我们更需要去探索如何用比较当代、现代的手法把它呈现出来。”在韦艳敏看来，当一份文化、一种工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恰恰证明了它曾经的辉煌和在当下环境中的不适应性，我们更应该将这份古老的技艺加以创新，获得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作为投资人，韦艳敏除了对项目有精准判断外，她的“投资心经”里最核心的其实还是“看人”。

“投资的核心还是看人。”在韦艳敏眼中每个创业者其实都不太一样。除了最基本的技术、人品、团队外，韦艳敏更看重人与事之间的匹配度，人与事之间能否产生爆发力，“但是看人这件事太难了。”

“创始人最核心的是品质是三观正，任何三观有问题，玩歪门邪道，走灰色路径的，我们都不会投资；其次是坚韧，创业过程是痛苦而漫长

的，不可能顺风顺水，不坚韧的人很难坚持到最后；最后是理想，赚钱是人人都想的，但如果只是想着赚钱，那么能得到的心理支撑是有限的。一旦你赚到了一些小钱，心态就不一样了，动力就不足了。要做一番大事业，必须是有更大的理想在后面。抛开品质，进一步分析的话，我喜欢的创业者，一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创业是很不一样的事情，需要不一样的人去干，这个人内心一定是有特殊性的。”韦艳敏对创始人的个人品质格外看重。

韦艳敏谈到投资一个海归项目创始人的细节：一位90后创始人坚持每周给奶奶打电话1小时以上，细节见人品，正是这份在喧嚣聒噪社会中仍然不变的孝心和沉稳，打动了她，让她果断投资了该创始人的项目。

韦艳敏投资一个项目之前会和创始团队的每个创始人进行交流，前后交涉过几轮，对每位团队成员都了解后才决定投资与否。韦艳敏对创始人要求极高。“我不会因为看到某个赛道是风口，就降低对创始人的要求抢着进去投资。”

“做投资非常有意思，我乐在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跟一



⑦ “美@中国”IP发布



⑦ 韦艳敏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女性青年创业代表分享会

帮特别优秀的创业者天天打交道，他们都是时尚潮流的弄潮儿，他们身上都有非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还能接触到那些非常前沿科技领域的应用。”韦艳敏说，“我对我投资的每家企业都很满意，都很看好。总体来说，海创会投资项目的成绩很不错，今年很多机构乐意做我们项目的接盘侠，我的项目老股转让变现是没有打折的变现，说明我们投资的项目是真的优秀。”

当然，海归因子也是容易跟她产生共鸣的因素，“在拥有先进科技和管理文化的国家受过熏陶的人，他们具有全球性的视野和高精尖技术，海归们是最好玩的一群人”。

韦艳敏认为海归这类群体创业，也存在自身固有的短板。很多海归都是在国外生活学习多年，他们是并不熟悉国内的环境和商海



沉浮，空有一腔抱负和野心，却无从施展拳脚。

很多海归由于在海外求学期间受到当地文化影响，导致回国创业初期，项目严重水土不服。而扎根中国市场多年的韦艳敏了解到在中国市场的中国资本具有中国特色。

海外企业如何落地，需求点在哪里，创始人的行事风格是否能在国内市场如鱼得水，这些都是韦艳敏需要一一去解决的问题。

“不擅长的我不投，我做够专业度，每个项目都是万里挑一，以后都可能是行业独角兽。”

坚持“育人”那条路

兼任广州海珠区欧美同学会的副秘书长，韦艳敏助力海归创业孵化一如既往。在创业路上，欧美同学会给了韦艳敏很多帮助，现在她用自己的能力实现反哺。

当创业项目初具雏形、创业者尚处于迷茫时，韦艳敏希望凭借投资人敏锐的嗅觉和精准的眼光，为那些困窘于市场的迷途中的创业者插上翅膀，助力他们飞翔。她活跃在各种创新创业活动和比赛现场上，接受了不少国内高校、国际赛道、产业赛道的辅导和评审邀请，分享她的常胜“秘籍”。

因这份情怀使然，韦艳敏自然而然地走上创业导师“育人”路，“人们常说‘薪火相传’，在投资这件事情上，我只是希望尽我所能，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作为创投界的“前辈”小姐姐，韦艳敏认为，不管是比赛还是分享，无论对参赛者、分享者还是评委、导师而言，都是一次学习。毕竟，“头脑风暴”获益的不仅是个体，参与过程不仅可以寻找价值，还能为参与双方带来新的启发与思考，促使更好的技术、项目、灵感、理念得以萌

芽、成长。

为探索如何以更好的科技应用实现赋能城市名片和城市主打景区，找到可以结合的创意科技项目，并促进文创项目的成果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海创会旗下机构 YC 美学研究院承办了 2021 “美 @ 中国” 科技文创大赛。在大赛举办期间，韦艳敏带着部分参赛项目走进广州陈家祠，多方共同探讨文创产品的合作模式。在她看来，项目最重要的当然是落地，走向市场，实现共赢。

韦艳敏擅长用资本市场的逻辑、分析市场需求，清楚细分行业的垂直情况，接触到一个项目时就充分设想对接已有项目的可能性。韦艳敏不谈资源整合，相对于炒概念，她更喜欢称这是“跨界联动”。

韦艳敏说，未来海创会将利用好已有优势，围绕文化创业和人工智能领域，打造完整产业闭环，布局相关产业的投资，扩大生态圈，做更深入、更垂直的海归投资。韦艳敏的第二个使命聚焦在海归创业、就业上，她称自己是搭桥者，找准两类群体核心需求，推动联动合作。“高校朋友说我如何厉害，NO NO，我的理念就是办法永远比问题多；创业青年说如何敬仰我，NO NO，我只是尽我所能分享经验；创投和投资同行佩服我，NO NO，我就是实现内心所欢；合作伙伴尊重我，NO NO，我只是做一些回归社会发展的需求满足而已……这些年，我的第一庆幸就是选择回国发展。”

未来，在家国情怀的感召和激励下，她期待继续以“海归”为桥梁，链接海内外海归传播民族文化，助力中国传统产业升级，“国内的创业环境、巨大的市场和储备丰富的人才资源为创业创新提供了成功的机会。我想尽我所能，和众多海归人群一起去做一些事。脚踏实地，不负韶华。”🌐



广东侨联工作

联 谊 联 络 品 牌

情
系

南
粵

拓展内外朋友圈，画好最大同心圆，以侨为桥，以情聚谊，共促中外人文交流，增进中外友好合作。



鲁迅与史沫特莱

文 嘉禾（鲁迅研究专家）

鲁迅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是一个未被梳理的话题，也鲜有专著问世。其实，鲁迅的许多重要活动都与史沫特莱休戚相关，鲁迅把史沫特莱当作挚友，史沫特莱也视鲁迅为她“生平最珍贵的朋友”。鲁迅与史沫特莱的深厚友谊，渗透着志同道合的价值认同和中国脊梁的民族情怀。

史沫特莱拜访鲁迅先生

1929年5月到1936年秋，史沫特莱在上海度过。1929年12月27日，经蔡咏裳介绍，史沫特莱拜访了鲁迅，《鲁迅日记》记载：

二十七日 小雨。午后得杨维铨信。下午史沫特莱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董字秋士，静海人，史女士为《弗兰孚德报》通讯员，索去照相四枚。

1930年2月，史沫特莱赠予鲁迅德文版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并在扉页上题词：“赠给鲁迅，对他为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意。”这表达了史沫特莱对鲁迅的敬重。

史沫特莱是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892年2月23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北部沙利文县奥斯古德镇一个叫坎鲁格龙德的农村。她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

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召唤着青年时期的史沫特莱，她不满美国的现实，不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转移，而以亚洲人民的自由与解放事业为己任。

1928年12月，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特派记者的身份，绕道苏联，从满洲边界来到中国。从此，她与鲁迅同行，开始了为追求民族解放、民众觉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醒而“呐喊”的历程。

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之发端

1930年上半年，鲁迅委托他在欧洲留学的学生收集欧洲的版画和其他美术作品，包括画册，于是他发现了凯绥·珂勒惠支。此时正值“左联”活动期间，鲁迅与史沫特莱接触频繁，得知史沫特莱和珂勒惠支是好友，便直接委托史沫特莱购买珂勒惠支的作品，第一次买了12件原作，120马克，合100块大洋。第二次买了10件，114块大洋。

通过史沫特莱，鲁迅先后购得珂勒惠支的《织工的反抗》组画（《饥饿》《死亡》《密谋》《织工的队伍》《暴动》《结局》）和《农民战争》组画（《犁地》《强暴》《磨尖镰刀》《组织军队》《反抗》《战斗之后》《囚徒》）及其它版画，都是珂勒惠支亲笔签名的精拓品。

《鲁迅日记》记载：

1930年7月15日，收诗筌所寄Kathe Kollwitz画集五种。

1931年4月7日，上午托A·Smedley寄K·Kollwitz一百马克买版画。

1931年5月24日，收Kathe Kollwitz版画十二枚，值百二十元。

1931年6月23日，得诗筌所寄Daumier及Kathe Kollwitz画选各一贴。

珂勒惠支是德国版画家、雕塑家，1867年7月8日生于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她早年在慕尼黑女子美术学校学习时，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一生旗帜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她的早期作品《织工的反抗》《起义》和《死神与妇女》《李卜克内西》《农民战争》等，不仅以尖锐的形式呈现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

的悲惨命运和勇于斗争的精神，而且唤醒人们反对侵略战争，根除战争根源，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张梦阳所著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之怀霜夜》描述：鲁迅对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画作推崇备至，因为他感到珂勒惠支的作品集中表现了被压迫人民的苦难，有一种力量和渗透力，笔触和线条都能够启发人和打动人，中国需要这样的作品来唤起民众麻木的神经。

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发端于鲁迅对珂勒惠支版画的推介。鲁迅推崇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关注她的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内涵，注重对社会的推进作用，这是他的初心。“我从外国借得火来，目的是要煮自己的肉。”1931年8月，鲁迅举办木刻讲习班倡导木刻版画创作。1932年，德国第三国际代表人汉堡嘉夫人出面主持在其书店里举行画展，鲁迅提供了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珂勒惠支的作品最初总是7幅一组，那次展出的作品名称为《织工一揆》（揆：发动，举动，拿起来），取这个生僻字眼也是因为当时的局势不得不隐晦自己的意思。1933年10月14日的第二次外国木刻展览，又展出了珂勒惠支的版画。

1935年5月，鲁迅在病情越来越重的情况下，还编印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是鲁迅生前亲自编选的最后一本版画集。该画集收入石版画7幅、铜版画14幅、黑白木刻3幅，其中包括珂勒惠支送给中国的自画像和《织工的反抗》《农民战争》两套组画。鲁迅亲自为画集写了《序目》，详细介绍了珂勒惠支的生平和作品的社会影响，为每幅画作了解和说明，鲁迅请史沫特莱写了画集的《序言》，由茅盾译成中文。

鲁迅在他的《死》一文中提到：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 (Kaethe Kollwitz) 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 (A.Smedley) 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罩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上海交大教授王锡荣披露，这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只出版印刷了103册，中国国内交内山书店发售的仅33册，30册在欧洲出售，其余在日本出售，都有鲁迅的亲笔编号。鲁迅希望能够有人翻印此书，广为传播，他在画册扉页上印着“有人翻印，功德无量”。此外，鲁迅还在上海举办了四次外国版画展览“西洋木刻展览会”。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因为鲁迅的大力推介，不少中国进步木刻青年，无论是创作思想或是表现技法，都受到过珂勒惠支的影响。他们在以珂勒惠支为代表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影响下坚持奋斗，以刻刀为武器不断创作，不断开展进步木刻运动，使得中国新兴木刻版画第一次真正地吸收了西方的风格，从而改变了中国木刻版画历史的进程，正如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里所说：



© 1936年10月，鲁迅参观木刻展览会与青年版画家们交谈（沙飞/摄）

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

在这一重大变革中，直接最先深受其风格影响的是身处上海这个中国新兴木刻发源地的版画家们，他们是：陈铁耕、胡一川、黄新波、力群、江丰、陈烟桥、王琦、刘岷、杨可扬、朱宣咸、马达、郑野夫、李桦、荒烟等。

鲁迅先生五十寿辰

1930年鲁迅50岁，生日是农历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9月17日，“左联”的朋友们在“苏腊巴亚”餐室（在法租界吕班路和陶尔菲斯路转角处，现为重庆南路50号）给他祝寿。这是由史沫特莱出面同荷兰西菜室的外国老板洽谈的。

他的9月17日日记写道：

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周年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

这二十二入中有柔石、董绍明、蔡咏裳、冯雪峰、李求实、冯铿、田汉、洪深、冯乃超、叶圣陶、傅东华、茅盾、史沫特莱。

冯雪峰在答复包子衍的信中说：17日事是有几个人提起，即请史沫特莱去与荷兰人开的一个高级菜馆（地点在当时的法租界吕班路一带，很幽静，里面有一大草坪，平时吃饭的人不多）联系，每人自带四元钱（菜很贵，四元一客，还是吃不饱的），参加的人是事前联系好的，人不多（据《日记》是22人），没有什么仪式，只请鲁迅先生坐在草坪上拍了一个相，吃饭时愿意说话的起来讲过几句话（我记得鲁迅先生也讲过话，话的内容已完全忘记）。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里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祝寿那天下午，我和我的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小餐的花园门口。从我们所站的位置可以把客人们必经的那条长街看得一清二楚。我看见前方路口有一个穿长衫的男人，表面上像在等候公共汽车；另一个坐在近旁一家门前的台阶上。

鲁迅，由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陪同，来得很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而他竟成了我在中国那些年月生活中最有影响的因素之一。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头上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发像一把刷子。面部轮廓和一般中国人相似，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表情最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不谙英语，却颇能说几句德语。我们是用德语交谈的。他的风度、谈吐和举手投足，都散发出绝对完美的人格的和谐和魅力。

宾客的人流几乎随即来到。鲁迅已向花园里边走去，我一再回过头去看他，被他那以某种姿势举起的瘦削的手深深吸引。

随着客人们的到来，我的两位朋友告诉我，他们中间有作家、美术家、教授、大学生、演员、记者、研究工作者，甚至还有两名精神贵族圈内

的人物。这两位到来，并不是因为和鲁迅在信念上志同道合，而是由于敬重他的正直、勇敢和学术上的成就。

史沫特莱为鲁迅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鲁迅先生身穿乳白色的长衫，斜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两手交叉搭着藤椅扶手，潇洒、从容。另一张由史沫特莱寄往美国《新群众》杂志发表。《新群众》负责人瓦特在给中国左联的信中说，《新群众》刊登的照片下面有这样的说明文字：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袖，摄于他五十寿辰日。他还积极参加自由大同盟和其他左翼的文化团体。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记下了当时鲁迅讲话的情形：

自始至终，鲁迅仔细听着，及时把专注的目光转向每一个新的演说者，一根食指却沿着茶杯的杯口不停地移动。演说全部完毕，他才站起来讲话，神态安详地谈他亲身经历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动乱的历史——中国从根本上遭受到摧残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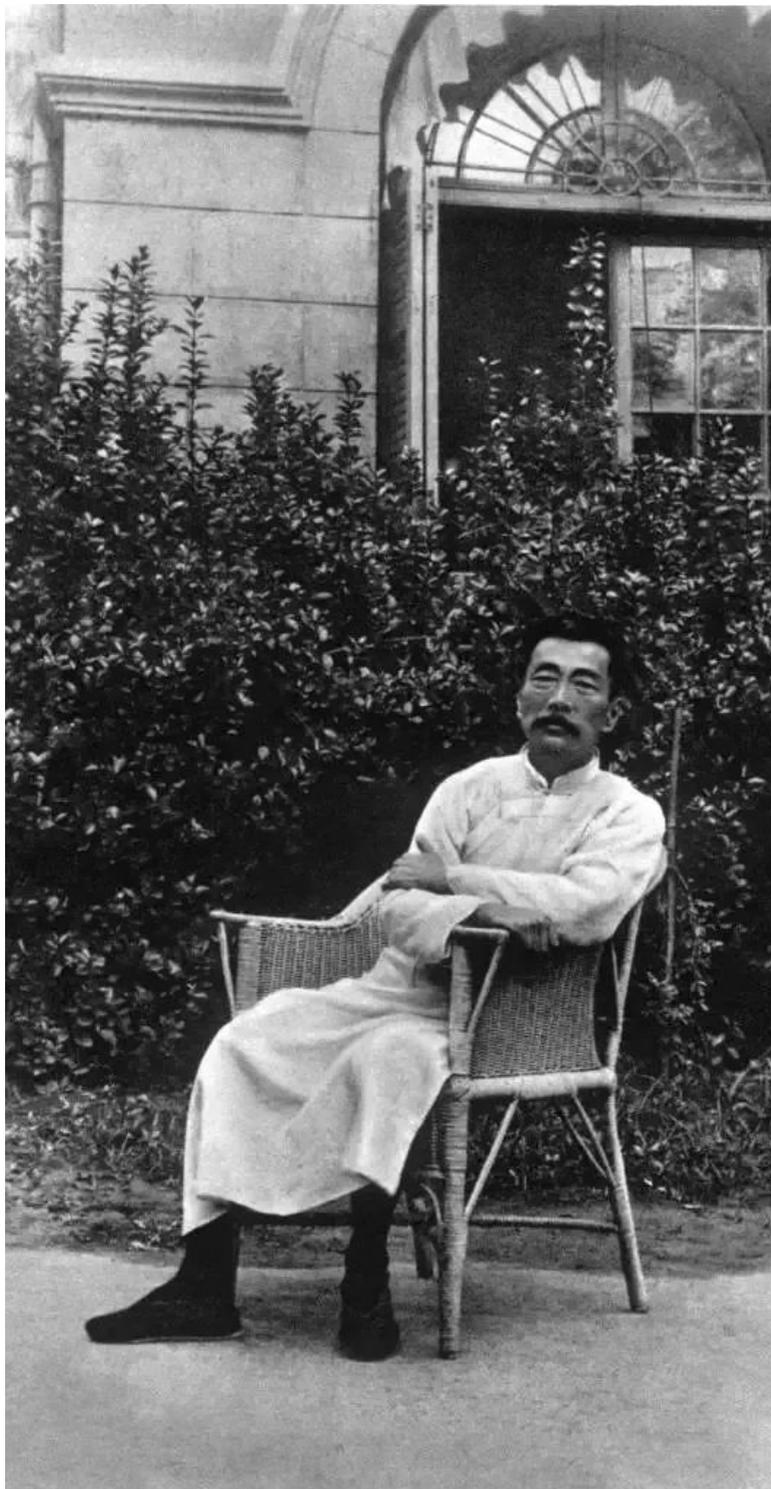
史沫特莱回忆，那一天，《上海报》的编辑李求实报告了秋收起义和红军战争的情况，冯铿则“谈起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她在讲话结束时，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成为中国文化总同盟的两个创始组织的保护者和导师”。

1930年9月20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

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为了忘却的纪念”

193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在



⑦ 鲁迅先生五十寿庆时史沫特莱为鲁迅先生摄影（史沫特莱/摄）

三马路（今四川路）东方饭店举行扩大会议，由于叛徒告密，29人被捕。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被捕的23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杀害。当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江苏省委书记何孟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书记李求实，还有“中国革命文艺联盟”作家柔石、殷夫（白莽）、胡也频，“左盟”执行委员、工农文学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候补中委、妇女部冯铿。

鲁迅得到他们遇难的消息，在一个深夜，他独自站在花园庄旅馆那个堆满杂物的院子里，早春的寒光照在他身上。他心情沉重地想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的年轻人”柔石；想起每当和自己一起走路的时候，“简直是扶住”他的友人；想起柔石的朋友，那一位似乎又有点罗曼蒂克的冯铿女士；想起了那个大热天里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刚被捕释放出来马上跑来找他的殷夫……

史沫特莱回忆 1931

年3月18日晚上去看望鲁迅的情形：

1931年3月，我返回上海，我的秘书冯达接我时告诉我，有二十四名年轻作家、演员、艺术家被捕而且被杀害。他们于2月7日被提出监狱，被迫挖好了各自的坟坑之后被枪杀，有些人是被活埋的，其中就有柔石。

我急忙赶到鲁迅的寓所，发现他正在书房里，面色阴沉，没有刮胡须，头发蓬乱，面颊深陷，眼睛里闪烁着灼灼逼人的光焰，他的语声充满骇人的仇恨。

“这是我在那天夜里写成的一篇东西，”他边说边递给我一份以他那种碑刻似的笔体写成的稿件，“我叫它《写在深夜里》，请译成英语，在国外发表。”

这一晚，柔石被杀这件事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谈话内容。鲁迅把他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作）这篇稿子交给史沫特莱，请她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以此向外国的读者披露反动派的暴行。文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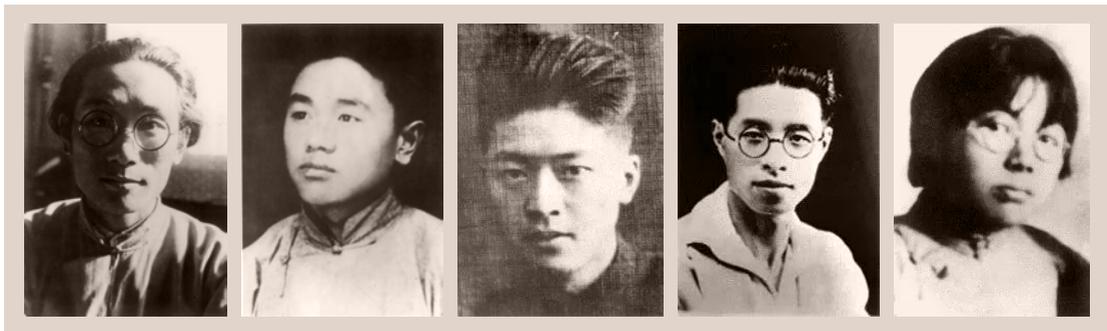
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

史沫特莱回忆说：

在我离开他家之前，他和我一同起草了一份宣言，向西洋各国的知识分子控诉在中国发生的对作家和艺术家的屠杀。我把那宣言拿到茅盾那边。他把它修改了一下，然后帮同我把它译成英文。

这篇标题为《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学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宣言，刊登在《前哨》的创刊号上。6月出版的美国《新群众》杂志第七卷第一期，以《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为题，刊出了这个宣言的英文版，结果，五十多名世界进步文艺家发来了谴责杀害中国作家的抗议书，珂勒惠支是其中之一。国民党政府得知西方世界有责难之意，大为吃惊。

1931年3月30日，袁殊的《文艺新闻》周刊第3号上，刊出冯雪峰《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用读者投书的形式最早公布了“左联五烈士”遇难之事。4月25日，“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就是“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二字是鲁迅写的。五烈士每人一篇小传，《柔石小传》是鲁迅写的。他还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作为五烈士的悼文。9月20日，“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主编丁玲请鲁迅先生提供一些插画。鲁迅凝视着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画《牺牲》，画面是“一位母亲含悲献出她的儿子去做无谓的牺牲”。鲁迅想起了“他那



② 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白莽）、李求实、胡也频、冯铿



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这画连同鲁迅写的说明刊登在《北斗》创刊号上。

1933年2月8日，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道：

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副会长、著名文艺评论家阎晶明所解读的，鲁迅总是用“纪念”这个词表达自己用笔怀念死者的心情，其实是他复杂、隐忍、痛苦、悲愤、沉重的心境的简洁表露。

1936年3月11日，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写道：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

1936年4月7日，鲁迅在《写于深夜里》中写道：

柔石被害时，报章上毫无记载，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里，……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

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

此外，为了中国的民权保障，鲁迅与史沫特莱也是同仇敌忾，奋力搏击。1933年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萧伯纳来上海。其时，萧伯纳与宋庆龄同是世界民权保障同盟名誉副主席。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会见萧伯纳是“民权保障同盟的一项活动”，鲁迅和史沫特莱都参加了会见。

鲁迅1933年2月17日日记，和《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记下了他参加接待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事。1933年3月1日，史沫特莱署名“镜涵”文章《萧伯纳过沪谈话记》（登载于《论语》第十二期），也做了记载。

1933年5月13日，鲁迅、史沫特莱还一同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纳粹党蹂躏人权、摧残文化的种种暴政。

萧三的信

1928年开始，鲁迅突然受到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穆木天、冯乃超等）《洪水》《创造月刊》的连续攻击，被污名“封建余孽”“醉眼朦胧上酒楼”。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孟超、杨邨人等）《太阳月刊》推波助澜，讽刺鲁迅“朦胧以后”“死去了的阿Q时代”。鲁迅被迫应战，一批批驳创造社、太阳社这些论敌。论战出现大混战的局面。

为了消除隔阂，团结对敌，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李立三和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富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分别找鲁迅，找创造社、太阳社骨干谈话，要求停止对鲁迅的攻击，建立了革命文学团体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吴黎平在《长念文苑战旗红》一文中回忆说：

1929年11月间，李立三同志在秘密机关找我，代表党中央制止这个倾向，提出三点意见：1. 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2. 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3. 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鲁迅联系，征求他的意见。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北四川路寰乐安路（今多伦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到会的有30多人，潘汉年代表党讲话，鲁迅做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

但是，在“左联”时期，鲁迅应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及“自由人”“第三种人”有过三次论战，内部隔阂越发严重。

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1935年11月8日，正当鲁迅“横站”之际，史沫特莱向鲁迅传递了“左联”驻共产国际代表萧三解散“左联”的信。

萧三的信列举了“左联”成立五年来的成绩，提出在目前“民族危机日益加紧”的时候，“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



⑦ 1933年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接待萧伯纳时合影（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因此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认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拯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是我们进行的方针。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也有过这样的回忆：

1935年11月间，我在鲁迅家中曾看到萧三给左联的信。萧三在信中指出了左联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但也严厉批评了左联长期存在而未能彻底克服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并提议解散左联，另外成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文学团体。他在信中说，“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拯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是我们进行的方针。

从萧三写信的口气，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个人也做不了这个主，而是传达了党方面的指示，或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因为我从史沫特莱那里已经听说共产国际在战略策略上有重大的变化，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团结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我对萧三信上的建议持赞成的态度。

由此，“左联”解散，但未发宣言。

关切鲁迅先生病情

从1933年开始，须藤医生就给鲁迅看病。1936年5月份，须藤医生把鲁迅的病当作胃病来治，后来5月20号起，鲁迅发热近10日。须藤医生发现，当胃病治是不对的。

后来，鲁迅的病情日渐沉重起来，史沫特莱是对鲁迅病情极为关心的好友之一。5月31日，史沫特莱特意邀请了当时在上海的美国著名肺科大夫邓恩医生为鲁迅看病，茅盾担任翻译。大家建议改由邓恩医生诊治，但是鲁迅不同意。因为他想须藤医生是可以诊治的，如请别的医生来看似乎是不信任须藤医生。

6月5日，宋庆龄先生在病中写信给鲁迅劝他入院治疗，她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茅盾回忆：“我到鲁迅家不久，史沫特莱同D（邓恩）医生也到了。我在楼下接待他们。D医生问，病人懂几国文字？史沫特莱说，日文很好，德文可以看书，不懂英文。医生说，那我们用英文交谈吧。上了二楼，D医生听诊以后，走到史沫特莱面前，那时鲁迅躺在床上，面向窗。史沫特莱和我站在窗前，史沫特莱问大夫病情如何，大夫回答说，严重。史沫特莱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答：恐怕过不了年。史沫特莱这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据邓恩医生说，病已严重，光是肺病，但还可医治，第一步须把肋膜的积水抽去，如果迟延，必不治。问须藤医生时，回答是说：肋膜里并无积水。但是过了约莫一个月的时间，须藤又说确有积水，才开始抽积水。

鲁迅先生在9月5日的《死》中写道：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一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鲁迅先生10月19日逝世。举世震惊，万众哀悼。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先生丧仪藏品中，有13人和9人或8人治丧委员会名单三个版本之说。但无论是13人名单还是9人或8人名单，史沫特莱都名列其中。

史沫特莱在《追念鲁迅》里悲痛地说：

一个伟大的精神，一个以笔为刀而不知何谓恐惧的人物，与世长辞了。我曾经以做他的朋友为荣誉。所以，也同在上海和不远处数千万人一样，我掩面而泣了。

“中国的伏尔泰”

鲁迅的民族精神，他的正义的胸襟、沉重的文字、悲愤的情怀、生与死的拷诘，史沫特莱始终铭记在心，不能忘怀。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设置了“鲁迅”专门章节缅怀鲁迅。

她追忆鲁迅说：

他在日本阅读了托尔斯泰著作最初一批日文译本，托尔斯泰引导他接触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使他认识到现代文学的力量。

我的生活和鲁迅及其最亲密的同行、中国著名小说家茅盾的生活紧密地连接到了一起。我们三人一道收集出版了一本德国民间艺术家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我们一道为西方国家报刊撰写了大多数抗议反动派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稿。

他常同我谈起要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写一部历史小说的计划。但是他的国家深陷其中并为之动荡的社会使他无暇顾及。他对屠杀无辜和侵犯人权的暴行深恶痛绝，以至不久就把他的笔专门用作政治批判的武器，使它成了一柄真正的匕首。

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他把一种又一种文学杂志介绍给公众，这类介绍文章质朴而凝练，像一面面壮丽的旗帜迎风飘扬。

鲁迅把最优秀的现代社会问题作品介绍给中国青年。他享有自古就受人敬重的身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师表或导师的地位。

鲁迅先生的去世，不只是一件引我个人悲哀的事，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鲁迅，伟大的作家，有人称为“中国的高尔基”，而我以为，他其实是中国的伏尔泰。🌐

杨克：“永远在路上”的诗人

文 荀文彬（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一个喜欢种花草的诗人

我来到杨克在广州番禺的家，只见窗前，一个身影正弯曲着。不用说，肯定是杨克又在侍弄他的花花草草。我敲了两下门框，果然传来熟悉的声音：“进来，进来。”杨克直起身来，将双手在腰间擦了擦，伸出右手匆匆和我握了一下，算是打招呼，然后又躬身将一盆叫唐印的多肉植物搬去阳台晒太阳。

杨克喜欢种花草的名声在外。反映到诗作中，就是日常性、客观性、精神性的结合。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 / 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 / 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 / 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 / 亿万儿女手牵着手 / 在枝头上酸甜甜微笑 / 多汁的秋天啊是临盆的孕妇 / 我想记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户”（《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第一段）——这首诗写于2006年，央视新闻主播李修平、王世林在2008新年新诗会上朗读过。

石榴是杨克侍弄的花草中的一种，是中国老百姓常见的水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蕴多子多福，是吉祥的符号。杨克的这首诗，紧紧抓住“石榴”与“祖国”这两个关键词。

石榴很大，我们国家也很大；石榴籽很多，我们国家人口也很多；石榴籽是透明的、亲密无间的，犹如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儿女的心是水晶一般的；石榴打开来，里面是一瓣一瓣的，以微黄色的果膜分隔，而我们国家在地理上也是一个个省份相邻的；石榴向东一面比较红，西面比较青涩些，我们国家也是东部发达，西部欠发达一些；高原上的女孩，脸蛋被紫外线晒出的“高原红”，圆圆的，红晕就像石榴一样；“石榴的一道裂口”与“龟裂的土地”“手掌的沟壑”，共证了我们国家发展进程中黎民苍生的艰辛付出，对底层人民的热爱，溢于言表。每一句诗，既可以说在指祖国，也可以说是在描述石榴。杨克通过颇具匠心的意象，表达事物间暗含的关联性，这种比喻上的相关性，连接了“家国情怀”的主旨。



杨克，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云山讲座教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台湾华品文创有限公司等出版《杨克的诗》《有关与无关》《我说出了风的形状》等 11 部中文诗集、4 部散文随笔集和 1 本文集，由日本思潮社、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 6 种外语诗集，翻译为 15 种语言在国外发表。获英国“剑桥徐志摩诗歌奖”、广东首届特支人才文学领军人才等中外文学奖十多种。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研究员。

一个“行走”的诗人

“有人酸甜，有人麻辣，有人喜原汁原味 / 八大菜系风靡神州，各不遑让 / 当周游列国，从巴黎到纽约 / 在刀叉下受虐一周的胃 / 所有人的味觉，瞬间全被唤醒 / 炒煮蒸烹的中餐佳肴就是我的祖国”（《我的中国》第一段）——这篇，居然是杨克在英国驻穗总领馆办签证时写出来的！

2019年10月上海图书馆要举办一场朗诵会，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朋友希望杨克再写一首跟祖国有关的诗。

关于“祖国”的诗，杨克13年前写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几乎写尽了想象与联想，无法再超越。所以对于上海朋友给的创作任务，杨克一度认为无法完成。因为以杨克的风格，写祖国与创作其他诗一样，不能写套话、大话，相似的话，要寻找新鲜独特的角度，要具象而细致，可感可触摸。

“拖延”了一些日子，杨克收到英国利兹大学邀请他9月去参加诗会的函，在英国驻穗总领馆等待面签和打手印期间，杨克灵魂深处的记忆突然被唤醒，灵感倏然降临。

灵感来自于“行走”见闻。

杨克曾去江苏无锡参观过小娄巷。这条百余丈的短巷，历史上出过1个状元，11个举人，15个进士，80多个秀才；现当代文化科技名人也很多，有钱钟书、王选等，院士如“过江之鲫”。杨克认为这跟当地的“东林书院”有传承，由东林书院又让人想到了《诗经》《楚辞》，想到了屈原、杜甫，张载、辛弃疾、文天祥，再到艾青、闻一多，这些“家国情怀”都是诗歌绵延不绝的

精神元素。

杨克认为，外国也不乏“家国情怀”的大地之歌，比如惠特曼“我听见了美洲在歌唱”，莱蒙托夫的《祖国》，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肖邦也因为《波兰舞曲》被称为钢琴诗人。

自1999年起，杨克受邀参加过日本、英国、挪威、芬兰、哥伦比亚等好些国家的诗歌交流。每次出国几天后，他最怀念的就是中餐；在外语环境里，最亲切的就是看到中文听见乡音，这让杨克找到了《我的中国》这首诗的写作路径。

再联想到几乎中国所有的神话传说，都是与最高的神这个主宰抗命的，这是中国文化与世界三大宗教的区别。杨克认为，这首诗既写民俗习性、中华经典，也应该写山川，写土地，写黎民苍生，写慎终追远，写自我，写内心，写梦呓，写卑微的生活……浮想联翩，一一涌来。

于是，一篇气包万象，八面贯通，层次分明，秩序井然，纵横交织，经纬相连，严密完美的《我的中国》诗作出世了。

“很欣慰，同一题材，我竟然写出两首不同的诗来。”杨克说。

赞叹之余，我更钦佩他有一个“行走”的大脑。不少文章和诗歌，都是杨克在高铁、机场或者飞机上用手机写的。杨克也很欣赏那些去哪里都带着笔记本和笔随时记下几句的人，但他走到哪里有了灵感，就直接在手机备忘录上创作、修改。

像杨克这种文化层次的人，时间宝贵，工作又忙，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去逛商场呢？杨克说：“每到一个城市，很多文人会喜欢逛书店，但是我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会更喜欢关注那个城市。因

为我写作的很多素材来自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发现或者见识。我觉得，这个城市的书店跟那个城市的书店，其实差别不大。但是商场恰恰是代表了个城市跟另一个城市生活品质的不同，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正如我十几年前去越南逛商场，我就觉得他们的商场跟中国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差不多，这样我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大致水准，生活的某种变化。再者说，走在商场里，看到一些好东西，并不表示我要买下它们，光看着也觉得挺舒服。再比如，去美国，我也会花两三个小时去逛奢侈品大卖场。”

《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广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生命的轨迹》《洋山港》《晨过石壕村兼怀杜甫》《人的一生总有某个时刻像丧家之犬》等诗歌，都是杨克“行走”出来的，都是从小处着笔，体现出他的一种底层关怀意识，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灵魂观察史。杨克认为“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是诗歌的在场”“很多年生活底层的经历，奠定了我的诗追寻存在意义的基调”。民间的立场，其实也正是杨克“灵魂观察”的立场。

作为有意味的追求，杨克写了不少先锋语言实验和意象缤纷的诗作。我认为他的诗歌具有另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在于不管写作对象是老百姓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杨克与同期或后来的诗人（作家）相比，对环境或空间有更敏锐的认识，社会变化在他的诗歌里有鲜明强烈的反映，他敢于面对现实，承认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危机，乃至用叛逆者的眼光，对某些现象提出怀疑。怀疑之余，并不只停留在矛盾、徘徊、苦恼

中，而是以细腻生花之笔，大胆地探求光明，让人们看到生活的希望与美好，也充分展现出杨克高超的艺术匠心。

“我想说写作是个人化的，但既要表达个人感受，也要表达这个时代，表达这个公共空间。”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今天，杨克的写作始终有一条主线，就是跟中国和这片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并不完全写一种凌空虚无的东西，他写的不是公共合唱，而是个人发声。杨克并不排斥外部公共空间，他坦诚自己表达的是心灵，既有诗人的独特感受，也要找到与人心相通的那个柔软的心灵，但这心灵也是外部空间的一种折射和反映。虽然是个人发声，但关注外部的世界，当然也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的精神和灵魂。这一点，与马尔克斯的“空间叙事”写作不谋而合。

杨克并不反感“口语诗人”“民间立场代表诗人”等标签。如果再给他贴一个标签，我认为“中国最具城市意识的灵魂诗人”比较合适。

一个面向未来的诗人

“创新”是永不过时的流行词。杨克说，文学观念也要有创新，跟文学有关的新的事物更要接纳，因为这关乎文学的审美。

一个诗人不要因为写诗就只读诗。这样读书，营养非常单一，应该看杂书，包括中国古代的建筑、民居，有关战争的、哲学的，还有民俗的剪纸、菜式，等等，都应该有所阅读。“有一次看微信，一个小学生说《西游记》的确是吴承恩写的。因为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无论孙悟空取经走到哪里，小说里写的菜基本上都是淮安



◎ 2019年11月18日，杨克在广铁一小为3000名小学生讲授诗歌创作

菜。我认为这个小学生的阅读角度就很好，通过淮安菜来求证《西游记》作者，这就是文学阅读的一种创新。”

在文艺发展史上，历来存在着综合与创新，中国传统，作文必尊《诗经》、先秦两汉以及唐宋八大家，写诗词则宗唐或宗宋。而另一种审美，则强调创新。南北朝时的刘勰就曾大力倡导“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就是要作者根据自己的“情”和“气”，不拘于前人，采取通变而有创新，创新才能产生好作品。

“谈及中国的诗歌，小说散文等也是，不能只有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一个标准，既要和中国古典文学有某种呼应，也要有一种开放心态去吸纳当代世界文明的精华，包括从《荷马史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的作品，都应该成为当今写作的一个视野和标杆。”杨克说。五四以来的新诗，至今令人诟病的一种文体，叫“翻译体”。

“我觉得这也要辩证地看，除了读起来别扭的弊病，其实它们也丰富了汉语表达的另一面。写作首先要回归纯正的汉语，也要适当地吸收一些翻译体，使现代汉语更丰富。”

其实现代汉语的很多词汇已经不是中国古代汉语词汇，它是日本人先用汉字翻译了西方现代词汇，后来由鲁迅那代最早留学日本的文化人带回中国，形成了很多汉语新词汇，包括人们经常使用的“爱情”，都是古汉语里没有的。所以杨克认为“翻译体”也有部分合理性。

近20年来，在严肃诗人中，杨克是有自己读者的不多的几个。他认为一个诗人的写作，就像剪刀要有两翼，一翼是得到批评家、教授、学者和同行等专业人士的认可；另一翼是语言表达的多元化，用词的具体化，传达了人的普遍情感，中外读者都可以代入或者置换，外国汉学家比较容易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许，这也是他多次被邀请到国外参加诗歌活动交流的原因。

影响中国人几千年价值观的，不仅仅是精英文化，还有很多民间、民俗文化，比如仙侠、玄学、传说、传奇，网络文学就运用了“三侠五义”“民间故事”等表现形式，尤其是经过商业操作的不间断传播。“网络文学将‘想象力’发挥得很好，我觉得想象力是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传统文学既需要关怀现实，也要跟网络文学学习‘想象力’。”杨克说，“当然，网络作家也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将‘快餐式’文化做成经典。网络作家要注重表达人文精神价值观。”

文学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

唐诗宋词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堪称文学经典。这些经典之所以流传至今，就是它们具有文学美、韵律美、音乐美，经宫廷、民间朗诵、传唱、转抄，渐渐就广泛传播并流传下来。

杨克也希望中国未来的诗歌，在语言上要更加注重音乐性，或者是语言的声调、语调、语气和语感。“我认为这是新诗100年来的不足，当然这也是翻译带来的问题。”杨克参加过一些国际诗会，觉得外文的诗歌里有很强的节奏感，他们是拼音文字，注重轻重音。比如英国年轻一代的诗歌能够表演，因为他们有莎士比亚戏剧的传统，这样的诗歌表演居然还有品牌商冠名赞助。从这点来说，杨克谈及他的以及其他诗人的作品，不仅应该接受在微博、微信上这些新媒介传播，未来也要在音乐感上多下功夫，争取将更多诗歌搬上舞台，或者图书馆、影剧院，还要有在广场甚至百货商场大厅表演的勇气和水平。“本来，最早的诗歌就是行吟或者传唱的，我只是希望再做一个回归的工作。”

文学的普及工作是作家的义务，是人生的一部分。杨克觉得诗歌在广东的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他可能也是中国作家、诗人里深入一线讲学最勤快的人。作为国内有影响力的纯文学刊物《作品》杂志，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为年轻写作者提供平台甚至开辟专栏。

杨克觉得90后乃至00后这一代年轻人比之前辈作家，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外语非常好，对世界文学的了解更充分，年轻人应该发挥这个优势。他认为，写作除了表达个性进行文本实验，一个作家更应该立足中国的现实，关心国家的进程。如今中国经济总量稳定世界第二，这对中国作家国际地位的提升是有帮助的，世界更关注中国，更关注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更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那么也更关注中国的文学。杨克说：“我相信年青一代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作家。”🌐

那些“无足轻重”里正蕴含着铮铮质地

文 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办公厅主任）

刘星元是一位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青年作家，在近几年崛起的青年散文家中，他的散文意蕴的深度、叙事的精度、语言的美度，使他成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领军性作家。翻开他的《尘与光》散文集，鲁南腹地乡与野的气息便晕润开来，小人物的喜怒哀欢便凸显出来。刘星元的乡党、散文家王鼎钧曾评价他的散文：“语言平易中有清新，一洗遗风，挥洒自然，康庄大道，足以致远。延长中国文学吊古伤今的传统，小中见大，含蓄中有深沉，将来人生经验有了厚度和高度，有书写出大作品的可能。”鼎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但刘星元选题用心，择材独树一帜，为文总有真性情，不是专靠辞藻掩映，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之初就有着与写作恶趣味保持区隔的自觉，这殊为不易。

刘星元根植于鲁南腹地，一座名唤“兰陵”的县城，一个名为“北邱庄”的小村庄，这种境况也决定了他的视野所及、选材取向及作品的质地。令人欣喜的是，刘星元的写作并未迁就这些传统的题材，他在作品选材、语言架构以及思想指向上，皆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他咀嚼并辨识着自己的书写对象，以期完成对某些事物或环境的拆解与重塑。

在题材择取方面，刘星元散文多取材乡野，但始终是纳入到县城背景之下的，他并非一意低吟乡土行将消逝的挽歌，而更多是考量在均质逻辑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县城作为链接乡村与都市的缓冲地带，对于大多数国人的乡土回忆与都市想象到底提供了什么，又如何塑造自我的身份意识。刘星元关注的焦点是那些在潮流一线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他着意于选取那些被

人废弃不用的“边角料”，常常以“物”破题，以思维的运转延伸语言的触角，意在从那些细微之物上触摸人性的善与恶、命运的喜与悲，以被俗常生活、散漫时光忽略或抛弃的小事物、小片段、小情节入手，揭开一类事物、一类情怀的隐秘，并在这隐秘中尝试构建独特的更为私人化的“一”。从某种层面上讲，他似乎是在把自己的创作用“一+全+一”或“小+大+小”概括，但是，最终的“一”和“小”并非最初的“一”和“小”的重复，它是沿着思维和内心攀爬的审视人性、物性的“虫”，在这个过程中，羸弱的它曾尝试吞噬，最终又用这吞噬集聚起的力量完成了“瘦身”。诚如银雀文学奖给予他的授奖词所言：刘星元的作品很好地汲取了非虚构的叙事精髓，将尘封记忆渐次打开，普通抒情状物体系里的不假思索便会黏着而来的修辞，刘星元则做了细致审视与剔除，所以，虽然所述皆是大时代里的卑微小事，但他却赋予这些小事不寻常的光芒。

在语言架构方面，刘星元作品紧扣生活的脉搏，用思维与叙述的开合，探索散文文本更多的可能性。刘星元致力于文体互援的尝试，这种尝试与他的写作经历不可分割。他之前曾涵泳沉浸于诗的河流，数年后，他发觉单一的文体不是万能的，有些事物以及事物衍生出的思想，单一文体往往不能准确或合理地表达，于是尝试用散文来记录，并尝试将诗的属性融入其中。然而，一味追求诗性的表达，往往会让作品陷入“单薄”的境地，为了能够更为沉稳地接近事物、深入内质，他又开始向小说这一文体求援。对于他的这

种借力之法，评论家马兵曾评价：“虚构和非虚构的运用产生的张力构建了刘星元散文内在的世界，而叙事性元素的加强，使他要传达的那底层的艰困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刘星元散文中的诗性元素也历历可见，他在两种文体间建立起一种互援性的关系，使语言更具弹性和美感。我有时甚至觉得，就像木心评《红楼梦》的诗歌，那些诗歌与小说是水与水草的关系，星元的很多诗歌也是嵌在他的散文中才更能体现其味道。”另外，我在阅读刘星元作品时发觉，他一直在尝试为每一篇文章量身定做一种独特的气氛，使这气氛能与这篇文章匹配。这种气氛来源于作品所叙述的内容，更来源于作者与内容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之后切身的体会。这种宽泛的构思，为整篇文章保留下“留白”的创作机会。这种“机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既有机可乘，但也可能会坐失良机。刘星元亦认可我的这个发现，他认为，这种“留白”的设置偶尔会让他抓住一些时机，在早已营造好了的气氛的推动下，一些完全超出自我预料的词语、段落乃至章节就会旁逸斜出地流淌出来，这些本不在构思之内的语言，往往会打乱整篇文章的结构，但唯有这样才能保持它的野性。

在思想指向方面，必须再一次说到“故乡”这个词。“散文的精神写作是贴着大地，贴着物质的写作，散文写作首先是及物写作……那种非伦理的写作是凌空蹈虚，在玄想中进行不及物的狂欢，只是沉迷于精致的文字，这种所谓的探索，与物质世界和个体的精神世界疏离，看不到人间的苦痛，背离生活的真实、精神的真实。”（耿立语）在刘星元作品中，“故乡”始终是重要的及物书写对象，正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他将自己的写作视线投向了自已熟稔的本乡本土，他沿着自己

的血脉向故乡深处回溯，于草木之间巡行，在文字深处抵达。刘星元在逆时光的寻访中发现了故乡隐匿的影踪，在文字的追溯和重塑中，那些身影生动起来，那些面孔生动起来，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生动起来……源自对乡村生活的深切感受和虔敬之爱，在刘星元的散文中，人事代谢应时顺势，且生生不息。乡村变迁、家族历史、个人经历，刘星元不写沧桑巨变，只写在岁月的风侵雨蚀中，渐渐远了的那个乡村，逐渐旧了的那些事物，并与当下进行触碰，在时间与时间的对峙或拉锯中，不断返回自己、寻找自己，不断返回故乡、寻找

故乡。散文这一文体，只有精神的丰沛，才能改变过去那种小摆设、体量单薄的困境。天上地下，散文的物理空间十分广大，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精神空间，实际文本所呈现的精神含量和丰富性是否足够，尤其在描述深刻的心灵事件、人性的深度挖掘、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态、揭示普遍信仰危机、承担良知和批判功能方面，散文往往是缺席的——这并非艺术本身的天然安排，而是一种人为的弃权和出让。

所喜的是，星元的散文，一直是在在精神的维度掘进的，他的眼睛是悲悯的、向下的，或者是平视的、反思的，他把自己摆了进去，像蛇一般自噬。总而言之，星元的散文从真相入手，让事物的各个面向显露，尔后则经过体悟，经过省思，最后抵达精神的高度。

刘星元年纪尚轻，对他来说，一切皆有可能。相信这位青年才俊一定能继续以亲历者、旁观者乃至拾遗者的身份，去触摸事物，解读它们传递给人类的贴切或隔膜的感受，记录下那些于喧哗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人和物，留存下那些于喧哗中看似无足轻重的细微之声——这些“无足轻重”里，正蕴含着铮铮质地。🌐



《尘与光》

作者：刘星元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贺龙敲石鼓红旗漫天舞

——在长江第一湾追忆红军

文 白浩（《丽江日报》记者）

站在“万里长江第一湾”——金沙江畔的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但见宽阔而平缓的江水不急不忙地划下一道舒缓的曲线后立即掉头奔向东北方，昼夜不舍。金沙姑娘在这个季节似乎只愿展示给世人平和、安详、柔情的一面，涌动的暗流悄悄隐藏于碧波之下。随意弯曲而略显狭窄的石鼓小坝上，尽是绿油油的麦田和绵延不绝的柳林，一切都显得恬淡、静谧、美丽，农人在波澜不惊、惬意地劳作，享受着生命、生存、生活的本真。面对四围青山、巨大江湾，我肃立于安放在坡头亭子里的那面硕大石鼓前，仿佛置身于85年前红军在此渡江的壮丽场面。

石鼓得名于一件历史文物。“民心得失演古今兴亡史；石鼓合开占天下治乱情。”这是郭沫若为石鼓作的对联。这是因为石鼓有一道据说能自动开合的裂纹：天下动乱，裂纹越撑越大；天下太平，裂纹相合如线。石鼓是一面汉白玉制成的巨鼓，直径近两米，鼓面上镌刻有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战胜吐蕃的“大克大捷纪胜碑文”。据说，石鼓立于三国时代，结缘于这里曾是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属忽必烈“元跨革囊”之故垒西边，更是唐宋以来纳西族木氏土司与吐蕃地方政权相抗衡的天堑。在纳西族民间故事中，这里又是金沙江姑娘告别怒江与澜沧江，直奔东海去寻找自由、幸福的拐点。元代诗人丁鹤年曾这样描写这里的水势：“江流至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观”；当地纳西族诗人、作家、

学者范义田亦豪迈地宣称“山连云岭几千叠；家住长江第一湾”。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到来，再一次为石鼓书写下壮怀激烈的史诗，为丽江及纳西族人民的命运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1934年7月，为保证中央红军安全转移，红六军团率先西征到达黔东，与从洪湖苏区突围出来的红二军团会合后回师湘西，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极端困难中完成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也从湖南桑植和轿子垭地区出发踏上长征之路，并于1936年3月进入滇、黔边境。4月1日，按照在贵州召开的盘县会议精神，红二军团为右翼、红六军团为左翼，先转向南伴攻昆明，待调敌回援后突然分兵向西，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与围剿追敌千里回旋、频施妙计，途经28个县区，攻占13座县城，并于4月24日在原丽江专区鹤庆县县城召开会议，确定在今玉龙县石鼓镇一带北渡金沙江。4月28日，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从玉龙县石鼓镇到巨甸镇一带顺利渡过金沙江，在历经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跋涉后，于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在翌日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后，朱德、贺龙、任弼时等同志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积极的斗争，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于10月9日、22日在陕北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历时11月、

转战9个省、行程16000里、途中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的长征亦胜利宣告结束。

红二、六军团选择在石鼓一带渡江北上，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此前，蒋介石坚信红军只会从丽江经梓里铁索桥过江往永胜县东去。蒋中正给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电令云：“……查，丽江县东约数十里踞金沙江两岸有一铁索桥，名梓里江桥……现萧、贺股匪（拟）铁索桥渡金沙江企图与朱、徐会合。为免该匪易于渡江计，可否将铁索桥速即设法撤去……希飭丽江、永北两县速派地方团队赶筑桥头堡，扼守至万不得已时可将铁桥撤至东岸为要。”“金沙江沿岸所有船只及一切渡江材料应如预为搜集，先由我方紧急时准予烧毁或破坏之。”为此，他早已部署重兵守住梓里桥，并像泸定桥一样拆掉桥板只留铁索，等待红军往“口袋阵”里钻。蒋介石和龙云还坐着飞机视察当地的“剿匪”准备工作，感觉良好，颇为得意。

然而，红军怎么会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行事呢？4月24日至28日，红二、六军团在石鼓至巨甸的百余里江岸上选定木瓜寨、木取独、格子、茨可等渡口成功抢渡金沙江，从此甩开十余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堵，高唱着豪放的战歌“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山高路又远，更不怕敌人来阻挡”挥师北上，只留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吓死滇军，拖死湘军，脚踏川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等醒目的大标语。而朱德总司令在得悉红二、六军团成功渡江后十分高兴，电贺云：“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在红二、六军团到达之前，石鼓街上已有一些陌生商人来做小本生意。他们不仅了解当地的地形地貌、江水渡口、风土人情，而且掌握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名单。在红军要来石鼓过江的消息

传开后，敌江防总指挥、藏族土官汪学鼎慑于红军声威，早已过江躲藏起来。红军先头部队到达石鼓后，迅速沿江挡住维西方向的反动武装，而300名水性好的战士则组成突击队过江夺船只、占渡口，扫清对岸的威胁，以保证大部队的渡江安全。26日开始，在当地老百姓的倾力帮助下，全体官兵、男女战士克服船只少、江流急、国民党军尾随其后和空中3架飞机胡乱轰炸等重重困难，昼夜不停地神速抢渡。但见贺老总敲响石鼓，指挥渡江，到处是旌旗招展空翻飞，留下民歌至今传：“贺龙敲石鼓，红旗漫天舞。天兵飞渡金沙江，笑话当年元世祖。纳西穷人见太阳，从此不怕木王府。龙云队伍遇红军，夹尾逃窜像灰鼠。纳西人跟着闹革命去，要掌江山自己做主。”28日，红六军团十六师最后在巨甸渡江完毕，全军抵达中甸境内（今香格里拉，当时也属丽江专区管辖）。于是，萧克将军回望石鼓渡口感慨万千，立马赋诗以纪其事：“盘江三月燧烽扬，铁马西驰调敌忙。炮火横飞普渡水，红旗直指金沙江。后闻鼙鼓诚为虑，前得轻舟喜欲狂。遥望玉龙舒鳞甲，会师康藏向北疆。”

对于红军在石鼓抢渡金沙江的印象，张铨秀将军在《从乌蒙山到金沙江》一文中回忆道：“更令人难忘的是，当地（丽江巨甸）的各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他们身背肩扛，从远地赶来，执意要把最好的糯米粑粑、最新榨出的红糖一筐筐、一箩箩地送给红军。我们营是最后一批渡江的，人民欢送得最热烈、最真诚。我登上最后一只木船，面向南岸，给人民道别的时刻，清楚地看到许多年长的老大妈，有的还用手指扳动念佛的数珠，虔诚地为红军远征而祈祷，许多年轻的汉子合起双手，握紧拳头，呼唤着向红军祝福。”而纳西族人民则说，红军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军队，个个都长得帅，个个都是“大学生”，见穷人就喊“老板”（老乡），买东西都要“把（给）你钱”，不收还不行！的确，红军在丽江的短短



① 石鼓镇

几天里，受到各族群众的箪食壶浆相迎送，贺老总送给中甸松赞林寺松茂活佛的“振兴蕃族”条幅，更是给予包括藏、纳西、白、彝等各民族人民无限的希望。人们确信：红军是英雄好汉，而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则是完全无用的；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方向。贺龙的期望也在短时间内成为现实。

正因为这样，1938年，金沙江两岸便爆发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黄军起义”（起义军说“黄军”是“红军”的弟弟）。在大将军张志友、三将军张连科的率领下，他们提出“杀贪官、安人民、打富济贫”的口号，队伍迅速扩大达2000余人，持续抗争了半年多时间。虽然最终被残酷镇压，但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丽江坝区、剑川县、中甸县，深刻影响了丽江乃至整个滇西北地区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尤其是对20世纪40年代李刚、郭耀南、杨尚志、和万宝、丁志平、吕力生等共产党员在丽江、华坪、永胜的革命活动起到了催生作用。1947年5月，丽江各县已经有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1949年3月16日，丁志

平在华坪打响了滇西北高原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同年5月，中共丽江县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五一大游行”矛头直指国民党腐朽统治，公开喊出“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战斗口号。这些都是红军长征播下的火种燎燃的烈火。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国民党丽江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兼丽江县县长习自诚在1949年6月29日几近无奈地宣布：“自六月三十日止，将蒋介石政权系统下之县行政权即日解除，还政于民。”7月1日，原丽江县全境和平解放，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早了3个月。

红军长征抢渡金沙江天险前后仅仅5天左右，但其感召力空前。一旦红军砸碎了千年的铁锁链，丽江县一次性有19名青壮年自愿加入红军队伍追随革命，其中的王玉清、张履公、杨德根3人紧随部队一路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后来，王玉清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退休回家，而其他人则倒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革命征途上，成为最早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革命而牺牲的第一批丽江及纳西族革命先烈。



红军长征过丽江，也展示出纳西族人民大情大义、宽厚仁慈的秉性。他们对因病留下的伤病员极力掩护、悉心呵护，使大多数伤病员恢复健康后平安归队，少数在丽江落地生根，而自己则在国民党的“清乡”中饱受折磨，惨遭杀害。如，在丽江古城有 20 多位红军伤病员因为群众掩护而躲过“清乡”；巨甸的舒茂才（原名鲍学信）收留了 7 名伤员，并保全了 6 个人的生命；石鼓的戴阿七和 3 名红军伤病员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之后均遭杀害；漾西的香春爸、石鼓的陈尚英、巨甸的余阿康、东元的朱文照等都先后护送众多伤病员回到红军队伍；130 多名掩护主力渡江的红军战士最后因没有船筏可渡而流落在丽江县鲁甸乡至迪庆州维西县一带，得到纳西族等各族民众的终生关怀。那些红军抵达丽江县城后打开国民党县衙门的监狱救出的穷人，更是怀着感恩戴德之心给红军当向导，如桑乐天被释后辞别亲人徒步 400 多里，将红军带路到中甸县城，直到丽江解放前夕才回到家乡；金庄的汤自光、郑太和，大研镇的周耀候等 70 余人也曾为红军充当

向导，确保了红军及时安全渡江；尹学富、王孙、和仲清等 20 余名工匠还主动到红军指挥部报名扎木筏，并在一个隐蔽处一共找到 7 条木船；年震、周长寿、尹学富、李顺才等 28 名船工在 4 天 3 夜里昼夜不停地划动木船和木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红五师十五团七连的大木船发生沉船事故后，除救回半数外，20 多名指战员被凶猛的江水吞噬，船工周长寿在极力抢救落水人员时英勇牺牲；当了解到红军所带“滇币”过江进入藏区后将不再适用，丽江商会及时为红军兑换了两大簸箕银圆予以协助；和士强、张兆华等 34 名大研镇裁缝用 17 架缝纫机在 7 个地点连续工作两天两夜，赶制了大量军帽、米袋，帮助红军漫漫远征。

在这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中，还有一个钟么妹的传奇。钟么妹乃贺老总的外甥女，她从湖南走到云南，一直跟着部队东征西战，想不到在石鼓渡口染上了重病。由于马上就要过江爬雪山、过草地，贺老总只好把她寄养在当地一个纳西族大妈家中。后来，么妹为躲避敌人的清查先后流落永胜县、大研镇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此后，钟么妹当过丽江古城的街道长，参加过支援解放军挺进西藏的运粮队。人们劝她到北京去找舅舅，但她说：“我现在都成了半个纳西人，早有了丈夫、孩子，哪还好意思跑去北京拖累舅舅？”“文化大革命”中，随着贺龙元帅命运的变化，钟么妹也“背着黑锅”历尽人间冷暖悲伤离世。

虎跳峡激浪、玉龙山腾云，红军长征抢渡金沙江虽已往事如烟，但红军的精神却如东去的大江永不枯竭。我深知，正是 85 年前那次伟大的长征，唤醒了雪山、唤醒了峡谷，更唤醒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一个古老的国度，并鼓舞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继续忠诚担当、坚定不移、继承发展，敢教日月换新天，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词有别裁天地宽

——卢家明《词林别裁》的艺术世界

郭守运

作者简介

郭守运，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兼任文化和旅游部珠江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有宋一朝，词之一体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典范，成为民族文学样式的菁华。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论词有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以“境界”论词，其实质是强调词之一的审美特质；标举“高格”，则推崇词作为“时代文体”的艺术价值。时光荏苒，今天我们屹立在二十一世纪的潮头，放眼四顾新时代，发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依然如灯塔般“宛在水中央”，亭亭玉立于时代风潮中，为我们提供社会文化的航向、艺术价值的依据和民族自信的基石。而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批为优秀古典文艺作品默默耕耘的“守夜人”，他们是古典文艺的学习者、吟诵者和朗读者，也是古典文化的教育者、阐释者和传播者。

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卷本巨著《词林别裁》，七十余万字，其作者卢家明，素以学术研究耐心细致、考证严谨著称，“少壮工夫老始成”，在知命之年，深感古典学问传承之重任，耗时多载完成了此项国家级项目。从书稿结构看，以经典词牌为基础设章，按照“华音流韵”（词作注释）、“临风赏读”（美学阐释）、“古今汇评”（词话述评）、“词人心史”（知人论世）、“词林逸事”（典故传说）、“低吟/浩唱”（同类词例）、“倚声依谱”（词牌格律）等栏目进行编辑，并在其中穿插“参读”（对比阅读）、“品题”（词人评点）以及历代名家书画真迹等。词、词牌、词作、词论、词评、词说、词典、词史、词之书、词之画、词之印有机结合且目次分明，历史演进和逻辑分析完美统一，构建了一个栩栩如生、琳琅满目的词之艺术世界。

因而，就《词林别裁》在当代词体艺术研究的贡献而言，其体系宏大，功底深厚，视野广博，思虑绵密。无疑，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守夜人之一，他们的手中，托举着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清空之别趣

《词林别裁》的特色价值，首先是集中展示词之“别趣”美和“清

空”的文体特征。就文学发展史而言，这是词作为一种文体，摆脱诗之附庸地位，脱离“诗馀”之说的核心要素。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极其兴盛的时代，诗书画艺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宋诗和宋词当为文艺领域的“双子星”，熠熠生辉。同样，宋代也是文艺理论较为发达的时期，诗话、词话、曲论、书论、画论，也都达到了同时期世界的巅峰。

宋朝严羽所著《沧浪诗话》有云：“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严羽是在对比唐诗与宋诗的差异之际，重点提出了“别裁”与“别趣”的审美命题。别裁，通“别才”“别材”，意思是写诗作词的天赋是一种特殊的才华，跟有学问没学问没有什么关系；当然要把诗写好，还是要多读书、多研究探索，才能到达足够的境界，而且诗歌作品里面最好是看不出有什么学问的痕迹，句句都像发自肺腑，这样的诗才是好诗。这让我们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贺《南园十三首》中的“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诚然，“掉书袋”是出不了大诗人和词家的，真正的绝妙好词，需要的是一颗玲珑心，一颗别趣之心。

别趣，指趋向各异。趣，通“趋”。《文选扬雄》篇云：“若夫壮士忼慨，殊乡别趣。”李善注：“乡，音向。毛萇《诗传》曰：‘趣，趋也。’”亦有《文选·何晏》篇云：“离背别趣，骈田胥附。”李善注：“离背别趣，各有所施也。”对于“别趣”的追求，在诗体而言，严羽以孟浩然和韩愈为对比，他认为韩愈的学问比孟浩然大很多，但是孟浩然的诗却比韩愈写得好很多，代表了山水田园诗派的最高艺术成就。同理，写词写得好看学问大小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写词同样需要一种别样的才华。

《词林别裁》对于“别趣”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对于词的“清空”也进行标举，所选择的个案代表，很多都有此文体特征，体现了本

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清空”是一种诗词的风格或审美范畴，源出宋代张炎《词源·清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张炎大力褒扬姜夔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晚清词人郑文焯《鹤道人论词书》亦云：“词之难工，以属事遣词，纯以清空出之……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章也提出：“清空是张炎提出来的词的最高境界……他所说的清空就是空灵神韵，同严羽讨论的意见相同。”因而，抓住词之本质特征，体现了本书对于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是清醒而明确的，彰显了词体研究的自觉性和独立性。

别具慧心之研究

《词林别裁》的特色价值，也体现在书稿结构设置的巧妙上，展现了作者对于词学若干问题的精深思考。

清沈德潜编有《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旁征博引、蔚为大观；现代著名学者南怀瑾也著有《论语别裁》，书中不仅有篇章结构、段落联结上的提示，而且有原文义旨以及所涉人文掌故的阐发，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别具一格。《词林别裁》在章节结构方面，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而在文献资料的丰富性方面，犹有过之。

钱钟书先生也曾经论述过“文人之诗”和“学者之诗”的区别，前者意象多变、感情奔放、自由自在，后者细致精巧、思理清晰、精于对仗。而传统的词学研究，也同样有各自的局限：或鸿篇大论、理论精神但缺乏生气，将词进行外科手术式地解剖和研究，学理有余而乏味可陈；或口灿莲花、滔滔不绝但不着边际，将词作为跳板而随意发挥，激情有余而逻辑混乱。偶有如缪钺先生《诗词散论》等精妙之作，但因为是“散论”，



《词林别裁》卢家明编著 中华书局出版

卢家明，江西修水人。1983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获硕士学位。编审，广东省首届出版名家。曾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兼任广东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校对工作委员会主任。担任责任编辑出版的图书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或者政府图书奖、中华优秀读物奖五项，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项，获得首届南粤出版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第四届中国政府出版奖优秀人物奖。

里面的文章大多短小精悍、各自为政，采取了宗白华先生式的“散步研究”法，难以构成理论体系，对于当代学科化、逻辑化的学术发展，贡献不足，殊为可惜。至于报刊杂志上常见的一些感悟式、碎片化的研究，泥沙俱下，不仅不利于词体的研究和传承，反而破坏了词之格调和清空幽静之审美范式。

作为文献学家、文艺理论家和出版家的卢家明，综合了“文人”和“学者”的特长和特色，在全书的结构设置上，兼顾词学研究的审慎细致和词体内蕴的美学情思。具体而言，在书稿的架构上，从个案研究（具体词牌）出发，逐步推进，条分缕析，开口小而挖掘深度大，深得“一花一世界”的艺术精神。在研究、赏析的具体过程中，作者结合历代诗文评，采取“知人论世”的研究方式，并有“同情之理解”（陈寅恪语）的生命态度，体现了作者的人文高度、艺术深度和生命温度。

此外，《词林别裁》每个章节里面的同词牌的词作，选取的都是经典之作，也便于读者研习、效法和模拟，并根据文尾的词牌格律“倚声依谱”填词。这对于古典文学爱好者以及专业者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创作参考价值和比较研

究的教学价值，值得赞许。

别有天地的艺术空间

《词林别裁》是现代文明话语体系下，对于古典诗词传统的再解读、再构建，也是“自成高格”的艺术实践。从作者角度看，这是作者最得意之处，也是作者花功夫最多的地方。

空间是人类生存最重要、最基础的前提条件，是有形物质与无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载体，也是世界各大文明发源地最早一批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本体论问题之一。后世学者对于上古思想与文化的思考，其实都是在一个特殊的假定空间中进行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文化界进行了著名的“空间转向”，这是在“哲学的黄昏”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进一步探索。实际上，就中国古典文学而言，无论是“桃花源”“大观园”，还是泛舟江湖、赏雪山岭、怀古凭吊的场景，都是艺术家构建出来的艺术空间，用以栖息自己的性灵和精神。

而《词林别裁》不仅详尽地呈现了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境界，而且以现代性的艺术手法构建了更加综合、更为多维、更有魅力的词学鉴赏空

间。这一空间，格调高雅，清幽玄妙、境界开阔，正如清代况周颐在其《蕙风词话》中所力荐的“高格”：“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谓风流高格调，其在斯乎？”“高格”是一种流而不靡的格韵，一个自成体系的词美空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同样称许“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从上卷的《忆秦娥》到《相见欢》，从下卷的《采桑子》到《长相思》，种种意象构成了多姿多彩的艺术空间：西风、春江、画船、罗裙、芳草、孤帆、塞下、关河、西楼、桃花、长安、大江、海棠、燕子、庭院、烛影、微云、梅子、杏花、芙蓉，以及残月、笛声、古道、白首、远烟、香尘、湖水、子规、桂花、剑锋、风松、芭蕉、鸿雁、魂梦、故园等，无论自然风光意象，还是社会生活意象，都在作者的笔下，得以艺术再现和美学传达。

通过《词林别裁》的阅读，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和把握这些艺术意境，以及它所构建的艺术领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文人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焦点进行想象、创作，而是于流动中放眼四方天外，一目千里，把握全境。早在《周易·系辞》里就已经说到，古代圣哲观察天地的方式是从空间之维度开始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活的两个重要维度，中国古代诗词的空间意识是诗人用心灵去观看空间万象，是通过外物的载体而领会内在精神，将虚景与实景相结合，在诗歌上形成虚灵的、物我相融的艺术空间。在秦汉以前的哲学中，时空不是纯认知的，它是在人们的感受中形成的，时空是生命化了的感觉时空。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时空观源自于悠久传统的中国哲学，认为空间是生命的定位，空间与时间因生命而交接沟通，于是空间被意象化、结构化。

由此，我们通过《词林别裁》，可以进一步探讨审美主体的艺术世界。词人以现实时空为出发点，徜徉于大化时空的无限之中，以求得精神的逍遥，从而在有限的感性时空中体悟到生命的无限性。词人喜欢寄情山水、怀古伤时，由表象而探求内在的精神，探求背后的意义。他们可以通过观照一时、一地、一物，联想起此时、此地、此物与相关联的其他事物，这就是王维所说“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在中国文化中，仰观俯察、远近游目，是在整体观照的前提下，由此观彼、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本质性认识过程。中国的空间意识更多的是从诗性智慧的角度出发，讲求“虚灵的空间”，讲求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例如，陆机《文赋》云：“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则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这些古代文论中的经典名句，都是在强调时空因素在文学构思、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词林别裁》的阅读中，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学术要点。该书的名篇佳作选读，充分展示了独特的艺术世界，即词人的空间意识，不是去追求无穷无尽的宇宙，而是俯仰往还，远近取与，将天地万象网罗近前，将千般思绪、万缕惆怅尽收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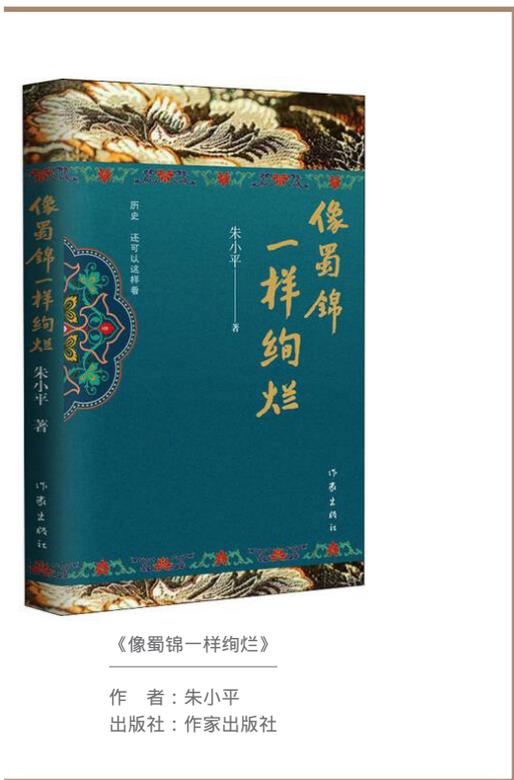
唐代大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卢家明慧眼独具，匠心独运，以词牌为首领，以赏析、史论、比较为骨架，以吟唱、创作为血肉，以参读、品题为毛发，以论带史，主客兼顾，学用结合，生机勃勃、内蕴丰富。对比杜甫的学诗之说，反思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论，《词林别裁》风雅传统存之，词学风骨有之，其必将对于当代中国古典诗词的学科构建、人才培养以及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树立，起到历史性的作用，推动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继承、文化传播和发扬光大。🌐

大家小文亦精彩

——读朱小平散文集《像蜀锦一样绚烂》

张陵（《文艺报》原副总编辑）

朱小平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像蜀锦一样绚烂》是一本好书，而且来得很是时候。这两年，世界被新冠疫情搅得一团糟，这个时候，能读到一两本好书，改变不了世界，却多少能让人心平气和，不至于那么慌乱。当然，好书不是拿来疗治心病的，而是拿来更好地看明白历史，看明白世界的。



读《像蜀锦一样绚烂》，会被编排在突出位置的几篇作品如《啊，“致远”——邓世昌其人及沉舰之因》《永不消失的军魂》《“像蜀锦一样绚烂”——北洋海军陆战队殉国记》《甲午海战中的留美幼童》《煤，煤，煤》《致命的实心弹》《李秉衡其人》等所吸引。光看这些题目，就能知道作家在撬动一个重大历史题材。仔细读下去，就能发现，题材虽大，作家的切入点却非常小。在众多反映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散文作品里，只能算是一些旁敲侧击的小文。不过，文小意不小。像朱小平这样的文史大家写小文，就如海面上露出的冰山一样，看得见的地方小，看不见的地方大。

《啊，“致远”——邓世昌其人及沉舰之因》并不展开甲午海战的宏大叙事，而是让人知道，北洋水师从建军以来就是以福建籍军官为核心形成派系，称为“闽党”，非闽籍军官多受打击和排挤。邓世昌就是一个非闽籍军

官，在军中自然很不得意，被孤立。他虽然上的马尾船政学堂，却没有机会和其他“闽党”一样，到海外留学。全凭他个人的才能和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舰长。在大东沟海战中日舰队作战序列中，“致远”号本来不是日本舰队攻击的重点。但“致远”和“镇远”一样，为了保护旗舰“定远”，毅然挺身而出，主动攻击日舰，把敌人的目标引向自己，受到了日本战群的群攻，缓解了受伤旗舰的压力。而旗舰的指挥官，正是经常和他过不去的“闽党”领袖人物刘步蟾。这个切入点确实很小，却一下子抓住北洋水师人际关系致命的弱点，也一下子写出了以国家大局为重，敢于牺牲的军人个性和大英雄形象。在这种腐朽的军队关系里，很多将领会找各种借口，贪生退却，而邓世昌却视死如归，显出了精神品格的崇高。史料并非独家发现，却第一次由文学用于塑造人物形象，让我们更深地读解历史的英雄。

《“像蜀锦一样绚烂”——北洋海军陆战队殉国记》就是作家读史的独到发现。在整个海战中，这支被作家称为北洋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毫不起眼，“小得不能再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作家描述道：“北洋海军陆战队唯一的一次战斗，是突袭南帮炮台之战。其英勇无畏的血性，视死如归的气概，令敌方刻骨铭心。这是丁汝昌在万般无奈之下，令陆战队投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斗。结局是以陆战队全部战死（包括负伤自杀），是一次典型的自杀式奔袭。”作家不光写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杨用霖等将领的壮烈殉国，更是把笔触延伸到普通士兵身上，写出他们牺牲的惨烈。这些细节，是由日本后来出版的《日清战争实记》中提供的：“使人感慨的是，有的中国兵知道不能幸免而自杀死去”“登陆水兵几乎无一逃脱。海岸上积尸累累，不可胜数”“海水完全变成了红色，像蜀锦一样绚烂”。

《煤，煤，煤》则是一篇对战争失败的反思

性散文，切入点不大，却让人触目痛心，咬牙切齿。据有关资料，北洋海军船坚炮利并不亚于日本海军，指挥水平也不差，战斗意志更是超强于敌，却莫名其妙成了战败的一方。这种历史的耻辱，后来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军事专家是会深刻反思的。不过，一个作家的反思则是独特的。作品指出，之所以败给日本海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军舰的动力煤出问题了。军舰专用的优质煤，被腐败官员换成了劣质煤。动力上不去，速度跟不上，进，追不上敌舰；退，跑不过敌舰，打不着人家，却处处挨打。实际上，军舰还没出港，就注定了战争的失败。也许，作品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可以争议，但当时朝廷腐败和掌握权力的官员发国难财却是不争的事实。腐败国家打不赢这场战争，更改变不了积贫积弱的民族命运。

《李秉衡其人》就更有意思了。文中写道：论个人操守，李秉衡似乎无可挑剔。他毕生以“名臣”自居，一生不纳贿贪财，体恤百姓与士卒，疾恶如仇，动辄上劾不称职的官员，无所顾忌，正气凛然。可这么一个人，在事关北洋水师生死存亡的威海之战、刘公岛保卫战中，身为山东巡抚的他却不能全力支援。北洋水师的覆灭，他是要承担责任的。追其原因，就是他跟随张之洞的“清流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腐败官僚势力作斗争。而北洋水师领导权正是掌握在李鸿章手里。所以李秉衡不听从支援，或消极应付，结果误了国家大事。个人品质再好再优秀，在国家命运前途大局面前不清醒，分不出轻重，也会沦为民族的罪人。作品虽短小，只写人物一个侧面，但其中内涵之丰，思想之高，同一题材的作品似还不能启及。

一边是将士忠勇杀敌，一边是国家腐败成疾。二者鲜明对照，时代悲剧昭然若揭。作家写战争，显然不去和历史学家拼历史逻辑，也不去和军事专家拼战争哲学，只是从自己熟悉的文史

资料中，爬梳出几个问题和思考，寻找到一种不寻常的历史关系，构成作家看历史、看战争的观点，形成自己的历史散文的问题意识，体现出文学反映历史的独有优势，力道和深刻性与历史学家、战争史家异曲同工。当今流行的历史散文，以为越宏大，就越有历史感、命运感、哲理感。殊不知，越大就越可能缺失文学表达的优势。倒不如像朱小平那样，以小见大，由浅至深，反倒能深得历史散文之真谛，找到突破与创新的方法。

二

血性给力的散文，非得有历史的洞见、思想的深刻和时代精神的把握不可。其实，读过朱小平之前创作出版的几部散文集如《燕京感旧录》《无双毕竟是家山》《京城百艺》等，就可以知道，朱小平读书多，知识广，学问深，然杂而不乱，重心则放在明清以来的老北京历史文化。对老北京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他如数家珍，无所不知，信手就来。与其说是老北京的学问家，不如说是老北京不离不弃的发烧友。居京几十年，早把自己的情感生命全都融入北京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一山一水里了。而他的散文随笔多是通过遗存在历史文献中的老北京的点点滴滴，表达对老北京的情感和依恋寄托。《无双毕竟是家山》中的《什刹海忆旧》一文，典型地反映出作家对老北京的痴迷。当今新一辈研究北京史的学问家和作家不光朱小平一人，但说如此挚爱痴迷，把老北京写得如此通透者，唯有朱小平一人而已，并非武断。

当今世界，正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老北京到新北京，变化天翻地覆。变局变革好处多。其中一个大好处，就是让我们更多地反思，认识到传统文化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意识到传统文化不可或缺，更不可任意破坏，必须保护弘扬传统

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灵魂，才走得远走得稳走得强。只可惜，老北京沧海桑田，丢失的东西太多了，找不回来的东西就更多了。带着这样的历史遗憾和时代伤痛去读朱小平的散文，方可感知他内心痴迷之敬畏，方可读出他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一般人会以为，朱小平正在用他的笔，一点一滴地修复着古老的北京，恢复老北京的历史风貌和历史的精气神。其实，更为重要的是，朱小平的每一篇散文，每一篇随笔，都像是一块老砖、一片旧瓦，正在构筑一座看似古老的文化北京城。这座城，复活在他的散文里，也复活在读者的情感里。

《像蜀锦一样绚烂》写的大都是明清的历史，都与老北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物有关，相当多的篇什，就是直接写老北京的故事。如《逝去的诗声》《清代书家说四人》《柳敬亭北京轶闻及其他》《顺承郡王府的沧桑》《“凭栏一片风云气”》《铸钟厂和“钟杨家”》《蔡锷、小凤仙与棉花胡同》等。第四辑则集中讲述与现代文学史文化史相关的老北京故事。虽不敢说篇篇精品，但可以说篇篇都是用心之作。如《逝去的诗声》写光绪年间“清流四谏”之一的名士宝廷的复杂的人生命运故事。一个政坛新人，为人正直，敢谏直言，却因所纳之妾“为浙江江山九姓船娘”，被政敌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最后革职罢官，丧失大好前程。故事不算新奇，作品则写得风生水起，读来真的是令人感慨惆怅。

值得一提的是，集子里那些与老北京故事并不直接关系的历史散文，也写得十分精彩，有些堪称当代散文的上品，如《钟鼓楼遐思——明代的军户》。作品详实考证明代卫所军事制度和军户制度，看似摆客观史料，不动声色，其实骨子里透着一股对古代守卫军人和军人家属的深深同情和由衷敬仰，是一篇很有情怀的美文。《叹息张瑞图》也是动用了作家爬梳史料的特殊本事，写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的宦海沉浮，层层揭开传

主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为我们认识张瑞图的书法与人生的关系，理出了很有启发价值的思路。《苏东坡祠》更是与当代思想有机互动的散文佳作，写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点题则在“人民性”，赞美苏东坡的人民情怀。苏东坡贬谪广东惠州，正是他与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他作品的“人民性”在这个时候最为突出鲜明。现在人受林语堂影响过深，只重苏东坡的文人个性，而避谈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朱小平则写出一个老百姓心中的苏东坡。可见朱文之思想含量，格局境界。

三

与其说朱小平写老北京，不如说是写老北京人。北京的文史是北京人创造的，写好北京人，才能复活老北京，风物才有精气神。小说写人物，史料服从虚构。散文写人物，史料为了真实。某种意义上说，散文人物难写，历史人物在散文中更难写。而朱小平笔下的人物，都可以说几乎都是老北京的历史人物，都必须恪守真实的原则去写。

读书人读历史读的就是人。其实，在朱小平那里，写老北京人物并不那么难，很多时候可能还是一件很有心得很享受的事情。观朱小平爬梳人物，特点有三。一是将风物与人物融在一起写。写风物见人物，写人物托风物。如《无双毕竟是家山》里的《毛泽东与北京烟袋斜街》《张自忠之死与张自忠路缘起》《从赵家楼说到曹汝霖》《杨曼青与北京炒肝》《林白水与生春红砚》《京华奇人郭风惠》等篇。二是以随笔手法，简洁勾勒，看似平淡，其实用心传神，几句话就写出人物的精气神。如《京城百艺》其实就是一部北京人物志，从近现代到现代，甚至还把笔端伸到了当代，写出京城各行各业的人物百态。如唐英、于谦、曹雪芹、纪晓岚、张恨水、金寄水、汤显

祖、李万春、梅兰芳、冯志孝、康有为、苏曼殊、沈醉、溥仪、张学良。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三是虽为小文，却都有大量传记史料考证支撑。冰山自在胸中，方有一角露头。无论写历史人物，还是写文化人，均含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像蜀锦一样绚烂》则在朱小平的人物画廊里又增添几个新的历史人物，写法也显新意。作家保持了以往写人物的力道，更多采用近似报告文学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在人物血肉以及性格展现上下了大力气。如果知道朱小平是写过《张大千》《鬼才范曾》等人物传记的行家里手，就不难看出，作家思想艺术的不断探索追求已站到时代的高地，审视笔下的历史人物。《啊，“致远”——邓世昌其人及沉舰之因》中邓世昌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成功。这个个性有些孤傲的民族英雄，腹背受敌。前面是强大的日本舰队，背后则是“闽党”的排挤打击。在这样的矛盾关系中，邓世昌不计个人委屈，自觉地选择民族大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腐败的封建时代，他这种思想境界，代表着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让人看到了一个民族希望之光。可以看出，作家读解梳理文史时，融入了当代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意识，真正抓到了邓世昌性格之魂。不仅有血有肉，还达到一定的时代思想精神高度。《永不消失的军魂》中的丁汝昌这个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这个人物身上有许多弱点，甚至也有跟着李鸿章搞腐败的问题，却能在战败后承担，以自杀谢罪，颇有中国军人的血性。《李秉衡其人》中的李秉衡性格则是当今散文极少触及的。一个道德品行如此清流的人，就过不了大时代考验这一关。这个人物耐人咀嚼。《“像蜀锦一样绚烂”——北洋海军陆战队殉国记》中写北洋海军陆战队，没有具体写人，只是写到一个壮烈牺牲的士兵群体，但人的形象历历在目，不能忘怀。写出无人之人，乃大手笔。这部散文集所出现的新人物，推动着朱小平散文思想艺术的更上一层楼。🌐

灵魂超度的时间想象

——谈张况的《史诗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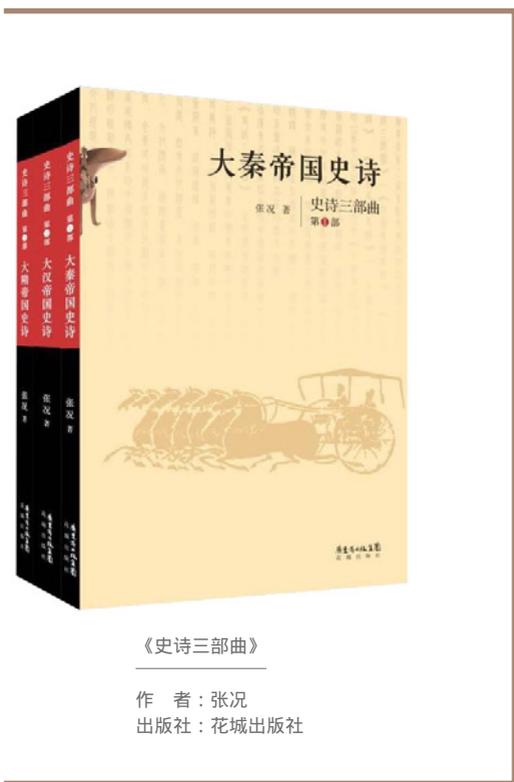
文 郭小东（文科二级教授）

最后的胜利属于死亡，如果这个命题为诗人所接受，同时以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形式与内容，进入他的诗，尤其是以史诗形式的长篇叙事诗，结果将是怎样？

张况的《史诗三部曲》进入我的视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它重新勾起我对某些文学理论问题的再度思索，逼迫我看重并坚定认为的是，只要细细辨认，就不难发现，诗人的史诗意欲，并不仅仅是所谓“中华史诗”的新古典主义营构，也不完全关乎中国古代史上那三个后世人们永远津津乐道，以为荣辱，以为伟大的历史王朝及其王朝旧事。那些所谓“特定意义”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进程，今人对之的借鉴或把握，已然滚瓜烂熟，历史只是在不断地重演中，行走着永难重复的脚步，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而已。考据与想象，使虚构历史成为一种学问。而小说与诗，又使这种学问在文学面前土崩瓦解。问题是，一切历史已死，而使历史真正复活的，是文学，是诗。张况所做的，正是对死亡的复活，对死亡作为最后胜利者的时间形象的复活。

张况既塑造了一个时间形象，同时又将自己闪进这个形象之中，他在密集的诗的语词中，不断地闪进，闪回闪出，他不由自主地

融进时间形象，成为时间形象。他在体验了历史的死亡同时，创造了另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带着强烈的个人性和当代性，不是简单的新古典主义便可囊括，这也许正是张况把三部曲命名为史



诗的缘故。

也许还没有哪一位当代诗人把自己的作品以“史诗”命名，没有并非不可，足见张况对于诗的文学自信及对历史的文化自足。这是他在“三部曲”中能气贯如虹，汪洋恣肆，挥斥方遒的缘故。这是值得称道的。写三个王霸时期的三种霸王人物，诗人没有心存霸气，没有心存高远，如何成行？

史诗的定义，在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中，史诗被作为一种“崇高体裁”，相对应于小说的“低级体裁”。亦即整个正统文学，全部建立在遥远形象的区域之内，与尚未完结的现时不可能有任何的联系。当今现实本身，即保持着真实的当今面貌的现实，不可能成为崇高体裁的描绘对象，当今的现实与史诗的过去比较，属于低级的现实。史诗描写的对象，是一个民族的庄严的过去，也即“绝对的过去”。史诗的世界远离当代，远离歌手的时代，其间横亘着绝对的“史诗距离”。这种过去式的文学或诗歌言说，既考验诗人的文学膂力，又对作品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当史诗作为体裁之时，同时也就成为一种崇高的定义标准。它无法自命，只能被评说，被厘定。所以，我说张况这种文学自信和文化自足乃至诗人的自持，已然被置于一种崇高的围堵之中。这也是中外古今，史诗创作凤毛麟角的原因。它在歌功颂德的歌谣中成长为叙事，又在长期的流传中不断丰满再生它的德行。诚如13世纪但丁的《神曲》，那个处于神经亢奋中的意大利人，他之所以成为“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语），《神曲》之所以成为史诗，是他想象中的经历，隐喻了人类迷惘和苦难的终极命题，以及全诗结构的神秘主义，以此奠定了时代的里程碑。张况亦是如此。我同意叶延滨在序里所说：“这是值得举手致敬的中华文明的纪念碑式的作品！”

值得研究的是，但丁《神曲》的深邃之处，是他对时间的理解，在中世纪，人类对于时间理论，几乎一无所知，而在但丁的想象中，生命已经被分成三界，《地狱》《炼狱》《天堂》。这是时间作为生命的三个阶段、三种形式以及无方向的维度，同时也就同获三种以上的内容。具有灵魂及灵魂超度的意义，它写的是来世，形象及形象追寻的却是往生。

通常的诗评，看不到或没有发现但丁的时间观，他诗歌中的时间形象，对之的借鉴或论述就忽略了对时间及时间形象的讨论与研究，而面对张况的《史诗三部曲》，我看重的，便是张况在诗歌创作中对于时间的重视，或叫作对时间的发现，他在长诗中努力寻找的是，失去的时间，只有时间的寻找，方能找到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隋帝国残阳如血的史诗内涵。张况作为当代诗人，他须完成他的先人们没有完成的时间责任。

这里，回顾一下中国文学史是必要的，否则无法充分肯定张况的诗歌创作实践的里程碑意义。中国的长篇叙事诗史并不辉煌，最早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以今日论，它们都算短诗。除去蒙古族、藏族的几首民间流传的英雄史诗外，当代文学中作家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为数不多，略计如下：

郭小川的“爱情三部曲”——《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严厉的爱》，《将军三部曲》《团泊洼的秋天》；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生活的歌》《杨高传》等；田间的《赶车传》；阮章竞的《漳河水》《金色的海螺》《白云鄂博交响诗》闻捷的《复仇的火焰》；刘仲历的《在河之洲》与张永权的《老乡何其芳》，分别为七万行；还有“文革”中张永枚的《西沙之战》……

这种不完全的统计，已见所谓史诗性诗歌的创作何其艰难。如果说上述作品对于时间有所思虑的话，时间并不是作为意识到的形象，而仅仅

是一种背景，某种特定政治意义的时代表述，也即“新中国”的时间定格。

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上，来看张况的诗，对之的理论抽离就清晰得多。在通常的意义上，文学的艺术就是时间的艺术。时间是给人神秘感最大的来源之一。诗人，作家，尤其是哲学家，都让时间迷惑，如果没有设置起点与终点，时间将无从把握，也不复存在，故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把时间定义为“绵延”。张况的诗正是准确地把握了这个字眼，将之化为一种态度，所以时间及时间形象，就成了《史诗三部曲》的灵魂及灵魂创作，他把时间既作为叙事与描写的手段，又将之作为歌吟的对象，结果是写出一部关于时间，也即关于王朝与人的生命历程的叙事诗。他叙述了时间，并由时间诱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话语。

话语是一种关于价值的言说，是在时间的过滤中，沉淀坚定下来的认知。事关立场与态度。而时间，作为单词，它所构成的虚线，就是史诗的结构。

《大秦帝国史诗》开篇：“时间龟裂的卜文 / 显示权势的动因”“时间幽蓝幽蓝的湖岸 / 一颗身世另类的小野种”“时间内部庞大的阵容 / 疯狂地吞噬着倒叙后的朝阳与落日”“时间一分心 / 历史就走神”“时间的疤痕上 / 鬼魅以刀光剑影潜行”“时间反方向调节的激烈角逐 /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命厮杀”……这些诗句散落在长诗的各个部分，在铺陈的同时，实现着对时间本身的诗意建筑，在予时间以形体描绘之时，一个以时间为主体的语境逐步产生。一种向死而生的残酷气氛，弥漫着诗歌的存在环境。人物由时间产生，又为时间所熏染并凸现性格部分。时间的抽象性和叵测性，所产生的神秘感与恐惧感，顿生紧张与危机的情节，使叙事自觉沉没于吊诡的预设之中，这是大秦帝国的暴虐性质决定的。这种诗意的陈述，使漫长的历史时间集拢而成一些触目惊

心的时刻。

“乌鸦混淆视听的谰言 / 击穿时间迟钝的真相”“时间瘦弱的一星亮点 / 照耀一句打蜡的谎言”“一圈老迈的涟漪 / 正冲破时间的笼络”“时间悲悲戚戚的难言之隐 / 被一阵压抑的冷风吹散”“时间荒谬的黑手 / 扯断历史的脐带”“倘若时间再倒流那么几十年 / 肯定有不少人会错误地认为”“一种空前大胆的想法，划过时间走红的脑海”“张开透明的馨香 / 稀释时间的醉意”……时间不再是一种岁月的度量，成为歌吟的对象，它在诗人的雕刻刀下，被随意地、激情地把玩把握，无以遁形，将抽象的时间概念，变身于各种形体，形状与情状之中，它自己开口，叙述沧桑。它有时是春花秋月，有时是万丈阳光，它是一年四季，又异形于气节气流之外。“时间的视线沉默而冷傲 / 它无法看穿财富的面目”“时间自恋的足音 / 很近，也很遥远”“时间张开嘴巴 / 伤口有话要说”“一首纠缠着人性悲歌的沧桑曲 / 重重陷入时间深不可测的泥淖 / 浇灭时间虚张的大火 / 将一截格式化的遗产 / 交给一碰即碎的残暴”“被夕阳烧焦的黑幕里 / 露出时间苍白的裸体”“时间混浊的老泪 / 熄灭最后的残灯”“骨折的时间之手 / 搅拌着荒诞的唾沫。”“时间的水袖轻轻一甩 / 一道气势如虹的圣旨 / 便夹杂着变态的闪电”……

时间作为想象的对象，在不断的描写隐喻之中，丰满而为内心象征，不断被赋予外在的经验，赋予人的性格和形象。张况在充分铺排内心的象征的同时，把属于内心和外界的两种经验，用时间搭通了桥梁。使静止的时间在诗的进程中流动起来：“积雨云拿起大手笔 / 替狂风摘除了性别 / 它要将时间的缩影 / 植入大地的“心脏里”“为一份憧憬圆满的情绪答案 / 极力表达长时间的忿忿不平”“时间的假发落草为寇 / 路边的墓碑拔腿就逃”“时间灵异的河流 / 一路上汪洋恣肆”“血色苍茫 / 时间只是一个悲伤的

看客”。

时间本身具有思维的功能，它和诗人一起面对另一个时间，对天地间的一切，包括生灵发出叩问。时间瞬间被泛化了。它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既代表诗人又与诗人对话，这就形成了长诗持续不断的节奏，它是保持诗人乐此不疲的动力。时间，此刻已成了人类并不存在的永动机，它在自行拧紧发条的基础上，不断地松紧着诗歌的节律，诗人所有的思索，语词的流淌，结构的建设，都因此而保持着一种弓满的状态，这种激越的情绪，并未因诗行的长短，写作的停顿而有所松弛，这种紧致的张开的状态，使诗句与诗行趋向于饱满丰富。一泻千里的情绪所形成的格局，仍然是酣畅晓畅的。

在《大汉帝国史诗》中，这种酣畅晓畅表达得更为淋漓，我以为诗人在创作第二部时，一切青涩已近成熟，那是诗歌的金秋时节。时间在他心中，诗中表现得更为从容，显示着一种气质与风度：“时间不幸以最为决绝的瞳孔 / 瞥见了令人痛惜的一场别离 / 时间之手随即凄然地关闭了 / 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个场面”“时间并不想念自己脸上滑落的泪水 / 因为那里面藏着太多的惶惑和困顿”“被时间过滤后的一场瑞雪 / 轻轻掩埋人们内心的荒凉”“像时间朴素的韵脚 / 在风雨中规行步履”“而拒绝伪证的生活 / 接受了时间的抚摸”“一个盛世片断 / 挣脱时间的束缚”“在时间燃烧的骨节上 / 化作闻风丧胆的烟灰。”

从诗的歌吟到描述到叙事到哲思，诗人对时间的认识和理喻，越加驾轻就熟。他眼中的时间，已经渐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也即具有了空间的想象。这种想象的让渡，于张况的创作，是一个质的飞跃。他甚至已经到了写作无意识的境界，那种满满的自觉已无须刻意强调，也无须用心防范。时间仿佛已成一种心灵的迹象，随水而逝的河中浪涌，随时来去，关于时间的语词，也越加

密集。每三五页就会有时间意象出现，这种意象的密集，强调并丰足了诗歌的时间生态。这是一条漫长的时间之河，时间之旅。它不失气质气度地在诗歌中行走，既表现着自己，又言说着他者。它成了长诗的魂灵，由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也不是一个规划中的指涉，它的变化万千所承担的意象群、意义群，使这部长诗的史诗品格有了不同凡响的吟唱。

我搜遍了三部长诗中关于时间凸现的诗句，不下二百多条。由它们结构形成的诗句，是为长诗中最为精彩的，它们像极了奔马的奋蹄，声声碎落在遥渺的行脚，最终集结为时间的投名状，记录并长成为全诗的承担。

时间在诗行中行走，立体而为一种思维中的时间，一种想象中的时间，这就是张况诗歌创作中的现代性追寻。它勾连起那种叫诗性与神性的东西。他把不可逆的时间，向各个方向绵延、伸长，把时间形象立体地站立在纸上，这就是张况的史诗三部曲。对之作文学史判定与分析，将是期待中的事。

这样的诗作终于出现在广东诗人笔下，成为广东诗坛一直在期待又久久未能出现的文学风景，以往关于广东是诗歌大省的自诩与期盼，至此可以画一个暂时的休止符。小女人散文做足了南方都市奢侈的市井情态，而坚持不懈的现代诗及种种充满小资情怀的后现代诗歌，也已然泛滥到只有存量的骄傲。在一个陷落于迷惘与难堪生存的时代中，诗歌理应对历史与现实的文明状况，对民族的文化传统，对历史的重大回眸，有一种理性同时激越的叩问与追寻。从高渐离与燕太子丹开始的年代到独夫的倒地，中国走过了三千年，而广东始终是其中一个并不沉默与宁静的符号。张况的诗，对此张开的视野与胸襟，将之作全新的收拾，为宏大的叙事辟出了一处空间。这是百年间南方文学一度丢失之后的重拾。🌐

印说岭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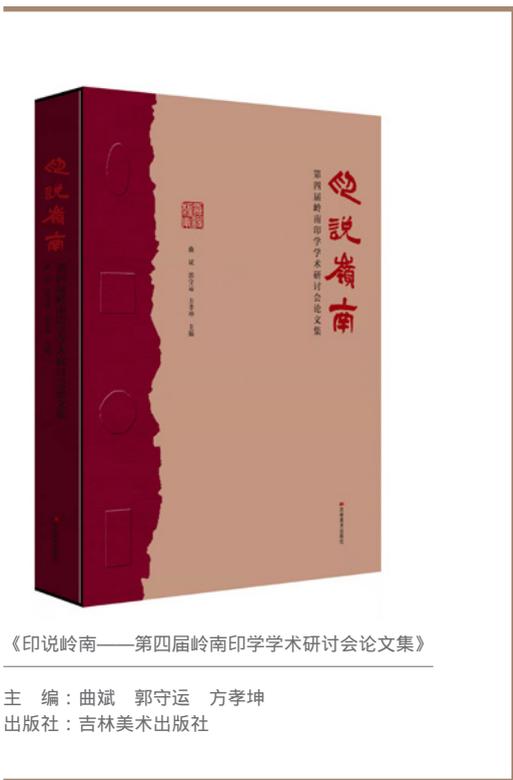
文 黎向群（广东文艺职业学院书法史副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明代以前，岭南因偏于一隅，岭南印人少与中原及江浙一带的文人雅士交流，虽在发展中吸收了中原、江左文化，却在更大程度上保守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一文中云：“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古风耳。”

明代时期，岭南地区对外贸易日益繁荣，经济十分活跃，文化艺术得以发展，尤为关键的是粤人进京为官或讲学游历，加速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江左文化的融合，文人篆刻风气在岭南印坛得到发展，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出现了黎民表、张萱、邓云霄、伍瑞隆、陈子升、陈恭尹、张穆等岭南篆刻名家。他们继承秦汉印之正大精神，以六书为准则，以学识性情为涵养，表现文人自身的审美情趣。

清代初期，岭南印人多取法秦汉、元人，同时大胆地吸取金文、秦诏版、汉碑额及汉瓦当等文字的意趣入印，开启了印外求印的源头，逐渐形成古雅淳朴的岭南印风及印派。谢景卿、黎简、谢兰生、尹右、冯敏昌、张锦芳、吴荣光等是这时期的杰出代表。乾嘉时期以后，徐三庚、陈鸿寿、常云生、余曼庵、符翕等外籍印人入粤鬻艺授徒，岭南印人受到江浙等地域印风的影响，丰富了岭南篆刻风格。如柯有榛、张嘉谟、张崇光、黄云纪、胡曦、金德枢等人。这些印人虽师法浙派，但沾染了凌厉险仄的习气，炫技弊端日益严重。

陈澧作为岭南印学思想的继承者，他看到了当时的流弊，撰写《摹印述》，正本清源，使得古雅淳朴的印风在岭南印坛发扬下去。光绪时期，黄士陵来粤授徒，他带来的黟山印风契合了岭南印坛自明



《印说岭南——第四届岭南印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曲斌 郭守运 方孝坤
出版社：吉林美术出版社

代以来崇尚古雅淳朴的印学审美观，故得以风靡岭南，最后形成“黟山派”。

民国初期，易孺、李尹桑、邓尔雅、简经纶在国内印坛名声显著，他们积极创立印社，广结印人，切磋印艺，研究印学，促进了岭南篆刻艺术流派的发展。1918年，易孺与“粤派”印人在广州组织成立的“濠上印学社”，是岭南最早的印社之一。1935年，黄文宽、陈大年、莫铁、何绍甲、李泽甫等十余人在广州创立的“天南金石社”，是岭南地区早期印社团体之一。这个时期，印人辈出、印社林立，印学研究和篆刻成果斐然，是岭南篆刻发展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综观岭南印坛三百多年的发展概貌，早在明代文人刊印之风气在江浙一带兴起之时，岭南篆刻已处于萌芽期。明清两代虽不如篆刻之乡的皖浙那样烜赫一时，影响全国，但也有自己的创造和特色。

在印学研究上，无论在印学、篆刻发展史、印人、古文字学研究诸方面，还是在创作上都有突破性的成果。

清代有谢景卿补订袁日省《选集汉印分韵》和自编《续汉印分韵》两著，流传至今，已成为印学典籍；陈澧《摹印述》一卷，指出了篆刻艺术审美取向，提倡汉印以“古茂浑雄”、小篆以“雅正为尚”法则。近代有蔡守、谈月色夫妇，蔡守撰有《印林闲话》考辨古玺印的源流演变，对印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谈月色著有《茶四妙亭印草》，还协助夫君编辑《画玺录》《缪篆分韵》《印雅》等著。容庚、容肇祖注重乡邦文献整理和印学研究工作，编撰《东莞印人传》一书，收录明至近代东莞印人十九人，小传下附以原名钤印。容庚还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秦汉金文录》等古文字专著。冼玉清《广东印谱考》一书，是一部对粤东地区印谱进行全面整理考证的书籍。马国权《广东印人传》一书，自述：“从一九六三年春起，我利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余闲，

开始搜集广东印学方面的资料。一方面搜辑广东历年出土的古印，从两汉到南明，编成《广东古印集》。另一方面，就是编集明清以至近代印人的史事、刻印。”《近代印人传》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体例与《广东印人传》大致相同，增加了印人的照片，范围和影响扩大至全国。

2010年，我在研究岭南书法篆刻史的过程中发现，广东只有篆法、摹印、印人传记和古文字的专著，尚有书法美术史章节，但却没有一部完整篆刻发展史专著，便发心在《岭南历代书法名家》的基础上，开始蒐集历代印人生平履迹、印人群体、印章、印社、印谱、印论、印学著作等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于是，2013年出版了《岭南篆刻》一书。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先生认为，此著是岭南第一部岭南篆刻发展史，并亲自用缪篆题写书签。

在创办印社方面，广东继承民国创社的传统，广泛团结印人，将岭南印学发扬光大。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各地纷纷成立印社。岭南印社创立于1992年，以曲斌社长为首的印社团队，坚持以“理论与创作并进”为艺术宗旨，广纳省内外专家学者，共襄发展大业。近三十年，开展了印说岭南、岭南艺术大讲堂、岭南学堂、岭南说印等品牌系列活动，其中印说岭南最具兼容并蓄的地方特色，引起全国印坛的关注。从2015年到今年，岭南印学学术研讨会连续举办了四届，收到全国各省市（含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等稿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关注岭南篆刻、印人、印作、印谱到岭南印派研究，从岭南地域印研究到战国古玺、秦汉印、明清篆刻流派、红色印信等方面的研究，还兼顾文字学、字法的使用等方面的选题。从四届的论文选题来看，岭南印学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希冀岭南印社以弘扬岭南印学为己任，继续前行，为岭南印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比较文学变异学视域下的 《雷克斯罗斯诗歌与〈道德经〉》

魏君珊（北京外国语大学）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与 道德经 》

作者：吴晓梅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是活跃于美国诗坛的当代著名诗人，尤其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他名声显赫，被《时代周刊》誉为“垮掉一代之父”。提及雷克斯罗斯与中国的缘分，不得不谈他以中文名字“王红公”发表了多部作品，他的译作颇受中国学者与读者欢迎，如《中国诗一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56）和《李清照诗词全集》（*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 1979）。雷克斯罗斯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曾引导一代美国文学青年对中国诗歌的研究与译介，美国诗人杰里·斯隆就是其中之一，斯隆在谈到其与中国诗词、文化相关的诗歌创作时，直言是受到了雷克斯罗斯诗歌的牵线指引。由此可见，雷氏对于中美诗词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中美学术界亦对雷克斯罗斯作品中的中国元素与跨文化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雷氏最为感兴趣的中国古典文化繁盛的唐宋时期正是道家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然则对于道家思想及《道德经》在雷氏诗歌吸收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现象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而这正是解读雷氏诗歌文化内涵的关键所在。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晓梅新著《从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与〈道德经〉》正好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本文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域下研究道家概念在文本旅行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在中美文化相互交融与相互影响的基础上，试图为弘扬中国文化提供

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可谓是一门影响广泛的“显学”，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仍在持续，作为其分支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爱德华·萨义德在1983年便观察到概念从一种文化移入到另一种文化时会产生变化，他指出学者要留意概念在移植过程中的变化，呼吁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变化进行研究与解释。此外，萨义德还进一步强调应对异质文化中产生的概念与源文化的概念进行比较，从而便于考察这种文化概念的变异过程。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指出比较文学变异学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在交流中出现的变异现象与通过研究不存在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在同一个文学范畴之内存在的抑制性因素，来探究文学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这种研究的具体对象之一是现实文学交流中存在的变异，即影响关系变异学研究，这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重要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不仅仅关注共通性、同源性，更关注变异性与异质性。在西方学术界，学者重点关注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同源性”与“共通性”，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找出不同文本之间的类同性与其渊源的同一性。但是，在理论实践中，西方学者较为认同的理论模式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实际上不同国家、文明与文化在交流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变异性的，这是基本的事实。研究文

学、文化与文明的变异性的文化传播、文学交流与文明交融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因此，比较文学变异学实际上是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更有效地展开不同文学之间的交流，揭示人类的文学规律。

《从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道德经〉》的研究视角新颖，一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传统研究视角，首次采用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视角，专注于影响关系变异学，以中美两国文学交流中的影响、模仿、借鉴、与接受所产生的差异为研究对象。该书全方位考察雷氏诗歌对《道德经》接受与吸收过程中产生的变异，指出《道德经》的具体概念经过文本移植以后发生的变异在雷氏诗歌中表现出美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双重特征，凸显了不同国家文化基因的差异性碰撞，揭示变异后道家概念在雷氏诗歌中的意义，展现了中国文化以雷氏诗歌为载体的美国文化产生的具体影响，进一步拓宽了雷克思罗斯研究的视野。

以往学者主要将研究聚焦于雷克思罗斯的《心的花园，花园的心》《空镜子》《阴与阳》这三首诗歌，而吴晓梅在前人研究的文本基础上，将文本研究范围拓宽至诗集《在何时刻》《凤与龟》《在荒凉之湖》《日晷铭词》《攀登迈尔斯通山脉》，极大地丰富了雷氏诗歌的研究范围，同时使其比较文学变异学这一理论视角更富说服力。在内容安排上，学界对于雷氏诗歌中体现的

“阴与阳”“上善若水”“复归于朴”等道家思想的研究篇幅较短，而吴晓梅在著作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更为详细，且蕴含了更为深入的道家哲学思想。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郑燕虹指出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阴与阳”哲学思想指代的是两个对立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吴晓梅在接受这一哲学关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阴阳两极互动将带来融合并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力量，呈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相互影响的特点，同时还首次提出女性创造世界的观点，即女性孕育生命体、创造万物，这一过程与“道”是一切的根源的概念具有一致性，该主张可见于书中“阴柔”章节。曾任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钟玲曾用雷氏诗中的自然意象石头指出返璞归真的主题，但吴晓梅进一步从社会伦理层面剖析雷氏诗歌中“朴”的意义，指出该“朴”是老子思想中的“见素抱朴”，表达了诗人主张建构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人民应纯真质朴，社会应摒弃自私自利的观念。并且，吴晓梅对“朴”的认知没有停留在自然层面上，她抓住道家思想的本质，即对人性的关怀与对人类价值的探求，从社会层面剖析诗人的态度，指出诗人痛斥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作用与痛恨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表达了诗人普济天下的情怀，并指出这是雷氏诗歌极具生命力的原因。针对“上善若水”的概念，钟玲做了初步的解释，指出水作为沉思生命哲学的意象，其运动原理类似于阴阳两极的运行。吴

晓梅则指出，雷克思罗斯认识到水具有包容性、与世无争、保持至清的特点，水的灵活性使得水形态百变，适应各种形势。雷氏这一认识与道家思想中的顺其自然相互照应，即万事万物应该顺应自身的规律与趋势去运行。与前人相比，吴晓梅这一发现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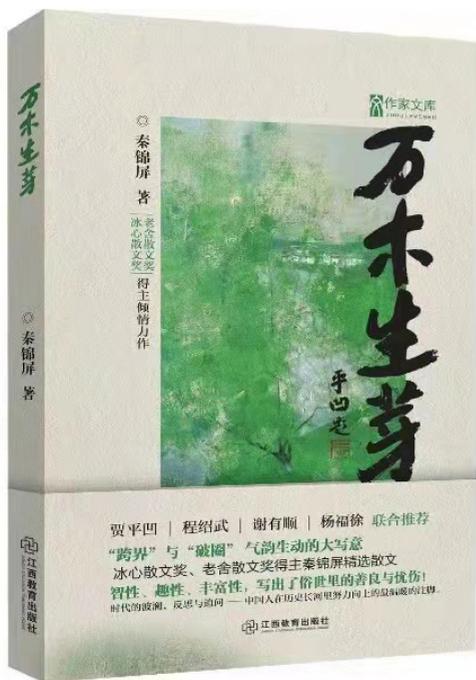
吴晓梅还首次指出雷克思罗斯在其诗中表达了老子“天人相合”的道家思想。这一哲学思想表达了诗人独特的生态美学观点，即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各自独立的生态环境；此外，生命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应被打破，倡导自我与他者求同存异、互为一体的生态哲学观点。这一观点意义重大，它不仅表达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追寻的万物共存的美好思想，而且在审美层面上还揭示了诗歌的社会责任，使诗歌的存在多一分现实意义。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道德经〉》是在全面梳理雷氏诗歌的基础上，对雷氏诗歌与中国古典文化关系的深度审视，也是对雷氏诗歌及其研究在中国的推介。其所研究的是融合了中美文化双重特征变异的道家思想的雷氏诗歌，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与影响在雷氏诗作中呈现的含义，这必将掀起国内学界的研究浪潮。同时该书也对学界研究道家思想与《道德经》的海外接受与变异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参考，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东西方文明交融提供平台，为弘扬中国古典文化、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贡献。🌐

质朴而鲜活的乡村水彩画

——评秦锦屏散文集《万木生芽》

✎ 安装智（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万木生芽》

作者：秦锦屏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认识秦锦屏有 20 年了，当时我在深圳一家纸媒当文学副刊编辑。那时，秦锦屏送给我她的一本诗集《落在睫毛上的雪》，书里面夹着几枚棕黄色、红紫色的枫叶与花朵，可见她的浪漫。最近，秦锦屏的散文集《万木生芽》出版了。我细读后，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从作品的艺术风格与定位看，此书中部分散文作品有着浓郁的西北农村的民俗风情和生活气息。秦锦屏是北方人，却长于南方，因而，南北两种文化在她身上得到了融合与统一，她身上有北方人的豪爽与南方人的细腻。虽然长居于国际大都市深圳，但秦锦屏的文学笔触却伸向了遥远而广阔的大西北，她的生花妙笔大多描写的是大西北农村的生活，所以说，秦锦屏是一位“都市里的乡村文学家”。

秦锦屏说：“在南方游历的时候，我想念厚重质朴的北方，到了北方我又惦念花草灵动的南方。原以为我的笔触最贴近北方，却发现南方的水意早已渗透了我的笔肠。原以为我的笔墨早已融化在南方，却发现，在千红万绿中，我的笔下仍鼓胀着浩浩的高原大风。”因此她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十分浓郁的地方色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新乡土文学”。这源于她有过一段农村生活经验，对西北农村保有着深厚的感情，心中结着浓郁的乡恋情结。她把西北乡土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写进文章，字里行间

充满了泥土的芳香，就像一幅质朴却鲜活的乡村水彩画。

《万木生芽》是以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了作者记忆中的西北家乡，写出了水灵灵的深圳。在她的笔下，农村古朴的生活、善良朴实的人、都市景象，联袂成一幅幅色彩浓郁的民俗风情画。秦锦屏写出了西北乡下人的生存方式、情感历程、人生足迹与历史命运，在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乡土民俗风情的乡土文学代表作，北有萧红的《呼兰河传》，南有沈从文的《边城》。想当年，萧红是居住在20世纪40年代动乱的香港而回忆叙写自己故乡东北黑土地的乡村生活，这种侨寓文学的独特表达是鲁迅先生曾评价并认可的。茅盾也曾评价萧红文学作品“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在描写乡土民俗风情这一点上，我认为，秦锦屏的黄土地叙事与萧红笔下的东北黑土地呼兰河、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农村，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从作品选材与主题看，秦锦屏的散文选取她周围真实发生的人与故事，是一种“非虚构”的叙事散文与抒情散文的结合，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生命正能量。无论是写家乡宝鸡端阳节麦收，还是写深圳没有落叶的金秋；无论是写春天大西北静静盛开的槐花，还是写黔东南作家采风的篝火晚会；无论是写小时候乘坐绿皮车的有趣往事，还是写成年后到延安支教的特殊岁

月；无论是写九江优秀环卫工人尹之浦，还是写汶川地震后在映秀镇卖羌绣的15岁小姑娘；无论是写“很凶很酸”的邓四川老师，还是写湖南好人何兴荣；无论是写爱读书看报、好管闲事、因助人为乐而挨打的“倔老头”父亲，还是写一生和善、却也有急躁脾气的奶奶“我婆”，或是写死去复来的可爱亲姥姥，秦锦屏都写出了一种自然的美、社会的美，更写出了一种人性深处的美丽。她笔下的人物，尽管地域不同，职业习惯各不相同，为人处世各有性格特征，却都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芒。而且，她可以将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都写进她的散文作品，化作锦绣文字。从这个意义说，秦锦屏驾驭文学写作的的能力很强。她已经形成自己独到的文学观，那就是把人间最美好的故事与记忆以一种“非虚构”的叙事手法写进文学，着力写好生活的五彩斑斓。她的作品风格质朴，明朗流畅，格调高雅，总能读到人间最温暖的东西。

三是从作品的艺术特点看，秦锦屏的散文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万木生芽》是叙事散文与抒情散文的结合，是对真实素材、真实题材的驾驭。如《山海重》《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是一种真实的“非虚构”的叙事散文。但从文体看，《山海重》《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可以当作小说，作者以一种“非虚构”叙事手法，以一种酷似“小说”的技法写下来，让它具备了作为短篇小说应有的文体特征、美学特征——细节、场面、动作、情节、个性化的人物、个性化的人物

对话、个性化的行文语言等。但从题材来源与内容看，这两篇文章又都是纪实的、真实的，不是虚构的，因而，又不能称之为小说。20世纪90年代曾有过“纪实小说”的文体概念，其实，纪实小说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小说一定是虚构的，既为纪实，就不能虚构。但秦锦屏能把一个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的故事写成一篇篇貌似“小说”的“非虚构”散文，这就是本事。她把真实的原生态的生活故事进行了巧妙的艺术转换，却没有留下一点斧凿的痕迹，在原汁原味讲述真实故事的基础上，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

秦锦屏驾驭文字的能力首先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她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个性化性格特征，进行素描般的白描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山海重》里，作者用一种白描手法，写西北村一个老年妇女“婆”，用一种非常生动鲜活的具有陕西地方特色的原生态的语言塑造了“婆”“五婆”等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农村婆子的形象。“碎娃伙，甬多嘴，出去耍去。你老婆是善人，在行善哩。”这样的语言十分生动。再如描写五婆回家：“五婆这才往外挪了挪身子，伸出细叮叮的腿，用长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细致地裹扎好腿脚，再从炕背墙上，取下她那做工细发、样式俊俏的扎花小鞋，在炕边磕两下，慢慢穿上，勾好。高高兴兴地，爬上大儿子宽展的后背，回家去了。”描写“我婆”的性格与动作：“我婆一生和善，没和旁人红过脸。那天，

她疯了一样闯进五婆家，一拐棍戳开五婆虚掩的门，冲着在炕上逗孙子玩耍的五婆质问：‘他五娘，我来问你啊，你咋给人当老的？我儿给你管吃管喝，给你掏钱看病，替你出主意、想方子，你咋害我儿呢！你看你，你现在和你儿，你们一家人过好光景呢，你把我一家人的光景戳烂包了！你，你……’”

从叙述手法与叙述风格看，她的许多文章全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或是“以彼物比此物”或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诗经》最古老的“赋”“比”“兴”的手法。秦锦屏把“赋”“比”“兴”的手法运用于散文创作。所以，我们看到，秦锦屏的散文基本就是以叙述、比喻和少量的起兴作为最基本的艺术手法。她不玩那些前卫的、先锋的、荒诞的、抽象主义的、感觉派的、象征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她就老实地走好自己传统现实主义的道路。这与她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知识结构、人生观、审美观有关。这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秦锦屏走得很成功，很个性化，是值得肯定的。

秦锦屏“文如其人”，她在生活中是一个浑身充满正能量、追求真善美的人，其散文便充溢着一股不可抑止的向上的力量，富有很强的感染力，十分耐读。她说：“无论南北，无论古今，无论中外，灵魂皈依的地方，才是此心妥的地方。”是啊，“吾心归处即故乡”。让我们都回归心灵的故乡，找回我们精神的原乡。🌐

杨清茨：自然天成 内美静悟

文 周由强（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书画家是杨清茨又一身份，这一身份和诗人身份一样为她所看重。这缘于她骨子里的文化情结。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书画是熏陶出来的，中国画说到底不是纯技术层面的手艺活，眼界决定出手高低。杨清茨出身世家，在诗书画印、古董清玩的环境中长大，对传统艺术的理解是潜移默化的。她自幼痴迷书画艺术，数十年如一日临习历代碑帖和绘画作品。这是自然而然的学习过程，不刻意、不矫揉，一切都是自己生命的外化，诗意栖居的笔墨体验。十年磨一剑，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清茨的书画作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有个人风格。她的绘画作品，尤其花鸟画用笔从容，构图舒朗，呈现出清雅气象。

品读杨清茨的大写意花鸟画，有“诗情画意出灵气，开心寻美种砚田”的感觉，正应验了功夫在诗外，功夫也在画外。大写意花鸟画尤其注重画面中的生活趣味，这一点在杨清茨的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她继承了齐白石“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一优良艺术传统，其花鸟造型生动，笔墨挥洒之处，以拙见真，写其生意。笔下生灵个性殊异，妙趣无穷，既饱含着她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又展现了她将万物化为心象寄托情思的诗人志趣。杨清茨在绘画上追求简约大气，但仍十分注重对笔意墨韵的抒发和细节刻画，往往是在阔笔涂抹之间，辅以点擦结合，顿挫波折，跌宕起伏。她将笔痕墨迹的轻重和走势附着于物象的形体结构，既把复杂的实际景象化繁为简，又牢牢地把持住了花鸟画内在的气韵与活力，饶有趣味。正如清代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所言：“写花草不徒写其娇艳，要写其气骨……炼笔毋失花情，写生善用墨气，如是乃写花卉上乘之法。”古雅艳丽是杨清茨在色彩上努力求索的方向，画中多用原色形成视觉上的冲击，浓烈而不失沉稳，色墨并用，相得益彰。杨清茨在画面布局上做到了清爽明快，纵深与延展之间层次分明。这让观赏者既感受到了生命的灵动与飞扬，从而领悟到了万物的和谐与相生。清代书画家傅山曾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四



杨清茨, 诗人、作家、书画家、主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艺术家》杂志编委会执行主任,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紫砂艺术专委会主席、书画专委会副主席, 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及非洲多国文化大使等。

诗作、散文见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诗刊》等近百家报刊, 并入选《中国当代文学选本》《儿童文学》《汉诗英译》《中国2019年诗歌作品榜》《中国2020年诗歌作品榜》《初心、红旗与新征程》《世界抗疫诗精选》《世界华语乡愁诗精选》(中英双语版, 芝加哥学术出版社出版) 等国内外多个文学选本。

主创的大型音乐诗剧《血沃中华》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品。获第八届长征文艺奖及文学领域多项奖项, 诗歌被收录于央视人文类大型电视纪录片《笔尖上的中国》, 诗歌《心灯》荣登中国教育电视台2018年“诗意中国”春晚压轴节目, 诗歌及散文常被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转载, 多次入选《中国新诗排行榜》等。



⑦ 小写意：满树玲珑光



⑦ 小写意：国色朝酣酒 天香夜沐衣

宁四母”理论极其精辟，对整个艺术领域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书画作品看，杨清茨悟得其中精髓，她在思想理论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厚积薄发；在创作实践上融入书法碑帖的金石味道，浑厚华滋；在图式表现上对物象的造型求生求简，返璞归真。画人物、各种禽鸟，点睛最难。正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观其花鸟画中大公鸡和各种鸟，用笔灵动，设色淡雅，尤其眼神颇能传情，似乎在低语、在倾诉。杨清茨对此颇能驾驭，实在难得。也可以说杨清茨在书画艺术追求上走了正道。

浓浓的诗意是杨清茨书画艺术的闪亮底色。宋代周密的《清平乐·横玉亭秋倚》词曰：“诗情画意，只在阑干外。雨露天低生爽气。一片吴山越水。”杨清茨也有诗句云：“梦里凋零的老丝瓜，刷洗着一池秋水的梦呓。”此也正应了周密的诗情画意说，让人们在意念深处和无限想象中，看到画的美景，得到美的享受，这是诗的功效。而画则是先由视觉观感获得蕴含的意境，再进而激发出诗意的联想，画可以当作诗来品读、吟唱。杨清茨虽多做自由诗，似乎不适合直接题在画上，但她的画能让人读出诗的旋律美、节奏美、意境美，将诗意与画情不留痕迹地结合在作品里，这是杨清茨花鸟画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中国花鸟画发展到今天已经是高度成熟的艺术形式，再有突破十分不易，历朝历代稍有成就的大家，皆发自画家的“心源”，得自画家的文化底蕴和笔墨功夫。李苦禅曾说：“写意画，要做到笔不工而心恭，笔不周而意周。”“写意”是中国画的精神符号，它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既是精神自由的必然表现，也是艺术规律与本质的体现。笔墨是“写意”的灵魂，笔墨需要毕生积淀。就目前而言，杨清茨的画在审美情调、独到眼光等方面已显露端倪。古往今来，在众多的花鸟画画家当中，有的人以题材多变取胜，有的人寄意深邃娱目，有的人刻意变法猎奇，但要表现出作者独有的审美感觉，丰富的理想空间，并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却并非易事。

书画如人。意在笔先，这是中国画最难能可贵之处。杨清茨是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其书画如她的生活状态一样，那荷、那竹、那鸟首先被作者赋予了生命的灵性。从作品看，杨清茨在花鸟画创作中，一方面通过传统题材抒发心中对自然的热爱与内心的情感，另一方面为中国花鸟画的笔墨语言在国际文化交往上探寻更多元化的发展路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书画亦然。无论书法还是绘画，能得清气一二殊为难矣，此既是技法之呈现，亦为人品之自然流露。杨清茨对美的执着追求，借助自小浸淫的古典文化精神内涵和开阔的国际视野，都表明着她的艺术之路未可限量。相信，随着杨清茨艺术眼界日益开阔、文化功力日益深厚、笔墨技法日益精进，其笔下自会开新境、上高格、臻化境，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彩笔追风

——动态人物画家徐治庆画奥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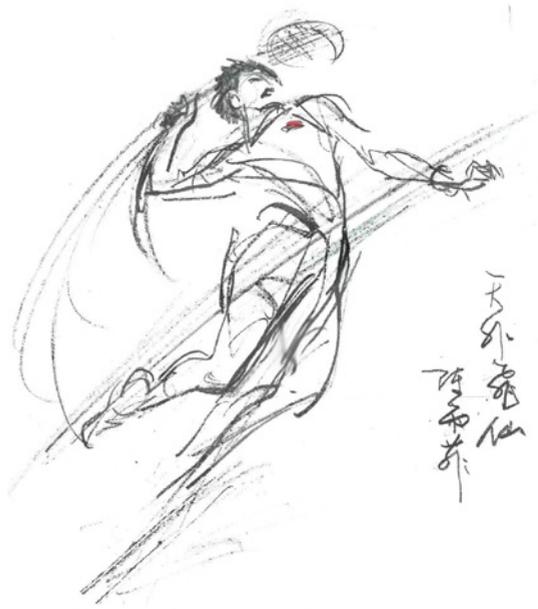
文 丰雪心

圣火点燃，迎来了史上最特殊的一场奥运会。虽然整整推迟了一年，但迟来的东京奥运还是在疫情的阴霾下办了起来。运动员们都铆足了劲，全力以赴，奔向自己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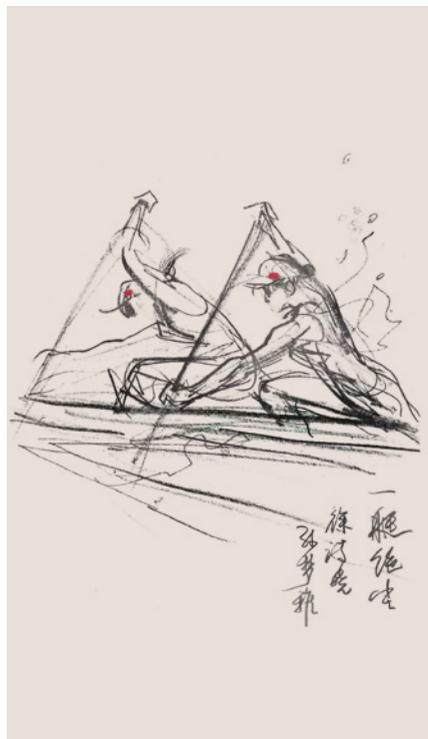
在如火如荼的紧张比赛中，有一位画家在不断地用速写的形式捕捉着运动健儿的英姿。他就是旅美画家徐治庆，广州画院的特聘画家，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新墨西哥州大学研究舞蹈和运动人物绘画，风格独特，被美国艺术界誉为

画家简介

徐治庆，旅美动态人物画家，美术教授，北加州艺术学院院士，中国广州画院特聘画家，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画学会（美）常务理事，为2002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创作并获奥运会艺术成就奖。



② 杨舒予





马龙
邹敬园
钟天使、鲍珊菊
徐诗晓、孙梦雅
全红婵
施廷懋、王涵
管晨辰
孙一文

“动态画家”。2002年，他的一套作品入选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专用，便与奥运结下了缘。他的动态速写被美国奥运会艺术委员会主任琳达评价为抽象美和真实美的完美结合，为此授予他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艺术成就奖。

作为一个动态画家，奥运的精神和动态的美，是画家最希望传递的正能量。运动中的人物最刺激徐治庆的视觉神经，在比赛的电光火石间，他就能观察捕捉从而画出运动员最有力量最具冲击力的感人瞬间，他的画笔就是为他们而精彩。享誉盛名的人物画家杨之

光也曾感叹：徐治庆对体育运动的速写，善用了其精湛的笔法，把运动员稍纵即逝的动态用粗野狂放的线条表现了出来，冲击了我们的心灵和视觉。香港大学教授、艺术评论家周锡评论：徐君下笔精准遒劲，挥洒自如，线条力透纸背，变化多端，缤纷交织，灵气四溢。

东京奥运会中运动员的出彩拼搏，激得他笔性大发，伴着运动场上振奋人心的喝彩声，徐治庆手中的画笔如魔棒一样，线条充满了动感，充满了灵性和生命力。一套近百幅“奥运健儿 中华英杰”的画稿就这样诞生了，这里择选了部分呈现给大家。

射击选手杨倩沉着冷静射下了第一金；巾帼英雄孙一文剑锋挑起金牌；苏炳添与世界飞人并驾齐驱；水中精灵全红婵惊艳奥运。无论是跳水、游泳、赛艇、体操、乒乓球、帆船、田径、还是羽毛球等项目，都尽显中华运动员的百分百拼搏和不放弃的奥运精神。

奥运的盛宴结束了，看着画家笔下运动员的精彩，让人恍惚置身于奥运现场，继续享受着其中的动感、力量与激情，也感受着艺术的流动之美。🌐



© 苏炳添

虎至福臻

——左昌亚生肖作品赏析

文 高达之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

十二生肖文化，一个穿越中华历史的文化符号，诉说着一个民族的图腾情节，演绎着东方大国的生活方式，也寄托着炎黄子孙的精神理想。它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已经渗透到十几亿人生命的信仰与观念之中，它是“龙的传人”的烙印。

画家左昌亚以画生肖动物为专长，在他的笔下，充分表现了生肖动物的纯真、敦厚、善良、活泼等属性，展示了真、善、美的审美价值取向。2022年是虎年，“虎”蕴藏着巨大能量、活力、威严，是正义、勇敢的象征。从左昌亚的生肖画作中，让更多的人了解、感悟生肖文化独特的标识和精神象征，为虎年增添一番喜气。

画家简介

左昌亚（余夫），

曾从事陶瓷造型设计、大型城市雕塑工作多年。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南方书画院副院长。



② 《虎头虎脑不虎心》



① 《不咬人》



② 《驴一鸣虎大惊》



③ 《山中一夜雨》



⑦ 《老虎再小也叫老虎》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畅想

文 钟晓毅



作者简介

钟晓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领域涉及文化产业、岭南文化、海洋文化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及大中华文学理论等研究。出版学术专著《走进这一方风景》《在南方的阅读》《穿过林子便是海》《金庸传奇》等8部，文艺创作《慢慢长大》《红尘有舞》等3部，主编《人文新走向》《敢为天下先》《海洋文化创新三十年》《中华美德书》《霭霭停云》等。

中国现代化的进军，之前是在珠三角这片蓝海上登陆，而中国现代化的纵深发展，也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中威武雄壮地上演。

历史是有延续性的，而现实将会提供更深远的“当代史”。大湾区大融合，必会成为新时代新经典。

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正式印发，标志着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这一片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文化资源最丰厚的区域的大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如何以创新的湾区文化作为引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全面实施、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就成为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湾区版图中璀璨夺目的区域板块，缔造世界级城市文化发展的“湾区典范”的努力所在。

无数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繁盛与否，文化的引领作用无可置疑。因为“文化”通常是指经过学习积累起来的经验。一个地区的文化是指某个特定社会群体行为特征的社会传递模式。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文化是具有相近的遗传特征和演化过程的，有相同的生活模式或者说习俗，还有相同的观念形成体系和语言思维表达方式；一个地区文化特征除其相同的遗传演化特征外，最重要的还有语言、非语言和习俗三个方面的特征。地区文化是一个较大的概念，它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或者说，随着社会的不断现代化，地区文化将会摒弃一些与地区生存和进步不相适应的部分，充实一些以利于发展的文化成分；同时，一个地区的文化也随着群落的迁移和

交往的日益密切，因受其他地区文化侵蚀和交融程度往往就决定了地区文化的纯粹性。然而，地区文化中相对稳定、不易变化的就是语言特征、非语言特征和习俗特征。语言特征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在使用语言时所特有的语言习惯；非语言特征是同一地域的人带有遗传特点的人际沟通信息代码体系；习俗特征是地区文化最富有色彩的部分，其内容非常丰富，通常个人的一些行为一旦变成固定的行为方式后就变成了习惯，而群体性生活文化习惯反映在地区文化上就是地区习俗和风俗。一个地区的习俗主要由食俗、婚俗、葬俗、称谓俗和礼宾俗等方面构成。各个地区间交往当中习俗的改变与影响是比较困难的，通常文化渊源较近傍的地区，习俗较接近，也较易相互融合同化；反之，就会出现相对的习俗文化观。

由此看来，这种对“文化”的理解采用的已不是旧的狭义的定义，即把文化规定为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总和，不仅是学校、博物馆这类设施以及语言、文明行为和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是具有了新的广义的涵容——文化是按一定的意图对自然或自然物进行有序转化的人类全部活动的总和。或者用简洁的话来概括：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实体，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很长时间以来，广东珠三角地区就和港澳两地形成了此种文化的动态融汇。

但不可否认的是，以香港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香港在社会文化上均只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延续，省港澳本是一家，历史上曾有“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一说，三者融合的共同体更直接从中国文化母体孕育衍生。有别于传统文化而存在的“香港文化”“本土意识”与“香港人”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大陆人为逃避战乱而南下香港，这些视香港为短暂寄居地的大陆人，基本都渴望尽快安稳地回归家园。他们身在香港，心

灵却眷顾大陆，文化充满乡愁。情况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才产生变化。

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一波波的风潮：自由平等，女性解放、嬉皮文化、民族意识……此起彼伏，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传统的中国文化道德与域外的西洋道德价值自然相互冲击挑战，加上战后香港经济迅速成长，稳定的社会环境，自由的低税经济政策，大量外资涌入，配合全球经济复苏，一下子天时地利人和促成香港创造了一个经济神话。踏进70年代，香港已从一个小小的渔港转化为世界金融中心，本地社会经济渐趋成熟，本土流行文化兴起，尤其是进入80、90年代，香港文化更是踏进了“现代主义”的阶段。

这种“现代主义”在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自印刷术诞生之后一直处于无可代替经典位置的文字，已经面临危机，一场由影像取代文字的科技革命正在许多人的不知不觉中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文字不再独统天下，影像变为新文字、新语言，是生活必需品；互联网更以君临天下的姿态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去，媒介就是信息，形式就是内容，语言就是现实。

因此当年的香港在这样中西交汇的土壤上，创造了自己很有特色的文化，正如当时的评论家们所说的：香港现今的文化不是高贵典雅的传统文化，而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新文化……除此以外，香港的中文报纸非常多，而且这些报纸有很多专栏，看专栏的人也多，这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台湾和大陆都没有。还有，香港的建筑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而香港的电影，表面看来跟美国好莱坞电影很相似，可是它说的故事以及所表现的味道和美国不一样，它毕竟还是讲中国人的事情……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香港不是文化沙漠。许多香港人认为香港没有什么，其实香港正因为有这些新文化而成为世界关注的

焦点。

而与香港、澳门毗邻的广袤的珠三角区域，到了当代，不仅激发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意气飞扬，更是凝炼提纯为一种鲜明的文化立场，在这里，既有生命跃动的记录，又不乏终极理想的关怀；既有智慧痛苦的折磨，更有智慧结晶的欢悦。这主要落实在对独创性与个性文化的张扬上，内部的改革调整，对外的开放交流，使珠三角成为一方众所瞩目热土。而珠三角人在漫长的艰难生存开拓中所积淀下来在新时期又得到新的升华的精神特质：诸如“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抓住机会顺流而动的机智，处

变临危以平常心待之的坦然，我行我素敢于冲决罗网的勇气，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朴素，以及在超越物质的层面对芸芸众生的那些平庸琐碎乃至是繁杂烦恼的日常生活提升。对自食其力的劳动的肯定，都开始被塑造为具有现代色彩的新文化，并已开始把这种新文化的气息随着南方以及沿海温暖的气流向内陆以及海外吹去，企望突破时空的限制，替换过去的天空——当时的珠三角，日常生活受到正面的关注，平等自由备受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许少了贵族高胄、显赫事功，却多了建立在交换原则上的平等，贫富差异依然存在，但市场经济



⑦ 横琴大桥连接珠海和横琴新区，远望澳门和濠江

转换机制却在原则上给不少人都提供了勤劳致富的机会。由是，珠三角是沸腾的，但又是相对平静的，尤其是在神圣被肆无忌惮地调侃，终极价值及其相关的伦理体系日渐沦丧，文化艺术应有的浪漫主义受到了普遍的限制，实利主义成了狂欢主角的时候，珠三角人能把现实中体会到的顿悟变成我行我素的卓然独立，乐观进取不因循旧习的务实兼容，不能不令人再度刮目相看。确实，一个地区的文化无论有多深厚的内涵，有多精湛的技艺，有多富独创性的精神，如果其文化行为只能在这个有局限的文化共同体当中得到认同，而得不到文化共同体之外的广泛响应，不能在国

际上进行交流，那么这个地区的文化充其量不过是表明它是一种富有个性或者有一定历史的文化，而不是现代味浓郁的文化载体。所以，传统的“务实”如何作用于新时期的“创新”，原初的“感觉”如何汇合现代的“理性”，古老的“兼容”如何加上“全球”的意识，从自在升华到自为，显示大家气派，应该是另一场充分体现粤港澳大湾区命运共同体大智慧的艰难的旅行吧，而这也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应时而生的重要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推进文化建设有三个有利因素：

首先，粤港澳三地一衣带水，同属岭南文化的核心圈，人相亲、习相近、心相通，同根同源，同声同气，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生态圈。海洋更带来了浓厚的开放意识，形成了放眼看天下的习惯，一直以来都有特别鲜明的地理优势。如今的香港、澳门、广州、深圳都已经成为或正向国际大都市迈进，并以各自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西方文化、东西方观念都在这片土地上得到较好的交流、交汇和交融，无论是文化容量、历史容量和发展容量还是文化质量、历史质量和发展质量都独具特征。

其次，有强大的政策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定位明确：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在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中打造一个以“政治、经济和民生”为核心诉求的区域发展规划，自然在国家的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第三，有强大的经济能力支持。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广东更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佛都是GDP总量超过万亿元的城市，而深圳都市圈GDP更占广东省



的40%左右，香港是东方之珠与世界金融贸易中心，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岁月安稳。整个大湾区放在全国乃至全球，实力都不容小觑。而跨珠三角都市圈规划即将出台，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浮出水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将更添新功能。

有这么多利好的支撑，作为文化概念的粤港澳大湾区，将会有质的飞升，虽然已有专家锐目看出：在这一规划里，“多元文化的共存发展”也被相关文件提及，但总体而言是被轻轻地一笔带过的，与可以高度数字化和图表化的技术、经济相比，文化显得过于抽象，如果不借助文化的书写和赋形，大湾区作为一个全新的“空间”也许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呈现。因此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全新的“空间”概念，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体和国家行政规划的结果，而更应该视作是现代空间的一个重新开启。“大湾区”是一个试图融合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主体诉求的“超空间”结构，这就是大湾区作为全新空间的“新时代性”。

由此推广开去，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应该是“向前”的文化，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仅跟经济有关，更跟视野和眼光有关，与时俱进的开放视野与思维，在文化的发展上亦当有充分的表现。用人文价值链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发展，当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这片热土是中国经济和科技最富有创新活力的地方，也是城市化程度最发达的地方，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区，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引领区域。本来已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技产业和金融中心，这样的城市群，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创造性活力，必然要激发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创造性活力。实际上，新生的文化与科技文化应该是互动激发的关系，没有新的思想文化的激发和引领，仅靠科技一脉，是不可能

产生最一流的科技创新产品的。回望历史，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的天然属性；展望未来，共融共享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今已扬帆启航，最好规划的一个长远的文化战略目标是：世界先进文化应该在这里抛锚停泊，中国的创新文化应该从这里起航，走向世界。目标中的“国际化水平引导”如果只是停留在商业领域和技术领域内，那一定是残缺的，物质层面的东西如果是硬件的话，那么精神层面的提升才是真正的软实力的体现，只有在文化和文明上占领高地，才是最有利的创新和竞争。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及的“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定位才是高配的战略目标的另一翼，只有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才能让世界更加尊敬这个地区的实力与内涵，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承载起更多现代文明的内涵与价值。

现代科技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的社会，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就是新事物，更不能局限于特定的界限，大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整体概念，但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整体，它是由多个文化个体组合起来的文化共同体。所谓文化共同体，就意味着每一个文化个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具有平等的地位，相互之间是一种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以某一个文化个体为中心形成主次的关系。因此，大湾区文化建设既要吸收各方的优势和长处，同时也要尊重各方的规则和习俗，才能真正达到“大湾区大融合，新时代新经典”的高境界。

超越与创新，将会是奠定粤港澳“文化大湾区”发育、生成、盛放世界的前提。未来可期，就看接下来大湾区联盟各方非同凡响的开创与突破了。🌐

广州文化的精神特质

文 王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省国学会副会长）

一提到广州，人们普遍的印象就是：包容、开放、务实、低调、敢为天下先。笔者觉得除此之外，广州还有一种精神特质没有得到足够的挖掘和阐发，那就是温暖。这种温暖，并不仅仅指向广州身处南方给人的身体带来的温暖感，还指向心理上的温暖感，尤其是给外地移民带来的温暖感。

广州作为一线国际化大都市，它聚集着最优质的资源，难免会表现出其他二三线城市所不具备的高冷，比如房价高、竞争激烈、交通拥堵，所谓“高处不胜寒”。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却是温暖的，这种温暖不是那种灼热的，也不是那种一见倾心的，它是一种有如空气般的存在，它是那么的不经意那么的日常，以至于无形，却又如影随形地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体会到一种被包裹的体贴与安全。

在语言上，广州当地人跟你讲粤语，只要发现你露出略微疑惑的表情，就会立马调频到普通话，哪怕是不标准到让人笑话的普通话。总之他们宁愿为难自己也不为难别人。

在饮食上，广州是美食的天堂，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可以慰藉疲惫身心的美食。广州的美食虽清淡却富有滋味，虽方便却宜于滋补，更重要的是，它的口味是任何地方的人都能接受的口味，不像或辣或甜或重油的其他菜系那样具有相当的排他性。

在消费上，广州消费力居全国前三，有钱人非常多，但通常都蛮低调，尤其穿得低调，露富的人少，炫富的人就更少，不会给弱势群体一种压迫感。而且广州可以满足不同档次的消费需求，中高档的商圈旁常有城中村拱卫，即便在太古汇这样的奢侈品购买场所，也有平价的品牌。

在人际沟通上，仅从人与人之间的称呼上就能感知到朴实的善意。只要是女性，通通是“靓女”；只要是男性，全部是“帅哥”。叫名字的时候，也是只叫名不叫姓，要知道，在北方，只有很亲密的关系才会这么叫。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防备，也正是在这一次次善意亲密的称呼中慢慢消融。



在广州，令人感到最温暖的，是异乡人对这座城市信任和这座城市对异乡人的托举。在异乡人的眼中：广州即便是一座水泥森林，那也是被鲜花围绕的水泥森林。如果你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败下阵来，有无力解决的困难，只要你求助，就会有人真诚地帮助你；如果你只想找个地方默默地流泪，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你。

看着城中村浓浓的烟火味，你会相信，即使有一天自己人生潦倒失意，也能在这个地方坚韧地活下去。你会相信，没有什么疲惫是街头巷尾的一顿美食不能安慰的，如果一顿不能，就来两顿。你会相信，这个地方的人信奉实力，崇尚做事，与其绞尽脑汁经营关系，不如扎扎实实经营好自己。你会相信，这个地方的契约规则，已经在人们心中打上深深的印记，如果有人违反，政府也会为自己主持公道。

而广州人的情绪，也如同这广州的四季，是一种比较恒定的温和的状态，不像北方那么四季分明、爱憎分明。热情的时候，两肋插刀，翻脸的时候，恨不能插你两刀。广州人仿佛有一种天然的情绪调控能力，他们的热爱与憎恶，通常都是比较淡定而平和的，他们对人善意而友好，但也会与他人保持足够的界限和距离。他们一般不会表现出汹涌的情感，但如果他们的底线被触犯，他们又是最生猛的行动上的反抗者。所以不温不火的广州，总是成为革命的策源地。

二

广州的这份温暖情意由来已久，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甚至到了唐代，地处岭南的广州都是一个让中土人士感到蛮荒、神秘、倒吸一口冷气的地方。人迹罕至的丛林、神出鬼没的毒蛇与飞禽、湿热的瘴气、腥臊可怖的大海，构成了唐前岭南文学书写的关键词。或许正因为此，岭南成为历史上最常见的贬谪地

之一。

按照一般理解，从政治权力的中心被贬黜到荒蛮的岭南，这些文人应该是非常凄苦幽怨的。然而对于大多数贬谪文人而言，岭南竟成为了他们的福地，他们在岭南由困顿走向安顿，开辟了新的人生篇章。

这些贬谪文人之所以能够在岭南成功逆袭，一方面有赖于文人们自身的生命智慧，另一方面亦源于岭南的善意、包容与接纳。贬谪文人一般都是有罪之人，而岭南对于这些罪人是深具同情、心怀敬慕的。一般人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的罪，而岭南百姓看到的却是他们身上的才德，总是毫无怨言地接纳着这些政治争斗中的落败者，抚慰着一颗颗从云端跌落的受伤的灵魂。大多数南贬文人，在岭南百姓的温暖下重新焕发生命的激情，将自己的命运与岭南大地的命运休戚与共，并最终实现了生命的蜕变与升华。而这些文人亦以深切的感恩之情，反哺回报岭南，他们凭借自身的优良素养与满腹才华，极大地提升了岭南的文明进程。

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下，温暖作为广州的人文精神一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也正是这份温暖，使得很多移民对广州产生了一种“反认他乡为故乡”的归属感。苏轼云：“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代又一代的移民与本地人一道汇聚成新的广州人，他们以广州为心灵的故乡，将热爱与汗水倾注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拼搏奋斗，最终铸就了广州辉煌的今天。

在此笔者也建议，广州在建构城市形象时，可以在“温暖”这一元素上做更多的文章。广州的城市叙事中，不应仅仅有城市之巅让人炫目仰视的高度，还要有城市之腹让人安心自在的温度。一线城市都很高冷，但广州很温暖。也正是这种温暖，使得在广州学习、工作、生活的人们即便“很卷”，仍对这座城产生深深的眷恋。🌍

欧阳山《三家巷》： 青春叙事，以及现代广州的童年

✎ 于爱成（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欧阳山，现代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作品《玫瑰花残了》《前程似锦》《一代风流》等。2019年，长篇小说《三家巷》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本文中所谈的《三家巷》，是欧阳山《一代风流》的第一卷，是本源意义上的最早的《三家巷》，《一代风流》的后面几部《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所写内容不在本人所探讨的“青春性”和“广州性”的论题之内，故在文中少做涉及，只是作为背景和情节发展的补注或交代，偶有提及。

《三家巷》起笔就回到了1890年，彼时书中主人公周炳的父亲周铁9岁。这样算来，周铁当是出生于1881年，与鲁迅先生同年，到欧阳山写作该文时候，无论周铁还是鲁迅都恰好140岁。最巧的是，《三家巷》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27年，也恰恰是鲁迅先生在广州的时期。某种意义上，鲁迅在广州的行状也正是为周炳、为《三家巷》提供了一个最为真切的历史文本，或者是构成一种互文。这种互文关系，文章后面将有叙述。

《三家巷》的故事从1890年写到1927年，37年间三个家庭并连带两家亲戚的历史，跨越了祖孙三代。到20世纪20年代，第三代的一群青年人、少年人成长起来。周铁家三个儿子：周金（1900）、周榕（1901）、周泉（1903）、周炳（1907）；大姨家陈万利家一儿四女：陈文英（1898）、陈文雄（1901）、陈文娣（1904）、陈文婕（1906）、陈文婷（1908）；邻居何应元家两儿一女：何守仁（1902）、何守礼（1910）、何守义（1912）；三姨区华家两男两女：区苏（1905）、区桃（1907）、区细（1909）、区卓（1914）；舅家杨志朴家两个儿子：杨承辉（1905）、杨承荣（1915）。

五个家庭盘根错节，既勾连起历史，也勾连起广州社会不同层面，形成纵横交错立体交叉的一种网状人际关系。铁匠周家、鞋匠区家、中医杨家、买办陈家、地主官僚何家，每一个家庭都呈现开放式的结构；五家的孩子，或者做工，或者上学，或者经商，或者做官，或在上海，或去香港，或到乡下，也呈现一种更为多元开放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格局。这样一来，作者采取的这种网状的结构方式，这种以周炳为主线五家线索进行穿插的编织结构，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1921、1925、1926、1927年四个年头纷繁芜杂的广州社会面貌就得以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

1921年，这群年轻人最大的陈文英23岁，几位主要人物中，周金21岁，周榕、陈文雄20岁，何守仁19岁，周炳、区桃14岁，陈文婷13岁；到直到《三家巷》卷终，1927年时候，陈文英29岁，周榕、陈文雄26岁，何守仁25岁，周炳20岁，陈文婷19岁，区桃永远定格在了1925年的18岁。我们看到这群年轻人也都仍然停留在20岁左右不到30岁的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而《三家巷》浓墨重彩所写的，就是这群年轻人的青春故事。

青春自然是最美好的，呈现了各种可能。作者对青春和美，都做了忘情的礼赞。周炳、区桃，代表了男儿女儿青春和美的极致。对于周炳外貌的介绍，书中不厌其烦，从12岁写到了20岁：

惟有那小儿子周炳，却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岁，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壮健，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还有人说，要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装束，他要比他姐姐周泉更加美貌。

12岁的周炳的美貌，不敢说颠倒众生，起码让姨家陈氏四姐妹都有几分心旌摇曳。周炳13岁的时候，22岁的陈文英回娘家在门口遇到他停下来陪他玩，“甚至把周炳抱起来亲嘴”；二姑娘陈文娣一提起周炳的名字，“脸就红了”；三姑娘陈文婕“是个沉静淡漠的人，光微笑着，拿眼睛望着她的四妹，不说话”；四姑娘陈文婷更不以别人戏言她跟周炳是“小两口子”为意，很受用这样的传闻。陈文雄听了四姐妹对周炳的评价，对周炳下了这样的判词——“真是亏四妹想得聪明。洋娃娃倒也恰当：只有漂亮的脸孔，没有头脑，没有灵魂。”

同样夸张的，是周炳到姨夫区华家做学徒的第一天赶上五月初五停工过节，中午跟姨夫一家喝酒吃菜，酒足饭饱躺在神厅里的杉木贵妃床上午睡，这时候的他，“两边脸蛋红通通的，鼻子显得更高，更英俊，嘴唇微弯着，显得更加甜蜜，更加纯洁。他的身躯本来长得高大，这时候显得更高大，也更安静。初夏的阳光轻轻地盖着他，好像他盖着一张金黄的锦被，那锦被的一角又斜斜地掉在地上一样。姑娘们都没事装有事地在他跟前走来走去，用眼睛偷偷地把他看了又看”。

周炳在作者笔下是个美男子，人见人爱，用陈文娣的话来讲，如果他“去学唱戏，她说这样漂亮的戏子，就算是个哑巴，也会颠倒了全广州的人”。同样是这个陈文娣，在拒绝并打击追求者何守仁时候，也拿周炳的美与何守仁的丑来说事，让何守仁回答人的灵肉是否一致的问题。书中还有多处写到了周炳随着年龄渐长而不断增加的成熟之美。

18岁的时候，周炳所在的中学排演白话戏《孔雀东南飞》，男主角周炳请来区桃演刘兰芝，两人在戏中假戏真做互相爱慕之情越发炽烈，作品借区桃之眼发出对18岁周炳的赞美——“区桃觉着周炳美丽极了，英勇极了，可爱极了。他的身躯是那样壮健，举动是那样地有力，面貌是

那样地英俊，灵魂是那样地高贵，世界上再没有更加宝贵、更加使人迷恋的东西了。”

同样是这个多事年头的除夕之夜，小伙伴们结伴游街卖懒，区桃与周炳情意绵绵，区桃眼中的周炳是这样的——“在区桃的眼睛里，也没有马路，也没有灯光，也没有人群，只有周炳那张宽大强壮的脸，那对喷射出光辉和热力的圆眼睛，那只自信而粗野的高鼻子，这几样东西配合得又俊，又美，又四称，又得人爱，又都坚硬得和石头造成的一般。”

1926年，周炳19岁，9月底的时候参加北伐战争的周炳和省港罢工工人运输大队一起回到广州，书中写道，“他整个地变黑了，变高了，也变瘦了。头发剃光，整个头部显得小了，但是胸部和两肩显得更加雄壮，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说话也更加显得有风趣”。此时的周炳已显成熟之美，陈文婷“看见周炳越过越‘成整’，越过越像个人，像个英伟的美男子，甚至仿佛嘴唇上都长出胡须来了，一想起他，就心跳，害怕。可是越心跳，害怕，却越想看见他”，这种魅力让陈文婷更加魂不守舍。哪怕周炳对区桃的思念，也让陈文婷觉得“他这个人拿真心对人”“他这个人醇厚刚勇——总之，是越发可爱。更不要说他长得一天比一天更漂亮，更像个成年男子，使她更加着迷了！”

1927年，20岁的周炳参加了广州起义，当他作为起义武装司令部的通讯员，以极大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全广州飞奔，“骑在自行车上，满城地跑”“精力饱满地跑着，不停地跑着”时，作者又不失时机地通过张太雷的司机陈能之口，发出这样的赞叹：“唉，说实在的，你在一万个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这样雄壮，又这样漂亮的男人！”

而这样一个美男子，却是以一个憨直的性格形象出现的。书中开篇用了五个章节的篇幅，耐心地、津津有味地讲述这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怎样把一件件事做糟做砸。用周炳父亲周铁

的话说，就是“阿炳这孩子傻里傻气，又蠢又笨，打铁不成，当鞋匠也不成；做买卖不成，放牛也不成”。用官塘街这一带的住户的话说，周炳“是一个真正的憨大”。陈文雄很早就评价说他“只有漂亮的脸孔，没有头脑，没有灵魂”。后来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评价周炳：“是一个憨直的人。憨直的人往往就是一条心！共产党最喜欢这种头脑简单的材料了。对于我们这种有点头脑的人，共产党就一筹莫展。”再往后当着陈文婷的面在信中谈论《共产党宣言》的周炳是“一个典型的傻瓜！”

书中所有的人物当中，其实最熟悉、最了解、最能洞察周炳并且给出最准确评价的人，不是区桃，不是陈文雄，也不是任何一个长辈亲戚，恰恰是陈文婷，陈文婷对周炳的感觉是“憨”“直”“痴”“傻”“醇厚刚勇”，并且天才地把周炳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做对比，“周炳这个人真有一股子痴心傻气，很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怪不得大家都爱他”。她听周炳说全世界都找不出区桃那样的人，自然是很不悦，不服气，她对区桃的评价也是准确极了——“区桃顶多算个晴雯，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不算晴雯，算个黛玉，又值得什么？反正算不上宝钗。宝钗的角色，该着我来演！”即便区桃算是晴雯、黛玉，也全都是红颜薄命，只有她本人配得上宝钗的富贵和好命。

将书中人物关系设定为某种意义上的《红楼梦》式的原型，似乎也是作者的本意。错综复杂的姨表关系、姑表关系，种种表兄表妹表姐表弟之间的爱情，最是得了《红楼梦》人物关系的真传，陈何两大豪门中的家庭故事包括社会网络也有了几分《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宁国府的架势。三家巷中的周家与陈何周两家当然是不可比的，反而扯动着陈何两家的神经，并对两家的日子产生了冲击。只是，作者有意避开了巴金《家》模式，把革命者不再安排在高门大族中，而是让

革命者来自市井民间最普通的家庭，让颇有几分“贾宝玉”性格的人物生在一个豪门大族的穷亲戚家，这就有了几分戏剧性。

这种戏剧性，可能出于作者的某种探索，他想看一看，想推导一下，如果，贾宝玉性格的憨直之人，生在民国时期广州的平民之家，会呈现怎样的成长逻辑？这种试验，当然是放在一种比较稳妥的生长环境中进行的，周家日子尽管比较拮据，但周铁是老铁匠，远近闻名，收入稳定；大儿子周金在兵工厂上班，两人的收入足以养家糊口，还能供周炳的哥哥周榕、姐姐周泉上学，只是再供周炳上学才没有保障，但这是相比较而言的，日常生活一日三餐其实并无问题的。这样的家庭条件，才有了周炳先后进剪刀铺学打铁、送人做养子、跟人学鞋匠、做药店伙计，以及给人放牛这样的历练，但这种种的经历都没有持续下去，回到家中也并没有影响家庭的生活，周炳照样可以在无所事事中消磨时光。

从学徒到学徒，从河北到河南，从城里到村里，学这个学那个，从这里到那里，铁匠会做，鞋匠会做，草药会抓，水牛会放，农事粗懂，演戏精通，辍学后又复学，参加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从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他的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遭际，倒是真的让他进入了社会、民间、民众，无所不见，无所不遇，无所不会，反而成了他接触社会融入时代的一种便利，而不至于像陈文雄等这批学生那样视野狭窄圈子固定，他具有更广阔的时代视野，也拥有了若干出生城市底层包括乡下人群的伙伴朋友。他反而更像是时代之子，历史见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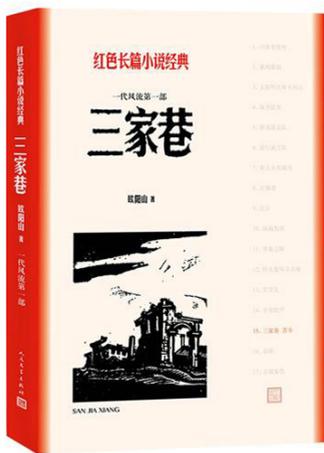
现场当事人，而绝不是局外人。

以周炳的“宝玉”之资，以他的憨直痴傻，以他的忠勇果敢，他竟然成了进入了国民革命的历史叙事，进入了广州现代化历程的叙事，进入了共和国的叙事，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然，买办家庭的陈文雄也进入了历史，地主官僚家庭的何守仁也进入了历史，但他们的进入是以顺应的方式，忠实地维护捍卫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上流社会的利益关系，并成为新一代革命与资本、政治的合流者，而不是背叛者，不是叛徒，不是巴金及其笔下觉慧之类的打出原生家庭的革命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欧阳山笔下的人物，都顺应了他们的出身和本性，他们的本性也更人性，没有拔高，没有理想化，采取了一种平实的、平视的、世俗化的视角加以对待。

所以，作者的最为大胆之处，正是分别塑造了周炳、陈文雄、何守仁这三个各自遵守成长逻辑和思想发展逻辑的年轻人形象，陈文雄、何守仁本来最可以成为贾宝玉，成为

觉慧，从原生家庭打出来，完成激动人心的革命事迹——但作者却让他们两人规规矩矩本本分分作为守成者、保守者、同流合污者，而把贾宝玉这个原型的功能赋予了平民家庭的周炳。由此带来的冒险就是可能这个周炳的发展逻辑就容易陷入性格的难以典型化（不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之“典型”意义上的“非典型化”）。这个后果自是作者早已预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代价。这涉及现实主义理论的典型论问题。后文另有讨论。

所以，我们在书中看到，这个周炳，其实并



《三家巷》

作者：欧阳山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非一个启蒙觉醒者的存在，也并非一个阶级觉醒者的存在，周炳就是周炳，他只是由着自己的本性一路奔跑，哪怕跑到最后，他还是他，没有长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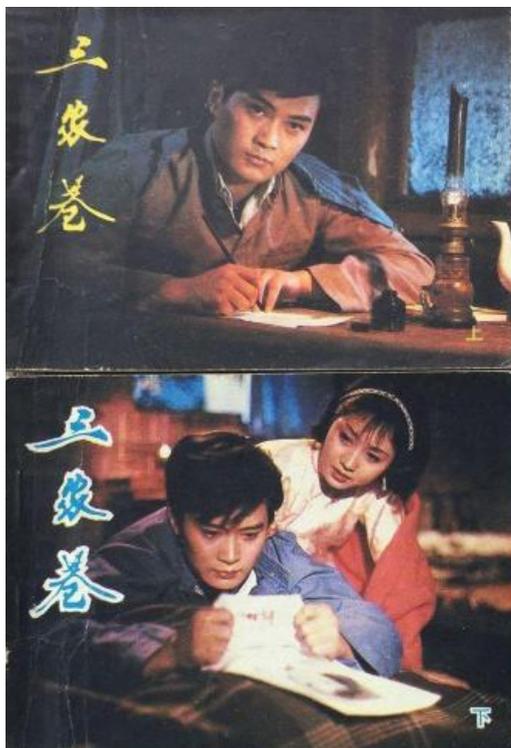
二

多有论者将《三家巷》归入“成长小说”的范畴。成长小说亦称启蒙小说（novel of initiation），最初源于德国，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被认为是这一小说类型的原始模型。这类小说展现的是主角（几乎清一色为男性，那年头女性好像不视为有成长启蒙的可能）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许进入社会吃亏吃苦而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许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而在这番长大成人的领悟和改变完成之际，故事亦到达（圆满的，或虽不圆满但尚称释然的）尾声。从这个意义上，创作于十七年时期的《青春之歌》等当属这样的类型。

《三家巷》有这样的痕迹，或者说，作者也有这样的初衷，但实际上达到的效果却勉为其难，或者说并未能完成。《三家巷》中，周炳的精神主体性一直并未能得到充分而积极的建构，他似乎更多是处于一种逆反式的与被动式的成长叙事中，而且主人公的成长极为晚熟，或者说谈不上成熟。巨型历史时段和事件对人物产生着影响和改变，但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也对人物的成长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制约，这样一来，人物的性格发展反而就出现了一种复杂性和迟钝性、延缓性，而不是常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展示的改变的“革命性”和“爆发性”，从第一卷《三家巷》直到最后一卷《万年青》，周炳的成长最后结束了，但这种结

束，仍然不是一种完成，而是一种斑驳而且拼接的状态——正如广州解放后，三家巷小伙伴中硕果仅存的陈文婕对她的丈夫一直坚持科学救国的李民天所说的，“你看阿炳这个人，从小就有那么一股劲儿。那时候他是一个傻子，现在看起来，他仍然是一个傻子！”

《一代风流》二至五卷中的周炳性格形象的发展轨迹放下不表，不在本文论说的范围，继续只说《三家巷》中的周炳的“成长”——有成长吗？无疑，有成长，他渐渐长成了一个伟男子，渐渐融入了火热的国民革命和党派政治的纷争，渐渐进入了共产革命的叙事。不过，就他的性格发展来讲，我们看到的周炳似乎仍是一根筋地任着性子长大，当然他似是天生的手艺人，生存技艺上手很快，打铁有打铁样，制鞋有制鞋样，农事有农事样，甚至天赋异禀，颇有几分演戏才华，像是无师自通，也交了方方面面一些底层朋



⑦ 《三家巷》电影连环画

友，所谓成熟不成熟，对他来讲是不太看得出来的。而最重要的，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其实也不是他的做工和上学，不是他的政治事件的参与，而主要是源自前面所说的他的美貌和讨人喜欢，凭借的更多的是好运气。比如，如果不是因为美貌，他不会与区桃、陈文婷乃至第二卷中明写的陈文英发生情感瓜葛纠缠，第一卷的情节发展也就削弱了动力或者动力几无。他做这做那，很多时候并无一个鲜活生动灵动的面貌，更像是一个工具、一个道具、一个观念、一个理念，被动地在时代的汪洋中漂流沉浮。作品似乎做实了要对这个理念化的人物进行可以乌托邦一般的安排，进行革命语境中的想象试验——一个憨人，一个浑人，一个貌美手巧、会演戏、为女人喜爱的现代中国的贾宝玉，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现代中国的第一代新人的。

在跟其他人物进行比较的意义上，我们断言周炳既缺乏典型性，也缺乏足够的个性化，不能说是圆形人物，倒更有几分扁平化的色彩——扁平化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个作品中，反而是周炳的被动化、非主体性、非强大的意志力、非“精神奴役创伤”与非“主观战斗精神”，才成就了作品中年轻人群像的生动真实，写出了民国革命时期广州最真实的众生相，描摹了现代中国革命中心最真切的历史瞬间，也刻骨呈现了在历史的洪流中的人的卑微与无力——人成了历史的人质。

谁能逃出历史的操纵与命运的拨弄呢？谁能具备超越历史局限的先知先觉呢？周炳不能，不同道路方向、不同党派选择、不同救国方案的追随者周金、陈文雄、何守仁、张子雄、李民魁、李民天、陈文英、陈文娣、陈文婕、周泉，都不能。走哪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时候像是掷色子撞大运。书中前半部，在欧阳山其实不掩饰对这帮年轻人的喜爱和理解同情，在盟誓、换帖等章节里，他塑造了一群对新中国未来充满信

心、幻想、立竿见影地改变的青年人形象，他们如此青春，如此热血，如此激情，他们开出来一个又一个的疗治中国痼疾，让其走向繁荣富强的救国药方，他们也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辩论。他们的情绪是昂扬的，语言是诗意的，思想是全新的，表达也是全新的，亦新亦旧的一代曾经比将近一百年后的我们更西化更罗曼蒂克，自然更有担当更革命更敢于舍生忘死。

革命！是的，革命是为当时的社会风潮、时代主流、青年方向。彼时的广州，彼时的中国，彼时的欧洲，彼时的世界，全球性的向左转，劳工神圣、反帝爱国、苏俄导向的“革命”大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全球同此凉热，广州成为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国民革命中心，是革命的大本营、“革命策源地”。国共两党一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是国民党之中，左派也占据着话语权。鲁迅也是因为收到“革命”的吸引和召唤，于1927年1月18日到达广州，任职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欧阳山也正是在鲁迅关照下进入文学系做旁听生，并参加了1927年3月14日在当时中大附近惠东楼二楼太白厅（今越秀南路一八六号东如茶楼内）举行的“南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座谈会。欧阳山在《光明的探索》一文中有专门介绍。

1926年秋冬之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让鲁迅充满憧憬，感奋“情形很好”“欢喜非常”“极快人意”，到1927年年初，他由厦门大学入粤之时，他感觉此时的广州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耳闻不如目见，他在中山大学学生会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就指出了广州政治形势的危机——“我觉得广州还是旧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说是‘革命’，就像满街红布标语中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这种‘革命’真使人有点害怕……”“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初到广州的鲁迅判断对了形势，但开出的药方却是继续为“革命”鼓与呼，为“革

命”加薪助燃、添柴加火，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作《读书与革命》的讲演，写《中山大学开学致语》等文章，鼓励在校学生“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兼顾革命的魄力的力量”，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当然，鲁迅所言的“革命”其实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与延伸，并不仅仅是现实层面的反帝反军阀反殖民反买办反地主，而更多着眼于对旧制度、就习惯、旧思想的革命，呼吁青年学生“向他们开火”“向他们进攻”，他没有预见到政党政治的残酷性和你死我活。鲁迅来到广州不过四个月，国共迅即破裂，清党事起，“四一五”大屠杀发生，据当时报载，当天逮捕2400多人。鲁迅后来反省自己对“革命”残酷性的认识不足，他痛悔自己曾经的鼓吹革命，何尝不是做了帮凶——他在写于1927年9月4日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中，承认自己大革命失败以后沉默了，“大原因之一”是感到了“恐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也痛恨自己在“吃人的筵宴”中，“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进而，他在20天后的9月24日所写的著名的《小杂感》中，更愤激地发出对以“革命”之名各种暴行的控诉：“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

还是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也表达了自己对青年这个阶层的终极认知，“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时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

无论是对革命阵营分裂导致清党的残酷性，还是当时青年走向分化，欧阳山《三家巷》中都有具体描写，鲁迅在广州不到1年，但他留下的

文字，却为这部作品做了令人信服的例证，或者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史之间的一种互文。同时也让人感觉，欧阳山作为历史当事人，作为鲁迅的学生，鲁迅先生的影响其实是深刻的。鲁迅的精神资源，他的不妥协不中庸，他的爱憎分明，他的对于文学功用的理解和对“革命文学”口号的有所保留，对欧阳山都产生了影响，让他并没有把《三家巷》这样一部史诗题材写成一种传声筒、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流行模式，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十七年文学另外一种方向，另外一个传承——尽管这样的方向并未成为主流，所以今天读来才格外可贵，上溯广东文学、岭南文派、南中国写作的范式，才有了一种可资凭借和言说的现代的源头活水。

在当时的革命叙事中，作品写出了三家巷中的小伙伴们置身时代洪流中的应激反应，他们的表现、思考、争论、挣扎，他们的选择、分化，他们新生、沉沦或者自救、自救的努力，再也生动不过地为现代革命与地方历史做了一份文学的旁注：既是宏大叙事的，也是民间叙事的；既是革命叙事的，也是日常叙事的。在时代的激响为主流声音的同时，欧阳山写出来一种众声喧哗。书中安排了若干场合的对手戏、对话场、对辩局，无论是父辈陈万利与何应元时不时交换时局的意见，还是陈文雄与何守仁时不时交流并发表对形势走向的分析，都是书中精彩的部分，四人的身份、性格、性情、口吻、神态全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重要的是通过这四个通天人物的信息交流与判断互动，高度概括性却又全面客观地从买办和地主官僚这两个社会阶层、两代人的口中，比较真实地还原了当时若干重大事件的动态。最难能可贵的，还有欧阳山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真实”观，不对人物做臧否渲染道德评断，让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丰满立体的历史人物形象，而不是被十七年文学及其后一段时期普遍脸谱化丑化的人物形象。

三

如前所述，作者对周炳形象的塑造，采取了自由放纵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按照恍如贾宝玉的性格逻辑，让其进入民间社会进入城市空间任性游荡，如同瓦尔特·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笔下一些人物的精辟概括：“游手好闲者”（flaneur）（张旭东译为“游逛者”，刘北成、王涌都译为“闲逛者”）。“人群的游手好闲者在他漫游到很晚的时候，便停步在某个仍有很多顾客的百货商店前。”在题为《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的精彩评论中，本雅明这样写道，“他像熟门熟路的人那样转来转去。……市场是游手好闲者的最后一个场所。如果街道一开始就是他的室内，那么现在室内就成了街道。现在他在商品的迷宫里漫步穿行，就像他从前在城市这个迷宫里一样。”

游手好闲者或游荡者或闲逛者是本雅明偏爱的形象，不仅波德莱尔，他自己无疑也是。本雅明把自己划分为与波德莱尔同一类的人，只不过同为游手好闲者，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波德莱尔走马观花地四处张看，试图发现一切使其震惊或者惊颤（schockerfahrung）的东西，而本雅明则始终有其关注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内阳



◎ 1950年1月，欧阳山任广州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处长

台、胜利纪念碑、蹄尔苑林、动物园、农贸市场、西洋景，这些是属于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的；拱门街、西洋景（又是西洋景）、世界博览、豪斯曼的城市理想，这些是属于19世纪的巴黎的；以及儿童读物、疯子写的书、袖珍的玩具雪景、堆满藏书的居室，还有“微雕在两颗麦粒上的完整的以色列颂诗”，带着十足的伤感的气质。

是的，厌倦，惊颤，以及伤感，是为现代主义的通症。波德莱尔的巴黎、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以及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卡佛的亚历山大港、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张爱玲的香港和乔伊斯的都柏林，都写出了对城市的痴迷，城市的孤独，城市的乡愁，写出来现代性的感受，他们的作品传递着敬慕、排斥、恐惧等混合的情感，而最终，除了他们讲述的城市，他们无处可栖，无处可去。都市经验才是他们，也是作为人类的终极故事。

《三家巷》中多处写到了周炳的闲逛，闲逛时候他眼中的广州城。小说上来第一句，就点出来广州之名：“公历一千八百九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绪年间。铁匠周大和他老婆，带着一个儿子，搬到广州市三家巷来住。”接下来书中还有159处写到广州，如“广州城里和西关的热闹繁盛街道”“在广州，每年清明前后，都要刮一场风”“广州人是把珠江叫作海的”“不消说，整条三家巷是属于他们的，就是整个广州市，整个中国，哪怕说大一点，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了”“周炳看见陈文雄挥动起他那两只特别长的胳膊，沉着有力地说到：‘这就是为什么人才那样可贵！为什么青春那样可贵！咱们有能力，有青春，有朝气，那是锐不可当，无坚不摧的！咱们看三十年之后吧！到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也就是到了后半世纪，那时候，三家巷，官塘街，惠爱路，整个广州，中国，世界，都会变样子的！……’”“在那个时候的广州，这样的谈话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风气了”“按

照周炳的想法，——也是当时几乎每个广州人的想法，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就是世界上真正的主宰”“每一个广州人恐怕到现在还能够回忆起来，在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到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这七个月里面，他们经历了一次多么严重的精神上的混乱”“全广州的人几乎都看见了他俩”（陈文雄和周泉举行的文明结婚）“这时候，全广州市都在白云山脚下睡熟了，什么声音都没有，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几声鸡啼”“一直到九月底，周炳才和省港罢工工人运输大队一起回到广州”“随后他就离开第一公园，在广州市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闲荡了一个多钟头，到太阳偏了西才回家”等。

介绍三家巷，是说“这条小巷子大约有十丈长，两丈来宽，看来不怎么像一条街道，却有点像人家大宅子里面的一个大院落。它位置在广州城的西北角上，北头不通，南头折向东，可以通出去官塘街，是一条地势低洼，还算干净整洁的浅巷子。巷子的三面是别人的后墙，沿着墙根摆着许多长长的白麻石凳子，东北角上，长着一棵高大的枇杷树。这儿的大门一列朝东，住着何、陈、周三姓人家。从官塘街走进巷子的南头，迎面第一家的就是何家，是门面最宽敞，三边过、三进深，后面带花园，人们叫作‘古老大屋’的旧式建筑物。水磨青砖高墙，学士门口，黑漆大门，酸枝‘趟栊’，红木雕花矮门，白石门框台阶；墙头近屋檐的地方，画着二十四孝图，图画前面挂着灯笼、铁马，十分气派”。

写到声援省港大罢工广州示威大游行的队伍，说“他们来自广州城的各个角落，有工人，有商人，更多的还是学生”“它没有别的声音，也没有别的指望，只有仇恨和愤怒的吼叫，像打雷似的在广州的上空盘旋着，轰鸣着，震荡得白云山摇摇晃晃，震荡得伦敦、华盛顿、东京、巴黎同样地摇摇晃晃”。

写到广州的风俗，五月五端午节雄黄朱砂点

“王”字；七月初六乞巧拜七姐，姑娘们摆出巧物来任人观赏任人品评；写到除夕卖懒：

区桃、区细、区卓、陈文婕、陈文婷、何守义、何守礼、周炳这八个少年人一直在附近的横街窄巷里游逛卖懒，谈谈笑笑，越走越带劲儿。年纪最小的是区卓跟何守礼，一个十一岁，一个才八岁，他们一路走一路唱：“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不懒！”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划拳喝酒。门外贴着崭新对联，堂屋摆着拜神桌子，桌上供着鸡鸭鱼肉，香烛酒水。到处都充满香味，油味酒味，在这些温暖迷人的气味中间，又流窜着一阵阵的烟雾，一阵阵的笑语和欢声。

还写到人日短足旅行，选出最美丽的姑娘做“人日皇后”；写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亲戚拜年；等等。

除夕之夜，周炳、区桃成功躲开同行卖懒的小伙伴单独行动时，“他们从大东门拐出东堤，沿着珠江堤岸走到西堤，又从那里拐进西关。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就把这广州城绕着走了一圈。到了花市，那里灯光灿烂，人山人海。桃花、吊钟、水仙、蜡梅、菊花、剑兰、山茶、芍药，十几条街道的两旁都摆满了。人们只能一个挨着一个走，笑语喧声，非常热闹”。

广州的气候，书中这样写：“台风一来，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阴沉沉的愁惨世界。鲜明艳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像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奏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骂着，吵嚷不休。满天的黑云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它们慢慢去远了，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走了，但从白云山后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



当陈文雄与周泉坐了舢板，顺着弯弯曲曲的水道，向珠江的江面上划去时，他们看到的是两岸茂盛的荔枝树，刚熟的荔枝一挂一挂地下垂着，“那水中的倒影漂亮极了，就像有无数千、无数万颗鲜红的宝石浸在水里的一样”。

当陈文雄、周泉、周炳、陈文婷登上白云山远眺时，“从高处望下去，可以望到很远很远的所在。有几十万人在那里忙碌奔走，在那里力竭声嘶地吵吵嚷嚷的省城，如今却驯服宁静，不像包藏着什么险恶的风云。珠江围绕着大地，像一根银线一样，寒光闪闪”。

周家三兄弟逃难之夜，他们路过之处，“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

周炳躲在舅舅家的中药铺后院，“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但是在他的对面不远，那珠江北岸的广州城，如今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却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参加广州起义，“周炳仆倒在地上，微微抬起头望望天空。这时候，天空明亮皎洁，月色很好。爆裂的枪声和子弹的啸鸣在广州的上空震荡着，回旋不停。闪闪的火光此起彼伏地从四面八方冲上云霄”。起义胜利，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巨人的诞生，“这个巨人的头枕着白云山，两脚浸在珠江的水里，两只手抱着整个广州城，好像抱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玩具一样，在微微发笑。他想，谁要想推开这个巨人，把广州城从他的手中抢走，那不过是一种可悲的妄想。他又想，从今

天起，一切坏的东西都要灭亡，一切好的东西都要生长起来”。

参加观音山防御战，周炳一次又一次地在战斗空隙里打量着这座生他养他的城市，仿佛像是跟广州不舍的告别。对广州的端详，第一次是他“信步走到山顶一块草坪的南沿，把广州全城迅速地瞟了一眼。广州城好像一群黑羊似地卧在他的脚底下，灯光稀少，寂静无声”。很快他又再一次更仔细地远望：

想把整个广州城再仔细看上一遍。刚才只不过匆匆忙忙地把那将他养育大了的城池看了那么一眼，而在这冰凉的、黑沉沉的冬夜里，从观音山顶俯瞰自己的可爱的、美丽的家乡，在他也还只是第一遭。他记不清楚刚才自己是否看见了那从小就非常熟悉的花塔，那砖砌的、上面长着小树的光塔，那像两个圆锥似地、一直插上天空的天主教堂“石室”，那巨大的方形建筑物大新公司和亚洲酒店，还有那白茫茫、一年四季都闪着银光的珠江。……这一切，如今都想重新仔仔细细地再看上一遍。

周炳幸运逃过了大追捕，乘坐“苏州号”轮船奔赴上海，给表姐陈文英家孩子做粤语老师。船“经过了香港、汕头、厦门，贡隆、贡隆地摇摆着笨重的尾巴，向着上海游去”，周炳“很不宁静地望着那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心里“叫痛苦、寂寞和悲愤缠绕着，挣不脱身”，但想到以上海之大，“他可以好好地去见见世面，也不枉人生一世”，“觉着自己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前程，浑身也充满了劲头”。本卷最后，周炳怀着期望，对广州告别：“对着广阔无边的海洋叫嚷道：‘再见了！可爱的家乡呵！’”

从起笔写到周炳的爷爷搬到广州的三家巷来住，到第一卷结束周炳逃亡离开广州，完成了一个闭环，从晚晴到民国，从爷爷到孙子。至于后面发生的故事，作为广州叙事，就不在本文论述

的范围之内了。这广州叙事，广州情感，既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也是作者的，既是当时体验的，也是历史经验的，既是即时的，也是乡愁的。作品笔下的广州，就成了一座世俗的城市，民俗的城市，市民的城市，市井的城市，物质的城市，土洋混杂的城市，活色生香的城市，饮食男女的城市，闲逛者的城市，革命者的城市，暗流涌动的城市，众声喧哗的城市，政治力量合纵连横的城市，背叛的城市，吃人的城市，英雄的城市——现代中国样本的城市，或者说现代广州生成期的城市。是残酷的历史洪流之中众生的生存图景，是人在历史中的人质一样的无能为力或前赴后继呼号挣扎，也是不变的人性在历史无情之中的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终于，人性浮现了出来，超越了历史。

四

是的，人性超越了历史，人物活在了当下。

人是历史的主人。人是城市的主人。没有现代人，广州不成为广州；没有现代国民革命，中国不成为中国。这部书的价值，正在于力透纸背地写出了这段历史中芸芸众生的一条街巷中一群人物的命运——谁都不是配角，谁都不是旁观者，人人都是当事人、主人公。

历史地看，或者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三家巷里的人物，我们还能记住谁呢？周炳，其实反而渐渐模糊了。除了他的相貌不凡和性格憨直，我们还能记住他什么呢？我们能记住的，是因他而越发生动的区桃的美及其毁灭的悲剧，陈文婷的个性及三家巷觉醒者的现代性的挣扎，以及陈文雄及其所代表的历史的理性。

本雅明在《论历史哲学》中这样评价他所喜欢的克利的《新天使》：“这就是人们所画的历史的天使。他的脸对着过去。在一连串事件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残骸

碎片擦着残骸碎片，抛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去的人，把已经撞得粉碎的世界粘在一起。但是一阵狂风从天堂吹来；这场风如此猛烈地吹开他的翅膀，以致天使再不能合拢他的翅膀。这阵狂风不可抗拒地把他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废墟越堆越高。我们称为进步的就是这场风暴。”

历史的天使，是的，五卷终篇，周炳是，胡杏是，何守礼是，陈文婕、李民天也是，幸存者都是。自然作者也是。作者甚至可能是周炳的影子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原型之一。他们都是历史的天使，主体，主人，胜利者。但他们何尝不可能是这样一个被暴风吹倒吹翻吹得只能倒走者？1949年不是，不意味着17年间不是，不意味着1966年后不是。所以，1951年的欧阳山写下来这样一部对于时代废墟的凝视，也信心满满地写下了一部对于历史必然性的想象。但他不会想到，他终将被狂风吹得身不由己地向前移动，只能把全部的目光投注在过去，全卷的终稿，却要等到30年后。欧阳山终于也成为一个倒走的闲逛者形象，如果他也感到痛楚的话，他的痛楚都来自于可疑的历史关系：时代的边缘也依然处在时代之中，任何想跳出时代的企图都是暧昧而又徒劳的。

终于，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其实矛盾而且充满缝隙的作品。我们模糊了血痕，却记住了广州，记住了美，记住了青春，记住了三家巷这条巷子。

评论家朱伟在《入广州记》中说，“第一次走进广州在60年代，那是欧阳山《三家巷》里的广州。关于潮湿的广州的最早记忆大约来自蒙蒙细雨中昏黄路灯下那条长长的巷子，有水洼的青石板路面通向的巷子深处，有一个身穿一身白衣裙的美丽女孩区桃。那一年，区桃消失在小巷深处时只有16岁”。

莫言《童年读书》中也回忆道：

有一次我从同学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三家巷》，回家后一头钻到堆满麦秸草的牛棚里，正看得入迷，他悄悄地摸进来，一把将书抢走，说：这书有毒，我先看看，帮你批判批判！他把我的《三家巷》揣进怀里跑走了。我好恼怒！但追又追不上他，追上了也打不过他，只能在牛棚里跳着脚骂他。几天后，他将《三家巷》扔给我，说：赶快还了去，这书流氓极了！我当然不会听他的。

我怀着甜蜜的忧伤读《三家巷》，为书里那些小儿女的纯真爱情而痴迷陶醉。旧广州的水汽市声扑面而来，在耳际鼻畔缭绕。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当我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趴在麦秸草上低声抽泣起来。我心中那个难过，那种悲痛，难以用语言形容。那时我大概九岁吧？六岁上学，念到三年级的时候。看完《三家巷》，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心里怅然若失，无心听课，眼前老是晃动着美丽少女区桃的影子，手不由己地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处，写满了区桃。……

而我，在文章的最后，也仍然闪现着两个人的影子。

一个照例一定是区桃：

这个人就是周炳的同年表姐区桃，穿着碎花白夏布短衫，白夏布长裤，绿油木屐，踏着清脆的步子，走进三家巷来。她的前胸微微挺起，两手匀称地、富于弹性地摆动着，使每个人都想起来，自己也曾有过这么一段美妙的青春。她的刘海细细地垂在前额的正中，像一绺黑色的丝带，白玉般的脸蛋儿泛着天然的轻微的红晕，衬着一头柔软的深黑的头发，格外鲜明。她的鼻子和嘴都是端正而又小巧的，好看得使人惊叹。

她的细长的眼睛是那样天真、那样纯洁地望着这整个世界，哪怕有什么肮脏的东西，有什么

危险的东西，她一定也不曾看见。黑夜看见她来，赶快让开了路；墙头的电灯却照耀得更加光明。

一个是陈文婷：

陈文婷说：“我就是要这样的。你爱我，就得服从我。你爱我，整个就得属于我所有。你爱我，你就应该只对我一个人表示忠诚！”周炳觉着不是受到宠爱，而是受到侮辱。他晒笑地说：“你还说不疯？你是想把一根绳索，一头套住我的脖子，一头系在你的裙带上，把我牵着到处走不是？你把我浑身上下看一看，我像那种裙边狗么？”陈文婷说：“好呀，不拴住你，尽你跟人去逛街，上馆子，半夜回来，黑吗咕咚地笑！”周炳摇头叹息道：“你这不是爱情，是专制。我要对你也这样，你受得了？”陈文婷把头一抬，非常骄傲地说：“我不怕！我就是要对你专制！爱情是粗暴的，野蛮的，是无可理喻的，是绝对自私的！难道爱情不是专制，还是德谟克拉西？”她这里所说的“德谟克拉西”，是民主的意思。周炳斜斜地瞅了她一眼，觉着她小时候是身材苗条的，现在变得又矮又圆了，在这又矮又圆的身躯中间，散发出某种兽性的东西，也是她从前所没有的。

其实，书中人物中最明白最具雄心抱负但也最具悲剧性的陈文雄对周炳看得最准：

何守仁还是吟吟沉沉地说：“照我的看法，倒是把他设法弄到‘惩戒场’去，让他做几天苦工也好。”但是陈文雄不赞成，他坚持他的见解道：“完全不应该那样鲁莽。说实在话，在我们三家巷里，周炳是一个人才，而对于人才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鲁莽从事。要是有机会，”从这一句话起，他改用英文说下去道：“我打算介绍他一个起码的位置，让他从另外一个开头做起。比方商业，就是一条不平凡的道路。而凭他的性格，他一旦认为什么事情是对的，他就会做得很卓绝。”

《赛龙夺锦》描绘的近代音乐人群像

文 许泽红（《花城》编辑部）

缘起沙湾的广东音乐

在《赛龙夺锦》书稿未成之前，除了番禺沙湾，并没有多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广东音乐缘起沙湾，知道沙湾何氏三杰对于广东音乐的重要意义。《雨打芭蕉》《陌头柳色》《赛龙夺锦》，这些音乐的旋律弥漫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你不知道它们的曲名，却定能在旋律响起时轻轻跟着哼起来。百年间，这些乐曲已经随着岁月和人们的迁徙，往广州、香港、上海，乃至东南亚和北美飘去。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就有记得广东音乐的耳朵。这些对广东音乐的创始与传承作出突出贡献的近代音乐人，值得被铭记、被塑造。

《赛龙夺锦》塑造了一个 Z 时代海外华人青年何八月，以及他的爷爷何四方，这对祖孙串起了整个沙湾何氏海内外音乐创作、流转及传承的谱系。并用回环呼应的叙事结构，首尾呼应，前后接续，完成时间和空间的瞬移和故事的叠加，层层推进，完成整个何氏宗族谱系和音乐脉络的显形。

小说分成八个部分，序曲“银河会”，少年的何博众承欢在阿嬷膝下，听她给他讲何氏迁徙沙湾的历史，何氏起家的根源。一个家族长达六百多年的繁衍历史，一代一代的祖先，在后来人的讲述中，往往被删繁就简，回望之时，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传奇故事和人物被永远铭记。比如：沙湾是鳌鱼吐沙吐出来的。鳌鱼龙头鱼身，是守护沙湾的吉祥物，是沙湾人崇拜和信任的图腾。有鳌鱼才有沙湾，才有丰衣足食和丝竹弹奏，才有广东音乐。何氏家族的开端，在这序曲中被浪漫的鳌鱼传说和温馨的祖孙情中一一叙说铺陈。

何氏家族人物群像简析

Z 时代新青年的寻根之旅。何八月是一种新型的例外，区别与他的祖辈、父辈，他这一代人，受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影响最大。这个出生网络时代的青年，有着前几辈远远比不上的信息检索和收集的能力、空间转换的巨大便利。作者用这样一个物，能更好更便利地节省时间并能便捷切换空间，去更好更全面地梳理、完成这次广东音乐的寻根之旅，完成为番禺沙湾何氏三杰立传的使

命。这既是何八月的使命，也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使命。

何八月，出生于加拿大，虽然遗传了家族的音乐天赋，却因没有在故乡成长而对自己产生怀疑：“我不确定身上还有没有您说的那种东西，我的音乐气象里有没有一种东方的灵动的东西。”这一不确定性成为他毕业创作的阻碍，也促使他决定回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读者显然从何八月的身份，已经能理清一条大体的脉络，祖先的遗传、血脉基因里带着的秘密，仿若有隐形的管道输送到他身上，引导他通过身体的还乡完成一次精神的还乡和灵魂的着陆。与之对比的，是他出生于广东中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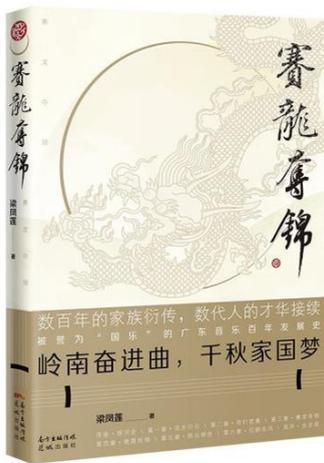
何氏远亲——女孩何七月，出身豪门，同样遗传了音乐天赋，却不得不读商科，接着继承家业，然后像个机器人一样在商海中拼杀，为守住家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努力。她是作为一个与八月对照的人物而存在的，年龄相仿，性别不同，一个出生于中国，一个生在加拿大；一个学商科，一个学音乐；各自的命运不同使命不同。何七月被家族企业绑住了，即使在海外求学，也常感身心的不自由，家族使命和灵魂的本我的背离，使她处于一种认命又不甘的状态中，她也清醒认识并接受这一切。何七月的不自由，对比何八月的不确定，发自内心的寻找根源的欲望，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何八月设定进一个必然条件中，他有自己的家族归宿和使命召唤，只有他才能串联起海内外整个广东音乐的传承谱系，只有他回到中国才能重新畅通自己身为何氏后人的血脉基因，才能迸发出新灵感，“音乐就

是永远的一棵大树”，“你要找到你的根，长成一棵大树……”

广东音乐的创始人——何博众。《雨打芭蕉》这一章讲“何博众的故事”，便是作者以人物为经、历史事件为纬展开的合理想象和虚构情节。何博众，何氏家族大家长，德高望重，人称四爷，也是何氏三杰的祖辈。在梁凤莲的笔下，他焕发新生，序曲中那个听着祖母讲古长大的少年，此时已长成一户大户人家的公子，天真纯良、天赋极高，善音律，工琵琶，一曲《十面埋伏》曲从情变。也因隔壁院里传来的庆春班汪水云的《十面埋伏》而认识戏班才女汪水芸。“何博众从众

多的声音里，清楚地听到了那把琵琶的声音，琵琶还没有停，何博众感觉是听到了一种召唤，一种未来更美好的日子在催促着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紧紧地抱住这种美好。”何博众与汪水芸因这首曲子而相识相知，音乐的魅力即在于此，旋律的鸣放促使人产生共鸣，善于打动人心，产生情感的共鸣，迸发出微妙的默契和交集。徽州和广州两个不同来处的青年男女因为音乐的魅力而开始情窦初开，萌生出男女情愫。但是，在离散的时代，

爱情是不符合现实的奢侈品，一场灾祸就能把让他们走散，从此天人永隔，只在午夜梦回时忆起。也是这种爱而不得的感情，最能彰显和表现人性的一面了。这使得何博众这一人物形象成功被立起来，“乐器就像人的性情，有正经的一面，也有随性的一面”。书中何博众就像他手中的琵琶，有情有义，有锐气，有柔情，在这种日经月累的自觉学习和同行交流中，他的音乐才



《赛龙夺锦》

作者：梁凤莲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华横溢，创作能力也日益精进，由此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名曲《雨打芭蕉》《饿马摇铃》和《赛龙夺锦》的初稿《群舟攘渡》，给何氏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音乐遗产《何氏家传秘谱》，奠定了沙湾广东音乐原乡的地位。

武状元有一个热爱音乐的灵魂——何柳堂。何柳堂小名大头森，是何博众最疼爱的孙子。作者给何柳堂最得祖父青睐创造了合理性：“四爷何博众常常对何柳堂说：你出生的那个夜晚，我梦见了一条五彩鳌鱼从海里游上岸，一直游进了留耕堂，我赶紧追上去，鳌鱼化作一片彩云消失在东方。醒来之后，我走出门口，望了一眼天边，天快亮了，东边果然是红霞满天，有一片云漂在天上，就是我梦见的那条鳌鱼的形状。”鳌鱼啊，那可是沙湾的图腾，这无异于强调了何柳堂的出生的吉兆，赋予他被偏爱的合理性。就像何柳堂自认为的一样，他有两个自己，最开始，他是“大头森”，是武秀才，一个是有着何博众影子的音乐才子何柳堂。一文一武，动静两种状态，矛盾又和谐地在他身上共生，交换扮演他生命中的两种活法。

他注定要把何家的琴传下去，被他传下来的是何家的灯笼局。音乐到了何柳堂这里，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教化的意义。何家历来是耕读传家，家境殷实，绵延几代，便容易滋养出懒散之辈。从省城考完武秀才回来的何柳堂，发现沙湾的烟馆、赌馆不减反增，曾经丝竹悦耳的祠堂被何氏子弟变成了赌窝和不务正业玩乐的场所。有鉴于此，何柳堂力挽狂澜，果断贴出告示，禁止何氏子弟聚众赌博，一扫歪风邪气。自掏腰包，重整祠堂，成为何氏子弟的主心骨，接续爷爷何博众的灯笼局。《群舟攘渡》横空出世几十年，传到何柳堂这里，历久弥新，几番修改，他和何与年、何少霞、陈鉴等人在灯笼局上多番历练、反复推敲，更名《赛龙夺锦》。

作者对于何柳堂进行了不同侧面的深刻描写，他带着祥瑞出生，却因“命硬”，两岁便克死了父亲，后被过继给了八叔；他因命硬被何氏上下几十人忌惮，却备受祖父青睐，深得祖父琵琶真传。他出生于耕读世家，却不喜舞文弄墨，更爱拳脚功夫。他有功名在身，却一身正气，目光长远，聪明睿智。第一步，给他一个复杂的身世，凸显他的与众不同。第二步，反其道而行，家族文艺细胞，他只遗传了一半，另一半，便是他往后人命运的伏线，可做不同的刻画。



② 何博众



② 何柳堂



② 何与年



② 何少霞

第三步，关上一道门，又给他开了一扇窗：堂弟何与年沉迷赌博，斗蟋蟀，越陷越深，他多次劝诫均无果，最后智斗地痞流氓，用一只连滩蟀赢回了赌资。解救了何与年，他却得罪了地痞流氓。时局动荡，沙湾本就不太平，他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只好前往香港谋生。由此才有了后来认识钟声慈善社的丘鹤侑、陈绍棠、尹自重、钱广仁以及吕文成这些音乐同行。何柳堂的香港之行，加入钟声慈善社才是音乐表演及教学工作，正是印证沙湾音乐正式走出广东，开始流传的一个标志。

浪子回头，何与年的传与承。在深得何博众琵琶真传的孙子辈中，除了何柳堂，便是他的堂弟何与年了。何与年真算是一个异类了，与堂兄何柳堂相比，他少时有一段时间“长歪”了，聚众赌博、斗蟋蟀、收保护费……俨然一副纨绔子弟做派，要不是何柳堂及时把他拉了回来，世间恐怕少了一位音乐才子。这当然又是出自作者的虚构，小说主要人物的合理虚构，被赋予不同的命运和人格，不同语言和遭际，人物也因这些设置的“人生障碍”而显得真实可亲，更像一个人。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在何柳堂和何与年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我们仍能看出二人的殊途同归——对祖父琵琶技艺和乐曲的传承和创新。在何柳堂的故事里，何与年留下的是一个勃然醒悟的模糊身影。行文至《晚霞织锦》，他终于成了音乐家何与年，相较于何柳堂，何与年受西方音乐的影响更深，思想更为开放融合。从何与年少年的不羁中，早已暗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开放与包容。他有才华、技艺和求新求变的愿望，即使人到中年，也不忘将家族音乐发扬光大，也是他带着广东音乐在上海成功灌录《赛龙夺锦》唱片。前文铺垫至今，何与年这个人物的弧光终于在灌录唱片的时候有一次集中的凸显和描写，从现场录制的任务安排、乐器调配、音域修改到控场能力，何与年展现出专业素养和人格魅力。“经历几代人的打磨，从沙湾的灯笼局，到香港的乐社，如

今登上了大上海的舞台……今时今日，沙湾何氏家族的音乐终于有了一个交代，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寓教于乐，借音乐安身立命——何少霞。《陌头柳色》中的何少霞，与他的两位远房叔父相比，更多了一份柔和至善的气质。生逢乱世，谁都无法预估自己的未来。“危机是故事必备的场景。”主人公的命运在遭遇危机这种激励事件时会被迫作出自己本能的选择。当日本人闯入沙湾时，能逃的都逃了。而何少霞却选择留下，他知道凭借自己羸弱的身体，一段逃难的路程更容易要了他的命。与其跑出去应对不可预料的命运，他宁愿留下直面日本人的威胁。由此，犹如一个横切面，他的性格已被作者用一场危机彻底透露给读者，我们甚至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柔中带刚的人。纵观全书，作者对何少霞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升转换了一个新的角度和层面，何少霞这个人物形象是小说中明晰的性别框架里面，兼具了女性特质的一个综合性的形象，这种柔韧的被刻板印象认为的属于女性的气质，其实是在男性身上存在的，它可以在任何人身上显现，并不专属某一性别，“在何少霞看来，每个人都兼具了男性、女性的气质”。也是在何少霞这个角色上，可以显而易见梁凤莲女性叙事的痕迹。她塑造了一个外表文弱，内心则有另一个坚强的自我挺立着，渴望田园牧歌生活，却在战火纷飞中昂然挺立的谦谦君子。所以才有后文中他毅然拒绝何健向陈璧君献曲谄媚，无惧威胁，敢于用“亡国之音”劝诫何健，又敢弹奏救国之音，家国危殆，山河破碎，何少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赛龙夺锦》里面，每一个或真或假的人物角色都有自己命运的走向和最终的终点，而何四方这个角色是整部小说真实与虚构转化的一道桥梁，他联通起了20世纪何氏三杰之后所面临的传跟承的故事走向。实际他就是一个工具人，一个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从20世纪到21世纪，

从中国到海外这样的一个流转腾挪的符号。这是作者小说结构中将现实与虚构嫁接的过程。广东音乐传承的一种隐形的路线，被作者用有形的、可视的小说文字跟虚构人物塑造起来了，使之更生动直观，通过丰满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几乎每一个何氏家族的人都有明确的使命和属于这个人物的是时代和个人标志性事件。由此，小说达到给予读者对广东音乐背后的故事形成一种强烈印象的目的。

编辑视角下的《赛龙夺锦》写作手法浅析

小说的人物简析到此基本结束，再看一下梁凤莲对整个故事的一个定位叙事框架的建构，相信她也是经过了多番尝试和取舍的。在小说有明确的原型人物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基本以虚实相生、虚构跟真实相结合的方式呈现这样一个故事，横向有同时代的音乐艺术家对照，纵向则是何氏家族一代代子孙后辈的衍传谱系。当历史事件和人物被转化成被艺术化处理、合理虚构情节去变成故事的时候，它是更有利于传播的。

小说用何博众、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等六人构建出完整的沙湾音乐百年史。每个人都各有性格，个人命运面临着或时局动荡，或战火纷飞，或社会大变革的艰难选择，但他们因为有了音乐这种超脱世俗负累的精神追求和抒发通道，所以能够保持初心，坚持本心，内心富足而敢于与艰难的生活对抗，敢于承担责任，人性的光辉使之既平凡又可敬。个人命运折射出时代命运，时代也因为这些历史而显出厚重底色。

另一方面，小说中还体现出了强烈的宗族观念。从文中几处对鳌鱼图腾的详细描述，到留耕堂、三稔厅等沙湾何氏聚居地这些祠堂作为主要叙述场所等，到何博众这个传统家族族长的刻画，无一不在彰显宗族意识对于传承的至关重要。祠堂就是教化子孙、灌输观念的集散地，承担了

教化功能、传播功能和展示功能。沙湾何氏家族对于广东音乐的传承贡献巨大，不得不说，也是仰仗了这种强大的宗族观念才得到重要发展的。

小说同时又凸显出本土作家写作的方言特点，梁凤莲是最适合这个题材的作者，她身上自带的广府气质和开阔的知识视野，以及端正和真诚的写作态度，才能驾驭这个题材。无论是民俗文化、一盅两件、茶楼堂会、本地俗语、在地名词，甚至广东音乐专业术语和知识等种种细节，都不是几次采风就能轻易摄取的。取一个方面简析，小说中对于粤语方言的使用，她是费了大功夫的，书中弥漫粤语方言的气息和各种方言恰到好处的好处使用。第一是结合上下文构建语境，促使读者理解方言：“何少霞没有因为成功帮助徐柳仙而转行去做一名度曲人。”结合语境，“度曲人”其实就是编曲人。“不要乱说话，你以为编古仔唱戏啊”，这句又杂糅了普通话和粤语。更直观的方法，则是在方言后加注，如屋企（家里）、大天二（地痞）等。这也是作者身为一个广州土生土长的作家，对于用本土的语言创作的时候的一种融合，一种较为妥善的小说语言的处理方法，既能不失岭南韵味，又不影响读者的阅读。

长篇小说《赛龙夺锦》的面世，是最合适的作家，遇到了属于她的题材。身为土生土长的在地作家，梁凤莲是一个“复杂”的人，这种复杂来自于外在赋予她的多重身份，既是学者又是作家，还是妻子和母亲，庞杂的日常事务并没有消解掉她写作的激情和精力。她写《赛龙夺锦》，尽可能扩大了广东音乐和沙湾古镇的阈值，甚至可以说，她“贪婪”去用尽自己，去掌控这个题材，去复刻还原沙湾乃至整个岭南文化区域的市井生活和记忆，展现和散发小说人物的魅力，展现沙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小说的世界里面，沙湾是他们的精神桃花源，是家族的归宿。这里有丰衣足食、丝竹弹奏。“爱与力量携手同行，一切都会生生不息。”

歌从山中来

——客家山歌的大山情怀

文 陈菊芬（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

客家山歌特出名，条条山歌有妹名，
条条山歌有妹份，一条无妹唱唔成。

这些悠远绵长如同天籁，而又似曾相识恰似乡音的歌声，就是名闻遐迩的客家山歌。我们追随歌声和歌声背后的故事，寻访华夏文化的重要代表——客家文化。

在历久弥新的中国，有一支客家民系，他们是汉族这个庞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包涵了语言、服饰、饮食、建筑，尤其是山歌，这所有的总和，被称为客家文化。它具有华夏文化的共同特征，坚韧、绵长、富于凝聚力与延续性。

客家山歌，以歌证史，展开的是一幅全景式的客家文化地图。从故土中原迁徙到南方，再开枝散叶到全球。黄河是客家人的母亲河，中原是客家人的母亲大地，更是客家山歌的母歌。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精神的凝聚。从中原到南粤大地，从原乡到五洲七洋，客家山歌是流淌在客家人血脉里的律动。山歌里，有客家先民穿疆过埠的艰难，有等郎妹令人断肠的辛酸，有妇女田头地尾劳作的坚韧，有少年郎崇文重教的恭敬。客家人根在中原，情系河洛，他们是华夏的子民，是炎黄子孙。无论漂泊到哪里，无论相隔多么遥远，被黄河水浸染过的客家儿女，都浸透了永不褪色的印记，那就是：我是客家人，我是中国人。

客家山歌中，充满客家人对故土的怀念，对

住处的爱恋，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每一首山歌，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幅生动的画面，一段立体的历史。这山歌里的画面、山歌里的故事，就是客家人的地域版图，更是中华文明的脉络。

走过客家的千山万水，听过山歌的百转千回。我，为客家山歌而来。

大山之声

客家人对中原血脉的继承，山歌是最有力的证明。“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山歌在山里唱，山歌是山里人唱。

南中国连绵的大山，是千年来客家人魂牵梦萦的摇篮，生长歌哭的舞台。客家人走出封闭的围龙屋，狭小的古村落，睁眼、抬头、落脚，都是无始无终的山地。他们在山野之间劳作、行走、栖息，饥渴、孤独、恐惧无穷无尽。为了排遣压抑，寻求同伴，他们用生命来歌唱，最早的形式便是“号子”。他们的号子，不同于北方地区群体协作式的“杭育”号子，而是“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斯人独立于天地之间，四顾苍茫，期待有缘之人：

哦嘿，依溜哇老妹哎，
有好山歌哇，你都溜等啊来哟嘿！

如此热情的歌声，才能引来这山唱来那山和，悠扬、奔放，而又不失清丽、婉转，如山一

般高亮，又如山溪一般清纯，客家山歌，是山的呼唤，山的回响。

沿着大广高速公路北行，越过广东的和平县就来到江西的龙南市。我要找的是被当地人誉为“妹妹找歌泪花流”的龙南市文化馆馆长廖小凤。我与小凤姐姐多年前因为山歌在QQ里相识，多年来“隔屏如相亲”，常常通过QQ讨论山歌交流山歌却不曾谋面，直到2015年在江西赣南师院参加客家学术研讨会，我俩一见如故欣喜地拥抱在一起，让在场的所有专家都笑谈我俩是“失散多年的亲姐妹”。

廖小凤就是这样一位客家妹子，热情、爽朗、执着。龙南市的杨村镇是九连山脉一带，那里山高林密，“八山一水一分田”，出门谋生的“肩担客”经常与凶猛的老虎相遇。“人，三分怕虎；虎，七分怕人。”“人先作威，虎躲藏；虎先作威，人遭殃。”由于经常出门，人们总结了一套智斗老虎的秘诀，就是当他们进山过坳时，都要放开喉咙提高嗓门，高唱山歌。由于歌声又尖又亮，高亢悠远，久久回旋在山谷之间，老虎听到歌声不敢作威，乖乖让路。龙南高腔山歌“过山溜”便因此得名。

2004年廖小凤在文化馆工作，她去拜访音乐前辈钟诗权时，钟诗权把20世纪80年代采录的过山溜录音带放给她听：

啊喂！阿哥（尼格）出门（哪）过广东（喔），
打只（啊）（尼格）山歌（哇）显威（呀）
风（哟）！
隔山（哪）（尼个）老虎对傩走（啊），
寻到（哇）（尼个）钱来（哟）转家（呀）
中（哟），（啊喂啫）！

由于使用非常难懂的杨村方言演唱，衬词又是如此丰富，演唱形式也很独特，除了能听懂“啊喂啫”之外，基本上不知道唱的什么，但小凤却被它的音乐气势深深打动，被前辈的辛勤付

出所感动。钟老师还介绍说：“杨村过山溜是很有代表性的客家高腔山歌，因为音调很高，演唱难度很大，因此很少人会唱。盒带中的演唱者叶金桥，在1979年采录的时候唱得很好，第二年就唱不来了，现在已经过世了，还有一位能唱的也已经过世了。”

都说一方传统艺术照亮一片天。为了不负传统，不负前辈，不负自己的梦想，2005年廖小凤开启了前往60公里外的杨村寻歌之旅。

起初，她请乡镇文化站干部带路，结果不是扑空，就是村民不好意思唱，听得最多的理由是：牙齿都漏风了，歌词也不记得了，唱得不好听……有时候磨破嘴唇总算开口唱，也是耳熟能详的普通山歌调。于是，廖小凤改变策略，在公交上寻找，因为杨村公交每班都能坐满，路上将近60公里。由于一路有人上下车，需要2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可以接触很多村民，而且村民相互之间不一定是熟悉，不熟悉容易开口唱。廖小凤原本晕车呕吐，但她强忍难受在车上带头唱山歌，以此唤起乡民们唱山歌的兴趣，进行各种山歌交流……多年的公交车上的山歌交流果然很有收获，廖小凤不仅得到更多线索，而且被锻炼得不晕车了。

寻找杨村过山溜的第五年，终于有了回报。

2009年1月14日除夕之夜，廖小凤得知一位在广东打工的农民工回来过春节，便一早赶往杨村。杨村人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杨村的美食也一样出名，年料、米酒端上来，她们边吃边聊，很快聊到过山溜，67岁的老人两眼放光，但是只是眯眯笑，就是不好意思唱。于是廖小凤故意哼唱一曲“过山溜”逗他，问他是不是过山溜，他这才亮开嗓子唱起来了。他一亮嗓子，廖小凤的心顿时亮堂了，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流，这么多年，总算把唱老虎歌的阿哥找到了。虽然听不懂他唱的什么意思，但是从歌声能想象出它的画面、它的意境。赖月全，一个憨厚的农民，在

广东打工因为思念家乡，寂寞时常常哼唱家乡的山歌解闷，工友们把他当作打工歌星，常常鼓励他唱山歌。如果没有这段打工经历，或许他和其他村民一样不好意思唱。

苦心人天不负，五年寻歌问艺，妹妹找歌泪花流，有辛酸的泪，更多的是开心的泪，虽然付出了很多，但得到了更多。

为了让这个珍贵的山歌活下来，传下去，廖小凤一手做保护研究，一手做传承实践，培养更多的传唱人，在龙南的各种艺术场所、中小学课堂乃至省内外，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都能听到廖小凤高亢的过山溜和热情洋溢的笑声。虽然，“肩担客”的生活场景已经一去不返，而老虎也成了珍稀动物山里见不到，可是廖小凤的歌声，却能引来了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热爱客家山歌的“老虎”。

“因为这个过山溜不仅是吓老虎的，后来渐渐发展成了一同砍柴的伙伴们的集结号。早晨出门大家到了溜岭（当地人称聚集的地方为溜岭），用过山溜呼唤同伴出发；到天黑要回家的时候，也集合到溜岭，如果有十个人，一个人打哦嘿，其余的九个人会发出回应，此起彼伏的过山溜在山上回荡，整个山上就是一个交响乐。龙南过山溜，它体现的是客家人的人文关怀，是团结之美，是关爱之美，是和谐之美。所以它值得我们用心守护，代代相传。”廖小凤说着这些话，脸上洋溢着像鲜花一样盛开的笑容，声音里透露着让人怦然心动的激情。

精神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正是承载在这样一种最民间的最接血气的艺术形式上。客家山歌，代表了这个族群对中原精神与文化全面的继承。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这首革命歌曲随着电视剧《长征》的热播飞遍大江南北，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不多人知道，它改编自江西的客家山歌《长歌》，因为歌曲有十段，又名《十送郎》，1960年在中国革命历史歌曲表演活动中，由空政歌舞团演出而扬名。它之所以传唱不衰，除了红色主题之外，连绵往复的句式，温柔婉转的曲调，还有南方山区红土地上的种种风情，多为客家女人送自己的表哥上南京下广东时的心声：

一送里个表哥，介支里个柜子边
双手里个拿到介支里个两吊钱
一吊里介拿你，介支里格零星用，
还有一吊拿给你做盘缠，
表哥听妹话，出门浪子都要里介爱惜钱

《十送红军》与这首江西客家山歌《十送郎》，音符都没怎么变，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年的中央苏区与客家大本营是重叠在一起的，赣州市、梅州市，加上闽西近10个县，以及广东的南雄、龙川、饶平，都在中央苏区范围内，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客家人。

中央苏区是共和国的摇篮。

《十送郎》那句句叮咛，声声牵挂，还有婉转缠绵的曲调，就是客家人祖祖辈辈一路传唱下来的。不说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灭种”的对客家乡亲的大屠杀，只说当年跳出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的铁壁合围的中央红军，开始是30万人，过湘江之前还有8万人，而最后到达陕北的则只余3万人了，而这30万人或8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赣南兴国、瑞金的客家子弟，赣南的将军县兴国，当年的人口23万，就有9万人参加红军，可谓男女老少齐上阵。客家人用鲜血与生命，保住了红色的火种。二万五千里路长征路走下来，每一里路倒下的战士里都有一位客家子弟，当年的《十送郎》，讲述着多少母送儿、妻送郎的故事。

客家人，用鲜血与生命铺就了这二万五千里征程。客家山歌，传唱着共和国一个又一个新的征程。

大山之子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
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

粤东客家人相传：被蜜蜂叮过的梨子成熟后会特别甜，但是梨核却会发黄甚至腐烂。借用感情“亲切”和把梨子“切开”的谐音，用切开梨子看到“心病”来表达恋人分离的伤感凄切，还有什么更生动更感人呢？平凡之中包含着不平凡的故事和道理，这或许也是客家山歌的“何其才之大也”。

这是中国近代卓越外交家、启蒙思想家、改革家、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辑录的客家山歌。他被誉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位大诗人，也是近代最早的第一代大诗人。他把客家山歌称为“人间天籁”，认为“以人籁易为，天籁难为也”，是所谓的文人墨客无法企及的。

世界客都梅州市东郊周溪畔的“人境庐”是黄遵宪的故居。人境庐取意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名句。1884年春，由黄遵宪亲自设计建造，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曲径回栏，花木掩映，景致清雅的人境庐，黄遵宪晚年创作了大量诗歌，并自选和编订了《人境庐诗草》。

这里距梅江不过百步，现今的城市已不是从前的禾田、鱼塘；更不见牧童、樵妇和船老汉“哦嘿，依溜哇”的劳动号子夹杂着的山歌声，只能从这里陈列的书稿和文字去搜寻黄遵宪的少年生活。他的家庭是书香门第，曾祖母李氏和母亲吴氏都出身于封建官僚知识分子家庭。曾祖母李氏是民间文学爱好者。黄遵宪在咿呀学语时，李氏

就对他口授民谣：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
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
亲家门口一口塘，放个鲤鱼八尺长。

黄遵宪从小就受到了客家民谣、山歌的感染和熏陶。他的《人境庐诗草》的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

一把芝麻撒上天，客家山歌万万千。
唱日唱夜唱唔尽，唱年唱月唱唔完。

也许正是这种平铺直叙，又引喻巧妙的自然艺术，给了诗人与生俱来的影响。黄遵宪最著名的“诗界革命”的主张“我手写我口”，正是来自于青少年耳濡目染的客家山歌。山歌，毫无疑问，便是“从口出”的，这“松出口”的典故，在客家人中深入人心。诗人认为山歌是自然界发出的美妙的声音，是纯朴民情的真实表现，是客家山民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诗人的《人境庐诗草》收山歌九首，其小序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志。”

黄遵宪大胆地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理论，不受古人的拘牵束缚，要以“流俗语”入诗。这与客家山歌的“我歌唱我心”是同出一辙的。他一方面大量创作客家山歌，另一方面认真辑录整理客家山歌，来展现客家民间生活情景。黄遵宪因在外为官多年，时间越长，接触他国风情越多，就越思念故乡，“嗨嗨！有好山歌呀，溜呀溜等到来哟”那熟悉的山歌调，总是他漂洋过海的牵挂。

黄遵宪亲自辑录整理民间歌谣，现存有《山歌》十五首。还有用山歌体写的一些竹枝词和新诗，特别是他用客家山歌口吻写成的叙事诗组诗《新娘娘》，在当时轰动诗界。他用大量的客家山歌来展现客家人民劳动、仪式、情感、生产、过番、历史、传说等，如他所写客家山歌对唱时

的情景更加是如在目前：

一声声道妹相思，夜月哀哀和竹枝。
欢是团圆悲是别，总应肠断妃呼唏。

诗人认识到山歌是劳苦大众抒发悲欢离合思想感情的东西，是展现客家妇女别具特色的生活画卷。黄遵宪的客家妇女诗主要在《山歌》《新娘娘诗》《己亥杂诗》《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送女弟》《寄女》《邻妇叹》《五清道中作》中，共约八十多首。在这些诗篇中，诗情的笔触伸进客家妇女的生活层面，赞颂了她们刻苦耐劳、俭朴质实的优良品质。

从信阳山歌到客家山歌，正是中原旧族南迁一路上留下的“遗俗”。黄遵宪自注“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所称：“礼俗多存古意，世守乡音不改，故土人别之日客人，方言多古语，尤多古音。”

在他的世界诗文中，也融入了客家山歌，尤其是革新意识——作为大诗人也是大外交家，戊戌变法的主将之一，也正是他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这才有他率先发起的“诗界革命”，“我手写我口”，他自称：“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往往搜索枯肠……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总，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正是远离故乡，漂泊无定的岁月，才会对原乡有深深的眷恋，这才把山歌一路唱来，而了无羁绊的命运，又让人们获得一种全新的自由，于是客家山歌才愈来愈放达，称情直往，无所畏惧。

客家山歌，与客家人迁徙史就这样紧紧地焊接在了一起，难分难解，陈寅恪有“以诗证史”一说，这里，同样也是“以歌证史”了。

不学诗无以言，学诗则“授以政”“使于四方”。山歌源自诗经，这里的人民知道礼义廉耻而又学问深厚才思敏捷，才能在贫穷的土壤上生

存与发展，走出去，影响未来。

出生蕉岭高狮乡，早同山歌结鸳鸯，
相亲相爱几十载，每日同下又同上，
大家喊徕山歌汤

这就是在世界客都梅州，视传承山歌为天职的山歌大师汤明哲。

汤明哲一生都致力于推广客家山歌。他被当地客家人亲切地称呼为“山歌汤”与“汤老爹”，梅州人视他为至宝。

2006年，为了学习客家山歌，更为了筹备我在广东广播电视台举办的“青青的山歌——菊子电视歌会”，我专程到梅州寻找汤明哲拜师求艺。作为一个不是生长在梅州的被当地人称为“不正宗的客家人”来学唱客家山歌，我心忐忑。初见汤明哲，他张口就唱：

天上飞来五彩云，今日见到陈菊芬，
千里登门来学艺，日后赛歌得冠军。

我顿时泪流满面，山歌让我们在瞬间成了亲人，成了嫡亲的师徒。

汤明哲告诉我：“唱好客家山歌，传承好客家山歌，不仅需要认真努力的付出，更需要热爱文化不求回报的情怀。”汤明哲自15岁起就受母亲唱山歌的熏陶，开始唱山歌。1949年后，汤明哲考进了华南文工团，后又因“想山歌”转回梅州市的兴梅文工团。在文工团，汤明哲见老一辈人唱歌时，歌词贴满了墙壁，茅塞顿开：“能写能唱那才是真本事。”从此，汤明哲一发不可收拾地进入了客家山歌的海洋中。17岁时他便开始创作山歌。由于成果丰富，反映移风易俗题材的《山村新风》被搬上了北京大舞台，人们给他一个雅号“山歌汤”。

1988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九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广东梅州作为中国大陆内地客属团体代表首次参加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当台湾代

代表团抵达时，有数百名当地客家籍侨胞迎接；而当梅州代表团抵达时，由于此前缺少交流与了解，迎接者仅有三人。为了化解这个隔阂，以汤明哲为首的“七人客家山歌团”在当天的晚宴上举起酒杯，汤明哲用纯正的客家话即兴唱出了这首山歌：

千年榕树共条茎，世界客人一家亲。
头颅顶上共客字，隔山隔水心连心。

“一唱的时候，各位代表就尽情拍手。”至今老师都会满面笑容地回忆那个场景。山歌顷刻间打动了在场客家乡亲们的心，大半个会场的人轰动了，大家纷纷走上前来寒暄问好。美国旧金山华文报纸在次日的报道中用“独领风骚”来形容梅州山歌团当晚的表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同志相当高兴，他写了一份报告给外交部：“中国梅州的山歌手们起到了外交机构所起不到的积极作用。梅州代表团的成功亮相，也为中国梅州市1994年成功承办第十二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奠定了基础。”

从此，梅州“山歌汤”多次应邀到美国、东南亚各国演出。后来每次我在海外演出或者出席活动，各国乡亲得知我是汤明哲的弟子，都格外亲切。作为汤明哲的学生，我体会到了荣耀，更深深体会到了自己肩负的重任。

如今，汤明哲已是耄耋之年，他用更多的精力集中培养新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山歌手。1998年开始，他就在梅州嘉应学院音乐系开设山歌课，至今仍坚持每星期授课，现在梅州市区的中小学、幼儿园都有汤明哲的歌声与身影。汤明哲在嘉应学院开办了山歌特长班，并且自己出资成立奖学金制度，鼓励和挑选对客家山歌有基础和兴趣的学生考研，希望对客家山歌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与传承发展。

2009年，汤明哲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汤明哲与客家山歌一样，



⑦ 陈菊芬《青青的山歌》

永远留在悠远的音流当中，流在千山万壑，流往千秋万代。

大山之魂

八月十五月光光，阿姆同偈拜呀拜月光
阿姆问我一声，故乡在哪方啊
月光啊月光光，你呀照四方
请你讲偈知呀，哪里是偈的故乡

这是一首客家人的歌。这些年，无论我在中国境内的客家地区，或是港澳台，或是东南亚各国，只要唱起这首歌，就会不断地被要求重唱，最后一一定是全场齐唱。人们的眼睛里，此刻总是蓄满了泪。他们高唱的不仅是月光，而是月光下的故乡，更是游子对故乡的思恋与渴望。

在广西贺州姑婆山，我拜访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曾龙城，他的灵感来源于客家童谣。

海内外每一个客家地区几乎都有《月光光》这首童谣，只是歌词有别。内容或是鼓励读书，或是传播知识，或是表达审美观。但是每首童谣的开头，一定是“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月下的家乡如此美好，努力读书高中



了状元，骑着白色的马儿，穿过开满莲花的池塘荣归故乡。

一首歌，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于是歌曲创作的素材找到了客家童谣《月光光》，唐山在海外就指中国，唐山就是唐人的故乡。不同国度地域的客家人，用最融合、最温软的情怀，仰望着这一轮思乡的月，吟唱着最深情的《月光光》。

柑子跌落古井心，一半浮来一半沉 你若沉下去，莫来浮起动郎心

如果只听歌声不见人，很难相信这首山歌会出自这样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之口。他叫熊德龙，是尼泊尔与印尼血统的混血儿。

2009年，梅州世界客商大会。我初次遇见相逢熊德龙。“侬呢，两个月大的时候，在孤儿院，善良的广东梅县的华侨，在印尼把侬收养，所以从细伢爸伢姆就灌输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客家人的一种优良传统。伢姆喜欢唱山歌，侬细的时候，佢就会教侬唱山歌……细个时候，侬一家的生活很贫穷，伢爸经常为了生计在外漂泊，伢妈就做裁缝，维持生活。有时候在缝纫机旁边，侬就听佢唱山歌，所以侬认为，山歌不光旋律好听，还有它的每一句歌词，很有一种中华文化深奥的知识。”当年在梅州，熊德龙用一口纯正的梅县客家话，笑咪咪地回忆着，讲述着，仿佛碰触着心灵深处最柔软的温暖。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晃又是多年不见。

不久，我在一个客家文化网站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山歌故事：一位旅美的老太太，从年轻时起就喜爱山歌，由于长年旅居海外，异常思念家乡。在她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久久不能瞑目。是她的儿子，把童年时妈妈教他的山歌一首一首唱给

人事不省的妈妈听，从“月光光，秀才郎……”唱到了“鸬鹚鸬鹚，挑水淋蔗……”，他唱了将近一个小时。奇迹发生了，昏迷多日的老太太竟然跟着儿子唱，儿子唱一句，老太太答一句，儿子再唱一句，老太太再答一句。母子俩就这样反复唱着念着，老太太终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山歌，陪伴她回到了故里。

独坐窗前，我被山歌震撼，流下了感动的泪。

2015年，在台湾的世客会上，我再次相遇了熊德龙。谈笑间，说到这个故事。熊德龙再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还是用纯正的梅县客家口音说：“个只赖子（儿子）就系呀！”……“觉得负起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

熊德龙，这个没有一丝客家血统的孩子，没有丝毫中国人长相的外国人，直接受益于客家母亲的教育。熊德龙后来成了国际闻名的报业大亨、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华侨领袖”，他称自己是“没有百分之零点的中国血统，却有着百分之百的中国心”的客家儿子。多年来，他用一个客家人后代的情怀，关注家乡的发展，注重乡情亲情，成为华侨领袖中爱国爱乡的典范。

“礼失而求诸野”，音乐也是如此。山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客家山歌让客家人的移民特征凸显在每一个有客家人的地区。客家山歌的“山”是一种标识，更是巍然屹立、万难不屈的精神。

正是客家山歌，使客家人证明了自身是中原文明的传承者，始终不渝的传承者，一千年唱过来，一千年唱下去，不改初衷，不改本色。🌐

[本文系 2020 年度广州市十三五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广州客家族群方言歌谣的文化开放性特征研究》(2020GZGJ145) 阶段性研究成果]

《雄狮少年》：非遗国漫助推岭南文化传播

文 童雯霞 王玉洁

中国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如那擎天柱上的醒狮头，以谁与争锋的姿态立于荧幕。这是一部书写岭南少年在传承非遗文化中成长的励志故事：广东乡下陈家村的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阿狗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参加舞狮比赛，师徒相互扶持，岭南少年从最初的“废柴病猫”蜕变为“热血雄狮”。自2021年12月初开启点映以来，《雄狮少年》在各平台的热度持续飙升，票房预测超20亿元，豆瓣评分8.3，被豆瓣收录于“2021年度榜单高分电影精选”和“豆瓣2021评分最高华语电影”。随着电影热度的不断提升，代表岭南非遗文化的“醒狮”正在成为国漫新潮符号，《雄狮少年》从凝练文化精神、丰富表达方式、唤醒深层记忆三个方面深度挖掘岭南文化的情感内核和精神底蕴，有效地助推岭南文化的传播，是非遗文化与动漫创意相结合的成功实践。

价值引领：凝练岭南传统文化精神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在赓续文化精神。近代以降，岭南经济发展迅猛且活力无限，其重要支撑点便在于岭南人民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特质。《雄狮少年》将岭南文化奋发向上的传统融入当代少年的血脉，体现了岭南精神的传承与文化的赓续。

影片的主人公阿娟心中埋下舞狮的梦想，在经历过种种现实困难后，最终赢得舞狮比赛。“不认，我就是不认”“只要鼓点还在心中响起，你就是雄狮”“你有没有听见，心中有一声咆哮”……《雄狮少年》这些振奋人心的台词随着高低起伏的鼓点声一字一句地敲进观众的心里。影片有一段场景搭配着《少年中国说》的背景音乐，“少年强，则国强……”，彰显国人已从当年的“东亚病夫”觉醒为“东方雄狮”，勇敢的当代岭南少年身上有股不服输的精气神，历经磨难不被压垮，越挫越勇奋起直追。狮子为百兽之尊，岭南舞狮所寓意的吉祥、兴旺、勇猛、奋发之精神通过影片予以传导，《雄狮少年》立足传统文化根基，将“雄狮”与“少年”融为一体——“雄狮”不仅

是岭南文化的符号，更是少年突破自我的象征。可以说，《雄狮少年》有效地实现了对岭南文化精神的深度挖掘，让观众在了解岭南民间舞狮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中国少年的热血、顽强和植入血脉的文化底蕴。

融合日新：丰富岭南文化表达方式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历史的血脉。如何在当前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创新传播的表达方式理应成为突破该课题的重要路径。

在《雄狮少年》上映以前，国漫在电影市场中已处于“活跃”状态：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6年《大鱼海棠》、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和2020年《姜子牙》等都是国漫崛起过程中的优秀之作。但上述国漫作品与《雄狮少年》最大的不同在



◎ 《雄狮少年》电影宣传画

于，前者皆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题材，是对神话故事的内容和人物形象的改编，满屏的魔幻主义色彩成为观影的前置感受；《雄狮少年》则从传统神话故事的题材中突围，“街边上的手推车”“打工人的集体宿舍”等可感可及、颇接地气的画面时刻提醒着观众，这是一部融入现实元素、地域特色的现实题材动画电影。

虽然是现实主义题材，但《雄狮少年》选用了年轻人喜爱的动漫进行故事的呈现，运用丰富的多元的多媒体手段将历史语境、现实语境融为一体。影片开篇用国漫摇曳生动的呈现方式展现了浓郁的岭南特色：粤语旁白与水墨画拉开帷幕，水墨丹青之间，国风与国韵奠定影片的主体基调；狮子穿梭其中，灵动与活泼展现得栩栩如生。通过动漫的表达方式，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缩小个体在接受文化时的消化过程，在愉快地领略岭南文化的同时对“舞狮”这项岭南民间艺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如今我们已经从读图时代进入读视频时代，动漫艺术在内容叙事、语言表达、色彩呈现以及观众心理接受度上都拥有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有着新媒体基因的动漫艺术与带有历史密码的非遗文化一旦结合便能生发出更为愉悦的审美体验，有助于对传统文化、非遗文化进行深度诠释。反过来，丰富的话语表达也助力这部无IP、无流量、无明星的“三无”动漫作品跃上高台。

符号传播：唤醒岭南文化深层记忆

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提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其本质是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集体记忆产生于存在社会中且具有互动行为的个体，它内化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阶段的见证与依据，更成为建构其文化遗产与精神延续的“支撑工具”。在《雄

狮少年》中，创作团队通过聚焦岭南文化的指代——“舞狮”，唤醒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从而实现文化传承的载体。

岭南近海临江，近代以来外出工作、求学者众。影片将顺德的烟火气息与都市的繁华拥挤作了鲜明对比，两种场景的切换勾连了文化的过去与现在、社会的发展与困境，引发观众共鸣。随着剧情的推进，熟悉的岭南风物一一浮现，逐渐唤醒游子的文化记忆——儿时在村庄的巷子里与小伙伴们奔跑的喧闹，与家人同去宗祠里祭拜祖先的虔诚、木棉树干涂鸦的欢愉——最终这些记忆聚焦于“舞狮”。

2006年，富含岭南文化意蕴的醒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醒狮是一项承载岭南乡愁、联结岭南民心、凝聚岭南认同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雄狮少年》以具象化、小叙事的风格反映宏大主题，将醒狮这种兼具公共价值和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符号化、立体化、本土化，有效地完成了对岭南文化的深度挖掘。

综上所述，动漫因其具备亲和力和可视化，逐渐成为创新传统文化表达与交流的突破口，推动传播者和受传者有效地进行编码与译码，最终达成“文化共通”。《雄狮少年》在深度挖掘岭南文化上做出成功尝试，影片从凝练文化精神、丰富表达方式、唤醒深层记忆三个方面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与有效抵达。影片以喜闻乐见的动漫形式创造性地将极具岭南特色的非遗舞狮、粤语插曲和岭南风貌融为一体，讲好岭南故事、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更具活力的现代岭南文明。🌐

[作者分别为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2021级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共建项目“以岭南文化为基础推进人文湾区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GZGJ257]

客家酿豆腐

文 彭伟栋（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身为客家人，最喜欢吃客家酿豆腐，那种醇香一直挥之不去，是正宗“家乡的味道”。为何要叫“酿豆腐”？我问家人，他们说，这个“酿”字并非酿造之意，而是客家话动词，表示塞入馅料，酿豆腐即是塞入馅料的豆腐。可见，客家人用的字眼非常形象、简洁。豆腐，虽然软绵绵的，吃来爽口，但比较清淡。而塞入肉馅后，味道便丰富了。

关于酿豆腐，有个小故事：有兄弟二人赶路，来到客栈，饥肠辘辘。他们一个对店小二说要吃豆腐，另一个对店小二说想吃猪肉，争吵不休。店小二左右为难，后来还是老板精明，灵机一动，制作了新的菜式——酿豆腐，既有豆腐也有猪肉。兄弟二人品尝后立刻大赞好味道。自此，酿豆腐慢慢风靡客家人圈子。

故事带有神奇色彩，可信度不高，但总是寄托美好的想法：看似无心插柳，实际仰仗老板的聪明和用心，才能作出好菜式。

酿豆腐的做法比较独特。我妈妈和妻子先按要做的豆腐数量准备馅料，调配馅料用瘦猪肉、葱花、鸡蛋一起搅拌，下一些盐粒和酱油，不一会便调好。她们将一块豆腐对半切开，朝豆腐切口边挖个“大洞”，塞进馅料，然后将其放进锅里煎。她们先倒食用油热锅，将露出馅料的一侧贴锅底煎，馅料呈赤色后散发喷香，另三面来回煎，不一会，十多块酿豆腐便起锅了。然而，这还不算是完成，最后一个步骤须用砂锅焖，因里面包着肉馅，煎只能将表皮弄熟，要真正熟透、入味，必须放在砂锅里煮。焖煮十多分钟后，才可开吃。那浓浓的豆腐味拌着喷香的葱花猪肉馅料，咬起来有嚼劲。

每年临近春节，我的家人都会制作大量客家酿豆腐，送给亲戚，或者留着放冰箱慢慢吃。家人做过年的酿豆腐下足了功夫，不像平常用煎的形式。她们酿好豆腐后，拿着一块块去油锅炸，在油水的浸泡下，酿豆腐从里到外慢慢地熟透了，全身变成金黄。这样的做法让豆腐更酥脆，馅料更喷香，比煎后再焖的酿豆腐更好吃。

豆腐是平凡的，但因将肉馅与豆腐结合，却“孕育”出了不平凡，成了客家名菜。由此，我想到了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价值，看你能否发挥潜力而已，连不起眼的豆腐也会有“春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 客家酿豆腐

中国海龟湾

文 刘明霞

作者简介

刘明霞，国家二级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惠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东江文学》执行主编。已出版小说集《新娘》，散文集《飞舞的高跟鞋》《邻水而居》，报告文学集《可园客厅——在湖畔遇见文艺名家》，长篇报告文学《乌禽嶂下的中国好人》。长篇报告文学《乌禽嶂下的中国好人》获广东省文艺创作“五个一”工程奖，散文《邻水而居》获广东省文学大赛二等奖。

海龟湾是中国大陆 1.8 万公里海岸线上海龟的最后一张产床，是中国唯一一个海龟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海龟约占全球人工驯养总数的三分之一，被列入“拉姆萨尔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这里是 大亚湾与红海湾交界处，是稔平半岛最南端的大星山南麓——惠东县港口镇海龟湾。从山顶上沿着延绵曲折的观海栈道一级级往下走，站在距海面 10 多米高的山崖上，俯身往下看，脚下的海水汹涌着波涛，哗啦啦冲击着礁石，浩瀚海风呼呼地叫着拂面而来，有点儿惊险。这条栈道，因之与台湾省屏东县的垦丁很像，人称“小垦丁”。

岭南的初冬是温热的，偏这两天气温突降 10℃，气温微凉，短袖外边套件风衣正好。海面罩着一层浓浓的雾，随着阳光时隐时现，波光粼粼起来。因为是工作日，人比较少，三三两两地在栈道上观光拍照。记得几年前来采风的时候是 6 月，这山上一丛丛的山稔子花正含苞吐蕊，红白相映，灿烂艳丽。

从惠州市区到港口镇，只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港口历来是边防要塞。1718 年，清政府为抵御外敌侵略，在港口大星山修建了炮台。1962 年的小星山战斗，港口英雄民兵连创下全国首例民兵单独作战，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光辉战例，被拍成电影《南海长城》。我曾采访过小星山战斗英雄张苞的妻子曾解，对港口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据陪同采访的海龟保护区管理局宣传教育科主任俞国中介绍：海龟湾面积达 18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约 2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 4000 米。这里地处低

纬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22℃，沙质松散细腻，生物饵料丰富，富有马尾藻、鲍鱼、真鲷、石斑、海参、海胆、乌贼和海豚等水生动植物1300多种，其中大量分布的马尾藻等海藻床、珊瑚礁，有净化水质作用，这里自古就是海龟产卵繁殖的天然场所。

下到平缓沙滩上，面对着一浪浪冲刷过来的海浪，感受着一代一代的海龟在这里重复着它们的生命轨迹……

二

几天来，俞主任带领我们参观了巡护道路、海龟繁育基地、海龟科普馆、瞭望台、专家楼等保护管理设施，见了几位多年来坚守在这片海滩的“护龟人”。

海龟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世界上现存海龟共7种，中国有绿海龟、玳瑁、螺龟、太平洋丽龟和棱皮龟5种，以绿海龟最多，其余4种已很稀少，这个保护区主要保护绿海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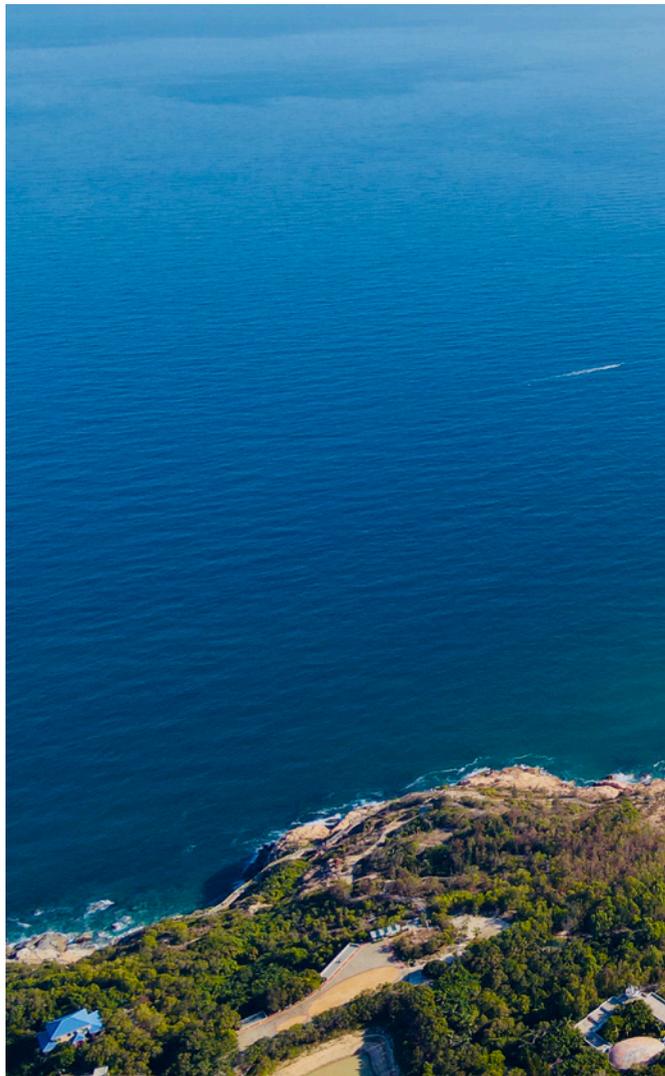
截止2021年，保护区海龟繁育基地内现有成年海龟2000多只，约占全球人工驯养海龟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为野外救护暂养及全人工繁殖。

保护区内设有海龟救护中心，人工繁殖的海龟和救助的海龟都在这里饲养，这是游客止步的区域，在俞主任的引导下，我们小心地顺着山坡，下到这个5000平方米的大棚养殖区。

一进入大棚就闻到浓浓的海腥味，水池里种着长势旺盛的海草，俞主任伸手捞起一把：“这些都是海龟的食物。”

走进“成龟繁育区”，过道两边一格格的水池里养着各种海龟。俞主任介绍，人工繁殖的海龟，种类以绿海龟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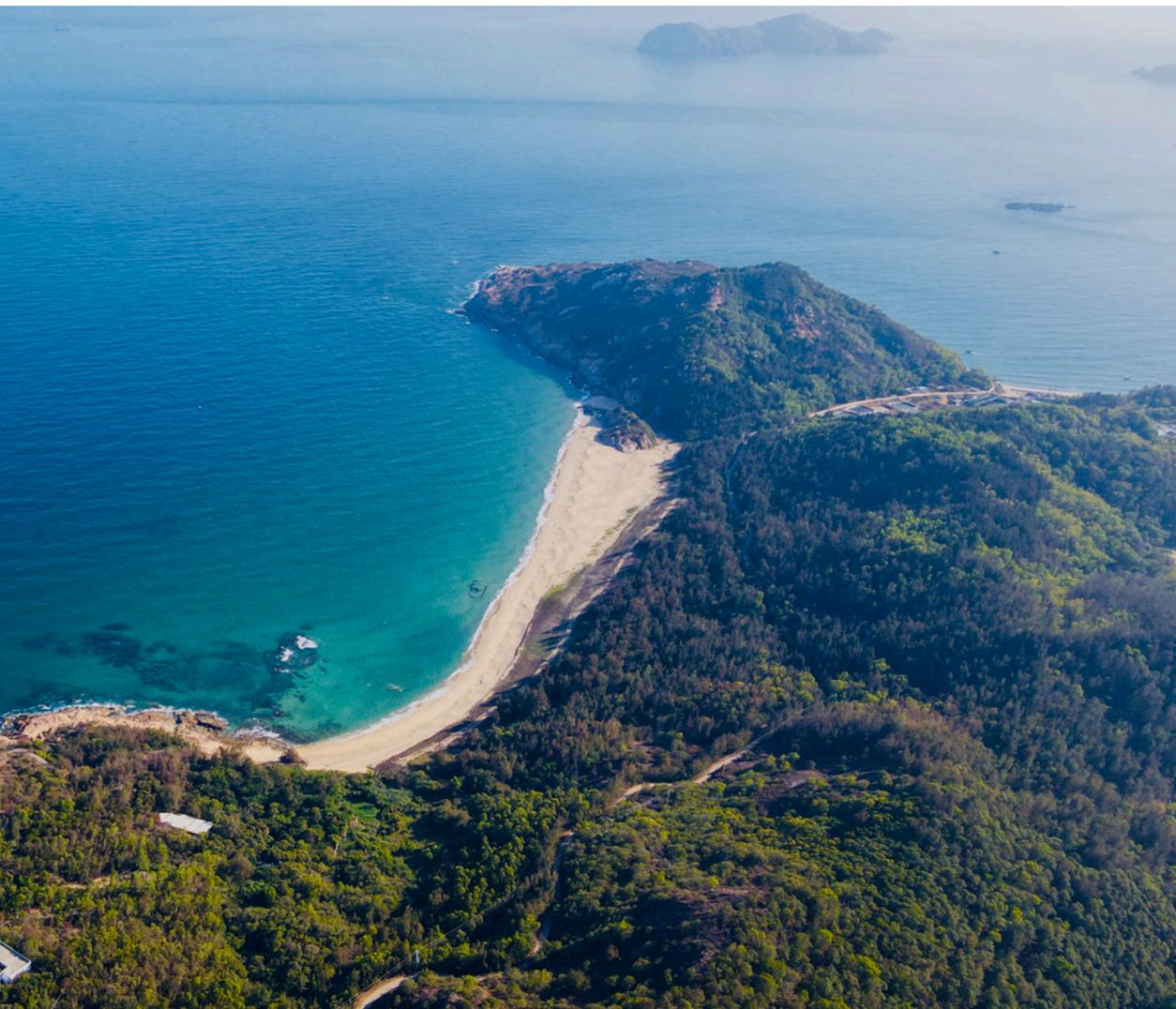
两个工人正在放水清洗池子。池子隔两三天就要清洗一次，清淤后放入沙滩下直接抽上来的



海水。池边长满青苔，滑滑的。一个工人正伸下梯子，穿着雨靴下到池里。

“天气冷了海龟就不活跃，天气热的时候就活跃，也能吃。哎你看！这里游上来了。”俞主任向池中扔了一些白菜叶，海龟纷纷游了上来抢食。

俞主任指着池里的一只海龟：“这只瘸腿的海龟是被鲨鱼咬到脚，渔民捕到后送到这里来医治的。”



⑦ 海龟湾



⑧ 从左往右，分别为：太平洋丽龟、红海龟、玳瑁、绿海龟

在一个池里，我发现每一只海龟身后都有一摊红红的“血迹”，吓了一跳。不过，这是工人在用高锰酸钾给海龟消毒。

保护区技术员李满文说，他们这个团队的人养海龟，平时也像医生一样给海龟做护理。但遇到受伤处理不了的情况，比如海龟被船板、渔网刮伤之类的，就需要专业人士进行救治。

李满文是湖南人，加入保护海龟这个行业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海龟还比较少，这个场地租给养殖大户养鲍鱼，李满文在此养鲍鱼，也帮忙照顾一下海龟。后来海龟越来越多，保护区就将场地收回来养海龟了。

李满文介绍，海龟喂养是根据季节来决定每天喂几次，现在水温22℃左右，比较低，隔天喂一次就可以。夏天的话水温偏高，海龟的活动量大，消耗就多，就要喂多一点。



◎ 刘明霞（右一）与海龟保护区管理局宣传教育科主任俞正中、作家林丽华合影

李满文的妻子正蹲在池子里给海龟洗澡，她用钢丝球用力擦洗龟壳，让它的花纹显现出来。这个池子里的海龟是玳瑁，它们长得特别漂亮，壳上有花边，交易最值钱，龟壳有收藏价值。

太平洋丽龟是几种海龟里体型最小的，四条腿都有一个爪子，其他品种的海龟只有前肢有爪子。

“你看！它是后肢也有爪子，所以也叫四爪海龟。”俞主任说，太平洋丽龟娇小的身影在海龟中属于小巧玲珑型，因龟壳是橄榄绿色的，也叫橄榄绿龟。

“这个池是红海龟，铁锤一样的嘴，能把贝壳的壳敲碎，吃贝壳的肉，嘴特别硬。”俞主任抓来一把黄白菜扔进水里，红海龟瞬间浮上来，一跃而起，铁锤一样的硬嘴“刷”地一口咬住漂浮着的白菜，鼻子上的两个孔，呼呼喷着水。俞主任说：“这是第4个品种，目前，我们就这4个品种了。我们现在人工繁殖的只有绿海龟，是海龟中体形较大的唯一一种草食动物，多食海藻类。而山东那边人工繁殖成功的有红海龟。”

海龟于每年的6月至10月开始产卵，每次产卵数量为4窝至7窝，500枚左右，但损耗大，幸好数量基数大才得以繁殖下去。据研究显示，小海龟自出生以后的24小时内，死亡率高达20%~40%。海龟保护区监测的数据显示，近10年保护区上岸产卵的海龟仍然在个位数之间徘徊。人工繁殖无疑成为恢复中国野生海龟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俞主任介绍：“在别的国家沙滩产卵的海龟，会觅食经过惠州。整个海洋，哪里有东西吃，它就往哪里去，总有一段时间会来到惠州。其实呢，它们的目的地不是惠州，可能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啊，甚至是日本或南太平洋。”

在幼龟培育区，我们看到了今年通过人工繁殖的1880只小海龟，张牙舞爪地在水中游来游去，好调皮的样子。

现阶段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在合适的时间放养海龟，如何探究出存活率最高的海龟年龄，对此保护区正在进行研究。

尽管人们不断增强对海龟的保护，全球范围内的海龟数量仍在急剧减少。海龟现在面临的威胁主要有4类：渔业捕捞，海洋垃圾污染，栖息地、产卵地的丢失，海龟非法贸易。

三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一群群海龟在海龟湾这片沙滩上重复着它们的生命轨迹，从幼龟出壳蹒跚离岸，到20多年后重返海龟湾产卵。从这里诞生起，它们就注定要和这里厮守，这里已然成为它们的精神家园。

大澳村紧挨着海龟湾，海龟湾的一些沙滩也属于大澳村。“过去不仅仅是海龟湾，在盐洲岛、巽寮湾一带的海岸线也曾有海龟上岸产卵。”年过花甲的海龟保护区退休职工杨振扣说。作为海龟保护区的第一代“护龟人”，他见证了海龟湾30多年来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渔民和村民都曾以海龟为食。如今海龟湾那一片被重点保护的产卵沙滩，曾是王姓大户人家的私人沙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由生产队来管理，不允许村民杀海龟，但可以挖海龟蛋。生产队组织挖了分给村民，村民吃不完，就拿去送给亲戚，或在市场上卖。到20世纪60年代，挖了海龟蛋，卖的钱要上缴财政。那时卖海龟蛋，两分钱一个，在当时是很贵的了。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空档期没人管，是最乱的时期，谁看见谁挖，海龟一爬上来，有人就翻起来捡蛋，捡了海龟蛋，又把海龟又放回去，海龟死了很多。

夜晚，村里年轻人就跑到沙滩上，通过传

感器看海龟产卵出来没有。他们拿着小木棍戳沙滩上的沙堆，寻找海龟蛋，看到海龟一爬上来，他们就上去把它翻起来，看它产卵出来没有，如果没有，他们就走了，到了下半夜又来观察。如发现海龟还是没有产卵，就拿刀把蛋剖出来，好残忍！而有经验的渔民，只要在沙滩上闻一下沙子的味道，便能分辨出海龟有没有上岸产卵。

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活动频繁以及滨海产业开发兴起，全球绝大部分地区野外海龟种群数量都在锐减，部分种群甚至濒临灭绝。洄游至保护区核心沙滩产卵的绿海龟逐年减少，海龟湾也面临着生态恶化的风险。

杨振扣无比惋惜：“现在上岸产卵的野生海龟每年仅有几只，甚至几年一只！”

在大澳村村委会，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村支书吴小龙，他说：“以前保护区没有现在那么大规模的时候，土地都是我们村的，像我外公那一代人，就是第一代的保护区的人，那时候村里的村民跟政府合作，在保护区里面保护海龟。”吴书记为我们找来村里69岁的退休干部黄佛银，老人给我们讲起了海龟的故事。

从大家七嘴八舌的普通话、客家话、学佬话不停切换的交谈中，我的思绪如看电影般被带到那个年代。

1975年，黄佛银接任大澳村农业大队大队长，他当时就是负责生产队组织挖海龟蛋的。黄佛银说，大澳建村400多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早来大澳村开基的是一个姓王的人家，王家的人用他家的田来换别人家的土地和沙滩。村里有国民党的保安队，三几个人一个组织，为整个村服务，也保护王家的沙滩。

原来大澳村分两个村。南面是南村，他们这边是北村，那时有4个生产队长，就每天晚上8点去挖海龟蛋。“月亮一出来，第一批海龟就上岸来下蛋了”，到下半夜来的更多。如果遇上打



台风，刮风浪大，来的又更多。

“4个生产队长，每人拿一个大箩去挖，倒回来就是自己那个队的。我和他们讲，你们不能够放浅一点啊，我们够吃就好了，你们4个人搞4大箩。他们那个标下去，‘啪’的一声，标深1.1寸就好了，谁戳破了海龟蛋，那个烂的就属于他自己喽。”挖到的海龟蛋，第二天交到大队，由黄佛银来安排分配。社员按每天一个劳动力分5个，拿回家煲粥或用盐腌了吃。

当时，每一个晚上挖到的海龟蛋起码有两三千个，至少十几窝，最高纪录的一窝蛋有290多个，最少的是70个。同时，他们也知道要一边满足村民的生活需要，一边自发地保护海龟。到了9月，他们会放几窝留种孵小海龟，做了记号，让它自动孵化出，自己爬到海里去，但也不时会有鱼来吃小海龟。

“那个时候是1980年之前，海龟很多的，从6月到9月，连续3个月，每个晚上都能挖有两三千个，挑回来分给村民。一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了，大家到香港买船，我就离开农业大队了。那时候真的没有保护意识。”黄佛银无比懊悔。

在茫茫大海中，海龟是依靠什么作长距离洄游到它的出生地登陆呢？这是一个自然之谜。海龟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还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它的肉和卵可食，脂肪可炼油，龟板能炼胶，是高级补品，龟掌、龟油、龟血、龟肝、龟肾、龟胆、龟蛋等都可入药。龟壳是工业原料，可制造工艺品或装饰品。由于历年来大量捕捉滥杀掠夺，破坏产卵繁殖环境，导致海龟登陆逐年锐减，现已成为珍稀濒危海洋动物。

因此在近10多年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F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WWF)等国际性保护组

织，均将所有海洋龟类列为濒危物种。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中国亦将其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并予以重点保护。

资料显示，从20世纪中期至今，每年有30多万只成年海龟被人为杀害，在现存的7种海龟中，6种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中国的整个南海的成年绿海龟也就剩下2000只，而惠州每年上岸产卵的海龟已少于20只。在这种情况下，对海龟进行保护有着非常大的必要性。

四

想起放小海龟回归大海的一幕，杨振扣依然十分感动：“那真叫依依不舍啊。”享受过这片沙滩的温柔与丰饶，小海龟回归大海的时候，下水后立即浮起来，然后再游到几米又浮起来，鼻子喷一下水，再游几米又浮起来喷水，相同的动作重复三次。

它在向我们告别，好感动、好难舍！

小海龟在它独特的感恩，真情道别。这又何尝不是人龟和谐的真情大爱？

其实，这只是海龟的一个生理过程，是突然放进大海的一个适应过程，刚放出来的小海龟接触空气太多了，要多次沉下去，适应两三个小时，海龟沉到海底下憋气可憋4个小时。

小海龟慢慢爬到沙滩上，向大海方向走去。它一定不会向身后的山上走，如果把它的头转过来引它向山上走，你一松手，它立马掉头往海边走。

时间推回到1985年，正值改革开放经济起飞时期，广东人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贫穷落后的小镇焕发着生机。当时，国门大开，国内外呼吁保护海龟的声音越来越强。其实早在1982年，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摸查海龟湾情况，

上报水产部门，呼吁保护。比如张晓荣、宋友珠等人。到了1985年年初，在惠东县渔政管理站工作的杨振扣收到了广东省水产局的通知——省里计划建立海龟保护区，请报告当地海龟资源情况。当时没有专门保护机构，由渔政处代管，他是第一批调查摸底的人员，到大澳村调查摸底后，将这些情况汇报到广东省海洋渔业局渔政处：“村民说，每年稻谷低头时，也就是端午节前后，海龟会来海龟湾产卵。”

报告批下来了，指示：排除干扰，成立海龟保护站，并拨出启动经费2500元。惠东这边也是反应迅速，请了4个工人搭棚子，刚好那几天刮台风，端午节就是6月台风季，海龟已经产卵了，没有房子，就用塑料纸搭建了一个简易工棚。

1985年3月，广东在惠东县港口海龟湾正式建立保护区。虽然非常简陋，但这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保护行动。

当时，正好山东和美国的海龟专家闻讯到此处来调查，不料遇上台风，他们知道海龟在这里产卵了，但不知道具体位置，就拿沙子来闻，证实海龟已经产卵。因为那个时候，杨振扣他们要抬渔政的船去避风，他在那守船，管理人员因避台风回家了。遗憾的是那时候通信不方便，没有对讲机，什么都没有，通知不到人，台风急，时间也不等人，山东和美国的海龟专家最终没有找到海龟产卵的位置就走了。

到了第二年，海龟湾保护区有了一些影响力。美国的一个华人，在媒体上发了一篇报道，说中国已经建立了海龟保护站了。

杨振扣说，4个民工都是大澳村的村民，做得比较辛苦，做了1年以后才建了一个小房子，就是两房，一间办公室、一间厨房，没水没电。随着孵化的小海龟越来越多，单靠简陋的脸盆已经养不下了。保护区就挖建了5个水池，总面积

约100平方米。冬天，为了防止小海龟被冷死，他们只好用铁皮搭炉子，烧柴火为海龟保暖。

当时，每天下到沙滩去照顾小海龟，来来回回就要3个小时。条件非常艰苦，而且对于怎么养小海龟，也没经验，大家都摸索着饲养。第一窝小海龟刚出窝的时候，他们什么东西都给它试着吃点，喂香蕉、蛋黄、鱼肉等，反正像喂养婴儿一样。很多渔民看他们的棚子没电没水，很不方便，也主动领小海龟回家去养，养大后再送回来放归大海。

孵化一窝小海龟要50天，沙子至少要挖1米深，海龟自己会挖的。一只海龟最多1年要产6窝卵，一次最多160个，最少就60至80个。大约一只海龟2年或3年可以产500个海龟蛋，半个月一次，一次生百个，到后面几窝就少一点。大海龟挖好窝产完蛋后，就用沙子埋好，把它的孩子弃在沙滩，转身游回大海。而公海龟是从来不上岸的。海龟蛋靠太阳照晒的温度控制沙子的温度，50天左右，太阳下了山以后，天黑了，小海龟孵化出来，只有60%是好的。

当年来的海龟产了6窝卵，隔了3年，它又洄游到这里来产卵。

后来小海龟越来越多，他们就每天去100多米外的大海挑海水来养小海龟。随着小海龟数量的增加，他们就在保护区的棚子里做个大水池，买一个6匹的抽水机去沙滩上抽水来养小海龟。

到1990年，保护区才专门给他们配了一个6匹的发电机，发电发到晚上10点就停止，大家只好睡觉啦。因为经费比较紧张，大家只得省着点。当时，资金短缺，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推迟发，甚至有两三个月也没有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护龟人也没有放弃喂养小海龟。

五

在海龟学术交流中心一楼，笔者发现宣传栏上有几张救护海龟的照片，有一位外籍人士非常显眼。

俞主任介绍，这是夏威夷的海龟保护专家乔治，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来中国协助保护海龟。在2005年至2017年期间，他先后三次来到中国海龟湾，帮助解决了海龟人工繁殖的关键技术问题。

海龟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些年来，保护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社会团体、专家、院校等展开学术交流合作。2008年以来，保护区先后派出技术骨干前往开曼群岛的海龟农场考察学习，邀请香港渔农署技术人员到保护区考察调研，参与中美海洋生物资源协调工作研讨会、中美海龟项目研讨会、日本神户第38届海龟生物学保护大会等，通过这些“共研”举措，逐步提升了科研能力，掌握了海龟繁育基地设计、海龟洄游习性、海龟卫星追踪、芯片标识和基因脸谱制作等技术，迎来了海龟人工繁殖成功这一硕果。

2017年8月，保护区突破绿海龟全人工繁殖技术，填补了国内在这项技术上的空白。

为了搞人工繁殖，技术人员必须了解研究海龟的习性。关于海龟的交配，之前他们听当地渔民讲，海龟交配的时间是1个小时，后来听国外专家讲是3个小时，待他们启动了人工繁殖过后，观察到是6个小时。他们晚上在顶棚放条木板，保护区管理局技术科科长叶明彬与几位技术人员坐在上面守着，通过红外线监观察，再一次证明海龟的交配的确超过了6个小时。叶明彬是保护区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见证了保护区20年来的变化，他总是会细心地指导工人科学照料海龟。

自然繁殖是在大海里交配的，如果海龟怀孕

了，就跑到这里来下蛋，产完它就走了。如果没有碰到什么台风等意外，正常情况下一般相隔13天到15天又来产一次。每一窝60天的孵化期。俞主任说：“哪一天产了蛋，我们就往后推60天，然后前后隔一两天就关注这一窝了。它一出生，我们人已经到位了，所有工具都准备好了。”有几次李满文发现有几窝可能活不过当晚，结果第二天起床，发现它们又活蹦乱跳了。

野外孵化的小海龟，存活率只有1%。为了提高小海龟存活率，保护区开始探索室内孵化、野化训练等人工干预技术。小海龟出生后，他们就把它挖起来，放到大脸盆中，放上沙子去给它爬，爬三天以后，就把它的脐带收拾好，一磨就磨平了、抹干了。如果小海龟刚刚出来就放到水里，脐带就会感染导致发病；也不用喂东西给它吃，刚出生的小海龟脐带自带营养，是不需要吃东西的。

李满文说：“现在技术提高，小海龟长得很快。现在吃鱼和青菜了，吃得很厉害啊。但现在很多技术还是不过关的，保护区因此派技术员夏中荣博士去外国考察学习。”

海龟从小人工饲养，丧失了野性，对人没有戒备，放归大自然之前，要进行“野化”训练。杨振扣告诉我们，小海龟到1岁就可以放回去。海龟孵化出来，如果马上放回大海去，它会不适应，只会在水面生活不会沉底，所以要在海滩上至少生活半年，身体长壮了才把它放回去。

保护区海龟野化基地于2019年8月启动建设，占地总面积约35亩。在考洲洋出海口附近选定了毗邻出海口，潮汐落差明显，海水可以随潮涨潮落而进出围堰池。海龟野化基地经过场地优化改造和海龟投放试验，发现投放的海龟能在基地自然水体环境下生存和繁殖，以强化它们在海洋中觅食、抵御灾害的能力，提高野外存活率。

保护区在海龟背上用特制的无害胶水贴了一块二维码牌，世界各地若有人发现这批“背着二维码的海龟”，只要用智能手机一扫，就能进入海龟保护区的公众号。与此同时，系统也能监测到二维码在何时何地被浏览的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追踪海龟的目的。

海龟保护区自2002年就开始对海龟放养的情况进行跟踪，所采用的技术以卫星追踪器为主，最长监测时间为6个月，可以监测海龟们生活所在地温度和湿度的条件。通过这种技术可以评估海龟与之前放养的母龟的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得到相关数据之后，能够对后续的海龟养殖和放归有一定帮助。

而这种卫星追踪器拥有较快的数据反馈速度，在海龟放归之后3到5分钟之内，就能收回相关数据。它们带来的数据是，海龟从保护区放生之后，往北洄游可达日本，往南会到我们海南省、甚至可达越南、菲律宾等。

六

30多年来，港口海龟保护区从1985年成立，1986年晋升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3年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200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目前中国仅有的64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

海龟保护区结合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保护绿海龟及其栖息地生态资源和开展公众教育、科普宣传双管齐下。如今已有便利的内部交通网络、巡护道路、海龟救护中心、海龟繁育基地、海龟科普馆、瞭望台、视频监控室、专家楼等保护管理设施。

2019年1月，集科研、海龟救护、科普教

育于一体的仿生态的海龟驯养中心启用，大幅提高了保护区管护能力。2020年9月，国内首个海龟野化基地启用，在保护及救治珍稀濒危物种、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都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对海龟保护区发展实现新跨越具有重要意义。

截止2021年6月，累计保护野生海龟上岸产卵741窝，83000个海龟卵，孵出小海龟68000多只。

海龟的生命周期很漫长，从出生到成熟产卵，需要20年到30年的时间，当初放归大海的第一批小海龟已接近成年。保护区护龟人都期盼着某一天，能看到这批海龟回到故乡产卵。

海龟保护是一代代的事业，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保护区在驻地惠东县港口镇的中小学设立了“海龟环保奖学金”，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片社区”的宣教理念，形成以海龟保护区为中心，辐射社区各渔村的海龟保护网络，为保护区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针对暑期长假，依托海龟湾营地设施，在公益机构志愿者的配合下，开展“海龟夏令营”活动，培育青少年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和观念。

海龟的繁殖也丰富了惠州沿海的物种多样性，增加其景观价值，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前往旅游，有利促进了惠州旅游业的发展。

保护区多次获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嘉奖，成为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张生态名片。

地球上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的作用，我们人类不是地球上唯一的主人，海龟在维持海洋生物链的平衡上贡献非凡。在全球背景下，诸多先驱呼吁保护野生动物、改善生态环境，不仅是保护地球、保护自然界，其实也是一个改善人性和人类灵魂的过程。只有人和自然达到和谐才能维持整个生态的平衡，从而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达到高度的协调和统一。🌐

让卢永根故事代代相传

文 姚燕飞（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1947年，卢永根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贪图安逸和享受，他就不会有在当时周围人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举动。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唤醒了对于振兴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用他自己的话说：“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二者皆可抛。”

用“祖国”代替裴多菲诗中的“自由”，是中国式的智慧。连“祖国”都没有，还奢谈什么“自由”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想追求自由美好的生活，首先要爱国。

卢永根和徐雪宾大学毕业后想谈恋爱，时间却都被工作夺去了。卢永根不仅是学校的团委书记，还是学校的党委委员。怎么办呢？于是请示党组织。确定恋爱关系如此，结婚更不能马虎。两人商定结婚的时间是8月9日——正好是卢永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卢永根爱党爱得那么深沉，特意将自己结婚的日子定在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

在1958年8月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卢永根对学习苏联米丘林遗传学产生过怀疑，被认为有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观点”而遭受批判，并且还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要弄清卢永根受处分的原因，就要先弄清楚他所怀疑的米丘林遗传学是怎样一种学说。网上这样表述：米丘林学说认为，生物体与其生活条件是统一的，生物体的遗传性是其祖先所同化

的全部生活条件的总和。如果生活条件能满足其遗传性的要求时，遗传性保持不变；如果被迫同化非其遗传性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时，则导致遗传性发生变异，由此获得的性状与其生活条件相适应，并在相应的生活条件中遗传下去。从而主张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获得性状能够遗传。

这个学说中关于无性杂交、辅导法和媒介法、杂交亲本组的选择、春化法、气候驯化法、阶发育理论等，对提高农业生产和获得植物新品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米丘林关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获得性状能够遗传的理论，缺乏足够的科学事实根据。

米丘林培育出了300多种新型果树，受到苏联政府的赞扬。他的杂交理论经李森科发挥后

被苏联政府采纳为官方的遗传科学，尽管当时全世界的科学家均拒绝接受这个理论，但仍被强制推行。20世纪50年代这一理论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盛行一时，对生物学研究造成了不良影响。

卢永根对米丘林遗传学持怀疑态度，站在了实事求是的立场。

因为有信仰，卢永根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清晰的，没有半点模糊和动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信仰在他身上的完美结合，这是一种国家意志和情怀。

愿他的故事代代相传！



《布衣院士卢永根》

作者：姚燕飞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侨乡沙堆的浓浓乡梓情

文 黄柏军（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五邑侨史》杂志主编）

江门五邑是全国著名侨乡，辖区内的沙堆镇又是侨乡中的侨乡。沙堆镇位于新会东南部，东、南邻珠海市斗门区，西连古井镇，北接古井镇、珠海市斗门区，陆路和水路交通发达。清末民初以来，沙堆镇乡亲大量出洋谋生，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今天，祖籍沙堆的华侨、华人已经发展至近 4 万人，散居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乡亲比家乡人口还要多。

2021 年 9 月，我率队到沙堆开展侨情侨史调研，惊喜地发现了多处华侨建筑散落在该镇梅阁村、独联村、那伏村等。从这些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屹立不倒的华侨建筑身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沙堆籍海外侨胞对家乡、对父老乡亲的关爱和支持。

古巴桥：万里鸿雁爱乡情

在沙堆镇那伏村，有一处著名的华侨文物，近百年历史的侨捐桥梁：古巴桥。当年为什么要建造古巴桥？



② 黄柏军（右二）陪同暨南大学侨史调研组成员、沙堆镇侨务工作者开展沙堆镇侨文物调研

民国初年，那伏村村民在村东头修筑了一道弧形的长堤，并在堤上种上荔枝树，仅仅数年功夫便长成一条荔枝林长龙。此堤北起那伏村教堂里北山鸡包（山丘名）坡脚的上干坑（土名），南达东庆里南的鸡尾驳（土名）的竹口，向东弯出，全长 1000 多米。塘下坑出口处间于长堤之中，划若鸿沟，把长堤一分为二，造成南北交通阻断，当时虽有简便的木桥可供村民小心通行，但过往行人走至此处深感不便，村民祈盼能建一座大桥，但是苦于村中钱财不足，一时不能成事。

古巴桥的修建为村民们解决了出行的不便。该桥于 1927 年冬动工，至 1928 年夏建成。古巴桥又被当地乡民称作“洋灰桥”，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建筑物使用西方水泥还是比较时髦的事情。

“洋灰桥”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桥长 10.35 米，宽 1.65 米，厚 0.18 米，单孔拱桥，两边桥墩高约 4 米，桥面两边护栏也是用混凝土捣成。村民原本为这座桥梁命名为“那伏长堤桥”，但由于建桥经费多由旅居古巴的乡亲捐款，最后为表彰旅居古巴侨胞的贡献，遂命名为“古巴桥”，并在桥护栏两边均刻上“古巴”字样的水泥凹字以作纪念。那伏村父老当年曾经树碑于桥头，铭刻

捐款者之芳名。时至今日石碑虽已残旧，但字迹仍可辨认。时移世易沧海桑田，由于水源坑道的改道，道路的变迁，此桥早已由水道桥梁变成旱桥，桥底也填满了泥土，当年那种横跨小河渡人到彼岸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但每当提及古巴桥，村民总是津津乐道。

关于古巴桥，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事情发生在清朝末期，那时那伏村不少村民为求生计远赴古巴谋生做苦工，日夜操劳如骡马，日盼夜盼祖国强大、民族富强。他们得知孙中山在海外宣扬革命，于是群起响应，支持孙中山发起组织的同盟会。为此，那伏村旅居古巴的华侨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为中国同盟会筹集革命款项，准备交付给孙中山作为革命经费。由于当时封建势力的封锁和实际条件的限制，本来准备用于推翻满清的革命捐款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至中华民国成立也未能如愿送到革命军手上。中华民国成立后，古巴侨胞由此前的支援民主革命转变成支持家乡新建设，将该款项用于家乡桥梁的建设上，便有了古巴桥。

2012 年，古巴桥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过程中，被江门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侨联大厦：见证旅美侨胞的爱乡深情

走进独联村，发觉这个小村子不简单：竟然有侨联大厦！这个海外侨胞的“娘家”是怎样建起来的？事情要追溯到 40 年前。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海外游子动了心，他们开始结伴回来家乡走一走、看一看。他们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其中，侨胞林有基就是这样的有心人。1980 年，独联籍乡亲、旅美侨领林有基首次踏上故土。当时独联村还比较落后，故乡破落萧条的景象激发了他埋藏在心底的爱乡之情，他希望有生之年尽自己的能力造福家乡。他想到民国时期沙堆籍先侨倡议建立



② 村民将“古巴”二字刻在桥上，既为桥名，也为表彰旅居古巴侨胞对家乡的贡献

归侨组织侨安会的非凡作用，于是向独联村父老乡亲建议建造独联侨联大楼，并愿意带头捐款。

林有基的提议得到海内外独联乡亲的热烈响应，尤其是林湛贤、林发枝等侨彦在侨居国各牵头筹集捐款。两年后的1982年春，独联侨联大厦落成了。

独联侨联大厦落成伊始，这里即成为海内外侨胞和乡亲建设家园的“参谋部”：配备自来水供应（改革开放初期独联村内仍未建立自来水网络），扩建小学校楼和筹募奖学金基金，复办《独联侨刊》，修桥筑路等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侨委会、村委会都是在此热烈讨论运筹帷幄，使一张张蓝图变成美景、一个个梦想变成现实；侨胞、侨属、乡亲以及各界友人在这里团圆、相聚，成为海内外乡亲温暖的家。

花旗巷：旅美华侨留下的爱国路

花旗国，江门五邑民间对美国的俗称也；花旗客，父老乡亲对旅居美国乡亲的俗称。100年前，一班旅居花旗国的花旗客在家乡修筑了一条花旗巷，花旗巷的故事被父老乡亲传颂了100多年，感人肺腑。

在独联村的东和里十五巷，是一条从南至北，从上街至巷尾都铺上水泥的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是很有名气的花旗巷。现在乡道铺上水泥并不是什么令人稀奇的事情，但是时间倒退到100年前，那可是吸引眼球的新鲜事。据老一辈的独联村乡亲说，花旗巷修建于1920年，由独联村旅美华侨林英锐、林贤豪等人发起捐款而建。

花旗巷是独联村历史上最早由华侨捐款赞助建成的巷子，建筑工程选用的水泥质量优良，所以至今路面尚好。那时候，因为岭南农村社会建设比较落后，这条路建成之时引起了轰动，十里八乡参观者络绎不绝，成为一大新闻。

旋安阁：九十载燃点文化火种

梅阁村有座闻名遐迩的侨捐老建筑：旋安阁，又名梅阁侨刊社、梅阁阅书报社，是见证梅阁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建筑。

华侨出洋早，最早接触西方高新技术和文明，他们认为家乡要发展首先要重视文化教育，所以他们最乐意捐助家乡的教育文化事业。梅阁村在民国初期就在海外侨胞的支持下成立阅书报社。1928年，梅阁阅书报社建立在新隆街的一间商铺中，那时的阅书报社已经展示了“睁眼看世界”的胸襟和气魄：报社墙上挂着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广东地图，还摆放着大量传播中国新思想的杂志书籍。

1931年由海外侨胞捐助，梅阁阅书报社重新选址，新的旋安阁落成，为今后《梅阁侨刊》杂志的继续出版提供办公场所。旋安阁为《梅阁侨刊》遮风挡雨，两者命运紧密相依。《梅阁侨刊》创刊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间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抗战期间因为战乱侨汇断绝而停刊，1989年再次恢复出版，从家乡邮寄到千里之外的梅阁侨胞手中，让海外侨胞可以通过《梅阁侨刊》了解家乡的发展和建设。

梅阁村旋安阁、《梅阁侨刊》，90年侨史、90年风雨，说不完的华侨故事，说不完的家国情怀。

梅阁旧码头：滔滔江水念侨恩

梅阁码头（江门渡客运）旧址建于1930年，距今90多年。码头旧址坐西向东，由码头、凉亭、纪念亭三部分组成。纪念亭平面为八角形，砖混结构，穹隆顶，4个门口，直径5.6米。亭内墙身镶有4块砚石碑，每块碑长为1.8米，宽为0.8米，记录了当地村民特别是海外侨胞集资兴建梅阁码头的历史，还有古巴、美国、加拿大等华侨



◎ 沙堆梅阁村侨捐老建筑：旋安阁



捐款芳名。

码头凉亭平面为四方形，砖混结构，平顶，顶层板画壁画。该码头旧址是当地华侨兴建家乡公益事业的实物，是重要的华侨文物，对深入研究沙堆乡土历史、华侨史、社会发展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沙堆侨安会：侨心思归安享太平

沙堆侨安会大楼坐落于新会沙堆镇的沙堆中心大街西北。1919年，为团结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维护自身利益、组织捐资家乡建设等，旅加拿大华侨在温哥华设立沙堆侨安会总会。不久，由总会发动在北美、中美等地的沙堆华侨募捐了一笔款项，派几位华侨回乡，主持兴建分会大楼（即现在的沙堆侨安会）。沙堆侨安会是按照西式楼房设计，选址在当时流经沙堆圩的西坑的坑边，所以工程特别浩大，建筑要求格外牢固。工程从1929年开始打桩施工，到1931年竣工。

大楼落成后，沙堆侨安会成为归侨侨眷聚会的好地方。1922年创刊的《沙堆公安月刊》也迁此编辑文稿，印刷发送到海外华侨手中。1940年6月2日，新会县义勇游击大队的共产党员奉命深入日伪军内部，动员那伏伪军将领高勤部反正。高勤的反正部队袭击驻那伏村的日伪军，生擒了日伪华南派遣军总司令方正华。日军上尉村上骑马逃跑回江门，他恼羞成怒，亲自驾飞机轰炸沙堆地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是沙堆侨安会和游击队驻地。1940年6月4日下午2时，3架日机由北面飞至沙堆上空，向沙堆圩镇及那伏等地的楼房、碉楼、祠堂等建筑物狂轰滥炸。由于受到游击队战士的抗击，日机只能在侨安会四周投下数十枚炸弹，幸未炸中侨安会主楼，只是围墙和厨房被炸毁，主楼墙上弹痕累累。侨安会大楼在日军炮火中巍然屹立，显示了侨乡儿女不畏强暴顽强抗战的大无畏精神。抗战胜利后，加拿

大温哥华沙堆侨安总会又发动侨胞捐款，派人带回大笔维修款项，对沙堆侨安会进行修缮，使先侨的祖业恢复原貌。《沙堆公安月刊》改名为《沙梅侨安月刊》，继续在侨安会办刊直到1949年。

1966年到1976年期间，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沙堆侨安会楼顶的一对泥狮子被拆毁，又被凿掉侨安会的“安”字，且侨安会内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被毁坏。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落实了侨务政策，沙堆人民公社拨款4500元，对沙堆侨安会进行修缮，恢复楼顶的双狮，按原状恢复“安”字，门前辟为小公园，楼后建有厨房。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了各种设备（楼顶的大电子表、二楼睡房的床、大厅的木椅、铁椅等）。沙堆侨安会修缮后，不少华侨和港澳同胞对祖国、对家乡有了归属感，大家纷纷结伴组团回乡探亲，亦有不少人在沙堆侨安会二楼住宿。沙堆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会址就设在沙堆侨安会内，真诚为侨胞、侨眷服务。沙堆侨安会得以重现光彩。

1981年，《沙梅侨安月刊》更名为《沙堆侨刊》。复刊首期，编辑部还是设在沙堆侨安会。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不断组团回国观光并回沙堆故乡探亲访友。他们第一时间是到侨安会与编委们座谈，送上办刊经费。1991年是沙堆侨安会落成60周年和《沙堆侨刊》复刊10周年，镇侨联和侨办请示镇人民政府，又争取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支持，将侨安会内外重新粉饰。

2002年5月，沙堆镇侨联、侨办和沙堆侨刊社经研究，向温哥华沙堆侨安总会提交修缮沙堆侨安会的申请报告。同年11月，侨安总会派胡光俊、廖全享回乡实地研究修缮方案。2003年2月，胡光俊、胡汉业先生代表加拿大侨安总会回乡验收修缮工程方案。3月，侨安总会决定再把沙堆侨安会全面修葺，于是发动侨胞，筹得修缮款由胡光俊、廖鸿树于年底带回交予沙堆侨刊社。2004年3月开始修葺工程，于4月



① 沙堆镇历史悠久的侨安会经多次修缮，重现当年风采，成为归侨侨眷休闲聚会的好地方

完工。

2017年8月23日中午，受台风“天鸽”的袭击，有86年历史的沙堆侨安会大部分门窗损坏，二楼平台底及部分横梁、柱多处水泥剥落，钢筋裸露。为护好沙堆侨安会这座先侨当年捐建的建筑物，沙堆镇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下拨了维修经费35000元；温哥华侨安总会在海外筹集了一部分善款，经过海内外乡亲的群策群力，维修工程于2017年11月30日动工，于2018年1月19日完工，工程共耗资44000元。

沙堆侨安会原有顶楼大钟是沙堆沙西仁兴里旅港侨胞廖国雄于1995年捐赠，因年深日久，大钟受风雨侵蚀，机件老化，致使原大钟10多年不能使用。2018年年初，沙堆侨刊社名誉社长廖根盘发动10位江门热心乡亲共捐赠人民币20000元，购买由山东制造的大型建筑用钟——恒瑞2014智能塔钟一座，赠送给沙堆侨安会。2019年9月，由沙堆镇政府出资，清拆侨安会门前的建筑物，重建侨安会门前围墙，于11月20日竣工，使侨安会的全貌得以展现，乡人经此皆驻足欣赏这座近百年的建筑物。现在的沙堆侨安会，仍然是《沙堆侨刊》办公的地方，也是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探亲联系乡情座谈的地方。🌐

陈炯明与《南侨月报》

文 王毓伟（中国社会科学院） 彭露（成都市武侯区第五幼儿园）

“孙陈反目”是近代广东乃至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时人称之为“粤变”。此事发生后孙中山出走上海，陈炯明独占广东。看似陈炯明在“粤变”中“大获全胜”，但随着孙中山在上海揭露陈炯明“变叛乱为革命”的谬论，陈炯明在海内外民众中形象严重受损，所领导的广东政府的合法性问题面临严重危机。恰在此时，广州街头出现一份新的侨报——《南侨月报》，并接连发文为陈炯明“重塑形象”。

“粤变”与“罪人”陈炯明

1922年4月，因政见相左（主要是关于“北伐”及“联省自治的争议），“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免去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一切职务，陈炯明被迫隐退老家惠州。但其所辖各部，不愿放弃对广东的控制权，于是在6月15日夜，炮轰总统府及孙中山居所。孙中山在参军林树巍等人护送下，乘船前往海军司令部，先后登上楚豫舰、永丰舰（后改中山舰）继续指挥海军与陈炯明军对抗。19日，孙中山电令李烈钧、许崇智所部北伐军返粤。7月中旬，北伐军在粤北一带与陈部激战，战事不利。8月3日，许崇智等召开南雄会议，决议分两路撤兵。8月9日，孙中山以北伐军失利，决议离粤赴港。同日，乘英舰抵达香港。14日，转乘俄“皇后号”抵沪。至此，第二次护法

战争宣告失败。

惊闻“粤变”及孙中山避难永丰舰，海内外侨胞对陈炯明及所部讨伐声一片。6月19日，美洲国民党支部致电孙中山，谴责陈炯明“叛乱”，“闻粤变，群情大愤。请速率大军，攻复广州，……侨民信赖公，愿尽力接济，望公奋斗到底”。同日，美国华侨也来电：“陈炯明祸国，侨众共愤，请速诛，并继续北伐，侨等誓为后盾。”6月20日，古巴华侨来电，痛斥陈炯明，请孙中山“调北伐军回粤讨贼，扫除妖雾，再图北伐”。此外，据《申报》记载，时“一般华人，自中山被逐后，袒孙之舆论，乃有春潮怒涨之势，大多数人似皆赞助孙氏”。而当“粤变”传至南洋，当地的华侨学校中甚至出现了一种名为“掠陈炯明”的游戏，游戏中选一人自称“陈炯明”，其他学生对他“穷追猛打”，直至“他改名认过才行。”可以说，自“粤变”以来，海内外侨胞对于陈炯明及所部批评声不断。

8月15日，孙中山为向海内外同胞宣布“粤变”始末，揭露陈炯明自诩“叛乱为革命”的谬论，发表了《宣布粤变颠末表示统一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意见书》中孙中山强调了“护法”的重要性，并表明北伐之目的实为“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堕于非法者之手”。同时，孙中山表明自己出任大总统，是“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



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即合情合理，亦属临危受命。就任以来，则“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予非法者战”。北伐以来，“赣中告捷，军势远振。……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统一”。孙中山认为，在北伐成功有望之时，陈炯明所部悍然攻击政府，使得“护法”破产，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此，孙中山强调自己指挥平叛乃受国会重托，乃是合法合理。

同时，孙中山认为陈炯明身为政府要员、革命同志，完全可以坦诚相见，不必暗自操纵。此间叛乱完全是阴险至极，实有负重托。最为可耻的是“粤变”以来，陈及所部“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财产，悉受蹂躏”，较先前各军阀部队的行径更为恶劣。在孙中山看来，这是叛乱主导者们用以“诱导”叛乱的交换条件，实在是卑鄙至极。《意见书》中还提到孙中山本人是支持自治的，但其所支持的是全体人民的自治，而不是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藉口”。最后，孙中山在《意见书》中发出倡议：“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同国，且不惟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蠢贼。”

以上，孙中山就“就任非常大总统”“六月六日宣言”“改道北伐”“指挥海军戡乱”“联省自治”等问题进行了澄清，就《意见书》用词及布局而言，其行文条理清楚，逻辑严谨，能够深入浅出，且极富革命渲染力。经此塑造，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者”，对海内外同胞而言，似已不言而喻。

事实上，对陈炯明，孙中山曾寄予厚望，表示“以当时信托克强（黄兴）、英士（陈其美）者信托之”，此次突遭“粤变”，对孙中山打击极大。永丰舰上，孙中山在给苏联代表齐契林的信函中写道：“我正经受着陈炯明——一个完全受恩于我的人——新所成的最严重的危机。”历经“戡乱”，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仇恨已难以

消除。故《意见书》中，难免有些言语过激的部分存在。9月18日，孙中山又发表了《致国民党党员书》，就“粤变”中陈炯明所部叛变之经过再次进行了详细描述。《意见书》《致国民党党员书》发表后，孙中山先生的威望日益增加。正如《纽约时报》所言：“孙已成为各派人士在上海集会的中心关键人物，他的住所已变成各方面意见并不一致的政治领袖们的‘麦加’——人心归向的所在。”反之，对于陈炯明及其所部这些“粤变”的制造者们，他们身上那些所谓“叛乱者”“民国罪人”以及一切“罪名”似乎都已“盖棺定论”。

重塑陈炯明形象的《南侨月刊》

就在孙中山发表《意见书》不久后，一份名不见经传的侨报《南侨月报》在广州出版。《南侨月报》今存见一、二期。由上海图书馆馆藏《南侨月报》第一期封面所见，其创刊于民国11年（1922）8月31日，由广州南侨通信社发行。该刊设有社论、时评、社会公论等19个栏目。该刊“横空出世”是否与“粤变”后的广东当局存有关联，或有怎样的关联，就目前笔者接触的史料，虽不足以直接说明，但似可从该刊本身入手窥探一二。该刊创刊号第3、4页所登封面人物分别是“粤变”后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广东财政厅厅长钟秀南，而后者则为前者亲信。第二期，所登封面人物则是粤军第34旅旅长陈炯光、第16旅旅长杨坤如，二人皆是“粤变”中的关键人物。

同时，就该刊其他的内容来看，存有大量为“粤变”中陈炯明及所部行为辩解的文章，如《北伐军行动之谬误》《南北总统退位观》《中山与竞存心肝之比较》《东方伊索》（漫画，此处借以“东方伊索”之名，用以讽刺孙中山）《叛军辨》《许崇智失败后之余文》等，其舆论偏向显而易见。

见。此外，该刊发行两月以来，大肆宣传“联省自治”，诸如《某议员对于省议会联合会议谈：蓬蓬勃勃联省自治之气象》《公使团赞助联省自治》《省制的讨论》《国会议员对于联省自治之主张：讨论结果多数赞成》《沪上联省自治之声浪》等，无不极力称赞“联省自治”的重要性。陈炯明是民国时期“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自率军回粤以来，陈炯明便利用当时日渐增长的“粤人治粤”情绪，大张旗鼓地宣扬“联省自治”。其认为：“广东者，广东人民共有之，广东人民共治之，广东人民共享之。”主张依照广东人自己的力量，将广东打造成模范省。以此观之，《南侨月报》与陈炯明所代表的“粤变”后广东政府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关联。

此外，在《南侨月报》第二期，存有大量为陈炯明母亲祝寿的文章。其中包括《陈总司令俭德可风》《总司令返惠寿祝》《商联会祝陈母寿文》《陈伯母杨太夫人八秩开序寿（一）》《陈省长祝陈母寿文》《省议会祝陈母寿文》等。祝寿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仪式，不仅体现为人们对祝寿对象强烈的崇敬，还内涵有特定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近代以来，社会生活日趋政治化，“民间仪式被国家或国家部门及其代表所征用，主要取决于它们潜在的政治意义、经济价值”。而以报刊这种公开化的媒介去进行祝寿，无疑是利用报刊的放大效应，赋予祝寿者特定的地位。同时借助媒介仪式的象征力量，去展示祝寿者们的团结力量，从而构建现实的政治需求，继而激发更多的追求者与同路者。《南侨月报》大肆对陈母祝寿报道的背后，其意义也在于此。而粤省政府几乎所有重要部门以及重要势力（广东商会），都以《南侨月报》为舆论阵地为陈母祝寿。可以说，《南侨月报》与粤省政府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联。

最重要的是《南侨月报》是“非卖品”刊物，其“每月定出月报一册，俱逢望日发行，分赠海外华侨各机关，纯系公益性质，不收邮费报费”。

凡“非卖品”刊物多目的性明确，即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发行。《南侨月报》创刊启示中言：

“本社纯为主持正义，辟除邪妄，沟通内外消息，纠正社会人心，发皇平民自治，促进统一和平而设。”而《南侨月报》发行（赠送）的对象是海外华侨各机关，可以说其创刊目的正是向海外华侨澄清某种“误解”，并向海外侨民宣扬“联省自治”。而结合刊物内容来看，其“所要澄清的内容”与“为了谁而澄清”等问题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假定，《南侨月报》的横空出世，其背后要么是有“粤变”支持者的参与，要么是为了迎合“粤变”后广东政局掌权者的需求。但不论是何种关系，《南侨月报》的出刊，都是为了给“粤变”后的广东当局塑造一个全新的形象。其中，“主持正义，辟除邪妄”的过程正是一个制造合法性的过程。

当然，此一时期对陈炯明进行“辩护”的刊物还有《申报》（上海）、《大公报》（长沙）、《晨报》（北京）、《孤军》（上海）、《香港华字日报》等，其中《晨报》虽被时人称为：“北京的晨报，极力用笔墨来帮忙陈炯明，和诋毁孙中山，想看过晨报的人，都可以知道的。”但《晨报》是以北京研究系为政治背景。至于《申报》《大公报》《孤军》等，就“天时”（创刊时间）、“地利”（创刊地点）、“人和”（创刊目的）而言，其对粤省政府的“辩护”力度以及与粤省政府的关系则都远不如《南侨月报》。

因受制于史料，《南侨月报》的舆论影响力，无法估量。但陈炯明于1924年1月通电下野后，仍被推举为新组建的中国致公党第一任总理，并有华侨称“现在中国没有比陈炯明更为华侨所知而尊敬的人”。可见，“粤变”后，陈炯明并非“千夫所指”。虽不能断定《南侨月报》在重塑陈炯明个人形象上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其产生的效果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写在广东省侨刊乡讯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周年之际

肖韵贤（广东省期刊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侨刊乡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2022年2月8日，新年上班的第一天，广东省侨刊乡讯的微信交流群里，出现了广东省侨刊乡讯专业委员会的《新年贺词》：“这是新年上班的第一天，也是侨刊乡讯委员会全面开展会务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我们向全省侨刊乡讯同仁致以良好的祝愿：迎着新年初升的太阳，我们一起同行。”

不知不觉，广东省侨刊乡讯专业委员会成立已经10年了，从参与筹备到后来出任负责会务的秘书长，我见证了专委会（下同）从无到有，脚踏实地，10年来一步一个脚印，带领全省侨刊乡讯集合成为一支团结奋进的队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广东省侨刊乡讯是由侨乡民间及有关涉侨部门创办，主要面向海外乡亲（含港澳台同胞）为主发行的公益性报纸和刊物，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1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侨刊乡讯向海外侨胞传递了家乡的信息，介绍了祖国建设的成就，维系了侨胞对家乡和祖国的感情，被誉为海外侨胞的“集体家书”，成为广东省各级侨务部门联系海外乡亲的桥梁纽带和广东省对外宣传工作的平台，更是广东省期刊出版界的特有刊种。目前广东省侨刊乡讯共150种，其中报型9种，刊型141种，广泛分布在全省37个市、县、镇、村等，年发行量达到2600多万册（份），其中年海外

发行量700万册（份），遍及五大洲175个国家和地区，联系海外3000万侨胞和广东三大民系的6000多个华侨社团。

由于种种原因，一段时期以来，全省侨刊乡讯规模不同，发展不平衡，而且没有一个行业组织，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其时，全国报刊规范管理，广东侨刊的管理职能也从广东省侨办回归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省新闻出版局也面临着如何发挥侨刊作用及规范管理的课题。

为了更好团结全省侨刊，推动促进侨刊乡讯健康发展，扩大中国声音在海外华人社会的传播，2010年10月26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在鹤山召开全省侨刊工作会议，听取意见，研究广东省侨刊乡讯如何健康发展。其间，省新闻出版局领导和广东省期刊协会领导委托广州华声杂志社社长林干牵头，组织18家侨刊作为筹备工作小组开展筹备工作。

会后，林社长找到我，希望我出任筹备小组的秘书，负责筹备办会的具体事务。其时，我刚刚从一家上市公司转入侨刊工作，一切都仍在摸索中，而且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工作经验，要参与筹备一个全省范围内政治性、文化性和广泛性都十分强的社会组织，显然是挑战。在各级领导的鼓励下，我挑起这副重担。

2011年3月18日，筹备工作小组成员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召开了筹备工作会议，讨论了委



⑦ 专委会成立大会筹备组主要成员合影

员会筹备计划和成立大会的具体事宜，我在会后开始联系全省的侨刊。由于长期没有系统管理，许多侨刊乡讯人员现状不明、地址不明、电话不明，联系的难度很大，我只能翻阅历史文件和有关侨刊样书，一点一滴收集信息查找线索，利用自己本职工作的间隙，一个一个打电话给各地侨办、侨联和刊社联系人。记得有几次好不容易打通了台山基层侨刊主编的电话，却由于听不懂对方一口台山话而“鸡同鸭讲”，只好发信息将有关事宜通知对方。有的侨刊不明地址，只好委托当地的侨务部门联系当事人。有的侨刊主编年事已高，不懂电脑操作，无法通过网上下载有关电子文件，于是将文件打印成纸质，通过邮局寄达。

还有一些小故事：许多侨刊都是本地的侨务部门主管，从来没有与省里有过联系，当一些侨刊接到筹备专委会的电话后认为是诈骗，向当地侨务部门举报，有一个县级市侨刊还坚持要我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好不容易联系上当时

正常出版的137家侨刊乡讯，也顺便了解到10多家侨刊没有出版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我根据领导的意见，安排了成立大会的具体会务。

2011年6月10日，广东省期刊协会侨刊乡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会议室召开，省新闻出版局、省民政局和省期刊协会领导以及来自全省80多家的侨刊乡讯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林干担任委员会主任，有关重点侨刊的主编担任副主任，我先是担任秘书，后来出任秘书长，负责会务具体工作。

新成立的专委会，究竟怎么开展工作？当时，专委会的领导很明确：侨刊乡讯大部分是民间刊物，但有肩负民间外交、对外宣传这一政治性、公益性的历史任务，专委会的使命便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团结全省侨刊共同发展，形成广东对外宣传的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因此，保持“政治性”这一基本灵魂，把准“服务性”这一着力重点，突出“群众性”这一根本特点是侨刊乡讯专业委员会的重要课题和工作核心。



写好“集体家书”

广东省侨刊乡讯专业委员会是全国第一家侨刊乡讯的行业组织，它有着媒体社会组织的属性，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媒体行业组织，由于侨刊乡讯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在海外传递家乡消息，传播党和国家声音，凝聚侨心，成为海外乡亲“集体家书”的办刊定位和宗旨。所以，专委会成立后，自觉把协调侨刊乡讯“写好‘集体家书’”为侨胞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侨刊是海外乡亲的“集体家书”，家书就要如实地向亲人报告家乡的情况。因此，引导侨刊正确反映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下侨乡的变迁、群众生活的变化，是专委会的首要任务。我们配合上级部门，按照党的对外宣传要求，加强了侨刊乡讯的舆论导向和行业规范管理，参与侨刊乡讯出版许可证审核以及侨刊乡讯培训组织工作，同时先后在涉港、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新冠抗疫、建党百年等重大节点上对侨刊乡讯的宣传重点提出建议，引导大家结合自己的办刊实际讲好中国故事。同时，按照广东省委宣传部要求，从2020年起，专委会组织专家对侨刊进行审读，帮助基层侨刊提高办刊水平。2021年专委会组织审读专家到侨刊数量较多的开平、台山地区开展基层现场审读阅读。

为了及时了解全省侨刊的具体情况，为上级部门提供决策依据，2011年9月，我和林主任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调研组，对《侨星》《广州华声》《中国侨都·江门》《开平侨乡报》进行调研。此后，到基层调研、了解侨刊的办刊条件和办刊情况便成为专委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0年来，我们始终保持基层调研常态化，每年组织专委会有关人员选择3—4个地区进行调研，掌握办刊一线的动态情况，及时汇报给主管部门，争取宣传出版部门和侨务部门对侨刊的重视和支持。2015年，专委会承担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

东省侨刊乡讯现状与发展》专题调研，我们组织调研组先后到中山市、河源市、湛江市、梅州市、佛山市和江门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鹤山进行侨刊乡讯现状调研，同时，对广州市幼儿师范学院、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华裔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侨刊乡讯的传播方式以及华裔学生华文阅读和对侨刊的认知程度，摸清了全省侨刊的基本情况并形成调研报告。同时，根据调研结果结合时代特点，为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起草《广东省侨刊乡讯管理办法（草案）》文本，提出侨刊乡讯在新形势下的管理思路。专委会还组织重点侨刊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刊管理司副司长赵秀玲和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分管领导作了广东侨刊情况汇报，向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提供了参考资料。

为侨刊解忧排难

广东省侨刊大部分都是民间办刊，经费和人才缺乏，加上部分地区的领导不重视，导致一些侨刊在办刊中出现种种问题。专委会作为行业组织，是侨刊的“娘家人”，我们坚持服务基层、服务一线，为侨刊排忧解难，“雪中送炭”。

专委会从2012年开始，根据出版处的要求，主动协助《出版许可证》年审工作，从年审通知的发放，年审材料的收取，初审材料的审核及有关数据的统计到最后许可证的回邮，都由我们负责。除了许可证年审，在日常工作中不少侨刊也会遇到许可证内容变更的问题，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咨询变更手续，以及在办刊工作遇到的有关问题。我们都尽最大努力一一耐心解答，做好侨刊人“娘家人”角色。

开平有一家村级侨刊，急需变更许可证内容用于银行年审，但他们不清楚具体该怎么办理，就打电话给我。来电咨询的是一位老人家。我回答后，他又说因他年逾七十，刊社里面他已是



⑦ 2015年广东侨刊乡讯采访团一行在华创会会场外合影

年轻的，但因年迈不方便亲自到广州送件。于是我与省新闻出版局的服务中心联系，让他把资料邮寄到服务中心，等许可证办理好之后，再由服务中心邮寄到开平外侨局，让主管部门下发给刊社，省却了老人家专门跑广州的麻烦。此事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一一打电话去落实，很快许可证就办理好变更并寄回到了老人家手上，让老人家很感动，逢人就说有了专委会，侨刊真的是有了娘家。

2000年以来，随着电子媒体的发展，对纸质媒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财力、人力、技术不足和观念滞后，侨刊乡讯在应对这一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专委会从成立之初就考虑为基层无法开办电子媒体的侨刊乡讯提供上网平台。2013年9月28日，在省新闻出版局支持下，经过期刊协会与有关单位合作开办，侨刊乡讯网站“唐人街网”上线试运行。上线后，网站设有今日侨乡、文化中国、乡土乡音、侨刊连线等8个频道，共40余个栏目。后来，我们还在省新闻出版局政务网开办侨刊乡讯专栏，建立侨刊乡讯数据库。2021年9月我们与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开办的广东省侨刊乡讯电子阅览中心正式启动。这一系列的合作，都为基层侨刊乡讯电子版提供免费上网的平台和机会。为了让上网平台的搭建能顺利开展，我和林主任专门带着网站、服务中心等合作单位的人员到各个基层侨刊进行宣传，现场展示上网效果，并认真听取基层侨刊的需求，主动与合作单位沟通。同时充分考虑到不少基层侨刊专职办刊人员少，办刊人员老化，对互联网了解认识不足，日常工作量大的实际情况，对报送资料环节上尽可能优化，以减少基层侨刊的工作压力及负担，让基层侨刊在没有增加工作难度的前提下免费使用到电子杂志。此举获得了基层侨刊大力欢迎，网站的报送率一直保持在比较好的水平。

我们根据调研结果向广东省委宣传部反映海外邮费涨价影响侨刊发行的困难，争取省委宣传部下拨给侨刊乡讯海外发行专用邮费补贴经费10万元，随后分类发放到海外发行量较大的达89家侨刊，这是历年对全省侨刊乡讯最大规模的专项财政补贴，各地侨刊深受鼓舞。

侨刊发展离不开党政部门的支持，专委会与

广东省委宣传部、省侨办、省侨联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将基层侨刊遇到的困难向上级部门反映，同时利用基层调研的机会，向各地领导宣传侨刊，争取对侨刊的支持。林主任在江门调研的时候认识了江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贤进，向他多次宣传侨刊的重要性。后来，林贤进到鹤山市担任市委书记后，对《鹤山乡音》给予了资金上的大力支持。

为了让侨刊乡讯的办刊人员及时了解上级意图，我们在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和支持下，从2014年起，每年都组织侨刊乡讯社长总编培训班，加强业务培训。同时，我们还积极参与中山、佛山、江门等市的侨刊培训。

为了扩大侨刊的影响力，我们与马来西亚雪隆广肇会馆合作开办全球第一个侨刊乡讯海外阅览中心——“广东侨刊乡讯吉隆坡阅览中心”；与中山图书馆合作成立国内第一个侨刊乡讯文献中心——“广东省侨刊乡讯文献中心”；成立国内第一个侨刊乡讯阅览中心——暨大华文学院

“广东省侨刊乡讯阅览中心”。2019年9月18日，我们策划的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百年侨刊 集体家书——广东侨刊乡讯创刊110周年文献展”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我们还与中国华侨博物馆商定，在北京举办“侨刊文献展”。这些举措让侨刊乡讯的知名度、阅读量和文献性都有了提升，以往不起眼的侨刊乡讯也登上图书馆和高校的“大雅之堂”。

为了帮助侨刊乡讯提升办刊水平，我们先后组织专家组，到中山、佛山、台山等侨刊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编辑业务培训。

考虑到侨刊乡讯长期处于出版界边缘，专委会成立不久，就争取省期刊协会组织广东省首届优秀侨刊乡讯、优秀侨刊工作者评比。及后，又争取将侨刊乡讯纳入“广东省优秀期刊”“广东省期刊优秀工作者”“广东省期刊优秀作品奖”等评奖体系，建立了侨刊乡讯和办刊人员的奖励机制，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同时也让侨刊编辑评



① 首个侨刊乡讯海外阅览中心在马来西亚成立

职称、晋级提供条件。

2018年开始，各地侨务系统进行调整，波及部分侨刊乡讯，产生一些问题，专委会及时向省委宣传部反映，通过省委宣传部再次明确侨刊姓“侨”的办刊定位，及时维护了部分侨刊乡讯合法权益。

结成方阵形成外宣传播合力

2016年6月22日—24日，在湖北华侨华人创业洽谈会现场，活跃着一支特别的媒体队伍：他们报道新闻，却不是国内的主流新闻媒体；他们姓“侨”却不是海外侨界的华文媒体，他们是来自广东的10家侨刊，受华创会邀请，组成广东省侨刊华创会采访团参加了华创会的全程报道活动。

这是专委会的一个“杰作”。早在2014年，专委会组织侨刊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全国期刊博览会期间，我和林干主任拜会了武汉市侨办的领导，聊起武汉市侨办承办的华侨华人创业洽谈会事宜，我灵机一动，建议林主任和对方探讨广东侨刊组团采访华创会的可能性。我们介绍了广东侨刊覆盖100多个国家，海外年发行量700多万份，进入千家万户侨胞家庭的优势，武汉市侨办觉得利用广东侨刊宣传华创会，效果应该不错，他们马上向组委会请示汇报，促成了广东侨刊组团采访华创会。

侨刊是侨务工作的抓手。过去，大多因为地域隶属关系，侨刊基本上围绕本土的题材进行报道，专委会成立后，不仅要求各地侨刊服务于当地发展大局和侨务中心工作，还组织侨刊配合国家和广东省重大侨务活动。除了武汉华创会和广东省在东莞举办的“海丝博览会”，2018年专委会争取到广东省侨办和四川省侨办的支持，组织广东省援建汶川灾区的地级市侨刊“侨爱在汶川”大型公益采访活动，作为汶川地震十周年之

际最早到汶川现场的媒体，深入乡村城镇，图文并茂报道广东各界和侨胞、港澳同胞支援灾区重建的贡献和新汶川面貌，获得了海内外一致的好评。而这些跨省、跨市的联合采访，不仅拓宽了侨刊媒体人的视野，也让原来服务单一地域侨务的侨刊跨界形成了传播合力。而这种合力更着眼于广东各地的对外宣传。我们在《看东莞》《茂名画报》《河源乡情报》《广府人》《惠州乡音》等侨刊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承办下，先后组织全省重点侨刊走进东莞、茂名、河源、南雄、惠州等地，以侨刊方阵形式，集约宣传当地的发展，收到了各地的欢迎。河源乡情报社的魏社长十分感慨：“原来组织一场活动，靠自己一家报纸报道宣传，只是河源老乡知道，现在侨刊组团报道，辐射面跳出河源籍侨胞，遍及海外的客家人、广府人、潮人，对提高河源的海外知名度事半功倍”。

我们还先后搭桥，鼓励组织中山与佛山、花都与惠州、佛山与福建、浙江等地侨刊的互访交流。这些互访和学习，让各地侨刊同行互相观摩，增进友谊，共同提高。

我们还鼓励各地侨刊针对阅读习惯和视觉习惯的变化在内容和版式设计上进行改版。10年来，约70%的侨刊陆续改出彩版，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侨刊《广州华苑》更是改版成为全国第一家面向海内外年轻学子的青年侨刊。

10年的辛劳让我对侨刊乡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侨刊社长、主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对侨刊乡讯事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2019年我还被期刊协会评为“广东省期刊优秀工作者”，这是大家对我的肯定与鼓励。

10年来，专委会在省期刊协会领导下，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团结了队伍，凝聚了人心，提高了办刊水平，形成了传播合力，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海外乡亲的精神家园做出显著的贡献。“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依然在路上，但庆幸的是，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锡兰过大年

文 杨海蒂（《人民文学》编审）

毫无筹谋，突然决定“锡兰过大年”。除夕之夜，说走就走。

锡兰即斯里兰卡。“锡兰”二字，常常见于中国古籍，可见两国之间的情谊。“斯里兰卡”诞生于一九七二年，尚未“知天命”呢。

对斯里兰卡的了解，最初来源于少时跳过的斯里兰卡舞蹈《罐舞》，其他知识储备非常有限，很惭愧，赶紧问度娘以急补：

斯里兰卡，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古称“狮子国”。接近赤道，终年如夏。风景秀丽，素有“印度洋上的珍珠”之称。

斯里兰卡是举世闻名的“宝石岛”，宝石产量位于世界前五；锡兰红茶是世界三大红茶之一，被称为“献给世界的礼物”。

又是“珍珠”又是“宝石”的，好，真好。斯里兰卡的形状，恰似一枚宝石吊坠，也像一颗情人的眼泪，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誉“世界上最美的岛屿”。无边无际的红树林缠绕着海岸，四面八方包围着“最美的岛屿”，全世界最茂密的森林，铺天盖地覆盖着“最美的岛屿”；森林里有



⑦ 斯里兰卡地形图

着无比丰富的生态多样性，也潜伏着地球上最狠毒的眼镜蛇……对斯里兰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一言以蔽之：“除了雪，这里拥有一切。”

置身于斯里兰卡，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莺歌燕舞、鸟语花香之类的词语用在这样的地方才没有违和感。

从中世纪起，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就是全球重要商业港口，有“东西方十字路口”之称，诱人的兰卡宝石、“最干净的茶”锡兰红茶，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兰卡宝石和锡兰红茶，也是吸引我前来的重要因素啊。

其实，锡兰红茶的祖先就在中国，差不多两百年前，英国人从中国引进山茶树，让它们在锡兰生根发芽。

科伦坡处处可见欧式建筑，这是大英帝国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历史印记。现如今，坐落于总统府后面的“莲花（电视）塔”，是斯里兰卡地标性建筑，据时任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程学源先生介绍，它是南亚的最高建筑，是中方融资并承建的两国友好合作项目。正是这位学者型的程学源大使，为了“印度洋的心脏”“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汉班托塔港的建成，数月内数十次面见斯里兰卡总统、总理，最终为中斯友好合作又下一城。“汉班托塔港事件”曾举世瞩目，而今说来，倒有些“此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意味了。

斯里兰卡是佛国，莲花是其国花。五千多座佛寺遍布斯里兰卡岛国，但看着维多利亚公园门口五短身材的变形金佛，我真是醉了。刚噶拉马寺里的本土产佛祖，则长着一副阿拉伯人的面孔，当然，寺里来自中国的观音菩萨和关公财神塑像，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刚噶拉马寺庭院里还有一尊大玉佛，连同佛龕重达四十八吨，系中国福建泉州商人捐赠。

这是文化交流，也是礼尚往来。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六十五岁的东晋僧人法显，从

长安出发到印度取经，是第一个将梵文经典引入中国的高僧。十年后，法显从印度南部乘船抵达锡兰，十五年远游，锡兰是他最后一站。笃信佛教的锡兰国王听法显说中国的孝武帝崇奉佛教，特遣使者赠给孝武帝一尊四尺二寸高的玉佛，孝武帝将之供奉于南京瓦官寺，可惜后来失传。法显回国后著述《佛国记》，记录了锡兰的风土人情，成为研究锡兰的重要史料。他在斯里兰卡家喻户晓备受崇敬，栖身过的岩洞被称为“法显岩洞”，一直香火鼎盛。

另一个为斯里兰卡人熟知的中国人是郑和。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保存着一块“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石碑顶部刻有花纹和“二龙戏珠”浮雕，右侧的汉字依稀可辨“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左侧横书的泰米尔文、波斯文损毁较为严重。郑和下西洋前在南京将石碑刻好，分别用三种语言表示对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敬颂，体现出大明王朝的世界眼光和中国气度。郑和在海外多地立碑，但被发现并保存至今的独此一块，它是郑和七下西洋壮举的真实历史见证。

后来，中、锡两国交往越发密切。据《明史》记载，锡兰国王派王子出使中国，船队抵达世界最大港口之一、东方第一大港福建泉州后，王子登岸四处闲逛，对繁华的泉州港以及满城盛开的刺桐花印象深刻。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冥冥中缘分天定，王子在华期间，锡兰国发生重大变故，归国无望的王子索性定居泉州，取“世”为姓，世代繁衍，“狮子”血脉从此融入中华民族。

斯里兰卡的国旗呈长方形，形状奇特图案漂亮：左边框里是绿、橙两色竖长方形，右侧为咖啡色长方形，中间是一头紧握战刀的黄色狮子，四角各有一片菩提树叶。咖啡色代表僧伽罗族，橙、绿色代表少数民族，黄色边框象征人民追求光明和幸福，恰与国土轮廓相似的菩提树叶表示



⑦ 莲花（电视）塔

对佛教的信仰，狮子象征国民刚强勇敢。

同样喜欢“狮子国”民族风格鲜明、宗教意味浓郁的国徽。国徽图案中心也是一头狮子，赭红底色代表丰富矿产；环绕着狮子的十六朵金莲花，象征圣洁吉祥；环绕着金莲花花瓣的两穗稻谷，象征五谷丰登；顶端的佛教法轮，象征佛法永远护佑斯国；下端的花碗，两侧分别是散发着光芒的太阳和月亮，象征国家如日月一样永恒。

在僧伽罗语中，斯里兰卡意为“光明的乐土”“光明富庶的土地”。

国树铁木、国花莲花，在斯里兰卡随处可见。自从佛教最有力的护法者、印度阿育王派其子来到“狮子国”布道，僧伽罗人就摒弃婆罗门教而改信佛教，从此，佛教成为锡兰国教，“狮子”们纷纷拜倒在佛祖脚下。

“每年东南信风吹起，海流轻拂印度洋上的明珠，斯里兰卡是世界尽头灵魂的故乡。在东西古城的菩提树下，回想锡吉里耶的经文，赴一场佛牙寺的众神狂欢。”马克·吐温饱含深情提到的康提，位于斯里兰卡中部，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有亚洲最大的植物园。巨大而秀美的康提湖位于康提市中心，湖边树木参天，鲜花怒放。康提湖之于康提，犹如西湖之于杭州，也如东湖之于武汉，是城市的灵魂，是市民的骄傲。自从佛牙从印度传入，康提便成为全世界佛教徒的朝圣地。闻名于世的佛牙寺，就坐



② 康提佛牙寺中拜佛的信众

落于美丽的康提湖畔。

佛牙寺始建于十五世纪，有围墙和护寺河环绕，围墙四角各有一庙，都是为保护佛牙而建。寺院建立在高高的台基上，经过历代国王不断修缮扩建，规模越来越宏伟、结构越来越复杂，主要有佛殿、鼓殿、内殿、长厅、诵经厅、大宝库等。内殿是核心区域，正中供奉着一尊金佛，金佛前铺满莲花。内殿左侧暗室里有一座七层金塔，金塔中又有七个大小参差的小金塔，每层小金塔内都藏着各国佛教徒供奉的珍宝。最小的一座小金塔，顶部有一枚钻石，塔内有一朵金莲花，金莲花花蕊中有一只玉环，玉环中安放国宝佛牙。每天早、中、晚，在震撼心灵的鼓乐声中，三位高僧分持三把不同的钥匙，共同开启内殿大门，先在内殿举行隆重的敬拜仪式，再开启内殿拱门，让恭候在外的信徒与游人鱼贯而入，共同瞻仰供奉着佛牙的神圣金塔。

我抵达佛牙寺当日，正是礼拜天，朝圣者络绎不绝，寺院被拥挤得水泄不通，盛况有如穆斯林朝觐麦加。朝拜者无论男女老幼，皆着一袭白衣，面容庄严肃穆。佛牙寺内外，有老者长跪不起、有大汉痛哭失声、有幼童虔诚膜拜、有女子怀抱婴儿念经诵佛……

花香四溢的佛牙寺，看不到一个“功德箱”，我想捐钱却找不到地方。佛牙寺，真正莲花净土，只有花香没有铜臭。

世上仅存的两颗佛牙舍利，分别供奉于斯里兰卡的佛牙寺和中国的灵光寺，两处佛教圣地我都拜谒到了，自豪感油然而生。

一年一度的康提“佛牙节”，是世界上最为隆重的佛教庆典。开幕式上，在万人簇拥下，“武装到牙齿”的领头大象闪亮登场，身

驮装有佛牙舍利的银匣子，带领数十只盛装打扮的大象，傲娇巡游全城。每头大象脖颈上都挂着铃铛，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十分悦耳。

从美瑞莎到加勒，沿着西南海岸线行走，一路上“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在婆娑的棕榈树下观赏世界上最奇特的钓鱼方式，真是奇妙的感受。一个个古铜色皮肤的渔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他们的“钓鱼台”是一根根高耸的木杆。渔竿在渔民手中上下翻飞，“嗖”的一下，鱼钩入海了；“啪”的一声，渔民起竿了。那划过天空的一道道银色光弧，便是上当咬钩的沙丁鱼。这种不用钓饵的高跷钓鱼，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捕鱼方式，是斯里兰卡最著名的标志性画面。

处于印度洋边缘的加勒，是世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是最早入列的世界文化遗产。加勒古城的历史和地理都很复杂。还在远古时代，加勒海湾就投入了使用，加勒港口非常活跃。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盯上了加勒，强行攻入，并用坚固的花岗岩石建成三个堡垒，称之为“太阳”“月亮”“明星”。一百年后，荷兰人占领加勒城堡，在葡萄牙人的军事要塞上增建壁垒，就地

取材用珊瑚砌筑环岛城墙。之后，英国、法国、丹麦、西班牙等帝国，都对加勒垂涎三尺，一通混战，英国胜出，加勒半岛沦落为大不列颠殖民地。

郑和随船携带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英国炮舰工程师托玛林于一九一一年在加勒古城偶然发现的，当时被用作下水道的盖子，简直暴殄天物。

加勒古城及其十四座城堡，以及其他军事、商业、民用建筑，诸如城墙、城门、钟楼、吊桥、军械库、火药库、官邸住宅等，都建筑在岩石半岛上，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观。在热带雨林的掩映下，黄色的葡式建筑、白色的西式回廊、青色的荷兰教堂若隐若现。佛教传入锡兰几百年后，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相继而至，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佛寺、教堂、清真寺、印度神庙在这里如此密集。一个印度耍蛇人吹奏起魔笛，小竹篓里的灵蛇探出脑袋，身子慢慢地爬出来，随着笛声妖娆起舞。这个场景酷似电影《卡门》的镜头，吸引着我长久驻足。耍蛇人对其他观者视若无睹，一味纠缠着我索要钱财，最终给了他十美元才得以脱身。被讹诈的感觉使得我心情沮丧了老半天，哪怕西方风格、南亚风情、阿拉伯情调共同造就出的美景，也难以唤回我初来乍到时的欢欣。

日落时分，是尼甘布最迷人的时候。尼甘布，这个西部港口城市，有斯里兰卡最大的鱼市，有造型独特、非常大气洋气的五星级酒店——我下榻于此，价格相当于北京三星级酒店。酒店大门外有很多小三轮 TUK-TUK，是斯里兰卡特色的出租车，别有味道。

走在街上，处处是当地人纯真的笑脸、善意的眼神。我跳上一辆 TUK-TUK，一脸厚道的“的哥”能领会我的三脚猫英语，载着我一路狂奔往商场。往日心仪而不可得的异域风情衣裙和首饰，终于能有机会狂购了。老板娘满脸笑容，连说带比划，让我把包包放在门口椅子上。开

玩笑嘛，商场人来人往的，这我怎么敢呢？老板娘一脸疑惑，说当地人都是这么做的。TUK-TUK “的哥”是暖男，一直好脾气地等候着，还不时竖起拇指夸我眼光好。

天色已晚，回到酒店才感到后怕：异国他乡、地广人稀、语言不通，万一被人劫财灭口抛尸印度洋呢？劫色自不必多虑，斯国绝色佳人多了去了，随处可见身着纱丽身姿曼妙的美人儿，连农家柴扉也常倚着美目盼兮的妙人儿，千娇百媚，我见犹怜。

可次日傍晚，又忍不住跳上暖男“的哥”的 TUK-TUK 直奔商业街，一家家地逛，一店店地淘，一包包地买。每买一包，“的哥”就顺手接过去送到小三轮上，回来继续陪着我采购。这使我五心不定：这怎么行呢？随便哪个路人都能顺手牵羊的啊。暖男“的哥”笑眯眯地说：“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可我哪能放得下心，一直忐忑不安，时不时跑到窗边观察动静。暖男“的哥”见状，憨憨地笑起来，似乎在跟我说“有人看着呢”。我出商场后才发现那是他善意的谎言。原来这个国度当真“天下无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位于北部的阿努拉德普勒，有着两千五百多年的建城史，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僧伽罗皇城，而今是一座弥漫着信仰与修行气息的佛教圣城。阿努拉德普勒之所以成为佛教圣城，是因为城中有圣菩提寺；菩提寺之所以成为圣菩提寺，是因为寺中有圣菩提树；菩提树之所以成为圣菩提树，且听我细细道来。

话还要说回遥远的从前——西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古印度年轻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为了解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为了普度众生，毅然放弃继承王位，舍弃奢华生活，出家修行云游四方。多年苦修后，在菩提伽耶的一棵大菩提树下，他打坐静思七天七夜，苦思冥想人生真谛，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大彻大悟，成为佛祖释迦牟尼。

“菩提”为梵文 Bodhi 的音译，意思是觉悟、

智慧。菩提树很神奇：从无病虫害，能净化空气，树下冬暖夏凉。因为佛祖在菩提树下修得正果，佛门将见证了佛陀正觉的菩提树称为圣菩提树。

令佛门信徒痛心疾首的是，助佛祖得道的这棵圣菩提树竟被入侵外族毁灭。好在“天不灭曹”，早在公元前三世纪，锡兰国王向印度阿育王请求将圣菩提树移枝锡兰，阿育王派女儿前往相赠，锡兰国王将圣菩提树枝条栽植于皇城菩提寺内高台上，这就是圣菩提寺中的圣菩提树。这棵两千三百多岁的菩提树，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古老的种植树，被全世界佛教徒视为圣树，在斯里兰卡的地位几近于佛牙。

来自菩提伽耶的圣菩提树小枝长成大树后，国王又将数十根枝杈分植于全国各地，以满足修行者“在每座佛寺至少种植一棵菩提树”的心愿。

圣菩提寺中枝繁叶茂的圣菩提树，成了维系佛祖渊源的“血脉”，现如今印度佛教圣地所植菩提树，都是由它“反哺”出来的。佛教徒将礼拜圣菩提树视为礼拜佛陀，每年五六月间的月圆之日，来自四面八方数以万计的信众，聚集到圣菩提树下顶礼膜拜。为防止朝圣者拥挤误伤圣树，锡兰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先后两次为圣树修建金色围栏。

匍匐在圣菩提树下，我泪流满面不能自己。据说菩提树能助人解脱罪孽实现心愿，我不敢奢望，只求从此斩断前尘不计过往。

在中国，菩提树因《坛经》之“菩提偈”而彰。唐朝初年，受禅宗五祖弘忍之命，僧人神秀与慧能作偈呈心。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与神秀之作相比，慧能偈意更为深切、法义更为卓越。弘忍于是秘授衣钵与慧能，使之成为禅宗一代宗主。

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佛教信徒一样，中国僧众也以从锡兰引进的菩提树为尊。岭南著名佛寺

庆云寺，植有两棵二百多年前引自锡兰的菩提树，寺院将其奉为至宝，小心翼翼严加保护。二〇〇五年，为了促进中斯两国佛教文化交流，斯里兰卡僧王级大长老、佛牙寺大管家、菩提长老等人，组成佛教代表团，全程护送三株珍贵的菩提树到云南，中国佛教界在昆明著名古刹圆通寺举行了隆重的菩提树安奉仪式。

菩提树对传播佛法功莫大焉，锡兰对佛教的贡献功莫大焉。

无畏山寺是阿努拉德普勒古城的另一座著名寺庙，法显大师曾在此修行两年，《佛国记》中对它有诸多记载。古皇城阿努拉德普勒，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城市，整个老城区被辟为考古园地，这应该是史上唯一的吧。

揖别阿努拉德普勒古城、圣菩提寺、圣菩提树，拜别群山环抱的“国家文化中心”康提，离别“远东窗口和地中海缩影”加勒古城，作别纯净、迷人、原生态的美蕊沙海滩，告别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海边小镇尼甘布，大年初六，我坐上慢悠悠的“千与千寻”海上火车回科伦坡。

没有车门的小火车，沿着风景如画的印度洋海岸慢慢行进，我的心情像风一样自由。沿途到处可见大象和小动物，它们在人的眼皮底下无所顾忌地晃晃悠悠。在这个莲花遍地盛开的海岛佛国，任谁都会自然而然将生活节奏放慢，不用呼唤“等等灵魂”，灵魂随时都在。

是佛祖保佑了我，在这个碧海蓝天的美丽岛国多日，不管怎么胡吃海塞都不上火，不管如何冷热交替也没感冒。

我是多么喜欢斯里兰卡，多么喜欢这个人们声称“一生必去一次的国度”，这个多少人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我多么适应，多么快乐，多么不舍，多么留恋，甚至希望将来能定居于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岛屿”。据说人有三生三世，相信我的一个前世就在那儿，或许是康提湖中的一朵莲花，又或许是菩提寺中的一片落叶。🌍

我留学时的室友

文 冯萍（波兰华沙大学博士）

我刚进入波兰华沙大学不久，就和一位乌克兰女孩成为室友。她只有18岁，才上大一，读经济系，而我那时已经是研究生二年级了。乌克兰姑娘叫阿拉，她很喜欢美国，也喜欢看美剧。她告诉我乌克兰人分为两派，在战乱的时候，一派喜欢到中国寻求发展的机会，另一派则想到美国去。她本来也打算去美国，一边打工，一边旅游，但她母亲不同意。

她朋友很多，大多数是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其中一位是金黄色头发的白俄罗斯小伙子，比较消瘦，但个头很高。阿拉说，他是自己最好的闺蜜的男朋友。而他和他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听着，并没有太当真。

一天晚上，阿拉精心地化好了妆，穿上了性感的裙子，然后和我说：“我今晚不回来，明天早上回来。”

“你去哪儿？”我问道。

“我和朋友跳舞去。”她朝我眨了一下眼睛，嘴边扬起了笑容。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起来开始写作，这时，听到了敲门声，我打开门，看到阿拉被她闺蜜的男友搀扶着走了进来。她身上一股酒气，那小伙子问我：“可以在你们屋里待一下吗？”

我点了点头，继续回到书桌上写作。

他们两人一起躺在了床上，小声地用波兰语说话，接着不知道谁播放了电影《007》的主题曲，我扭头一看，小伙子的手撕扯着阿拉的衣服，两人开始暧昧起来。

我很生气，他们这么做是极其不尊重我的表现。我板着脸，尽量平静地说：“你们可以出去吗？我在这里学习。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宿舍。”

阿拉忙整理了凌乱的衣服，小伙子也慌忙站了起来，道了歉，就一起出去了。

从此以后，我和阿拉之间就别扭了起来。我便出去找其他同学玩，恰巧这时，我的隔壁搬来了一位德国女生兰格利，黄色的头发有些稀疏，不施粉黛，但是格外有气质。

我见她刚搬进来，就主动给她提供帮助。我对她说，如果她需要簸箕、扫把之类的工具，可以问我要。

她连连道谢。

我们就这样熟识了。我告诉她我和室友之间的矛盾。兰格利听罢，忙说道：“你可以搬到我宿舍去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室友。”

“好呀！太好了。”我就这样搬进了隔壁的宿舍里。

兰格利非常较真，对违反规则的人毫不客气。一次我们宿舍的大妈没有打扫干净厕所，

兰格利看到了非常生气，找宿舍管理人员理论。最后兰格利赢了，大妈不得不重新收拾一遍，从此我们整个楼层的人都可以享受干净的厕所。

兰格利常常给我讲她眼里的德国是什么样子的。她从小生活的小镇，邻里都互相认识，非常和谐，人们不会因为肤色的不同而互相歧视。但是有时候德国人也有粗野的一面。男人们表面上非常温柔，但一喝完酒就互相爆粗口，他们会大声嚷嚷，调戏女人。到了夜晚，德国街上会有很多酒鬼和夜不归宿的人。

我想起第一次到柏林的时候，在火车站买票就遇到了一位说英语的酒鬼，他和我们说：“你们会说英语吗？”我的朋友是个女侠，她大声呵斥道：“滚开。”酒鬼吓了一跳，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一边走，一边嘟囔道：“你们滚开。”

兰格利跟我讲起她的感情故事。她曾经受过情伤，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了，直到在一个讲座中遇到了一位单身教授。虽然教授比她大三十岁，但她被教授的才华打动了，她尤其喜欢看他那犀利的眼神，仿佛可以洞穿一切。后来，他们成了男女朋友。但她抱怨教授天天东奔西跑，没有时间与她相处。由于两人的年龄差距，兰格利总觉得这次恋爱像是在唱着挽歌。

我问她：“你想结婚吗？”

她说：“我想要孩子，之前一直在吃避孕药，现在我开始吃维生素，希望可以早点怀孕。”

我们俩有一次在宿舍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这座公园并不算太大，但是树木参差不齐，中间有个池塘，有很多野鸭子在洗澡。我们绕着公园转了一圈，浅绿色的草坪上开满了粉红色的郁金香和兰花，各种树木散发着不同的香味，吸引着蝴蝶和蜜蜂前来。在树林中间还有一个小酒吧，有很多人在这里吃烤肉喝酒。

我们走入公园的深处，看到了一座被铁栅栏围着的废墟。这时，兰格利问我：“萍，你敢进去吗？”

我看到栅栏有一个洞，我说：“敢！”

她朝我一笑，我们通过栅栏，看到了一座二层的破旧楼房，我和兰格利顺着残破的楼梯爬了上去，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看到地上的碎玻璃、垃圾以及啤酒瓶。这时，兰格利看到了一个台阶，就走了出去。

“这么多垃圾和啤酒瓶，一定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待过。”我说道。

兰格利却站在平台上望着对面繁华的公园，默不作声。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曾经和弟弟在我们小镇到处搜寻这些被遗弃的废址，有种探寻历史的感觉。我觉得这些断壁残垣才是一个城市的真实面貌，人们费尽心思掩藏的、遮盖的丑陋，而展现给世人面前的只有美好。”

这时，一个拿着啤酒的小哥也钻了进来，跟我们打招呼。

“你们是如何找到这里的？”他一边说一边笑着和我们打招呼。

兰格利用波兰语问：“这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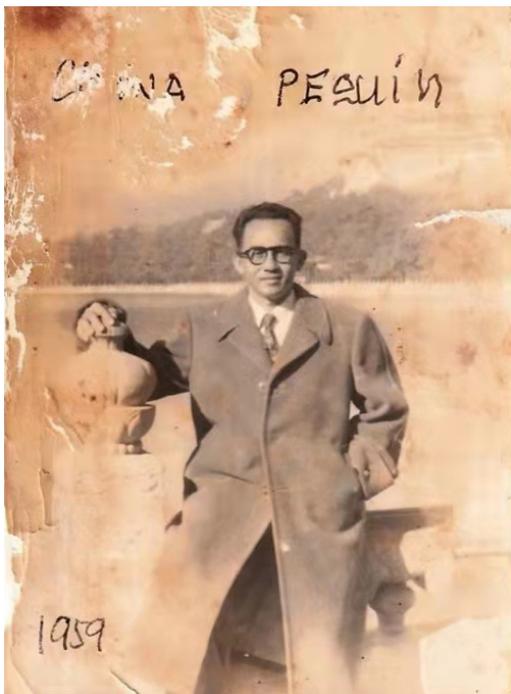
“你会波兰语！”小哥惊异地说。他告诉我们，这里在20世纪50年代时是一个公共游泳池，后来政府承担不起修缮和维护的费用，就这么荒废了。我随着兰格利和小哥一起走出了这片废墟。

后来兰格利的交换生期限到了，我们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她跟我说她住在法兰克福附近，让我有时间一定要去法兰克福找她玩。后来我去了德国很多次，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到法兰克福，不过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最后的一次通信，是在我博士生三年级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去了非洲研究非洲的生物。

我留学时的室友让我认识到了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文化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观点。无论如何，如果你心灵纯洁，这个世界则是宽容、美好的，但是如果你计较，这个世界处处和你做对。🌐

巴拿马华裔作家陈玛琳的传奇一生

文 苑雨舒（外交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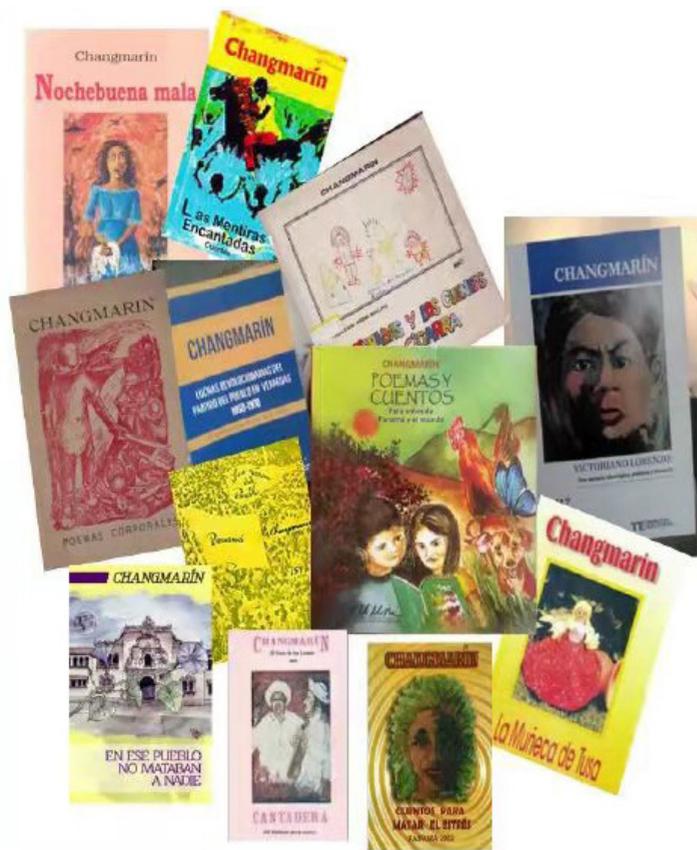
⑦ 1959年陈玛琳访华（陈玛琳基金会供图）

在大洋彼岸，有这样一位巴拿马华裔，他集作家、绘画家、摄影家、音乐家、民俗学家、记者、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等身份于一体，以其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成为蜚声巴拿马乃至拉丁美洲的跨界奇才。他就是巴拿马华裔陈玛琳。

1922年2月26日，巴拿马圣地亚哥·德·维拉瓜斯的土地上，一位名叫卡洛斯·弗朗西斯科·陈·玛琳（Carlos Francisco Chang Marin）的男孩呱呱坠地。日后，他将自己华裔父亲的姓氏“陈”和巴拿马母亲的姓氏“玛琳”合二为一，用“陈玛琳”的笔名在多个领域大放异彩。2012年12月5日，这位在巴拿马家喻户晓的天才人物与世长辞，享年90岁。他的一生横跨两个世纪，经历无数坎坷，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千锤百炼志凌云

陈玛琳的华裔血统来自祖父卡洛斯·陈。卡洛斯·陈出生于1865年6月29日，是一名广东儒生，曾出任官职。1904年，29岁的卡洛斯·陈举家移民巴拿马，到维拉瓜斯省经商，积攒下了殷实的家业。祖父在异国他乡为子孙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陈玛琳父亲出生便是华裔富家公子，但陈玛琳的母亲却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当地贫穷农家女子。在当时习俗极为传统的巴拿马，年幼的陈玛琳被迫离开母亲，跟随父亲的家族生活。然而，



◎ 陈玛琳部分文学作品（陈玛琳基金会供图）

父亲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也不抚养他，而是把他交给性情暴虐的姑姑。在姑姑家里，陈玛琳不像是侄子，反倒像是可以随意欺压的奴隶。无论是言语上的辱骂还是肢体上的惩罚，面对姑姑对陈玛琳的虐待，父亲始终无动于衷。这在年幼的陈玛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此后，他一直十分关心被欺辱、被压迫的下层民众的疾苦。

陈玛琳少小离家，辗转各地求学，从事过各种职业。少年时，他前往首都巴拿马城，做过修建军事基地和巴拿马运河的工人。在运河工作期间，他目睹了趾高气昂的美国人对待巴拿马底层劳工的奴役，种种残暴画面与幼时被姑姑虐待的场景重叠，引起他强烈的共鸣，也为成年之后他投身政界为人民争取权益，在文学作品中为底层人民发声奠定了基础。

1943年他从胡安·德莫斯特内斯·阿罗塞梅纳师范学校毕业，取得了小学教师的资格。该校大部分教师是被流放的智利和西班牙

知识分子，对陈玛琳进行了学术启蒙，为他日后投身文学和报业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的政治思想觉悟由此萌芽。1940—1950年间，陈玛琳在包括胡安·德莫斯特内斯·阿罗塞梅纳师范学校在内的众多乡村学校任教。从工地到学校，陈玛琳走上了一条用知识拯救国家命运的新道路，也开启了属于他的传奇人生。

蜚声拉美跨界王

陈玛琳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在文学、新闻、音乐、绘画、摄影和政治这六大领域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作家，陈玛琳是巴拿马文学界的无价之宝。他的一生著作等身，共创作了44部作品，包括17部诗集、13部短篇小说、5部长篇小说和9部叙述性或评论性文章集。他多次斩获巴拿马国家文学大奖——里卡多·米罗国家文学奖：1942年，诗集《鸣泣之时》（*Punto'e Llanto*）获诗歌类优秀奖；1956年，诗集《身体的诗》（*Poemas Corporales*）获诗歌类二等奖；1962年，短篇小说集《芦苇帘》（*Cañizos*）获小说类二等奖；1982年，小说《透明的

游击队员》(*El guerrillero transparente*) 获小说类一等奖。

陈玛琳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利用诗歌展现巴拿马社会现实，尤其是下层农民的生活挣扎，抨击社会弊病，思考国家身份和前进方向。他也擅长创作短篇小说，题材主要分两大类：其一为政治小说，借故事咏史兴怀；其二为情感小说，不掺杂政治元素，而是纯粹地用疾风暴雨般的独特风格表达自己强烈而丰富的情感。他的长篇小说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以历史事件为主要创作题材，书写中尤其关注细节。儿童和青少年文学也是陈玛琳一直关注的题材，这些作品往往取材于作者本人的经历，尤其是在家乡的小乡村里度过的那段美好却短暂的童年时光。利用精美的插图，陈玛琳激发了儿童和少年读者的兴趣。而他纯稚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也引起了成年读者对人性最简单、最质朴的那份美好的共鸣与向往，被评论家认为是巴拿马文学的瑰宝。他的杂文作品主要讨论民俗、艺术、历史和政治问题，尤其关注美国和巴拿马之间由于运河产生的种种争端、派生的经济模式和对区域发展产生的影响。陈玛琳在这些杂文中强烈批判美国当代国际政策，并对其他西方强国和包括关贸组织在内的重要国际组织行为进行了冷静思考。

总的来说，陈玛琳的文学创作主题以反思历史和反映现实为主。他描写巴拿马农民、土著等下层弱势群体的真实生活，为这一群体发声，争取公平、正义。同时也思考国家的命运和身份，聚焦文化多样化，也对民俗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研究。他的创作手法以现实主义为主，语言质朴，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花哨的形式，更从不对所谓的文风潮流随波逐流，其创作一直力求通俗易懂。

作为新闻从业者，陈玛琳年少成名。二战期间，年轻的陈玛琳在“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做过主播。后来他还投身报业，拉开了巴拿马风行一

时的“革命小报”的序幕。此外，陈玛琳还担任了《团结报》《人民党机关报》和理论杂志《分析》的主编，他的文章也经常发表在各类颇有影响力的大报上，如《评论报》长年有他的专栏“给图拉的著名的信”。

作为音乐家，陈玛琳的作品风靡巴拿马。他十分擅长“Décima”这种巴拿马民间音乐。一般来讲Décima的歌词由八音节诗句组成，巴拿马农民经常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想。陈玛琳自己作词谱曲创作的《开曼叔叔》被广为传唱，更传播到智利、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古巴等其他拉美国家。《巴拿马生日》这首歌也深受大众喜爱，在音乐大师埃德加·金特罗指挥下由DEXA乐队演奏录制。2003年，陈玛琳制作了专辑《巴拿马之魂》，其中收录了许多巴拿马民间音乐，为向世界宣传巴拿马文化和小商品添砖加瓦。

作为画家和摄影家，陈玛琳留下了许多作品。作为左翼领袖遭受迫害被迫流亡智利期间，陈玛琳在智利的大学选修了绘画课程，用图形和色彩直观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之后，他又开始涉足摄影，用镜头的语言捕捉自然和社会中那些令人难忘、引人深思的瞬间。

作为社会活动家，陈玛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年轻时他就投身青年运动，多次领导学生起义，二战期间成立了“维拉瓜斯青年联盟”，召开巴拿马首届全国青年大会。1950年，反共的保守派总统雷蒙已经上任，在这种对左翼势力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陈玛琳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主义性质的巴拿马人民党，开始进行地下活动。他的家乡维拉瓜斯省是农业大省，那里的农民历来受到地主阶级的严重剥削，陈玛琳担负起农民运动领袖的责任，全然不顾当时雷蒙对于左翼领袖的大肆捕杀。在严密的安全措施下，陈玛琳死里逃生，但却难逃多年的牢狱之灾。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停止为了公平正义和人民福祉而战斗。

受邀访华亲红色

加入人民党后，陈玛琳的中国血统与红色基因完美融合。1952年，陈玛琳作为代表受邀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祖父离开故土48年后他踏上了寻根的旅途，而且借此机会访问了苏联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共产主义运动成功经验。返回巴拿马后，他因为从中国带回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录像而再度锒铛入狱。尽管如此，7年后的1959年，为庆祝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巴拿马人民党受邀前往中国参加庆祝活动，作为党员，陈玛琳再次毅然启程前往中国。

两次中国之行激发了流淌在陈玛琳血脉中的中国魂，让他的本源之情汹涌澎湃。养育祖父的这个东方大国给陈玛琳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



⑦ 1959年陈玛琳访华时游览长城（陈玛琳基金会供图）

陈玛琳创作了6篇诗歌，描述他参观过的6座中国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和武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破了旧枷锁，以崭新的面貌给陈玛琳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中国之行中，陈玛琳对毛泽东同志的诗和文章极为推崇，自己动手翻译了多部作品，以《红心中的中国》为题集结成册出版。

铁肩担义华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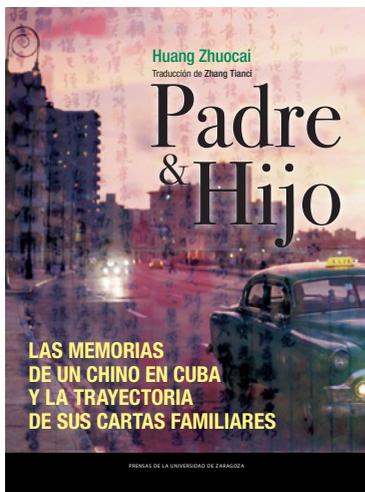
90年弹指一挥，回首属于陈玛琳的世纪，他在艺术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大放异彩。作为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以笔为武器，为下层民众发声，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寻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翻案，陈玛琳表达了他对巴拿马共和国的成立、国家的身份以及巴拿马社会多元文化的深刻思考。作为艺术家，他用各种方式捕捉祖国独特的美，更展现真实的世界。

他既是天赋异禀的全才人物，更是意志坚定的人民战士。即便是成年后他通过知识实现了阶级的跨越，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将一生奉献给了为最受压迫的贫苦大众斗争这一光荣使命。正如他融合了两个姓氏而造就的笔名一样，他的人生也充满了奇妙的因缘际会：中国君子讲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拉丁美洲高知群体向来有着双手紧握艺术创作的同时两肩勇于挑起社会责任的传统。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不谋而合，在陈玛琳这一东西方交融的“结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陈玛琳始终不忘自己所来之路，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地回到祖父的祖国，吸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功经验，去思考和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

在陈玛琳漫长的人生路上，暴风骤雨从未停歇，但他质朴而坚韧的人生航船却始终四平八稳，为大洋两岸的巴拿马人和中国人都留下了值得为之动容的精神财富。🌐

《鸿雁飞越加勒比》西文版序言

文 徐世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① 黄卓才所著《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西班牙文版封面

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黄卓才先生所著《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一书的西班牙文版即将出版，我感到十分高兴，并表示衷心祝贺！

《鸿雁》一书的基础史料是黄卓才教授珍藏的40多封父亲家书。他父亲黄宝世（Fernando Wong, 1898—1975）生前是古巴华侨领袖之一，曾任古巴中部城市大萨瓜市（Sagua la Grande，又译大沙华）中华会馆终身主席。

这40多封家书写于1952—1975年，均寄自大萨瓜。书中按时间排序，紧扣家书内容，以富于感情的文学笔法和精炼的语言，娓娓道出旅古华侨几代人的百年繁衍、奋斗与发展，既活现了一个移民跨国家庭的私人生活史，又真实和生动地反映了旅古华侨在古巴的生活、工作和奋斗的历史，这本书被誉为立体的最真实可信的古巴华侨史。通过本书，读者不仅能寻找到由契约华工到自由移民历代旅古华侨的足迹，而且能深入了解他们的历史和现状，本书还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一段中国和古巴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

1847年6月3日，悬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奥坎多号”（Oquendo）双桅帆船运载着206名契约华工（原载212名，途中死了6名），经过131天的航行，从中国的厦门抵达哈瓦那附近的雷格拉（Regla），开启了华工大量输入古巴的浪潮。据不同的统计，在19世纪中期先后到达古巴的契约华工有十四五万人，古巴是当时拉美国家中契约华工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从1847年至今，中国人抵达古巴已经173年。在这173年里，华侨华人在古巴经历了殖民时期（1874—1902年）、共和国时期（1902—1959年）和革命时期（1959年—现在）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一部古巴华侨史是中国移民一部辛酸的奋斗史，又是一部坎坷的发展史。170多年来，在古巴的华侨华人以其勤劳、勇敢和奉献精神，为古巴的独



⑦ 2014年，黄卓才夫妇携儿孙前往古巴寻根，在父亲侨居地大萨瓜市郊留影

立和民族解放，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促进中国与古巴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历史的原因，黄卓才教授没能在他父亲生前到访古巴，他父亲黄宝世老人家生前也没能回祖国和故乡探亲。但是，黄卓才教授并没有停止他追寻古巴华侨华人的踪迹。近年来，他曾两次率亲属组成“跨国家庭访问团”访问古巴，到黄宝世老人家墓前扫墓，寻找其生活和工作的轨迹。继2006年他出版《古巴华侨家书故事》之后，他于2011年、2016年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第二、三版。2017年他又出版了《古巴随笔 追寻华人踪迹》散文集，并与西南科技大学的袁艳博士编著了《从契约华工到改革先锋》一书，以纪念中国人抵达古巴170周年。

2020年是中古建交60周年，《鸿雁飞越加

勒比》一书西班牙文版的出版是对中古建交60周年最好的纪念。

这个西班牙文译本，译者是张天慈小姐，审订者是古巴玛丽亚教授和闫立博士，都是由于被书中的人物故事所感动，而决心把它传给西语读者的。他们花了6年精心打磨。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无私奉献，值得点赞。

探索和研究古巴和拉美华侨的历史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系统工程。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从事古巴和拉美问题研究的学者，我衷心希望黄卓才教授所在的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和中国、古巴以及其他国家研究古巴和拉美华人华侨的机构和学者能共同努力，一起更好地发掘、整理、研究和出版有关古巴和拉美华侨华人历史和现状的资料和书籍，为中古、中拉友谊添砖加瓦。🌐



广东侨联工作

经济科技品牌

侨创

南粤

汇集侨资侨才侨智，凝聚侨情侨心侨力，共享机遇，共创多赢，服务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





《国运祺昌》，96cm x 180cm，纸本/国画



画家简介

邓国祺，牧荷堂主。出生于广州，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珀斯。澳大利亚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澳东方文化艺术协会（政府注册）创会会长。

2002年，澳洲联邦政府铸币厂首次以中国艺术家作品为题材，向全球限量发行百套《邓国祺国画马年金币》——正面为马，背面为英女皇像的特定版纯金金币国画套装，并创下全部售罄记录。

2014年5月，应邀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

2014年7月，作品《国运祺昌》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邓国祺先生的胸中有九天云霞，落笔成幅，线条明快飘逸，色泽艳丽雍容，可以说铺张肥美到骨子里，宛若贵妃之态。

——《华夏》总编辑、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迪生

服务经济发展 依法维护侨益 拓展海外联谊 积极参政议政 弘扬中华文化 参与社会建设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陈碧信 / 摄

华侨华人的心跳
是海之交响
天涯海角，日月同在
无论你在何方
每一滴水
都会像大海一样
波澜壮阔，生命无限



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Guangdong Province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